前　言

本书名为《民国三教九流归宿》，似有必要首先来追寻一番“三教九流”一词的由来及定义。

所谓三教，原是指儒教、佛教和道教。《北史·李士谦传》载：“士谦善谈元理，客问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星也。”九流原是指先秦学术流派，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与九流合称，其本意有二。一是泛指各色人物或各种行当。如《西厢记》中有：“俺这里有一座寺，名曰普救寺……南来北往，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水浒传》第七十一回载：“其人则有帝子神孙，

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剑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二是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宋代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称：（梁武帝）“问三教九流及汉朝旧事，了如目前”。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又载：“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北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在现代汉语中，三教九流常作为各种学问、职业的总称。但有一点需指出，该词含明显的贬义色彩。所以，“三教九流人物”在口语的运用中，多是指那些游离于正常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之外的人物。

民国时代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的年代。这三十八年间，社会之黑暗、政治之腐败、政权之更迭、军阀之割据、人民之流离，展示了一幅战争与荒乱的场景。这一背景为各色人等的登场提供了宽广的舞台。因此，尽管三教九流人物历朝历代有之，而在民国时期为甚。

作为下层社会组织的帮会，在民国的病态社会里退化、癌变、腐败，并演为空前绝后的黑社会组织；五花八门的帮会培育出一批批称三山五岳、可呼风唤雨的帮会首领、龙头大爷。作为会党一支的会道门，也各自团聚在掌门人的周围，向城镇乡村展示他们的各自相异又大致相同的宗旨。同样，乡村的灾难、破产与无序，使下野武人、失意政客之流有了用武之地、可乘之机，他们呼啸聚集，形成一支支武装势力，求生于夹缝，扰乱在山乡，他们的膨胀使民国社会成了“土匪世界”。同样，在城市近代化的曲折过程中，也出现了一批身倚黑白两道，地位未必顶尖显赫，社会声名却实在不小，上至排难解纷，下至婚丧庆典，均少不了他们的闻人大亨。至 30 年代，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有些流氓无赖、堕落文人、龙头军人等纷纷卖身投靠，认贼为父，从而出现了面目狰狞的汉奸团层。如果我们把这种种三教九流人物置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就会看到正因为主体社会的病态与险恶，驱良为盗，逼正为邪，才使得这类人物如同割烧不尽的

野草，此消而彼长，绵延而不绝。

民国时代也是一个由封建专制时代向新民主主义新社会转变的时期。处在这黑暗转向光明、落后变为进步时期的人，大多会打上时代的印痕，即使是三教九流人物也不例外。他们中有些人迷恋权力与享受，跟反动政府沆瀣一气，或专事剽掠，或横行霸道，最终走上与人民为敌的不齿之路，如应桂馨、黄清沅、袁文会之流；有些人受传统文化的熏染，侠义精神与流氓意识同存，或邪或正，时侠时盗，但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亦能与时俱进，如徐朗西、顾竹轩等；还有些人承帮会反清复明之遗旨，秉江湖义气，于邪风浊流中独掌正义，手刃恶徒，以除暴安良为职事，他们虽出自帮会的庙堂，然却是众人景仰的大侠，如白朗、杜心武、王亚樵等。即使如上海三大亨这样的黑社会顶尖人物，在时代的叉路口，也会观测与转化，认贼为父的张啸林自勿庸多言，黄金荣、杜月笙在旧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刻，均与光明和正义有所接触、有所合作，因此在人生归宿的终极时刻，写下了还算可取的一页。以上种种，构成了民国社会千奇百怪的一面，成为民国历史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当然，广义而言，三教九流人物可谓是无所不包，除本书所列入的以外，尚有清客、乞丐、窃贼、混混儿、江湖郎中、保镖赌客、风水先生、占卜相士，等等。历史是多棱镜，在轰轰烈烈的历史正剧的背后，往往有着三教九流的活动。了解这等人物和行当，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从多方面多角度地反映并揭示民国社会的本来面目。

本书在数以千百计的民国三教九流人物中选取了六十人，其生平事迹，多为正史所不载，但其所作所为，又与历史的风云紧密相依，并在某些历史事件或风气向化的关节点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特殊角色，于欲了解民国历史的读者，不无开卷之益。

稍感遗憾的是，本书为民国人物归宿丛书之一种，而且因为

是归宿丛书，传主必须有归宿，而那些虽色彩斑斓但难觅“归宿”或史料缺乏难以谋篇者，就只能割“爱”了。本书为应出版社之命而作，作者们寻觅爬梳史料，谋篇布章写作均敬谨努力，对于他们的出色工作，我表示十分的感谢和敬意。当然，若有错误疏漏之处，由我与撰者共同负责，并敬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苏智良

1997 年 3 月

目　录

上海"三大亨"的收场

"龙头将军"的命运

被告席上的"海上三老"

江湖游侠的沉浮

助纣为虐的帮会头目

分道扬镳的青帮首领

南北巨匪的末日

烟贩毒枭的覆灭

坛主道首的结局

呼风唤雨的名猾巨蝇

银幕下的反派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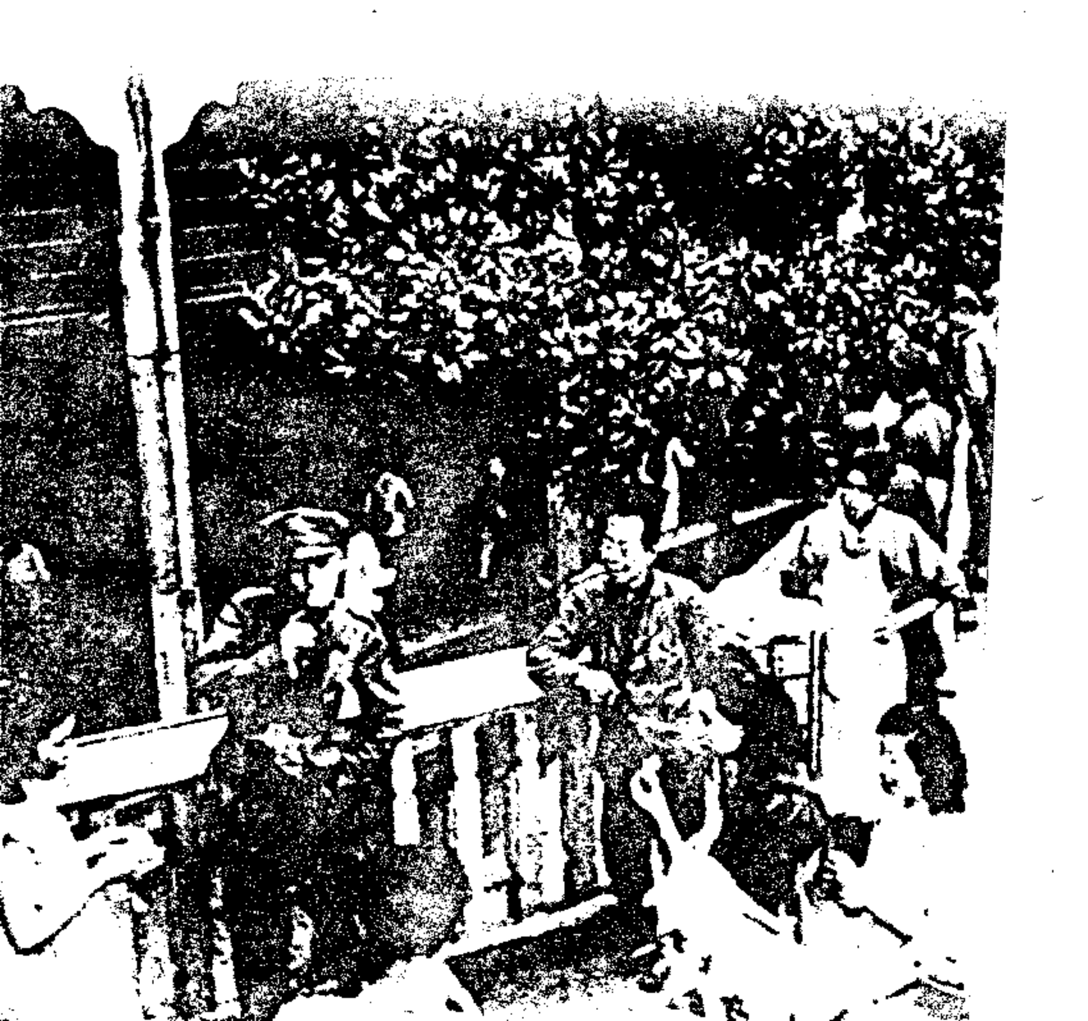
作恶自毙的市虎山魈

“名妓”萍踪

帮门鹰犬的可耻下场

难逃天网的残渣余孽

洪门山主的道路选择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洪门失去了“反清复明”的传统政治目标，林林总总的山门香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快蜕变成一个品流复杂、良莠并存的特殊的社会成员组合，既多牛头马面的充斥，但也不乏善识忠奸大义、能追时代潮流的人物。几个“龙头大哥”的结局，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在衰落中走向分化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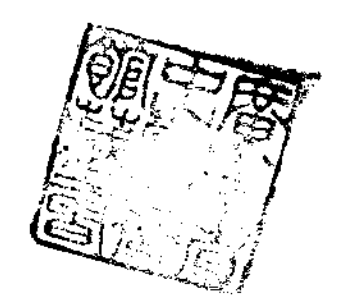




血洒梧州



王亚樵，字擎宇，别字九光，安徽合肥人，1889年生。早年与朋友结拜为兄弟，排行第九，人称王老九。自幼性情刚烈，向往荆轲、聂政，以侠义自许，以改造社会为己任。1913年到上海做苦力，不久打出一片天地，成为拥有千百门徒的的“斧头党”头领，从此开始其背景复杂、行动隐匿而令世人瞩目的暗杀活动，被称为“暗杀大王”。



1922年，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而明争暗斗。卢以亲信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齐则委爱将徐国梁为上海警察厅长。卢为剪除齐燮元的臂膀，欲觅侠士以杀徐，时上海斧头党首领王亚樵与卢公子筱嘉已熟识，且豪爽仗义、敢作敢为，卢永祥乃托王杀徐，并交王二万元为经费。

王亚樵承喏后，即召集心腹徒众等，取一万元分发，限一个月内完成任务。然而这些帮会徒众均是上海的“三光码子”(即吃光、用光、当光)，有了巨款便先去四马路(今福州路)吃喝嫖赌，三个星期过去后，徐国梁的一根毫毛也未损伤，王亚樵急了，将徒众召来训骂一顿，又掷出五千元，限一个星期必须取徐的人头。两日后，王徒郑益庵侦得徐国梁每日下午必至大世界对门的温泉浴室洗澡，王亚樵大喜，即与郑于1923年11月10日下午到该处守候。当徐浴罢出来，正要上车，王、郑双枪并发，弹中要害，徐国梁被杀。王亚樵为卢永祥除一心腹大患，卢为酬谢，除再赠重金外，委王为浙江别动队司令。

当时，孙中山致力于反直(曹锟)三角联盟，知王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交厚，特请王负责联络，因此，王亚樵此时亦十分活跃。但到1925年春，卢永祥兵败下野，王的别动队也只得作鸟兽散了。接着，他先去河南投奔胡景翼，得了个混成旅长；不久胡暴病身亡，王又率部南下广东，加入中国国民党，结识蒋介石。此后被国民党派到上海来工作。一次，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联益坊议事，王与杨虎意见不一，发生争执，王面对身材高大的杨虎，急中生智站到椅子上，“啪”“啪”，伸手就是两个耳光，杨虎畏惧王之气势，竟不敢还手，只一笑了之。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宋子文等控制政权，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之说。王亚樵对蒋介石的一党独裁极度不满，宣布与之决裂；而对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颇有好感，

因此主张拥汪反蒋。王曾数次派干将谋刺蒋介石，均因蒋防犯严密而无从下手。于是，王亚樵决定改刺宋子文。

宋子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蒋介石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1931年春，王亚樵为侦察宋之行踪，在上海蒲柏路(今太仓路)召集部下议事，随后，责令华克之、张玉华等组成南京小组，以刘刚、李恺等组成上海小组，分头准备。

7月22日，南京小组向王亚樵发出密电："康叔(宋子文之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立即出动二十余人，将上海北火车站围定。23日晨8时许，宋子文偕秘书唐腴胪等下车向出口处走去，现场指挥华克之命枪手陈成出击。不料是日宋与秘书均着白哔叽西装，戴拿破仑帽，身材也差不多，陈成仓促之间分辨不清，竟将唐腴胪击毙，华克之见一人倒地，认为刺宋成功，即扔出烟幕弹，掩护部下安全脱身。宋子文遂逃脱一难。

刺宋案后，国民党警特机关侦骑四出，寻找策划者，后被王亚樵指挥的另一谋刺上海市长吴铁城小组成员何永安所出卖，遂知是王亚樵主谋，蒋介石对王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十九路军在闸北英勇抵抗日军进攻。王亚樵即发动工人、市民投入抗日，他联合其他人组成上海市抗日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编成二十个大队投入战斗，专门锄杀日军、汉奸。后日本援军赶到，大将白川为指挥官，王得知白川在日旗舰出云号上的消息，即与龚湘龄等策划，研究自制水雷突击，结果因偏差而没有击中。

爆出云、除白川的行动虽未成功，王并不气馁，并继续寻找良机。淞沪停战后，志高气昂的日军拟在4月29日天长节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大会。王亚樵得悉后异常气愤，认为日军此举是对我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发誓要炸死白川，捣毁此会。

日军规定天长节祝捷大会只准日本、台湾和朝鲜人参加。王亚樵更与在沪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合作。4月26日，王在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沧州饭店与韩国友人安昌浩商议合作抗日,决定用定时炸弹爆炸会场,定时炸弹由安昌浩负责,而一应经费则由王亚樵负担;投弹人员由临时政府负责物色,王则予以配合。王有胞弟王述樵身材矮胖,留有小胡子,又能说几句日语,像个日本人,便负责与安昌浩联络,王述樵当日便给安送去四万元。

安昌浩与王亚樵商定后,即在其寓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 40 号召集韩国志士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宣布与中国抗日同志合作;然后商妥方案,务必一举成功。

4 月 29 日上午,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均着日人服装前往虹口公园,尹手提热水瓶炸弹进入会场,并将其置于庆祝会主席台的台脚边,并负责看住它不被他人拿走。正当白川演讲之际,炸弹炸响了,结果白川和居留民团负责人河端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师团长植田、舰队司令野村、总领事村井、书记长友野等均受伤。而尹奉吉不幸就义牺牲。事后王亚樵又送韩国志士四万元表示慰劳,并将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庆顺里的一所房子购下作为韩国志士的栖身之所。

事后蒋介石对虹口案也颇欣赏,特命上海特务头目胡抱一转赠巨款给王亚樵,以资奖励,并取消了对王的通缉。

然而,王亚樵仍继续反对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蒋介石。1933 年 11 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抗日反蒋。王亚樵即以安徽人民的名义加入。福建人民政府被蒋介石镇压失败后,第三党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张抗日反蒋拥共,王亚樵又积极参加。大同盟同人指出蒋汪不除,国无宁日。王即挺身承担暗杀蒋汪之重任。王立刻召集华克之、郑抱真、孙凤鸣等密议,遂于 1934 年 9 月在南京望鹤楼 2 号设立"晨光通迅社",作为暗杀活动的专门机构(后迁至南京陆家巷 23 号)。

1935 年 11 月 1 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孙凤鸣以记者身份藏枪进入中央党部大礼堂。上午大会开幕后,由汪精卫

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二十分钟后，国民党中委们齐往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时记者云集，委员们说笑逗乐，秩序稍乱，蒋介石见了便让秘书找叶楚伧查问，因此没有出场合影。孙凤鸣见状，即按原计划刺杀第二目标。9 时 35 分合影完毕，中委们正拟返身上楼进入会场，孙凤鸣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边向汪精卫连击三枪，果然弹弹命中。后张继将孙凤鸣拦腰抱住，张学良上前将孙踢倒，汪的卫士向其连击两枪，孙被捕后次日身亡。

汪精卫被刺案发生后，汪派人物及朝野人士均怀疑此乃蒋介石指使，一时指责之声四起。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严令戴笠限期破案。戴从孙凤鸣的记者证追查，将晨光通讯社张玉华等抓获，查清为王亚樵指使。蒋遂令戴笠必须除掉王亚樵，活的见人，死的见尸。

追击令下，王亚樵于 1935 年 12 月 25 日派人将交通部常务次长、外交部顾问、有卖国嫌疑的唐有壬，刺杀在其上海甘世东路(今嘉善路)甘村 3 弄 235 号门前，然后从容前往香港。

追捕的戴笠与被追捕的王亚樵，原来曾有一段密切联系。早在戴笠流浪上海滩的时期，王亚樵已是名闻海内的豪侠之士。戴笠十分仰慕王之名声，请求朋友介绍相识。王亦很欣赏戴之才干，两人义结金兰，戴笠还曾入居王宅。后来戴笠返回故乡江山，与王关系渐渐疏远。戴笠出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后，曾向蒋介石推荐，说王是不可多得之人才。但蒋批示：“这种人不可用。”从此，戴笠秉承蒋之命令，对王采取打击态度，甘为蒋之走狗。王亚樵曾致书，谴责戴笠唯蒋之命是从，手足之情从此中止。

此番，戴笠侦知王亚樵已潜往香港，即率得力干将跟踪至港，强烈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协助逮捕王亚樵。而香港情报处长勃朗已得到胡汉民、李济深等要求关照王亚樵的口信，故一面拒绝戴笠，一面通知王亚樵转移。

于是，王亚樵再度回内地。李济深的老家在广西梧州，这里地处粤桂交界之处，容易隐蔽藏匿。1936 年春，王亚樵到达梧州，改名匡云书。广西省政府负责保护王亚樵，并每月提供五百元生活费。

遭受挫折的戴笠改取迂回战术。他先逮捕王之亲信余立奎，然后派特务陈亦川到香港，收买余妻余婉君，许以救余立奎出狱为条件，让余提供王之行踪。余经不住威胁利诱，遂供出王亚樵在梧州。

这时的梧州，属西南反蒋势力的禁地，因此王亚樵在此亦渐放松了警惕。戴笠采取突袭手段，派特务陈资平率二十余人，携余婉君乘一快艇直奔梧州，先遣余婉君与王见面。余系老友之妻，与王相识已久，因此没有遭到王的怀疑。至此，戴笠的计划已成功了一半。

1936 年 10 月 20 日，王亚樵与余婉君在李济深胞兄处用餐后，余约王去住处，称有要事相告，王乃只身前往。刚入余寓，王便感觉不妙，正想退出，这时埋伏的特务们刀枪齐发，王亚樵身中五枪一刀，当即牺牲，时年四十七岁。还做着救夫梦的余婉君，也被欲杀人灭口的特务们砍死在一旁。

（苏智良）



遗恨绵绵

向海潜，字松坡，湖北大冶人，1888年出生。辛亥革命时任湖北民军司令，跟随孙中山、黄兴从事革命活动。后投靠奉系军阀张宗昌，担任团长，向希望在军中升官进爵，但并没得到张宗昌的重视，久之，向也意识到军阀没有前途，遂投诸洪门。

1923年，向海潜来到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取名五圣，一是为纪念洪门的前五祖、中五祖和后五祖，二是开山结义的是五兄弟五堂口：向海潜——智松堂堂主、朱卓文——仁文堂堂主、梅光培——义衡堂、明德——礼德堂、张子廉——信廉堂。五圣山的弟兄推向海潜为总山主。时向海潜居住在方浜路祥茂里，计划以上海为基地，反对北洋军阀，为洪门的发展打开新局面。

然而，近代以来，上海素为青帮之大本营，尤其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大亨的势力，上自军政宪警，下自贩夫苦力，盘根错节，不可动摇。五圣山成立后，青帮势力即对其进行排挤、封杀。于是，向海潜只能在上海的佛教寺院的住持、当家和尚中发展成员，而无法深入金融界、企业界和军警界。

而且，五圣山的堂主们也信仰各异、志趣不一，如仁文堂山主朱卓文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结为莫逆，对实际负责广东国民政府的廖仲恺极为仇视。1925年8月20日，朱指使暴徒陈顺刺杀了廖仲恺；义衡堂堂主梅光培也与此事有牵连。所以，朱、梅在开山不久就杀害了国民党左派领袖，为五圣山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

经过向海潜的多年努力，五圣山还是打开了一些局面。“四一二”政变后，向海潜与吴铁城、商震、钱大钧、杨虎城、谭延闿、李济深等建立了友谊，吴铁城为五圣山提供了经济资助，向尤与主张反蒋的李济深最为投机，李济深不仅加入了洪门，而且破天荒地出任五圣山的会办，其地位仅次于向海潜。

1936年，四十多个洪门团体为克服山头互不联系、社会影响弱小的缺点，准备在上海筹建洪门联合团体。经过酝酿，于大境路关帝庙召开洪兴协会成立大会，洪兴协会取义“同心协力，复兴洪门”。在当时的上海洪门中，向海潜的势力最强，而汪禹丞的名望最高，因此会议推举向、汪两人为洪兴协会董事长。洪兴协会成立后，事务所就设在浦东大楼五圣山的会所里。向、汪每月召开理、监事

会议，各山头的龙头大爷们彼此交流情况，联络感情，消除隔阂。过去，上海洪门内部经常为争地盘、挖墙角而互相打斗，但自从洪兴协会成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洪兴协会成立之际，抗日救亡运动正蓬勃发展，向海潜在理事会上要求具有爱国传统的洪门成员投身抗日斗争。他还派代表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等企业，向下层洪帮工人弟兄讲演洪门反清故事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召集申新第五、第六、第七厂，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工厂企业的工人在大中华酒楼聚餐，号召洪门弟兄不仅要抱洪门的义气，还要抱中国人的义气，团结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向海潜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洪流。7 月 21 日，他致电北平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全体将士，表示：二十九军的抗战为民族增光，海潜韬晦沪上，愿本孙中山反清精神，率洪门健儿，与敌寇周旋，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为能率洪门为保家卫国出力，向海潜又于 7 月 22 日致电蒋介石说，我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残暴日军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向还与青帮首领捐弃前嫌，共同发表声明说："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

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的军队抗战路线，轻视并歧视民众的抗日，因此向海潜的这些愿望没有实现，但是，向海潜仍积极参加上海的抗日活动，他是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席团成员。上海沦陷后，他与五圣山各堂主相约，无论在何地，继续参加抗日。信廉堂堂主张子廉到香港后召集在港洪门弟兄，成立中华民国香港联合保安队，与港英政府合作，抗击日军对华南的进攻。义衡堂堂主梅光培在香港警察、海员和渔民中广收门徒，并创建义勇军参加抗日。礼德堂堂主明德 1938 年在河南许昌组织抗日游击队，请洪帮首领杨庆山为顾问，这支队伍声势浩大，使日军"闻之胆寒"。五圣山会办李济深也发动本山弟兄护送大批难民从广东向内地撤退，他们曾将二万妇孺一直护送到广西桂林。

日军占领上海后，向海潜离沪先到汉口活动，后进入万县，最后到重庆。在四川胞哥范绍增等人的协同下，五圣山在四川扩展开来。首先，向海潜将重庆礼字袍哥副总社长廖开孝，仁字袍哥、军统骨干罗国熙，原二十军师长夏炯转入五圣山，然后通过这些洪帮首领将重庆的仁、义、礼各堂袍哥全部转入五圣山，这样，五圣山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洪门山头。向海潜在重庆也十分活跃，他常到洪门弟兄集中的党政机关和企业访谈，鼓励弟兄们全力抗日。他还派人到湖北组织抗日游击队，以便深入敌后打击日军。

帮会首领的活跃、帮会武装的出现，使国民政府大伤脑筋。蒋介石即使是在抗日的危难中，也没忘记削弱异己、控制全国的武装力量。蒋介石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限制并取缔帮会活动。1944 年，向海潜请明德携八千支步枪和洪帮人员经西安到敌后去，蒋介石严令打击，戴笠即指使在西北的胡宗南将枪支扣压；明德则被戴笠命令别动纵队司令刘慕德逮捕活埋。蒋介石还下令通缉向海潜，向不得不逃往桂林，后经洪帮将军樊崧甫和吴铁城等人的疏通说情，蒋才取销了通缉。向海潜在李济深那儿做了一段时间幕僚后，才回到重庆。其时，他的芙蓉嗜好相当严重，黑粮一断就不得不求告于身入五圣山的军统特务徐亮。蒋介石后来给了向一个"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虚衔，定期送些财物，把向羁縻在了重庆。

为控制全国帮会，蒋介石欲建立由军统操纵的帮会新社团。当时在重庆的洪门各山头如五圣山的山主向海潜、丽花山山主韦作民、长白山山主张树声、太华山栖霞山双龙头杨庆山等酝酿准备成立洪门最高山堂，此事被国民党侦知后，蒋介石担心洪门统一后势力巨大，万一被中共利用将不可收拾，便指令戴笠联合杜月笙等帮会头子，筹建一由军统控制的全国性帮会组织。

经酝酿，1940 年夏天，人民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向海潜与杨虎、杜月笙、杨庆山、张树声、韦作民、田得胜等七人为常务委员，戴笠担任主任委员。人动会虽有捐款献机、赈救水灾、建立秘密的抗

日交通线等活动，但人动会的活动均受到了军统 特务的限制和控制。

抗战胜利后，向海潜于 1946 年回到上海，首先便办理洪门复员，改组洪兴协会，向仍任理事长。接着，他在杭州建立五圣山码头，以曾广澍为码头官，杭州一地加人者达六千多人。时美洲洪门首领华侨司徒美堂回国到沪，以联合向海潜等，召开全球洪门大会，组建致公党，对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46 年 7 月 25 日，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贵州路湖社举行，向海潜为主席团成员，由于国民党的干涉和分化洪门，洪门组建统一、公开、独立政党的愿望终成泡影。

蒋介石、戴笠为控制全国帮会组织和武装作为打内战的资本，决定改头换面，将人动会改建为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1946 年 10 月 19 日，新建协会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成立大会，向海潜在蒋介石的淫威之下，被迫让步，担任常务理事(其余二人为杜月笙和杨虎)，实际负责人是书记长、军统特务徐亮。新建协会会址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40 号，该会号称会员五十六万人。

1946 年 4 月，向海潜六十寿辰，洪门在上海静安寺设立寿堂，孙科、吴国桢、吴开先、潘公展、王晓籁等国民党要人和社会名流均送礼祝寿，蒋介石也送礼恭贺。这一时期，向海潜还多次在上海大开香堂，广收门徒。最大的一次也是在静安寺，由向亲自主持，按照洪门传统，三节六礼，跪拜磕首。1947 年 12 月，向海潜又创立上海市协社，自任理事长，并以五圣山五堂堂主为常务理事，这是一个联络感情、生活上互助的团体。向海潜虽参加了新建协会这样的国民党控制的帮会，但并没有像杜月笙等那样，为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呐喊打气，也没参与伪国大代表的竞选，相反，在民族命运决战的时刻，开始向往进步。

1947 年，中共上海局提出要根据新建协会中成员的不同政治情况，分别对待，争取部分帮会首领，阻止国民党特务利用帮会进

行反共破坏，促使他们保持中立，不做帮凶，甚至为我所用。接着，中共上海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张执一亲自找洪门大老向海潜谈话，分析形势，希望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协助中共。

经过权衡后，向海潜向张执一表示愿意协助共产党。于是张执一指令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田云樵与向保持联系。此后的两年里，向海潜经常向共产党提供重要情报，如国民党战区指挥人员调动，部队调动，蒋介石决定下野等。向海潜还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合作，派智松堂的汪云山等秘密参加民革组织。礼德堂堂主樊崧甫也在上海与中共合作。

向海潜的这些活动被军统侦知，实际上戴笠等早已派人打入了五圣山。1949 年初，向海潜的亲信已明确提醒向说，你已被军统监视。向回答："不要管他。"仍与李济深和共产党来往，准备弃暗投明。这时，蒋介石鉴于洪门势大，五圣山的人马又遍布各地，不敢贸然行事。遂命毛人凤一定要让向海潜离开上海。上海解放前夕，向海潜被国民党特务押上飞机飞往香港。到香港后，向已失去行动自由。但他仍密派王智圣回上海，表示不为国民党所用，拥护人民政府。

此后，向海潜一家被迫到台湾。向海潜在台北恢复五圣山，除洪门活动外，并不参加其他活动。1974 年向海潜病逝。五圣山遂由遗孀李志芬接掌。

（苏智良）

徐朗西 脱险迎解放



徐朗西，字峪云，1885 年生于陕西三原东里堡。家境殷富，在四川拥有几处盐井和茶叶庄。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是东京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

孙中山历来重视帮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曾亲自参加了洪门组织,并被封为“洪棍”。在日本东京组织兴中会时,三合会的首领郑弼臣就曾率部前去加入;辛亥革命前的历次反清活动中也都有洪门兄弟参加。后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书中说:“清洪理白都是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之初,徐朗西奉孙中山之命回国联络帮会。当时日本人头山满和宫崎寅藏与中国各地帮会都有联系,在他们的介绍下,徐朗西同帮会建立了关系,并入了洪门,成为“峪云山”山主。同时,他又加入青帮,由“理”字辈颁发给证书,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大”字辈人物。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周旋于帮会之中,与帮会头目袁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次子)、步林屋、曹幼珊、阮慕白等广为结交。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认为洪门帮规仍沿用封建旧制很不妥当。于是召集洪门的九位大龙头召开“全国九龙会议”,建议废除旧制,改用军队编制,以迎合时代潮流。当时“九龙”一致同意,但因积习已久,加上时局动荡,实际上改制没有能积极实行。只有徐朗西执掌的“峪云山”不再举行传统仪式及封赠封建性质的职位,至于改变建制,也未能按照孙中山的主张实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徐朗西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联军前敌总指挥。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改任袁世凯政府的全国铁路督办。在视察全国铁路情况后,他曾有过建设十万英里铁路的打算,当时徐朗西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曾协助孙拟订计划。本来这是一项造福后人的宏伟计划,但后来因发动二次革命,只得中途作罢。

1914 年 10 月 27 日,已身为上海青[illegible]帮首领之一的徐朗西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第五局局长。[illegible]前后,徐朗西与孙中山交往频繁,关系密切。1916 年袁世凯死时徐住在上海任《民意报》记者,同年 6 月 15 日他采访了孙中山,孙指出,“目下

时局，尚未敢骤言容易解决。因袁党依然盘踞要津，国会议员尚未正式集会，完全责任内阁又未成立”，而段祺瑞“能从此真能拥护共和与否，维持秩序与否……不能妄加臆断”，通过《民意报》向全国人民表示了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的原则立场。10月，孙中山鉴于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没有完善的机关报，无法有效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决定把徐朗西主办的《民意报》定为机关报，并且把此事向中华革命党全国各地的党员作了通报。

1918年，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威胁大总统黎元洪离任，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镇压异己。当时陕、甘、宁、青、川、滇、黔七省民党联盟，组织联军讨伐段祺瑞，公推唐继尧为总司令。经共同商讨，并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大家认为应当从攻取陕西入手，因为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湘、鄂等省都是北洋军阀势力范围，虽然分直、皖两系，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分裂，而且势力雄厚，不易夺取。陕西方面，督军陈树藩虽然是段氏爪牙，但兵力较弱，并且三原有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可以遥相呼应。于是孙中山委任徐朗西为七省靖国联军援陕前锋总指挥。当徐在上海接受任命时，孙中山书赠“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给他。徐不解其意，问：“我率军援陕，此四字有何用处？”孙中山说“此次作战，靠你的军事特长，且本是陕人，此番打回老家，先得人和，定能取得胜利，倘若中途发生变化，可将此字传给后辈，作为参加革命事业的纪念。”后来“天下为公”便成为徐朗西一生行事的座右铭，也是他最终与蒋介石集团及反动帮会分道扬镳的思想根源之一。

徐朗西受命后取道粤桂至滇，经唐继尧同意率军入川。讨段期间，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两旅士兵血战半年，曾一度打到陕南紫阳，大有一鼓作气定中原之势。1918年2月，孙中山在致徐朗西的电报中表[illegible]主持，得以发展，颇感佩，……参谋长请兄荐任[illegible]准备请徐和焦易堂一道回陕为劳军使。后来因为情况变化，孙[illegible]焦易堂一人为劳军使主持陕西的事

务，但仍要徐朗西在上海与焦接洽，共同商议今后办法。

正当形势大好之时，徐朗西忽然接到唐继尧的来电，说段祺瑞准备和他们进行和谈，让徐驻军待命，以免影响谈判。徐朗西接电后非常愤慨，认为唐继尧之流背信弃义，全然不顾大局，一怒之下解甲归沪。七省联军援陕讨段的军事行动也随之结束。

徐朗西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天台路一座法式的洋房内。在沪期间，他重整了“峪云山”，并身为青帮“嘉北粮”头领，成了沪上有名的青洪帮领袖。其在洪门的地位与当时上海“三大亨”在青帮中的地位相当。

1927 年 3 月 21 日，中共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上海工人纠察队集中兵力进攻反动警察武装时，各帮会及流氓组织乘虚而入，占领没有武装掩护的各级政权机关，抢夺工人起义胜利果实。徐朗西是帮会中最先出头抢夺工人起义胜利成果的。21 日下午，他在南市斜桥打出“国民革命军上海临时指挥部总指挥”旗号，组织别动队、便衣队数百人，抢占工人纠察队攻占的政权机关，并乘乱收缴工纠队枪枝。4 月初，蒋介石为了反共与帮会商量决定，由洪门龙头张伯歧、青帮通字辈浦锦荣等组织成立了“中华共进会”，主要任务是取代上海总工会，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徐朗西也加入并成为骨干分子。“四一二”事变时，徐朗西曾组织队伍袭击上海工纠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但是徐的实力不如青帮，同国民党集团的亲近程度也不如青帮，尽管卖力，却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加上他本来就对蒋的反共政策颇为不满，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曾参与了反革命活动，走了一段弯路，但他很快幡然醒悟到这一切完全背离了中山先生的嘱托。

痛定思痛，徐朗西在“四一二”事变后便积极致力于营救上海、广州的革命者，同时在上海创办了新华艺专，自任校长，并从此不参加国民党的军政活动。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徐朗西完成了从一个帮会中的革命分子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真正革命者的转变。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党员张国威曾致函徐朗西，称赞道："先生公义为怀，站在劳苦大众方面，过去对于我们工作屡力帮助，我们是十二万分的感谢，欢迎先生和我们站在抗日的一条战线上，共救民族的危亡。"在中共的争取和鼓励下，徐朗西在上海沦陷后，从有利于共同对敌出发，除了与中共地下组织经常保持联系外，还把国民党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程克祥、彭盛木、彭寿三人介绍给周佛海，使他们得以打入汪伪内部。这时候，周佛海也急于向重庆方面靠拢，就利用程克祥等和戴笠接上了关系，提供了一些有利抗日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徐朗西都及时向中共地下党作了汇报。

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中，徐朗西通过胡振家(即胡荚)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营救被逮捕的革命志士。他的儿子徐晓耕也奉父命奔走于各特务机关之间。其间有的同志被保释了出来，而有的由于被特务掌握了确凿证据，实在无法保出，则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徐朗西的一家都为党的事业作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徐朗西创办了洪门社团"云社"，以吸收工商、文化界分子为主。其实质与原"峪云山"没什么两样，不过在上海帮会中它是以势力雄厚、作风正派而著称的。

徐朗西生平很看不起鸦片贩子，如盛幼庵、李筱宝、王永康等，对黄金荣、杜月笙的贩毒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当徐的妻子病故后，他想在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办一个图书馆作为纪念，艺专的教务长汪亚尘闻讯后马上透风给杜月笙。杜月笙正想找机会拉拢这位青洪帮头面人物，于是让魏廷荣代为转送五百大洋给徐朗西买书用，徐婉言谢绝了。后来杜月笙碰到他时说："我的钱虽然来路不正，但送给你办对社会有益的事，何必拒不接受？"徐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也知道用这笔钱买书供大家看，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但是万一读者们看书时，闻到书页上的鸦片烟味，叫我怎样做人！"可见徐虽为帮会中人，与各大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对于帮会中的肮脏

行径，却决不同流合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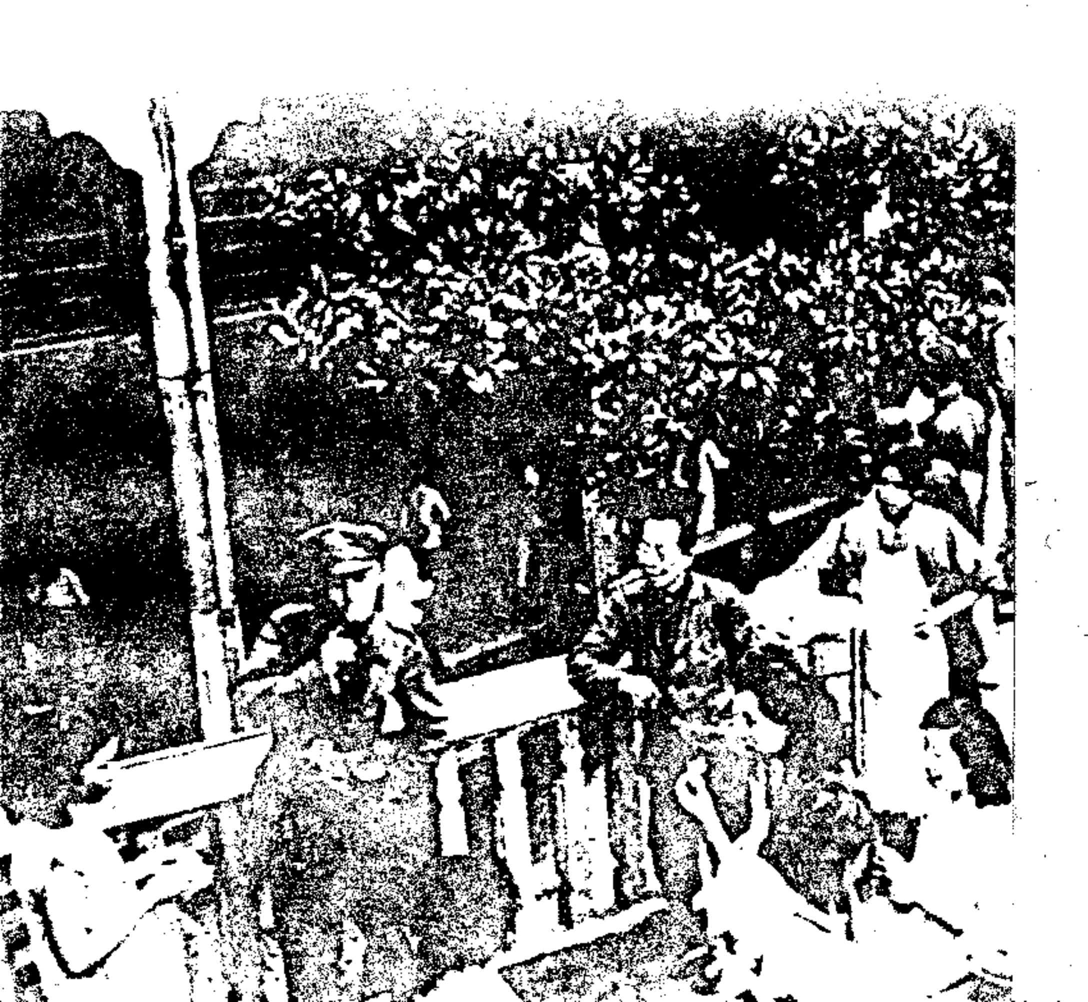
上海解放前夕，徐朗西接受中共党组织代表胡振家的指示，联络帮会控制的码头和三轮车同业公会，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准备迎接解放。这时候国民党特务已经觉察到他和中共有联系，但因没有确凿证据不敢下手。1949 年春，南京政府派于右任、戴传贤等国民党元老到上海劝徐举家迁往台湾。徐朗西和于右任是陕西小同乡，并且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在一起闹革命，但是当于劝他时，他毫不客气地说："胡子！我去台湾干什么？我宁肯在上海当'顺民'，也不愿动！"并且反唇相讥道："你从前是反蒋的，蒋给了你院长，你就'委员长万岁'了！"说罢哈哈大笑，终不为所动。

国民党方面派人"劝驾"，不过是"先礼后兵"的一着，一旦劝不成，便准备下毒手杀徐。一天徐的儿子徐晓耕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几个高级官员在一起吃饭，酒酣耳热时，有人向在座的参谋长询问："如果徐郎西拒不赴台，且与中共继续联系的话，我们将怎么办？"这位参谋长断然回答道："必要时，我们对他也只能不客气了！"其实是故意露风给徐郎西。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动员过徐朗西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转道北京，但由于徐安土重迁的思想很重，一时下不了决心。可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这一情况时，感到事态的严重了。于是他迅速与胡振家联系，经中共地下组织调查证实了徐晓耕的判断，并建议他秘密飞往香港，再转道北京。

1949 年 5 月上旬的一天，徐朗西化了装，由儿子徐晓耕亲自驾车，混过国民党特务的重重盘查，终于登上了从龙华机场起飞赴香港的最后一班飞机。后从香港转道天津到达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并且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1961 年 10 月在沪病逝。

（唐若豪）

遗恨终天话绿林



杀富济贫，抗敌御侮，崛起于草莽的游民武装，也曾席卷中州大地、驰骋白山黑水，创造出几多有声有色的壮剧，而其终结又无不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遗恨终天，良可扼腕。



战死虎狼爬岭

白朗，字明心，河南省宝丰县人，1873年出生。幼年曾读书年余，后在家务农。曾因得罪乡间地主而被捕入狱。1911年秋开始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的斗争。

最初与白朗一起造反的只有二三十个同乡，因为这位白朗“性豪侠，善驭人，疏财仗义”，所以深得人心，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大哥”，素有“官大哥”（即公众的大哥）之称。当时他们使用的是“笨炮”（土铳）和大刀，穿的是破棉袄，被人称之为“笨炮队”或“袄片队”。

他们起事后不久，清朝覆灭，袁世凯窃据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后，白朗军的锋芒便直指袁世凯政权。1912 年 4 月，白朗“打劫”了民愤很大的宝丰县卸任回籍的县知事张礼堂的财富。到 5 月下旬，据称已有“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支”，初步站住了脚跟。接着他和各地农民武装互相配合，打得宝丰、鲁山两县的官军不敢出城应战。官府惊慌失措之余，在向上汇报的文件中竟误把白朗写作“白狼”，一时以讹传讹，白朗的真名反不为人知了。

面对如此危情，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极为焦灼，他命令河南陆军第三旅旅长王毓秀改用“剿抚兼施”的政策，诱骗农民起义军就范。在官职、金钱的引诱下，杜启宾等十多个农民起义军首领动摇投降，先后去鲁山“受抚”，结果被官军杀害。白朗没有上当受骗，他坚持斗争，而杜启宾的昔日部下也都纷纷前来投奔白朗，使白朗这支部队很快增加到了五六百人。

1912 年冬至 1913 年春，白朗率众避开官军的主力，在舞阳以南的几个县和桐柏山区之间来往流动，打着“打富济贫”的旗帜，到处号召饥民参加。他们攻下许多寨堡，把获得的官坤、地主和富商的粮食财物，除留下部分充当军饷外，其余的都搬到大街上，高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啊！”因此白朗军受到了穷人的普遍欢迎，他们有的还摆上“贺桌”，穿上戏装，打上彩脸，唱着戏迎接白朗。在这半年之内，许多无地农民、失业工人，以及各色贫苦之人纷纷加入这支农民起义军，使之迅速发展到三千余人，随后，这支壮大起来的游民武装开始把斗争锋芒从山区转向县城，被

官府称之为“所向披靡，官军莫与能敌”。后来白朗军又扩充到五六千人，半数人拥有快枪，还有了一批机枪和六尊大炮。

1913 年春夏之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之时，深感自己力量不足，颇想利用白朗这支农民起义军，遂不断派人到白朗军中进行联系，并委任白朗为“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一职。孙中山还派出不少人以参谋或顾问的名义帮助白朗策划军务，协助作战。黄兴也在致白朗的信中要求白朗“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旨在牵制袁世凯军队的南下。白朗欣然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提出过“二次革命”的口号。

1913 年夏季，发出“驱逐袁贼，杀尽贪官，兴国保民”布告的白朗为配合“二次革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一举攻克了唐县和禹县两座县城，打垮守军近一个团的兵力的同时，他们分兵袭击了京汉铁路，使列车停顿下来，有力地牵制了袁世凯军队的南下。正如当时国民党主办的《民立报》所称“白狼（朗）已与民军合作，军容甚壮，纪律亦严”，“足以扶助（河）南省独立，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京”。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白朗，张镇芳甚至叫嚣要“在一个月之内”消灭白朗全军。正在此时，河南以及邻近地区一些不愿坐等屠戮的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纷纷来到白朗军中，他们向白朗提出“要革命，到南方找孙文”的主张，白朗也愿意取得革命党人的合作和接济，遂自号“讨袁军”，于 12 月下旬挥军东征。

1914 年 1 月，白朗率众万余人、战马千余匹，连克豫东南数城，进入安徽境内。他们一路上焚毁衙署、监狱和天主教堂，一路上不断吸纳各地饥民加入，人数不久便达到了历史上最盛时期的二万人左右，旋又将段祺瑞的围歼计划打败。2 月中旬，白朗又折回河南，突破官军围剿后突入湖北商务重镇老河口。3 月中旬，白朗军从老河口出发，经荆紫关进入陕西境内，4 月下旬又进入甘肃境

内。可谓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在进军南北过程中，白朗军改称“中原扶汉军”，有时也用“公民讨贼军”的名义。他们在沿途张贴的布告中，斥责袁世凯政府是“神奸主政，群凶盈庭”，“虽托共和，实厉行专制”，声称自己要“纠合豪杰，为民请命”，“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东南”，最后“设立完美之政府”。

在白朗军的早期行动中，绑架传教士、攻击教堂成为其表达政见的一种方式。有关记载最早可上溯到1912年，在豫东南部的行动中，白朗军的类似行为更加激烈、频繁。这从它的敌手、北洋政府的档案中收藏的雪片般飞向北京的告急电报可管窥蠡测。白朗的这一行为完全源于其反对袁世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见，而依他看来，无论传教士，还是教堂，无不是可恶的洋人支持袁世凯统治的具体表现。该绑！该杀！该焚！不该放过！

这一举措使白朗得益非浅。首先，白朗某些焚毁教堂、绑架传教士的行为是根据当地民众的意愿而为之，如河南的唐县、潢县，安徽的六安等地。这里故且不议当地民众痛恨传教士及教堂之种种原由，无可置疑的是，这一举措使白朗大得民心。其次，焚毁教堂、绑架传教士使北洋政府在国际上大丢脸面。“焚教堂、戕教士，酿成交涉”，是北洋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而白朗硬是逼着它看到了这些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列强或强烈抗议，或电令北洋政府速速派兵保护其侨民，或要求赔偿损失，或“剿匪建议”不断，或派员亲赴河南“观战”。驻京各国公使甚至“拟电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以期早为肃清”。第三，当官兵向白朗发动进攻时，“洋票”便可作为“高级”挡箭牌，例如，1913年10月间，北洋军吴庆桐部在进攻白朗军、“正图设计炮攻”时，突然接到副总统黎元洪的命令，称只有在被白朗绑去的“教士大小八口”获释后，“方准攻击”云云。吴庆桐在复电袁世凯时，对此深表忧虑：“窃恐该匪必以外人为要挟地步，为缓兵之计，一日不释放，一日不敢攻。”

由于白朗军声势日趋强大，故而其军所过州县，往往“武则逃避，文则开城迎降”。白朗的政策也有所变化，每攻下一地，除对那些敢于顽抗的官绅和地主予以打击外，对于开城投降的官绅不再杀戮 。白朗有时还下令要部队“住在城外”或“封刀人城”。和那些淫掠烧杀无恶不作的官军对比，群众自然欢迎白朗这样的“土匪”，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民众“视兵如仇雠，视匪如家人”。

白朗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及西北诸省，使中外统治者惊慌失措。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北洋国会和中外舆论都对主持剿匪的河南都督张镇芳的无能大加指责，迫使袁世凯“换马”，改派其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指挥北洋陆军的精锐部队四面包围，“严密防堵”。然而，技高一筹的白朗军忽东忽西的流动作战，岂是段祺瑞之辈所能抵挡的。袁世凯在给段祺瑞的电报中哀叹不已：“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乱党（指国民党）又从中鼓吹，殊损威信。因而中国债票跌到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部长（指段祺瑞）久在外，各国注视白狼更重，且久不平，尤损声威”。对此段祺瑞在回电中甚感“惭愧”地承认，“劳师糜饷，贻笑中外”，“久劳师旅，未靖匪氛，殊深愧悚”！这些无可奈何的言辞，说明白朗军给北洋政府确实带来了极大的“麻烦”。随后袁世凯又调回段祺瑞，走马灯似地改任田文烈为河南都督，加派了陆建章、赵倜、张敬尧等师负责督剿，甚至杀一儆百地枪毙过弃城而逃的“失职”县长。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挡白朗军滚滚向前的前进步伐。相传当时在陕西、甘肃和河南等省境内流传过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版画，题为《白狼（朗）过秦川》，极为形象地描绘了白朗持枪越马杀贼的英雄气概，而这不正是袁世凯最害怕看到的吗！

白朗军深入甘肃之后，由于部队已过于疲劳，而且当地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甚至连正常的饮水也很难保证，再加上时疫流行，少数民族地主武装的顽抗，更有各路官兵尾追攻击不已，起义军遭到

了很大的损失。在临潭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白朗军的许多重要将领都表示应放弃原先入川的计划，立即返回豫、鄂休整。白朗见众志难违，遂决定回师东归。

1914年5月下旬，白朗军退出临潭，由清水长驱直入陕西，曾一日夜行一百六七十里，把追赶的敌人远远抛在后面。他们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般地通过了凤翔、扶风、西安郊外，于6月下旬抵达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白朗最初打算回到河南故乡后，取得喘息时间补充兵力作东山再起。为避免被官兵集中包围，他决定化整为零，分为四路活动。然而不料一入河南境内，其士兵们便纷纷自动离队回家，沿途星散而不复成军，再加上官军的重兵围剿和"清乡严洗"，白朗军很快就被各个击破。

1914年8月中旬，白朗及其最后的数十名追随者通过官军的重重封锁，到达宝丰、临汝分界处的虎狼爬岭时，遭到了数千敌人的包围。白朗当时已身染重病，但仍与敌血战两昼夜，最后因弹尽粮绝，在黑夜突围中壮烈战死。

（徐有威）

中州大侠



王天纵，原名天从，字旭九，号光复，河南嵩县人，1885年出生。早年因家贫失学，崇尚游侠，精于射击，有“神炮”之称。后因不满官府统治，入嵩县西北之羊山啸聚山林，多次击败清军的围剿。

王天纵虽然是占山为王的所谓“草寇”，他却非常注意外界的形势，甚至订有上海出版的《申报》。1910年，他曾扮成候补道身份前往上海见世面。王天纵游沪归来，既敬慕十里洋场中的物质文明，又恨横行其间的外国人的为非作歹，由此萌发了民族革命的思想，并开始和同盟会中河南籍革命人士有了联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首先响应，西安光复后陕西东征军出兵潼关，北方大震。河南同盟会成员杨勉斋、蒋我山、刘纯仁、刘镇华、石又謇和吴沧洲等会集洛阳，图谋响应，并派出吴沧洲和刘纯仁上羊山联络王天纵及伏牛山各路绿林好汉，推荐王天纵为丁部大将军，请他攻占洛阳，迎接陕西来的东征军。王天纵一口答应，立即发动各路绿林朋友，北出龙门而进攻洛阳。但此时清朝派出陆军第六镇十二协周符麟部接守洛阳防务，戒备极严，王天纵攻城失败。于是杨勉斋、刘纯仁建议说：“前年(1909年)在洛阳曾与伯英(指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张钫)计划，如陕西革命先成功，豫西革命力量就先与陕西结合，然后全力东下，河南革命方易成功。我们不如仍照此计划西去与伯英的东征军会合。”王天纵等部表示赞同，于是昔日的众山大王决心弃山寨而加入东征军。

10月下旬，王天纵等八千绿林部队到达潼关，此时正值潼关第二次光复，清军东退，东征军骤得这些新生力量，士气越发旺盛。在王天纵来到之前，杨勉斋、刘纯仁先期微服造访了东征军领袖的张钫(这时张钫的头衔是“秦陇豫复汉军东征大都督”)，说明了王天纵的情况种种。而来到张钫面前的王天纵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早在张钫青年时就耳闻了王天纵的大名。只见王天纵身穿军服，身材高大，鹰鼻鹞眼，目光炯炯，态度威而不野，彬彬有礼，言语不多而中肯，似有满腹经纶。张钫以慰劳和欢迎的口气首先发言说：“诸位为国勤劳，辛苦了，我代表革命军欢迎诸位。”王天纵答道：“为国家的事，说不上辛苦，我们是来听指挥的，当不起欢

迎。都督以后不要客气，我们一定服从命令。"张钫听了这两句简单而又恰当的话，心中更加暗暗佩服。王天纵还解下自佩的德造手枪送给张钫："我闯荡豫西十几年，就凭这玩意儿，现在赠送给都督，表示我的心意。"张钫面对这种陕西东征军中尚未见到过的新式武器，笑着收下了："你在豫西的侠义行为是久仰了，今日得见，并将共同革命，真是有幸！"二路大军从此就会师了。

会师后的王天纵即被张钫任命为东征军先锋官兼第一标统，其余各位绿林好汉也均被委以重用。东征军军威顿时为之大振，接着全军即出潼关进攻清军。

王天纵在战斗中表现得积极勇敢，连败敌军。在进攻函谷关天险时，他仅带数百人，以突击行动攻占了这一险要之地，迫使清军东溃，并会同其他诸将攻人灵宝城，一鼓作气将清兵追至渑池。但因为他毕竟是绿林出身，攻多而守少，所以对正面防御作战经验不够，故而在英豪、张茅等地损失颇大，东征军被迫退至出发地潼关。

这时王天纵向张钫建议说："只凭我们这一路队伍东征，敌容易集中力量对付，如先占领南阳，再发动伏牛山中武力，从南进击洛阳，与东征军收夹击之效，使敌兵力分散，较易成功。"他还自告奋勇，愿意亲自带一部分队伍前往。张钫问他能否攻下南阳，对此王天纵信心十足："南阳是谢宝胜防守(当时谢宝胜任南阳镇台)，他是我手下的败将，他的命是我给留下来的，我去打他，一定有把握。再与湖北革命队伍联系起来，夹击中原，这声势和力量就大啦。"这里的谢宝胜确是王天纵昔日的手下败将，早在王天纵羊山占山为王时，曾任河南巡防营管带的谢宝胜就前去攻山不下百十次，无一不败。这次谢宝胜听说鄂军来攻，本来还想抵抗一阵子，但又听说是王天纵率部而来，便长叹一声说："完了！"遂自杀于南阳镇台衙门内。

王天纵攻克南阳后，正值南北议和成功，清廷退位，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各省宣布停战。王天纵应袁世凯之邀前往北京，

从此离开了他带领十多年的绿林部队。

抵达北京后，袁世凯多次召见了王天纵，询问他过去的经历，很是礼遇优待。袁世凯考虑到王天纵既不能从事文职工作，其从武出身又非正途，很难安排他的位置，但又不想让他外出以免放虎归山。经过反复考虑后，袁世凯乃授王天纵总统府顾问等职，出任陆军部中将顾问兼京师军警督察处副处长（正处长为马龙标），并将他的卫队也编入督察处的稽查队，供他指挥，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工作。袁世凯为笼络王天纵，还将前清大员端方的住宅送给他做公馆，发给优厚的薪金，还让其家属从老家搬来一起生活，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王天纵毕竟是闯荡山林为所欲为的山大王出身，现在虽然过着优渥的享乐生活，但总是感到无事可做，心情极感苦闷。他曾对到北京去看他的老战友张钫说："这做官的事，真是无聊，真不如当山大王痛快。"

到1914、1915年间，这种生活的味道又变了。袁世凯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王天纵的督察处也得从中效力奔走，王天纵深感味道不对，于是索性不再到处里去办事。王天纵曾对朋友表示，留在北京既乏味，又不能出京，真是厌倦极了。当年白朗起义军纵横豫陕，震动天下，给袁世凯政权以极大的打击。王天纵想乘机离开北京，便向袁世凯请求说白朗部下有他的旧人，他愿意出京去招抚白朗。袁世凯这个奸雄早就看透了王天纵的心思，只是好言慰勉，表示将另行重用，实质上只是一味的牢笼羁縻而已。王天纵对此也只好忍气吞声，度日如年了。

等到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后，黎元洪接任总统之职。他同样对王天纵极为欣赏，曾多次招见，以辛亥革命老同志的情谊相慰藉，还劝他暂时仍留住北京，日后当有重用云云。故而王天纵仍官任原职，住在北京。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分裂，张勋乘机复辟时，王天纵对人议论纷纷："既有今日（指张勋复辟），何必当初（指发动辛

亥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言下极为不满和愤慨。不久段祺瑞誓师声讨攻入北京时，张勋的辫子军仍顽守南河沿东华门一带，王天纵仍亲自率领其亲信卫队扒开南河沿以北的围墙，猛攻张勋的公馆，迫使张勋不敢继续指挥辫子军而避入荷兰公使馆，张勋复辟之举遂告烟消云散。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复任内阁总理，气焰越发嚣张，黎元洪也不再担任总统，王天纵的心情更加烦闷了。此时张钫经常劝他说，北京是呆不下去了，我们应本着辛亥革命的精神服从孙中山先生的领导，继续革命，王天纵深以为然。不久，于右任从上海去北京找到张钫，传达了孙中山的指示，让张钫和于右任返回老家陕西领导靖国军在西北地区大展宏图。离京前张钫将此意图密告了王天纵，王天纵很是高兴。

不久，王天纵通过关系与孙中山直接取得了联系，即从北京赴上海谒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当即任命他为靖国豫军总司令。王天纵兴奋之余，马上先派出一些亲信赴豫西和南阳一带召集旧部，随后他自己于 1918 年 9 月从孙中山处领取一部分经费后，赴四川展开活动。当时唐继尧任靖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王天纵认为在四川组织靖国豫军政治环境较好，遂在川滇两方的支持下，在四川夔府开始组织建军。此时他的亲信在豫西和南阳一带陆续招到了五六千旧部，分批向夔府集中。至 1919 年夏这些人马已编成两个师，由李魁元和陶福荣分任师长，马自修任参谋长。这支部队规模相当，他们一面训练，一面与业已抵达广州的孙中山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后唐继尧的靖国军联军总司令部进驻重庆后，召集川、滇、黔、豫、鄂五省靖国军军事会议，王天纵以靖国豫军总司令身份参加了会议，并表示愿意早日出兵援陕抗击北洋军的进攻。

会后王天纵即返回夔府整顿部队，准备援陕工作。但是王天纵部队的经费问题发生了困难，因为一则广东方面接济困难，二则他

们在四川属客军，不愿就地征筹。王天纵积劳成疾，竟于 1920 年春客死他乡，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徐有威）



殉难许昌



樊钟秀，河南省宝丰县人，1888年生。自幼随父耕读，曾在少林寺习武。1914年因不堪当地匪首的欺压，组织自卫武装，聚众达三四百人之众，1915年为陕西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兼陕北镇守使陈树藩收编，先后任骑兵连长、营长等职。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陕西督军陈树藩部的国民党人士胡景翼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先后树起"靖国军"旗帜，起兵讨陈。当时驻扎在西安附近的樊钟秀在国民党的影响下，在蓝田易帜归属靖国军，并于3月间抄小道突袭潼关的陈树藩部，击溃其新兵旅，得到了大批武器弹药，后退至商县一带整顿。

樊钟秀自打起靖国军旗号后，即派人去北京请陕西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张钫前来指导。同时，靖国军其他领袖也先后派人或写信给孙中山，请派于右任和张钫来指挥这支部队。4月20日，张钫来到了樊钟秀部，向樊钟秀详细介绍了国家局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目的和靖国军的任务。樊钟秀闻之不禁耳目一新，他极为兴奋地说："我瞎闹了几年，今天才找到正路了。"6月间，业已来到陕西的于右任被起义各军共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樊钟秀受任靖国军第二路司令。

在随后的半年时间中，樊钟秀率部与陈树藩部多次交战，或胜或败。时段祺瑞调奉、直、豫、晋、甘等省兵力前来陕西增援陈树藩，对靖国军展开全面进攻。坚守盩厔县城长达五十三天之久的樊钟秀终因援兵无期且弹尽粮绝，而有意曲线投降以自救。在和张钫进行商议后，樊钟秀部于1919年1月突围退至凤翔，而此时与靖国军对峙的奉军许兰洲师和陈树藩有隙，彼此颇有联合逐陈之意。经于右任和张钫的同意，樊钟秀遂暂编入许师，借资整补一番。

1920年4、5月间，直皖战争风云突起，许兰洲部向河南移动以策应直军。不久许部又北调，樊部被留豫西老家，整编为豫督赵倜的"宏威军"的一个团。回到家乡的樊钟秀不啻如鱼得水，他一面招选家乡子弟补足缺额，并加意整练，一面托人向正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代陈仰慕之情。孙中山对豫西这个素昧平生的小团长的好印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22年4月，吴佩孚为阻止孙中山北伐，配合陈炯明颠覆广

州政府，派蔡成勋率部开往江西，此时因战功而升任旅长的樊钟秀也随之驻防吉安、赣州等地。此时樊钟秀即派人秘密去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北伐时愿效前驱，孙中山嘱咐他整军待命。不久桂系军阀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吴佩孚又令赣军方本仁、邓如琢和樊钟秀部援沈，樊钟秀乘机由赣州向广东北江移动，与孙中山秘密取得了联系。8月间，行至江西大庾时，樊钟秀便通电就任孙中山委任的豫军讨贼军总司令一职。

1923年10月，陈炯明叛军主力倾巢出动，由东江大举西攻，志在占领广州驱逐孙中山。樊钟秀值此危难之机奉孙中山之命由北江驰援广州，11月12日抵达广州时，陈炯明叛军已占石龙、石滩等地，截断了广九铁路，并从白云山瘦狗岭炮击位于士敏土厂的孙中山大元帅府，情形可谓危在旦夕。樊钟秀部下车后立即投入战斗，他命令部下："此次保卫广州作战，是孙大元帅命令，生死都极光荣。只准进，不准退！只准胜，不准败！谁要当孬种，我先毙了他！"因此樊部军心振奋，士气旺盛，他们迅速击溃了进入广州郊区之敌，并乘胜收复了九龙车站，迫敌放弃石滩、石龙等地而溃退惠州，广州由此转危为安。樊钟秀声震一时。

凯旋而归的樊钟秀前来拜谒孙中山，在这之前他们彼此并未见过面。孙中山早就耳闻樊钟秀勇敢豪侠之名，料想他定是个北方粗豪大汉，不意面前的这位樊钟秀竟是一温文儒雅、白面书生式的人物，惊喜之余不免奖励备至，慰劳有加，委任其为建国豫军总司令，并优予补充，嘱樊钟秀好好整练部队，准备北伐。从此樊钟秀对孙中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樊钟秀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同年9月孙中山下令北伐军一律改称"建国军"，樊钟秀被委任为"建国豫军总司令"，奉命随谭延闿取道江西北伐。不久孙中山又以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而北上，樊钟秀在广东素不满滇、桂、粤、湘各军的明争暗斗，故而不愿再随北伐失利的谭延闿返回

广州。12 月间他决定孤军返回河南，号召地方武装听从孙中山的驱策，以增强北伐的力量。

樊钟秀部在孤军进程中，常常避实就虚，兼程急进，多走山险小径，少近城镇大道；时而左迂右回迷惑敌人，时而夜行昼息隐蔽自己，遇小敌则击，见大敌则避。几经艰难险阻，渡过长江天堑，终使赣湘追兵望尘莫及。1925 年 1 月，当他们逾时两月，历程数千里到达樊钟秀老家河南宝丰一带时，曾令人有莫明其从何而来之感。此时吴佩孚正逃匿于鸡公山，孙中山旋从北京向樊钟秀发出电令，命他派兵上山，"歼此渠魁"以免后患，但吴佩孚业已离山南逃，使樊钟秀终成憾事。

樊钟秀回到河南老家后，仍打着建国豫军的旗号，故而旧部老友、地方团队乃至绿林豪杰纷纷携械来投，不过数月已发展到了三、四万人。当时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胡景翼任河南督办兼省长，他俩本是靖国军时代的战友，政治思想一致，因此合作得很好。胡景翼对樊钟秀部返回河南极表欢迎，指定豫西南各县为樊部的防地。1925 年 2、3 月间，陕西督办刘镇华率憨玉琨部进攻河南，胡景翼部迎击于巩县一带，胡憨战争爆发。樊钟秀协助国民第二军侧击憨玉琨。憨玉琨战败，樊部进驻洛阳。战争结束后，胡景翼不久病逝，岳维峻接任国民第二军军长；并出任豫督，豫境内杂牌军均被收编。只有樊钟秀打着建国豫军的旗号屹然不动，他常说："建国豫军是孙大元帅委派的，谁敢更换我的旗号！"

从 1925 年 4 月胡景翼病逝到 1927 年春，樊钟秀陷入了困境之中。1925 年 11 月，樊钟秀曾奉岳维峻之命，率兵进攻山西，虽曾攻陷辽州（今左权县），但终为晋军正面设防与坚壁清野相结合而被迫无功退兵，仍据守豫西一带。

1926 年 2 月，吴佩孚和奉系联合，兵分三路出兵河南进攻国民第二军，并最终重新控制了河南。吴佩孚为巩固这一重占之地，自然不能允许打着建国豫军旗帜的樊钟秀酣睡其"卧榻"之侧，乃

令督理河南军务的寇英杰派兵前往豫西鲁山宝丰一带肃清樊部。樊钟秀自知兵力有限非寇英杰的对手，遂仍使用在陕北时的办法，将部队化整为零隐蔽起来。他亲自带领几百部下进入了临汝、鲁山等交界的深山区内，深藏其间，披荆斩棘，打算为久居之计。但未几又听取好友张钫的劝告，于1926年秋来到上海，与上海的国民党组织取得了联络。1927年1月他又来到了武汉，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正准备继续北伐，遂令他秘密返回河南，发动旧部策应北伐，并拟给他新的番号，但遭樊钟秀的婉拒。

1927年春樊钟秀回到了家乡，旋发动旧部重整旗鼓，打出了孙中山所给他的建国豫军的旗帜，这便是他婉拒武汉国民政府的新番号的根本原因所在。此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已从陕西进入豫西，竟欲收编樊部。但樊钟秀仍坚持用建国豫军这一具有光荣传统的旗号，不接受冯玉祥的改编，而只答应与冯玉祥合作北伐。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9月攻克汉阳、汉口一带，追敌至武胜关。吴佩孚仅率卫队一旅由巩县逃往南阳，早已与北伐军取得联系的樊钟秀部奋勇袭击，吴佩孚只得狼狈逃去。

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垮台后，蒋介石曾派人去见樊钟秀，拟委以番号，意在收编。樊钟秀对蒋介石背叛革命本极痛恨，对此要求自然严厉拒绝。同时他对冯玉祥支持蒋介石也很不以为然。最终樊钟秀从各方面都得不到军饷和装备的接济，在政治和人事方面也得不到任何方面的帮助，并不断与冯玉祥部发生磨擦冲突，冯玉祥派石友三军击败了樊钟秀。1928年冬樊钟秀迫于内外交困，被逼通电下野，蛰居上海。

1929年6月，孙中山的遗体由北平运往南京紫金山安葬时，寓居上海的樊钟秀因没有得到蒋介石让他参加此奉安大典的通知，甚为愤慨，遂不请自往南京，反蒋情绪溢于言表。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酝酿发动反蒋大战之际，樊钟秀回到河南，召集旧部孙世贵等人重整队伍，曾被蒋介石收编的任应岐

也从蚌埠率部来归。樊钟秀以孙世贵、任应岐为军长，自任总司令。蒋介石以当时的战场形势下，樊钟秀部举足轻重，便嘱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与樊钟秀素有关系的有关人士函电交驰，劝樊钟秀支持蒋介石，还想重金收买樊钟秀让出许昌。但樊钟秀均坚决拒绝，并印发告官兵书，历数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教背叛革命的种种罪恶，还将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有关人士所来的函电及复电也附文印发，以示坚决反蒋到底的决心，接着他便任命阎、冯派来联络的邓宝珊为副总司令，设司令部于许昌，担任平汉铁路正面防守任务。

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双方主力胶着于陇海线商丘南北两部，樊钟秀首当其冲，承受着蒋介石所属何成浚部的猛烈攻击。自5月以来，双方在临颍附近成对峙状态。5月18日下午，樊钟秀视察阵地返回司令部，行至许昌南门外吊桥时，适逢蒋军飞机进行低空侦察，樊钟秀的随从人员劝他赶快进入城门洞内躲避。樊钟秀一生不避枪林弹雨，此时他非但不畏缩躲避，相反站在桥头，仰首大骂。然而飞机恰在这时投弹，只听轰然一声，樊钟秀已倒在了血泊中，当晚便不幸去世。后遗体运到北平，葬于西山。

（徐有威）

东北绿林 

"老北风",真名张海天,辽宁省海城县人,1890年出生。二十三岁时因不堪警察的打骂,落草为匪,遂成为辽河流域著名的惯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民族意识之觉醒,组织起"抗日自卫军",诨号"老北风",向霸占家园的日本侵略者发起了不懈的进攻。

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海天已有整整十八年的“匪龄”，并早已成为一著名的“炮头”(匪帮称其头目的绰号)。日军很快占领了辽宁全境，横行肆虐令人发指。闻知日军发动事变后，张海天怒发冲冠，旋召集绿林部下：“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众弟兄齐声响应。于是这伙昔日名为“西胜”的匪帮打起了“抗日自卫军”的旗号，诨号“老北风”，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抗日生涯。

这里的“老北风”也颇含抗日杀敌之底蕴。“北风”一词原系麻将牌中的一张牌的名称，按照当地的约定俗成，北风为本庄的上家，本庄能否吃上牌，全看北风位置上的人出牌如何，因此北风是可以控制本庄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张海天取诨号“老北风”，无疑是要取麻将桌上北风克本庄之意，意在表达自己一定要克敌制胜，打败日寇之决心，而一个“老”字更是表达了他蔑视敌人的一片雄心。这支“抗日自卫军”起兵后，在辽河流域很有影响，著名的项青山、盖凌香和蔡宝山等股昔日的绿林豪杰纷纷前来投军，不久便聚集了二千多人，颇有一呼百应的气势。

日军占领沈阳后，一方面向吉林和黑龙江发动进攻，一方面在已占领的中国领土上采取所谓“以华治华”的殖民地方针。1931 年 10 月，日本关东军派出他们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出面收编土匪，凌印清即假托民意成立了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从他的日本主子那里领取了一大批武器弹药、一时间各地鲜廉寡耻之徒纷纷前来输诚，倒也凑了三百多人。

“老北风”和他手下的项青山、蔡宝山等人为获取凌印清部的这批武器弹药，便假装响应他的“号召”，接受他的“收编”，于是“老北风”、项青山和蔡宝山摇身一变，都成了“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旅

长。这些“白皮红心”的旅长们顺理成章地享用着日方提供的种种“优厚待遇”，暗中却与位于锦州的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生取得联系，相约联手消灭凌印清部及其日本驻军和特务。黄显生深表赞同，派出其部属的督察长带兵予以援助。

11 月 18 日清晨，大雾弥漫，老北风和项青山等人就以这场大雾为掩护，率部悄悄地包围了三道沟凌印清的驻地。老北风和项青山等以有要事面呈为理由，径直闯进了凌印清的卧室。当时凌印清正躺在床上大过烟瘾，吞云吐雾之际“老北风”的枪已戳了过来，结果自然是缴枪不杀了。驻地中的日本军队见其人马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无计可施之余，也只得乖乖地当了俘虏。而被俘的伪军二百多人在聆听了“老北风”讲述的抗日救国道理后，当场便有一百五十多人决意弃暗投明，愿意留下来参加老北风的抗日义勇军。最后，凌印清和“东北民众自卫军”的参谋长王槐三、军法处长刘信春、第十五旅旅长冯仙洲，以及日军军官仓岗繁太郎、松本德松、道源元助等七人被押往沙岭抗日军驻地，经审问后均被处以死刑。另外同时被捕的十二名日本特务也被用大车拉到辽河旁，送回了他们日本老家。“老北风”的诈降奇袭之举，威振辽河南岸，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斗志，“抗日自卫军”迅速发展到了五千多人。

12 月 22 日，日本关东军精锐第二师团主力从辽阳、海城出发，偷袭辽河，于 24 日攻占田庄台，26 日又占领了大洼。“老北风”和项青山等闻讯后率部三千人赶到前线，旋于 26 日晚猛攻田庄台。日军佐藤联队长指挥五百余名日军负隅抵抗，一场激战下来，老北风所部击毙日军五十余人，杀伤一百多人。翌日，“老北风”又乘胜追击，与另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护路队联合，围攻大洼车站，与日军展开激战。义勇军不顾日军猛烈的炮火，英勇厮杀，经过三进三出的血战，终使不支的日军乘夜败退营口了事。“老北风”的“抗日自卫军”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作战即凯旋而归，其影响声势自不待言。

田庄台和大洼车站战斗之后，“老北风”和项青山率领的义勇军在营（营口）沟（沟帮子）线上，多次与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九联队作战，使日军每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由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主义，东北军被迫退入关内，致使关外重镇锦州城于 1932 年 1 月 3 日落入敌手，抗日义勇军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

面对国民政府的畏敌如虎，“老北风”和项青山等以东北民众义勇军名义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谴责政府的一再退让，坐视东北沦陷的举措。随后，“老北风”等将自己的部队拉到敌后，以台安高力房子为中心，一面整顿扩编队伍，一面派人到北平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系，以求得其援助和支持。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

“老北风”的抗日活动，使侵略者大光其火。日军攻占锦州后不久，即派出驻扎海城县的日伪军三百余人，全力进攻老北风的抗日义勇军，并侵占了大沙岭村。1932 年 1 月 16 日，义勇军将大沙岭村团团围住，“老北风”率队从四面同时发动攻击，一时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其中西路军首先杀入街内，将日军指挥系统打乱，日伪军突遭袭击，一时措手不及，只得向村内溃退。经过一夜激烈搏杀，日伪军共死伤百余人，日军大尉河野英基被当场击毙。次日破晓时分，日伪军向牛庄方向突围逃逸，大沙岭村被一举收复。

“老北风”等乘胜追击，率部直捣牛庄日伪军老巢。盘踞牛庄的日伪军四百余人一听说是“老北风”的义勇军前来进攻，无不闻风丧胆。义勇军刚开始一阵猛攻，敌人便从西门仓皇撤退，伪军王殿忠部的一个连还在阵前哗变，投降了义勇军，使义勇军不但缴获了大量军械物资，而且又增添了不少生力军。几天后，杀得性起的“老北风”再次乘胜追击，进而围攻营口，终因缺乏攻城必须的重武器而未果，但其攻势之凌厉也足令营口之敌胆颤心惊，不敢轻易出城骚扰义勇军的驻地。在此期间，位于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出高鹏、马宏德等一批军政人员到“老北风”的义勇军工作，建立起

政治宣传处，强化了这支部队的政治领导。

5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划分成五个抗日军区，每个军区成立一个军团。第二军区所属海城、辽中营口、台安等十县，共编有十七路义勇军。老北风被任命为第二军区第三路司令，下辖十个旅，二十个独立团，一时名震长城内外。

由于不间断地主动出击，部队作战频繁，弹药消耗多于补充，为了从敌人手中弄到弹药，"老北风"和部下商定了一个绑架英商的计划，企图以此要挟日伪当局，相机夺取弹药。1932年9月间，"老北风"派人去营口绑架了两个英国人，其中有一人是英国大商人的儿子。"老北风"提出以步枪一千支、子弹十五万发、手枪五百支及轻重机枪各二十挺的代价，同对方交换人质的要求，限令对方在指定时间之内到盘山王麻子沟交货赎人。此举引起英方向日本当局通电抗议，各地英国领事也纷纷向日伪当局通电指责，日伪当局只好派出伪营口警察局长和伪奉天宪兵队、伪治安部要员去同"老北风"谈判。敌谈判代表先以高官厚禄诱惑张交出人质，被拒绝后又要求"老北风"将军械弹药折合成现款，"老北风"见状大怒，一挥手，叫人将敌谈判代表驱出门外，以绝敌人之幻想。敌人无奈，只好按"老北风"提出的要求将枪械、弹药装箱打捆，如数送到盘山。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波利事件"。

"老北风"的抗日义勇军神出鬼没的进攻使日伪军大惊之余大怒，为了消灭这支心腹大患，日军在10月间派出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少将，指挥其部和王殿忠所属的伪军共万人，于当月15日兵分两路，从海空两面疯狂进犯高力房子"老北风"的大本营。"老北风"率部与之激战三小时后，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入海城县境内。随后，为保存实力，"老北风"奉军团之命率部退人热河，后被国民党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改编。1935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东北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老北风"立即率领其部四百余人前去参加。不久这支抗日部队被日伪军打散，"老北风"被迫退回北平。之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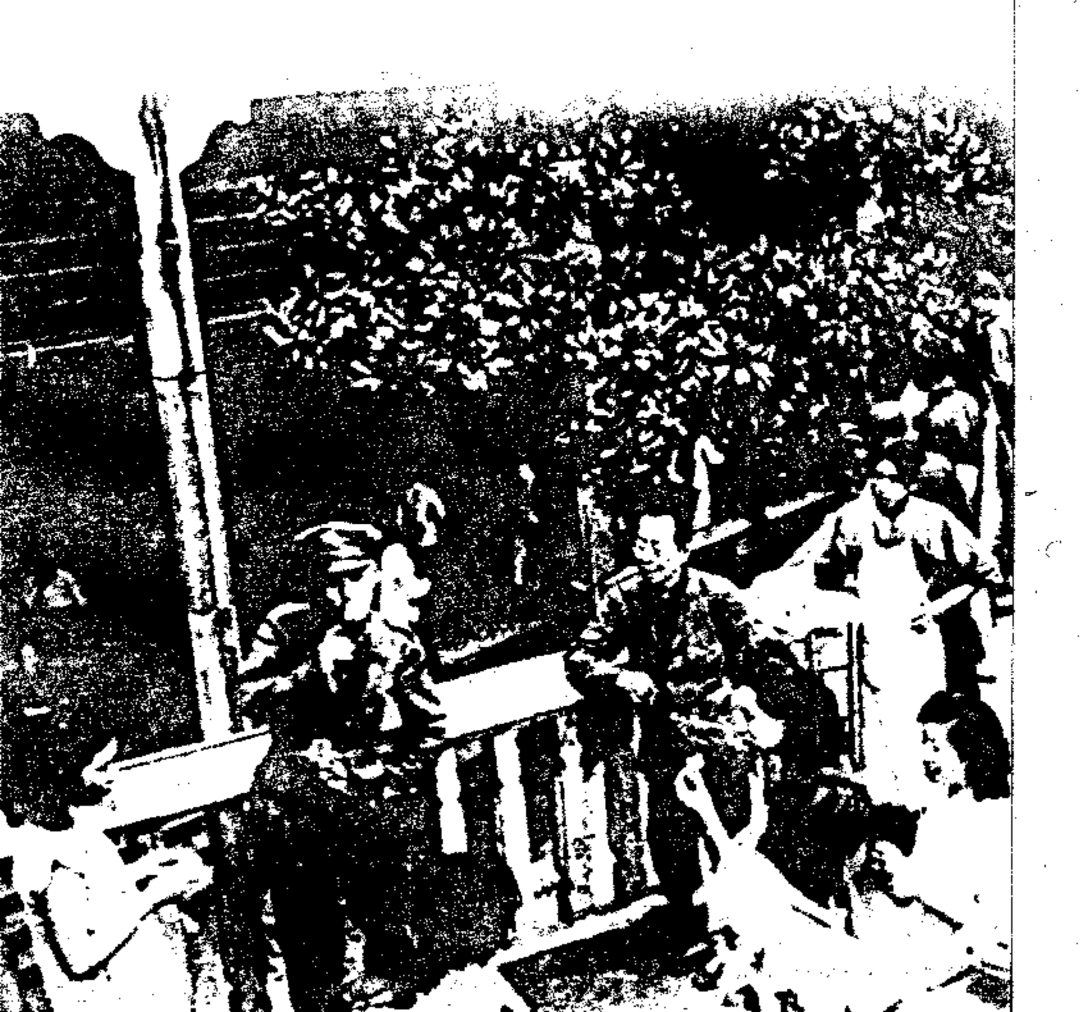
还参加过平西抗日游击队，在与日军作战时不幸负伤，又被迫回到北平治伤。

“老北风”的晚景极为凄凉，严重的枪伤，多年为匪时留下的毒瘾并发，使他卧床不起。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遭到国民党的强行解散，更使其经济来源断绝。贫病交困之下的“老北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铁蹄下的北平到处搜捕抗日仁人志士，在此风声鹤唳的环境中，“老北风”的病情日趋加重。

1939 年 5 月 2 日，这位昔日的抗日名将在贫困、悲愤和绝望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岁，随后被葬于北平的奉天会馆义地。

（徐有威）

上海“三大亨”的收场



藏污纳垢的旧上海“十里洋场”，曾是流氓横行的“天堂”，并称“三大亨”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堪称一类典型，他们在混世一生后的收场，自然别具观照价值。



终老上海



黄金荣，字锦镛，乳名和尚。原籍浙江余姚，1868年生。年幼时在上海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做学徒。1892年进法租界捕房当包探，后升为华人督察长，为上海滩三大亨之首。1927年4月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政变。后被蒋介石委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抗战期间在上海曾与日伪有所接洽，但未落水做汉奸。全国解放后，因年老多病留居上海。

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黄金荣，既未逃台湾，也未去香港，却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他住在龙门路钧培里老宅，深居简出，安度残年。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即苏北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也，有时则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三年，死了。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八十二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惟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呆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

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定下心来后，黄金荣叫人写出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四百多名青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作参考，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示，又告诫门徒收敛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接着命人将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匾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八年抗战中，黄将这块匾额深埋于地下，等待着蒋介石的"胜利"归来，现在他是不敢做这个梦了。

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对黄本人，则有一个具体的评估：

(1)肯定黄过去的罪恶，确为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

(2)但黄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政府低头认罪，残废衰老；

(3)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可采宽大政策。

这实际上是放黄金荣一条生路，让其走改过自新之路。

当时，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杀黄金荣，让其"逍遥法外"，很想不通，纷纷致书有关部门，大声疾呼要求从严惩办。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工作，并且曾经召开过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一天下午，两辆吉普车开到钧培里黄宅门口，军管会委派的军代表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宣布政策。黄见政府不逮捕他，稍为放心，一再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他身穿白色纺绸褂裤，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最后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此后，黄金荣蛰居于家中，不过问外务，人民政府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

政协副秘书长，他则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记得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致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八十六岁(原文如此，应为八十四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

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悔过书公开见报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异常敏感。他不知道这位老兄弟会说些什么，于是叫万墨林快去找来当地报纸，他要仔细看一看。

这时，杜月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过报纸，便看见万墨林已经用红笔勾出了标题："黄金荣自白书"，刚想接下去看，胸中却感到有些闷气，脸色立时显得苍白。万墨林见状，马上接过报纸读了一遍。

杜月笙微闭双眼，仔细听着，但未发一言。稍顷，他睁开眼睛，说："侬再读一遍。"

万墨林坐在床边，又从头读起，当读至 1927 年"四一二"这一段时，杜月笙仿佛非常紧张，叫"停"了几次，叫万墨林慢慢读。听罢，杜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黄金荣写的这份自白书，述及"四一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将镇压工人运动的总头子蒋介石及虞洽卿、张啸林等人都点了名，独独没有提到当时最"风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这决不是黄金荣故意隐瞒事实，为他两肋插刀，这个老于世故的把兄卖他还来不及呢！无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发出某种信息，既往不咎，欢迎他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杜月笙是何等样人，自然心中有数，所以才会发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独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黄金荣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实恐怕也是如此，黄金荣第一份自白书交上去后，竟未获通过，修改数遍，直到军管会点头，才重新誊抄了一份，就是公开见报的那一份。

而那时，潘汉年等人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紧锣密鼓，黄金

荣的自白书无异是重要一环。

但在上海，黄金荣的日子很不好过，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渐枯萎。

悔过书公开登报后，广大市民不仅不予认同，反而更加激愤。黄金荣惊恐万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只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念头，坐在家里准备束手待"毙"。身体状况也愈加差劲，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加上媳妇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惊怕之外，加上气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和精神防线受到沉重打击。这样拖了近两年，他终于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爬起来。

1953 年 6 月 20 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给他注射强心针，但亦无效，于当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终年八十六岁。

据当地公安分局在黄死后报告："查黄金荣现年八十六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廿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十七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廿二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十七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令人寻味。

(邢建榕)



魂断香港



杜月笙，改名镛，以号行。上海浦东人，1887 年生。1903 年在上海水果行当学徒，1911 年参加八股党，成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后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1927 年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1934 年后历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抗战爆发后，曾协助军统从事情报、策反、暗杀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黯然神伤的杜月笙包了一艘荷兰轮船"宝树云"号，携妻妾、子女、朋友、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到香港避风。

杜月笙到香港后，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这是由他的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仅三房一厅，比起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他整日蜗居于此，几乎是足不出户。

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大概是一路劳顿，受了风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一代大亨的最后岁月，基本上是在床笫之间度过的，有时甚至靠吸氧气维持，到了后来，神经衰弱症、心脏病和下肢偏瘫接踵而至。

有人劝杜月笙找名医来诊治，他会幽幽地说："老实讲，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会如此的。"

经济上，杜月笙也极为拮据，因为在香港不比上海，他赖以发迹的、上上下下的社会基础一旦失去，就无从呼风唤雨了。他来港前，将上海东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卖给美国人，得四十五万美金，在香港就是靠这笔钱开销。但杜府上下人口众多，花费很大，每月总在六万左右，毕竟是大亨，人来客去场面还是要应付得过去。

在香港杜府，整日价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兰和孟小冬两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时尚无名份，只是与他同居有年，她随杜月笙坐船来香港后，始终体贴入微地照料他，给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红的京剧名角，人长得很漂亮，年轻时在北京曾一度跟随过梅兰芳。后来潜心向余叔岩学戏，得其真传，并世无第二人，被誉为"冬皇妙音"。

孟小冬与杜月笙同居之后，再未登台。到香港后，为给杜月笙解闷，小冬常教杜月笙学戏，杜也以此为乐。不久以后，杜月笙与孟小冬正式结婚。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逢天气晴朗之际，还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过钱新之家门口，还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

有人说，这同杜月笙在国共两党面前重新“吃香”有关。的确，当时人民政权已日益巩固，统一了除台湾之外的全部山河。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持下，也获得喘息的机会。双方开始加紧对流落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回归和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杜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

对此，老谋深算的杜月笙表示，因身体欠佳暂不能回大陆。但是当遵照潘汉年“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的指示精神办事，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也不打算去台湾，并托人带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

台湾当局也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绝；无奈之下，他们拟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请他为“救国公债节约储蓄券港澳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想以杜氏之威望，帮蒋氏政权搜刮港澳同胞钱财，杜亦未答应。

那年清明过后，北京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监事会议。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此番中国银行改组，中共考虑到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赴港，邀请他们返京参加改组会议。

这批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杜月笙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

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消息传出后，震惊中外。后来史称“中

行事件”,特别是台湾方面如遭雷击,对杜月笙极为不满,蒋介石更是震怒,将在台湾的杜之老友,如张群、王宠惠、严家淦、洪兰友等人,召到草山别墅大加训斥,骂得狗血喷头。后来杜月笙病逝香港,蒋介石迟迟不作表态,也与此事有关。

1951 年 4 月 12 日,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二十四年前,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了刽子手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陆方面有何举动。

一天,台湾方面忽然派人来到香港,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黄杨两人自然枪决,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不如赶快动身去台湾,否则悔之晚矣。

言之凿凿,闻者惊心。

杜月笙忙问:“此说可靠否?”

“绝对可靠,系大陆上层人士绝密传递之情报。”来人又称,大陆已派暗杀团来港,若无法押解其回上海,则就地予以处决。

杜月笙虽然与中共有秘密接触,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对他的态度,料想不至于此,但来人如此言之凿凿,杜月笙心里不由得发毛。若翻老帐,他杜月笙的确是血债累累的,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床榻无法入睡,思虑着最终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直到事实证明,那是无稽之谈,心始稍安。

转眼到了 7 月,那天天气炎热,杜月笙正陪客人吃饭。席间,杜感到腹胀,手捂着肚子说:“我不舒服,要进去歇一歇。”

说罢,便要站起来,可用了几次劲,都未能站起来,原来腿部都已麻木,失去知觉了。显然,这是中风引起的下肢偏瘫。

杜月笙自言自语道:“不对了! 不对了! 这次真的不对了!”

众人赶忙上前,半抱半拖,将他弄进卧室休息。此后一个多月

间，直至病逝，杜月笙再未能起床，偶尔坐坐轮椅，故自嘲为“张静江第二”。

杜月笙本无太强的求生欲望，下肢偏瘫后，更了无生趣，医生或家人劝其打针服药，皆遭拒绝，他说：“你们这样是让我多吃苦头！”

好友顾嘉棠说话风趣，对杜说：“做张静江第二也不错，君不见他老人家从政之余，照样讨小老婆，照样生儿子吗？镛兄大可不必灰心！”杜只是叹道：“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就准备后事吧！”

其后几天，杜的病情果然日趋恶化。在与孟姚两位太太谈话时，曾突然昏厥，后注射强心针才苏醒过来。苏醒后，对她们说：“余生平最爱面子，长此下去将失面子。”

家人痛哭，知此次杜在劫难逃。

8月7日，杜月笙叫来秘书胡叙五，说是要口述遗嘱。他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将无及。”

时家人、好友均在室内，拭泪点头。姚玉兰拿过一只枕头，塞在杜月笙背后，扶他坐好。

杜月笙这时已是两颊凹陷，脸色白中透灰，说上几句话就要大喘几口气。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才缓缓说道，大意是：我已病入膏肓，行将离世，兹将所遗财产（包括现金、债券、不动产等），按具体分配方案，留给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继承人要努力守成，艰苦创业，云云。杜死后，据说有遗嘱三份，一为言平生志事与希望者，一为训勉儿女，一为处分财产。此即是后者。

遗嘱“处分财产”，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口述一通后，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

老友钱新之、陆京士、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

陆京士是杜月笙病情恶化后，从台湾特地赶来探视的，于 8 月 2 日抵港。7 月 29 日，陆京士接到杜月笙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内容仅四个字："病危速来！"于是急忙束装启程，赶往机场搭航班飞香港，但偏偏这几天遇上台风，飞机不能启航。

此刻已很迷信的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后，沮丧地对围在床边的亲友说："陆京士不能来，说明我的病真是不会好的了。"

杜月笙立下遗嘱后，病势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开始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脏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了。"

有一次，杜月笙忽然清醒，对周围说："有事可在此时询问，我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众人默然，姚、孟两位太太及子女，均失声而哭，甚是凄凉。

忽然，杜月笙看见站在床旁的朱某，想起曾借给他一笔款子，便瞪了他半天，一字一句说："朱兄那里，我还有十万……"

朱某未想到进入了弥留状态的杜月笙，对金钱帐目还如此清楚，连忙接上去说："你交给我的是十万港币，不是美金啊！"

杜月笙见朱某如此情急，十分不满，恶声恶气说："是港纸，当然是港纸了。"接着，他又关照了几件家务事，才重又昏昏睡去。

14 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蠕动了一下，想要对众人说什么，竟发不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下来。

姚玉兰和小冬见状赶忙趋步上前，为杜月笙抹去眼泪。小冬劝慰道："杜先生，你放心好了！"稍顷，杜月笙嘴里发出"丝丝"的轻微话语声，姚玉兰俯下身去，将耳朵贴近杜的嘴唇，终于听清了杜的最后一段话："我死后，要穿长袍马褂……，要买好一点的棺材，以后要运回上海，葬在我的生身父母旁，陪陪他们老人家……"

当天晚上，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奉命专程从台湾飞赴香港探视杜月笙。他抵达杜宅，已是深夜。

洪兰友见杜月笙脸色灰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也不敢上前，便叫陆京士向杜转达他来了。陆说："杜先生已昏迷不醒。"

洪完成任务要紧，上前紧紧捏住杜那双干瘪枯瘦的手，"镛兄！镛兄！蒋公叫我来看您了！希望你早日康复！"大呼小叫了一通，总算把杜月笙吵醒。杜于迷朦中，知道有人来看他，隐约说："好，大家好！"旋又昏迷过去，此后再未醒来。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遗嘱"。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一再关照："杜先生百年后，此份遗嘱一定要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该"遗嘱"开首第一句，便是"匪祸中国……"，接下去全是胡言乱语，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府上下，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真遗嘱墨迹未干，立遗嘱人尚有一口气，就公然要废真立假，而且要大家昧着良心承认，这种事情恐怕旷古未闻，如拒绝，又怕得罪不起，接受呢，则心有不甘。正在为难之际，洪兰友又宣读了"杜月笙治丧委员会"名单。蒋介石圈定的"杜月笙治丧委员会"名单，规格很高，其中有吴铁城、张群、何应钦、顾祝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洪兰友为笼络人心，将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又大力收罗了几位，连带将在杜宅的亲朋故旧，也悉数充作委员，一并报台湾当局批准。

可是，杜月笙死后流传最广，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

当时，洪兰友将从台湾带来的"遗嘱"，交给了杜月笙秘书胡叙五，关照他重誊一份，俟杜死后，即交各大报社发表。胡为人忠厚，

想想不是滋味，即与杜月笙生前友好密商，以偷梁换柱之法，将此“遗嘱”删改一过，凡涉及政治者悉行删去，计三大段。因此而文意不通者，再由人添笔润色。忙了一夜，才告完成。

1951年8月16日下午，众人正在杜府忙碌，内室有人大叫：“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大家一拥而进，见杜月笙面如死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护士急注射强心针，仍无效。正在手忙脚乱之际，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惊叫起来：“哎！脚冰凉了！”

有人一看表，正是下午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

（邢建榕）



汉奸下场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1877年生。1897年进杭州机房学织绸，后入浙江武备学堂。1912年来上海，逐渐成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1927年参与组织中华共进会，参加“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得任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1932年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察，中汇、交通银行董事等职。

抗战军兴，上海滩三大亨各作打算，分道扬镳。黄金荣托病留沪，但不问外事，也不想出头露面做汉奸；杜月笙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之下，亦金蝉脱壳逃往香港；惟有张啸林心怀叵测，自“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就悄悄离开上海，暂赴浙江避暑胜地莫干山的别墅里歇夏去了。

这座别墅称为“林海”，是张啸林在1927年花了一笔巨款修建的，周围修竹万竿、一色青碧，确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每逢夏天，张啸林都要去那里住上一段日子。

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为了有效地控制住社会基层，便想请黄金荣出山，希望通过对黄的收买利用，来实现对上海人民的全面统治。

可是，黄金荣却不愿公开落水做汉奸，日本人碰了几个软钉子后，便转而看中了张啸林，派人前往莫干山与他密谈，让其尽快回上海。张啸林正中下怀，口里却说：“要我下山可以，但必须弄个浙江省主席给我玩玩。”

来者未曾料到张啸林会开出这么高的条件，一时有点语塞，称回上海后再作计议。

其实，张啸林自有打算。

张啸林原本与黄金荣、杜月笙势力相仿，平起平坐，后来却每况愈下，忝列末座。他心中不服，却又无可奈何，现在他们走的走，躲的躲，正是他依仗日本势力，独霸上海的好机会，岂容错过。只是，他一方面要扯块遮羞布遮一遮，以免让两位老朋友耻笑，另一方面，当然要自抬身价。反正他信奉“有奶便是娘”这一信条，回上海后再作计议不迟。

张啸林对蒋介石也是一肚皮怨气，除了蒋对黄、杜更为器重之外，有一二件小事也使他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心。

1936年，蒋介石之兄蒋介卿病逝，蒋回奉化溪口奔丧，一时山

阴道上，吊客如鲫，其中就有专程从上海赶去的张啸林。那几天，蒋介石忙得不可开交，又犯了牙痛病，终日用手托腮。他的习惯是握手表示礼遇，颔首微笑表示欢迎，张啸林自然知道，却不晓得蒋介石牙痛，那天蒋介石接见他们数人时，只对前头一二人握一握手，对张啸林竟连笑口也不开一下，更不用说握手或说话了，气得张啸林一天吃不下饭，大骂蒋介石忘恩负义，从此以后不再去见蒋。

此前张啸林为了让留法归来的长子法尧，在上海滩谋个一官半职，曾厚着脸皮叫顾维钧疏通，陪儿子去南京见蒋介石，结果谈得不甚投机，儿子的事终未着落。

这本都是区区小事，可张啸林因气量狭小，时时想着要出一口恶气，竟至于到了不惜当汉奸的地步，实在令人可叹可恨。

张啸林回到上海后，日军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即来拜访，并介绍日本著名实力派军人永野修省与他认识。自此以后，三人经常在华格臬路张的住宅里密谈。张表示，愿意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上海效劳。就这样，他一步一步投入日军的怀抱，愈陷愈深，终不能自拔。黄、杜的一些门徒，见张有“苗头”，也纷纷改换门庭，投奔过来，一时张宅门前车水马龙，终日热闹非凡。

不久，张啸林接受日军的命令，组织起一个所谓“新亚和平促进会”，到各地为日军收购和运销日军急需的大米、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资。因为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不断截击敌伪物资，破坏交通补给线，使上海的日本侵略军的物资供应发生了极大困难。

一时做不成“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啸林，自然对这种“独门”生意大感兴趣，乘机着着实实发了一大笔汉奸财。后来他在日本侵略军的撑腰下，生意越做越大，不仅从外地搜刮物资来沪，而且从越南购煤运到上海，再转销华中一带。

据说，曾在上海街头风靡一时的三轮车，就是这时候由张啸林

从越南河内“引进”的。

张啸林又与东北日军汉奸勾结，成立“霖记木行”，自任董事长，专在辽沈一带倒卖木材。他的老兄弟俞叶封，受他的指派，专门去外地采购棉花，供上海的日军作军需之用。另外，他又叫郑子褒负责拉拢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为日本侵略军统治上海叫好。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听说张啸林落水，不免又气又急，辗转托人捎话给他，要他悬崖勒马，洗手不干为妙。可是张啸林哪里听得进去，反而破口大骂：“妈的个×！”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杜月笙离沪前，就生怕张啸林会跟日本人合作，因此劝他同去香港，自然这也是蒋介石的旨意。可是，张啸林却仿佛打定主意一般，硬是不肯去香港，反而冷冷地对杜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不妨来个‘青菜萝卜，各人所爱’，你杜月笙爱开银行、办工厂，当拿摩温、首席绅士，当议长、会长、十七八个董事长，那你尽管去当。我呢，我爱洋钿，我要发财，我还是做我的‘土’，做我的‘赌’。”

杜月笙知道再说也是白搭，只得黯然离去。

现在，张啸林真的落水做汉奸，使杜月笙心里很不好受，毕竟大家一同干了这么多年，兄弟一场，为什么偏要走这么条路呢？

这时，军统已在上海开展铁血锄奸活动，暗杀了一些大小汉奸，如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顾馨一、“黄道会”会长周树人等，其他如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周文瑞、伪和平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李金标都差点送了性命。张啸林也已列入军统暗杀之列。杜月笙的门徒，时任军统上海行动组组长的陈默，具体负责执行对张的“制裁”。

杜月笙一方面不想看到张啸林走上汉奸之路，另一方面也不愿背上一个“六亲不认”的招牌，坏了自己的名声。

1939 年秋，酷暑刚刚有些消退，张啸林从莫干山别墅返沪，便得到一个“好消息”。日本侵略军为酬谢张啸林的卖命，准备建立浙

江省伪政府，由张充当伪省长，让他过过官瘾。张啸林得知后，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更加起劲地为日本人效劳。殊不知，他的性命已危在旦夕矣。

次年1月，张啸林的亲信俞叶封，为捧名伶新艳秋的场，天天去更新舞台听她的戏。这天晚上，俞又特地约张啸林同去看新艳秋的《玉堂春》，并预订好了包厢，张一口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张恰巧有事走不脱，就没有去更新舞台，只有俞叶封等人在包厢里。正当戏唱到高潮时，俞开心地拍掌喝彩，突然有人冲入包厢，拨出手枪对准中间的看客一阵乱射，顿时戏院大乱观众乱窜，待到巡捕赶来察看究竟时，已发觉俞叶封倒在血泊里，一命呜呼了。

张啸林知道暗杀是冲着他来的，只是他命大而已，逃过了一次劫难。他一面庆幸吉星高照，一面也不免胆战心惊，好长一段时间未敢轻举妄动，整日在公馆里遥控指挥手下喽罗的活动。

但是，张啸林实在耐不住这份寂寞。他又开始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里去赌钱，出门回家，约有十多名保镖分坐三辆汽车为他保驾。有一天晚上，当张啸林的车队开到善钟路(今常熟路)、霞飞路(今淮海路)口时，恰巧遇上翻红灯，张的汽车欲停未停之际，埋伏在街角的军统除奸队员中，有一名不太老练，一跃而起开枪便射。张的司机阿四是见过几分世面的，见势不好猛踩油门，一溜烟闯过红灯跑了，吓破了胆的张啸林再次死里逃生。

戴笠接报，对军统上海站刺张接二连三的失败，大为恼怒，下令不惜代价完成任务。对那个早了一二秒钟开枪的特工，竟下令枪毙，这使负责刺杀的陈默，不得不考虑改变策略。他知道，张啸林遭受几次狙击，肯定会更加防范森严，甚至闭门不出，再采取设伏狙击的办法，恐怕难以奏效，惟有用重金收买张的内部人员。

不久，张的一个贴身保镖林怀部就被军统收买，答应见机除掉张啸林。

林怀部原是法租界捕房巡捕，系山东人，绰号“五和尚”，其父

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做过旅长。他拜张的司机阿四为“过房爷”，并由阿四引荐进入张家做保镖，因他枪法不凡，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爱司的红心，故甚得张啸林的青睐。

这时的张啸林仍旧执迷不悟，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一面继续为日本人效劳，准备做他的伪“省长”大官，一面加强戒备，以实力对抗军统的刺杀活动。他雇用的保镖，个个身强力壮，枪法不俗，并且增至二十多名，每次出门都乘坐防弹汽车，由保镖们簇拥着他，似乎向军统特务表示，谁能奈我其何！华格臬路张公馆更是戒备森严，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持枪守卫，日夜巡逻，围得铁桶一般。

但张啸林哪里想到，他的致命危险来自内部。

1940 年 8 月 14 日，张宅大院里保镖们正在闲聊，楼上张啸林与一位来客（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密商着汉奸勾当。林怀部这时走到司机阿四面前，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两人就大吵起来，而且愈吵愈厉害，旁边众人劝都劝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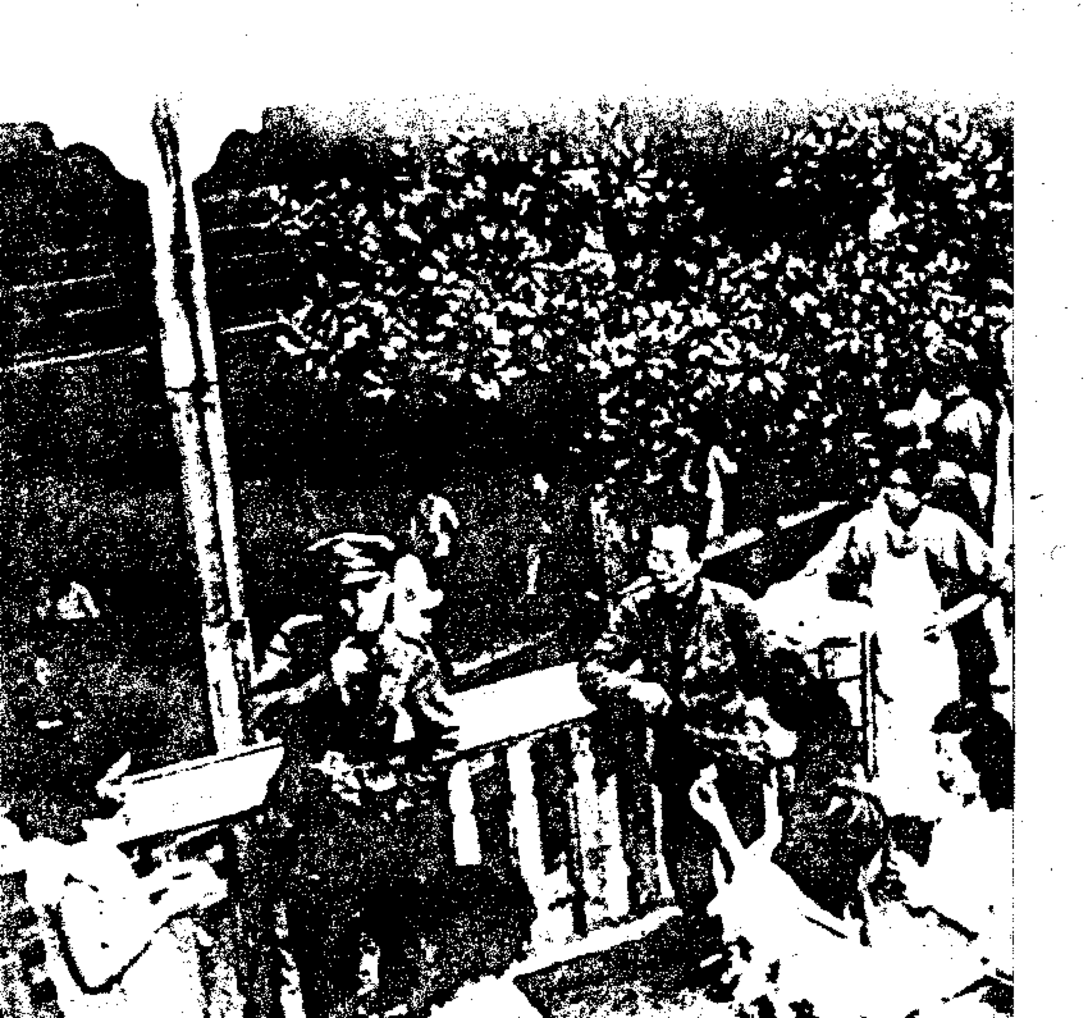
张啸林一向脾气火爆，见楼下吵个不休，便探身从窗口伸出头来，大骂道：“妈的个×！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老子多叫点东洋宪兵好了，用不着你们哉！统统给我滚蛋！”

要在平时，张啸林一发火骂人，挨骂的都乖乖的溜走了，可是今天却不一样。林怀部竟拔出手枪，回骂道：“他妈妈的，不干就不干！张啸林，你要当汉奸，待我送你上西天！”

骂声未歇，枪声已响，林怀部的枪法果然了得，一枪射中张啸林的面门，只听得一声惨叫，这个从地痞流氓起家的上海滩大亨，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汉奸败类，就此一命呜呼，终年六十四岁。

（邢建榕）

“龙头将军”的命运



开山收徒的会党龙头封金拜印，是近代中国帮会史和军事史上的双料奇观。歃血为盟的帮规“家法”用来控制卒伍，军饷弹械的源源补充来自“特种经营”……比之更富于传奇色彩的，则是“龙头将军”自身的命运。

庙会道长  忏悔生死场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行伍出身，曾在洛阳加入“庙会道”，不久为会道道长。北洋时期混迹于各派军阀之间，以流窜掠民、贩毒敛财著称。1928年改投国民党新军阀，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曾在河北马兰峪盗掘清东陵。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为张学良收编。抗战爆发后，历任冀察游击总司令、新五军军长，1943年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旋投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

一个面有雀斑的戎服大汉，头戴一顶美式军帽，手举一把锈迹斑斑的“莫邪宝剑”，背景是“庙会道”的“告徒红吾”、日酋冈村宁次颁发的“嘉奖令”、蒋介石签发的任命状……

这就是孙殿英在抗战胜利后的公众形象。虽说这幅漫画是两年后才刊登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报纸上的，但是老蒋签发任命状的这一笔速写，却是抢在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之前就开始的。

1945 年 8 月，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庆祝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欢欣中时，窝在重庆的蒋介石已考虑起了“反共建国”的“大计”。实施“大计”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把华北地区的伪军统统改编为国民党的“先遣军”，从而为他们摘去汉奸帽子，使他们对蒋感激不尽，从此服服贴贴地投入反共内战。11 日，蒋介石以十大伪军司令为各路“先遣军”总指挥的任命状，正式通过广播昭告，孙殿英就是其中之一，具体任务是“调防”京汉铁路沿线新乡至安阳间，继续与八路军作战。于是，孙殿英摇身一变，由“曲线救国”的“功臣”，转为反共内战的先锋。

同年 9 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奉将介石命令，率军暂驻新乡，待机北上进犯解放区。孙殿英却疑心孙连仲要解决他的部队，连夜坐火车去面见胡宗南，道是为贯彻老蒋的战略意图，准备把部队拉到汤阴，目的在堵住八路军下太行山；同时祭起“钱可通神”的法宝，一出手便赠送胡黄金三万多两，借以换取他的庇护。果然非常灵验，胡宗南马上表示对孙殿英“换防”的支持。此后，孙殿英不断贿赂国民党军政要员，连连奏效，不到一年时间，又弄来一纸蒋介石亲署的中将第三纵队司令官的任命状，乐得他捧着烟枪哼梆子，仿佛又寻回了当年掘宝东陵、骤发横财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麻哥，共产党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呀！”孙殿英奉老蒋军令进驻汤阴前，两个同他过命深交几十年的老兄弟悄悄地劝他：“俺

们又不是没吃过老蒋的亏,可别又让他耍了。"

"你麻哥肚子里有数。"孙殿英满不在乎地说。在他看来,国民党有着强大的海陆空军,并有美国作后台,战争只要打响,必获全胜;共军人少势弱,武器装备较国军更是悬殊,将来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眼下的局势对自己也很有利,只要打胜这一仗,既可显显自己的威风,同时也有了对蒋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个赌博场上的不败将军,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是押错了宝。

1947 年 3 月下旬,解放军刘邓大军挺进豫北,在短短十天之内,便攻克了豫北大部分国统区,拿下了孙部驻守的五陵,将包围圈迅速向汤阴紧缩。孙殿英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援兵解围上,对于刘伯承的劝降信拒不作答。双方激战近半个月,解放军铁壁合围,困守城池的孙殿英兵力锐减,弹粮愈少。蒋介石从汤阴的战略地位着眼,倒是派出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第二机械化快速纵队驰援,却恰巧落入解放军的运筹之中,他们以大部兵力从两翼延伸,形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待敌军接近汤阴时,即从两翼包抄,一举将其歼灭。

解放军歼灭了孙的援军之后,便集中兵力,向汤阴大举进攻。这时的孙殿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安。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仗如败,蒋介石会摒除自己,只有死守城池,坐等"时机"。啥是"时机",孙殿英自己也讲不清楚,更没法向弟兄们交代,只好乞灵于"庙会道"的祖师爷姜太公,特地集合所部"道徒"官佐一千多人,在汤阴城的南大街筑起神坛,供起他那把不离身边的"莫邪宝剑",焚香祝祷,跪请祖师爷指点神机。据登坛弄法念咒的"大师兄"称,祖师爷的神机指点是"义师不亡",结果发布后,士卒们的斗志更加涣散,传到孙殿英耳朵里的纷纷议论是——

"义师不亡,是说解放军吧。俺们这种'两杆枪',能算义师?"

"解放军不亡,那就是俺们亡了?俺的娘呀,可怜她还在家里等俺给送终哩……"

1947 年 5 月 1 日夜晚，解放军的总攻开始了。猛烈密集的炮火霎时间将汤阴东北角的城墙轰开了一个大豁口。抽饱大烟的孙殿英打起精神，指挥部下据险顽抗。可是官兵们大多躲避藏身，再无战心。很快，解放军控制了全城局势，退逃到东南角寨墙据点里的孙殿英自知大势已去，被迫向解放军缴械投降。至此，前后仅仅二十八个昼夜，孙殿英的第三纵队终于全军覆灭。

作为战俘的孙殿英先被送到河北武安县的冶陶镇，刘伯承司令员和他作了谈话，希望他认真反省，走向新生。此后，孙殿英去到漳河边的第二野战军训练班，揭开了人生的新一页。

横在孙殿英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他自知罪孽深重而缺乏对解放军俘虏政策的理解，面对每一顿"优待餐"，心里充满忐忑，老担心吃完后就要拉出去枪毙。其后感到自己生命确无危险后，又为部下担心起来，怀疑这些老兄弟们早已不在人世，而自己的侥幸活命，仅仅是为解放军起到宣传作用。为了消除他的疑虑，漳河训练班领导特意安排了一些同在汤阴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前来孙殿英的住宅，与他们的"麻哥"见面。眼见为实，孙殿英服了，特别是当他听说那些跟随其多年的"子弟兵"全都获得解放，有愿意参加革命的都加入了解放军，不愿当兵的全发给路费回家时，心情激动难以自抑——这个以赌发迹、贩毒发家的"双枪司令"，一向以江湖义气带兵，有"爱兵如子"之名，得知大家全有了光明平坦的前程，不由他不打心底里承认，只有解放军才是真正的"义师"，而自己的部队必"亡"。

孙殿英的敌对情绪彻底消除，话也多了起来，但是另一重困扰又缠住这个开始悔过的"双枪司令"不放：解放军是禁毒反毒的军队，可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被俘后每被烟瘾折磨，发作时就像一根随风而倒的枯苇，可以躺在炕上一连几天不动弹，几让人怀疑已经咽气。

为了挽救孙殿英的性命，漳河训练班经请示上级，决定对其采

取特殊的政策——派人化装进入敌占区买来鸦片，每日限量供其吸食，同时使用逐渐减少烟膏、增加桂皮含量的掺合办法，终于帮助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完全戒除了毒瘾。当孙殿英于恍然间知道真相后，竟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喊道："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孙殿英不再相信姜太公了，那把视如至宝的"莫邪宝剑"也用不着了，他开始进入痛苦的反思，对自己四十年的兵匪会道生涯，作了真诚的忏悔。他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

孙殿英的认识在逐步提高，身体却益加衰弱下去——他患了不治之症。训练班尽能力所及，为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可是回天乏力。

孙殿英希望活下去，就在今生今世报效解放军的大恩大德。当其自己明白已无药救后，又指望至少能活到解放军攻占郑州，使他能再见亲人一面。他说想看看儿女，给他们讲述父亲的过去，让他们代父补过……

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没能捱到这一刻。一个秋风吹拂的日子，孙殿英带着生死关头的真诚忏悔，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人世。

四十年后，他的儿子、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孙天义教授出任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分管的工作中包括保护历史名胜和文物古迹。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孙殿英的临终遗愿实现了。

（陈　洁）

袍哥政要起义投光明

范绍增，号海廷，四川大竹人，1895年生。早年不务正业，加入袍哥组织，后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战事结束后被众弟兄推为首领，占山为王。1918年在四川靖国之役中接受收编，历任营长、团长。1923年投奔杨森，任旅长、师长。

1927年5月，范绍增率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第七师东下进犯武汉，被武汉国民政府击败于仙桃镇。不过他在西撤四川途中收编了川鄂边境的一大批匪众，扩充部队达七旅之多。绿林出身的范绍增以善讲江湖义气而驰名蜀中。“四一二”政变后范绍增在长寿第七师师部热情接待了正遭蒋介石追捕的共产党员王维舟，不久范接到了捉拿王的指令，他不愿卖友求荣，于是送王旅费四百元和枪支，派专人护送出境。次年元宵，范绍增在大竹县城大事操办灯会，特意派人前往云雾山请吴佩孚及其眷属随从入城观赏，四川各军阀代表闻讯也前来凑热闹，备极一时之盛。数月之后范绍增又为吴大办寿庆，专门派人去重庆请了戏班前来演剧助兴。

当时他正受到顶头上司杨森的排挤，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于是他借为老父做六十大寿为名，在长寿召集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联军。4月范绍增和赖心辉、郭汝栋等部联合行动，包围了万县。5月他出任川鄂边防军总司令，在刘湘的策动下打响了反对杨森的战斗，不料遭到惨败，防地尽失，只得转而投靠刘湘。同年冬天在下川东军阀混战中，范绍增时来运转，连克大竹、邻水两城，为刘湘击败杨森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就任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后，为长期维持军队，重整军纪，逐步对部队中的袍哥活动加以限制和约束，当他获悉旅长周绍轩、贺森权在邻水县联合仁、义、礼各堂组织袍哥“群英社”准备大办宴席时，急电予以制止。

1931年5月刘文辉借为刘湘母吊孝为名赴渝活动，暗中赠范绍增五十万元(一说三十五万元)挑他反对刘湘。范收款后觉得烫手，便向刘湘请示，“刘自乾送我五十万元，怎样处理?”刘湘知道范绍增不是省油的灯，故作大度地答称“你拿到上海去玩，假都不必请”。于是范名正言顺地携款游沪，他在上海出手阔绰，挥金如土，广交杜月笙、杨虎等帮会朋友。青帮头目张福堂见范绍增颇有能耐，破例收他为关门弟子。从此川江袍哥和上海青帮互相勾结，声

息相通，合伙走私贩毒，大发横财。范绍增返川时杜月笙送给他一批武器装备，接着又用巨款买下妓女黄日英命其乘飞机抵达范处，与范同居。范绍增后在重庆上清寺建造了豪华的私宅“范庄”。

1932 年 5 月范绍增率第四师进攻洪湖苏区总后方新沟嘴，遭到贺龙指挥的红三军的迎头痛击，整整一旅被歼。范绍增率特务营死力冲出重围时，在猎枪队的掩护下落马而逃，他的坐骑也被红军缴获，慌乱之中只好拉过水牛当马骑。6 月范绍增等敌军不甘失败，卷土重来，攻陷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江陵驼子口、龙湾市一线。在这次战斗中，范绍增再次领教了红军的厉害，因手臂受重伤住进了汉口万国医院，吃到了苦头。蒋介石特派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携巨款进行慰劳，又通过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进行安抚。好友杜月笙闻讯后即将范接到上海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请外国医生为他悉心诊治，并慷慨送他上海杜美路花园洋房一处。范绍增伤愈后又出任第五路“剿匪”军副总指挥，围攻红四方面军。范部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才从红军手中夺回了绥定。1935 年夏范部追击红军到川西，企图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然而当范部赶到灌县牛头山、达维一线时，红军早已过去了。刘湘即以范绍增作战不力，请求蒋介石撤职查办。蒋电复“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同年冬，红四方面军回师川康直逼名山，范绍增奉刘湘之命火速赶往救援，在百丈关与红军激战一昼夜，才使刘湘转危为安。刘湘遂撤销了以前对范的处分。

1937 年 5 月范绍增被刘湘免去师长职务，调升二十一军副军长，实为明升暗降。不久蒋介石派何应钦、顾祝同赴重庆召开整军会议，意欲削弱川军。川军各部自然都不愿主动裁减部队，整军陷入僵局。顾祝同以将来升任军长相许，策动范绍增带头裁军。但刘湘深恐范独自成军之后更加难以控制，故意只委了三个军的番号，这样范绍增单独成军之梦随之化为泡影。于是范绍增在顾祝同的操纵下在范庄宴请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共诉对刘湘自私霸道的愤慨，并准备在整军会议上弹劾刘湘，将其扣留惩办。后因“七

七"事变爆发，这些计划都未实现。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湘率部出川抗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不久便因病入汉口万国医院就医。范绍增这时任十一兵团副司令，随军驻扎在汉口。他接受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密令，暗中监视刘湘，将与刘湘往来的陌生可疑的人员报告戴笠，并将刘湘与韩复榘密谋反蒋的重要情报连夜转报孔祥熙。蒋介石得此密报后下决心除韩，他在开封以开会为名，逮捕韩复榘，将其押解至武汉处死。刘湘对此甚为惊惧，病情加重，旋即去世。

国民政府迁渝之后，范绍增迁回重庆来龙巷旧居，让出范庄给党国要人孔祥熙、顾祝同等人居住使用。顾祝同对吃喝玩乐样样在行，范绍增和顾在打牌、跳舞等方面兴趣一致，气味相投，很快成了好友。在孔祥熙、顾祝同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范绍增于 1938 年春出任第八十八军军长。在经费、装备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范绍增自筹经费，自养兵员，次年春即率该军第二十一师及补充团出川抗日，徒步数千里，于 7 月初赶到江西上饶集结，在浮梁整训了二三个月后即开往浙西、苏南等地作战。1941 年 1 月范部在太湖地区张渚一带与日军苦战三天两夜，终于将敌击溃。百姓扶老携幼，带着酒肉糖果在百余里的防线上犒劳慰问。范绍增从未见过这种动人的场景，他在对官兵训话时称"我们是军人，就是要拚命为国打仗，保护老百姓。我们要打垮日本，将来才有脸见四川人，不要戴着脸壳回去!"之后范部又在江西临安、新登打退日军的两次进攻。不料顾祝同在 1942 年初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调范绍增为第十集团军副司令，军长遗缺由何应钦之侄何绍周暂调过渡，实际上剥夺了范绍增的兵权。

范绍增负气返渝后为维持家人和部属的开销，支撑局面，利用袍哥势力并依靠孔祥熙，开设复华银行，大做黄金美钞生意，获利甚丰。同时他又借打牌、家庭舞会等名义联络各方人士。

抗战胜利后，他于 1946 年秋到上海，准备长期居住。同年范绍

增在杜月笙的陪同下宴请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一个仓库，旋将其中库存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物资全部变卖，一下子赚进黄金三千多两。他以四千两黄金租下了位于上海广东路、湖北路与云南路三条大街之间的一座油绿色的三角形七层大厦——中央饭店。然后以重庆银行常务董事、复华银行董事长、兴川银行董事长的身份组建"益社"，社址即设在中央饭店二楼。益社宣称"本合作互助之精神，以谋社会公共之利益"，范绍增作为该社的理事长，主持了帮助遣送万余编余官兵返川的工作，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他又参加了益社名誉理事长杨虎等人组织的"民主同志联谊会"，暗中进行反蒋活动，并利用益社招待和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有一次他派出自己的汽车，抢在国民党特务下手之前赶到浙江峡石接参加民革反蒋活动的周绍轩秘密返沪。范绍增还借助国民党军政界一些朋友的势力，自组裕增贸易公司，自苏北、华北解放区运出棉花，再换成西药、纸张后运进解放区，从中获利。

1948年春范绍增以四川大竹县代表的身份赴南京参加伪"国大"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当时蒋要求范将手中的选票全都投选孙科为副总统。范不加思索，当即以事先已答应了选李宗仁，袍哥说话算数为由予以婉拒。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越发痛恨范绍增，同年年底益社即遭社会部公开取缔。

迭遭排挤打击后，范绍增又回想起抗战时期蒋介石借抗战为名夺其兵权的惨痛一幕，于是加紧从国内最大的反蒋力量——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那里获取政治上的援助。范绍增从上海脱险回四川后，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着手利用国民党部队及其番号组织倾向革命的武装。他以川东绥靖司令部副司令的名义通过顾祝同的门路取得了国防部暂编第十八纵队的任命，获准至多可成立十二个团。范绍增接着借口兵力不够，又申请要一个十万人的兵团番号组建部队，有关当局借口军费紧张，迟迟不予批准，一直拖

到1949年8月，为了利用四川的人力物力对抗人民解放军，才委任范绍增为挺进军总司令。范绍增不失时机，迅速召集大竹、渠县、邻水等县的袍哥和地方团队组成八个纵队，准备起义，下川东的袍哥大都愿意拥护。12月他在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挥师入川、国民党西南防御体系行将崩溃的重要历史关头在渠县通电起义，投入人民的怀抱。起义后他在所辖地区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将各县仓储全部交给人民解放军。1950年范绍增部在湖北接受改编。范绍增本人先后任中南军区参事室参事、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等职。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他主动交出了房地产，分批遣散了妻妾，逐步学会了读书看报。

"文化大革命"中范绍增遭到冲击，但对共产党始终毫无怨言。他说："共产党挽救了我。我要坚定地接受教育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粉碎四人帮后，他又为台湾回归祖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78年3月5日，范绍增在郑州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邵　雍）

汉留师长  反戈获新生



陈兰亭，四川石柱人，1887 年生。民国初年在川鄂边界为匪，并加入哥老会（又称汉留）。1916 年劫枪后率袍哥弟兄赴涪陵鹤游坪参加讨袁护国起义。战事结束后在川军余际唐部供职，历任团长、旅长。1924 年改投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任第十混成旅旅长。

陈兰亭旅驻扎在沱江北岸的泸州郊外小市。而全泸州的盐款、税收均为驻守泸州城内的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所把持。李对陈部一毛不拔，致使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寒冬腊月还穿着一身褴褛的军衣。陈兰亭多次向李提出要求分享盐款税收，均遭李章甫拒绝，为此双方屡有冲突。有一次李部巡查队借故就地枪毙了陈部两名肇事的士兵，并张贴布告称之为土匪士兵。陈兰亭认为这是李章甫有意揭他的老底，对李更加恨之入骨，伺机复仇。

1926 年 12 月 1 日，陈兰亭在中共干部刘伯承的策动下联合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在泸州发动起义。陈事先密派手枪兵着便衣入城，暗中控制了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和附近的街道。袁品文则借军士训练学校学生毕业之机会，计擒并杀死应邀前来训话的李章甫。接着陈、袁两部按计划派兵向李章甫驻泸各部发起猛攻，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于次日胜利占领了泸州全城，并发出了起义通电。不久陈兰亭受命出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四路司令。泸州起义在四川军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大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一些中层的将领或出于真心或为应付场面，纷纷电贺陈兰亭、袁品文起义并加入国民革命军的行列。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刘湘就任后增调重兵开赴泸州前线，企图一举消灭泸州起义军。陈兰亭奉刘伯承之命负责防守泸州以东的长江北岸，阻止敌军从两江交会的管驿嘴渡河攻城。当时倒向反动营垒的各路军阀都想染指泸州，远在绥定（达县）的刘存厚派人来拉陈兰亭前往绥定，许以师长；杨森则从万县派人来与陈兰亭拉交情，要陈将部队拉过去；黔军也派与陈相识的毛光翔到泸州，运动陈兰亭率部去投周西成。赖心辉为了收回泸州防地和军队，更是不遗余力地加强策反。赖派出第二十二军师长马昆山与陈秘密接洽，封官许愿。当时泸州城内兵力不足，内缺粮饷，外无援兵，陈兰亭等

人经不起考验发生了动摇，一度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降敌。后因袁品文等人的反对加上刘伯承本人已有所准备，陈兰亭只得作罢，但对于刘伯承提出的撤退方案不屑一顾，置之不理。刘伯承被迫出走后，陈兰亭就迫不及待地就任赖心辉所委的第二师师长之职。他在袁品文的劝导下，花了二百块银元买了一个叫化子的头，用枪打得稀烂送呈刘湘，算是对执行通缉令的交差，将刘湘暂时糊弄过去。接着陈兰亭率部队到万县投奔杨森，任丰（都）垫（江）长（寿）三县驻军指挥官、第二十军第六师旅长、新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等职。

陈兰亭师部设丰都期间，主持兴修了县城的马路、公园、川剧院、大操场等，使丰都的公共设施大有改观。同时他积极招兵买马，提取各县团枪支，扩充实力，镇压中共四川省委组织的二路红军。1930 年初二十军奉命调往湖北，陈兰亭不愿离开故土，改投刘湘，出任二十一军边防司令。他为了赢得刘湘的信任和重用，在部队内外清洗、杀害了一批中共干部。他还指挥所部及大刀会等地方武装“围剿”四川忠丰涪苏维埃区域，镇压土地革命。

1932 年末 1933 年初，红四方面军越过大巴山，接连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 年 10 月刘湘就任“四川剿匪军总司令”，纠集二十一万余人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剿”。次年 3 月陈兰亭率五个团投入所谓第二期总攻。当刘湘各部伤亡惨重进展缓慢之时，陈兰亭却连连报捷，宣称进展神速。实际上陈兰亭同样不是红军的对手，8 月间遭到红军反击后，陈部狼狈逃至秦河北岸时已折损过半。因此他不敢与红军硬打，为了保存实力和地盘，只得暗中派人联络红军，“明打暗送”，将武器弹药送给红军。等到红军从他的防区中撤走转攻其他国民党军队时，陈又将前此送给红军的军火加倍申报为“战场消耗”，要求刘湘如数补给。这就是他的“取胜”决窍。被红军打得丧魂落魄的刘湘被陈兰亭的鬼把戏蒙在鼓里，曾稀里糊涂地在成都“军干训练

班”上向各师军官训话时称赞“陈兰亭很会用兵，英勇善战，多次击溃共军，有时甚至胜过我亲自统率的部队”。

川军整编开始后，陈兰亭部先后归属王缵绪的四十四军，为暂编第一师、潘文华的五十六军，为一六三师，驻防于宜宾、遂宁等地。1939 年夏“云南王”龙云应召飞渝鲁见蒋介石述职路过成都时，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秘密签订了川、康、滇三省联合反蒋协定，王缵绪曾参与其事，事后却向蒋介石告密。陈兰亭本来就对王缵绪目空一切、飞扬拔扈心怀不满，对于王此次背信弃义卖友求荣尤为不齿，在刘、邓、潘等人的策划下，他和彭焕章、谢德堪、刘元塘、刘树成、周成虎、杨晒轩等六个师长一道联名致电蒋介石，历数王缵绪祸川十大罪状，如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希图坐收渔利，攘夺川康政权，归己掌握；征兵征实，扰民祸民；任用私人，树立党羽等等，请蒋速将王撤换，以谢川人，并请遴选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主持省政，用顺舆情。与此同时又调了一部分军队集结在成都，剑拔弩张，大有准备动武之势。蒋介石见众怒难犯，不得不稍作让步，将王缵绪赶下台自已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但这样一来，陈兰亭得罪老蒋甚深，他感到光靠三省联盟尚不足恃，还得联络其他反蒋势力。当时杨森驻外办事处处长、袍哥大爷杜重石自延安回成都联络哥老会势力，陈兰亭与杜一拍即合，谈得十分投机，于是着手筹建袍哥组织蜀德社，吸收金大、川大、华大、齐鲁各大学的学生入社，作为抗日反蒋的组织基础。陈还积极参与民盟刊物《大义周刊》的筹办工作，为引导袍哥革故鼎新尽了一份力。他还应杜重石之请伙同范绍增等人发起成立“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并为开设新群书店筹集了一二十万元的股金。后来新群书店在运用文艺形式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9 年至 1945 年陈部川康边防第五十六军第一六三师奉调进驻达县，在大巴山设防，阻止日军西进入川。1945 年陈兰亭又奉命调驻黔江，赴任之前他回家乡石柱省亲。省亲期间他出席了县政

会议，并捐赠教育经费五百三十万元（到黔江之后又追赠了法币二百零二万元），还为大歇乡小学捐了全套教学设备、课桌椅五十套、修缮校舍七间，又为全校六十五名学生各捐了冬装一套。陈兰亭鉴于该乡中学破旧不堪，另赠稻谷一百二十石，用以重修校舍。为了修建石柱城北二公里的石亭桥，他又捐了大洋一千五百元。陈兰亭省亲完毕离开石柱时特意留下工兵两个排，参加修筑忠（县）石（柱）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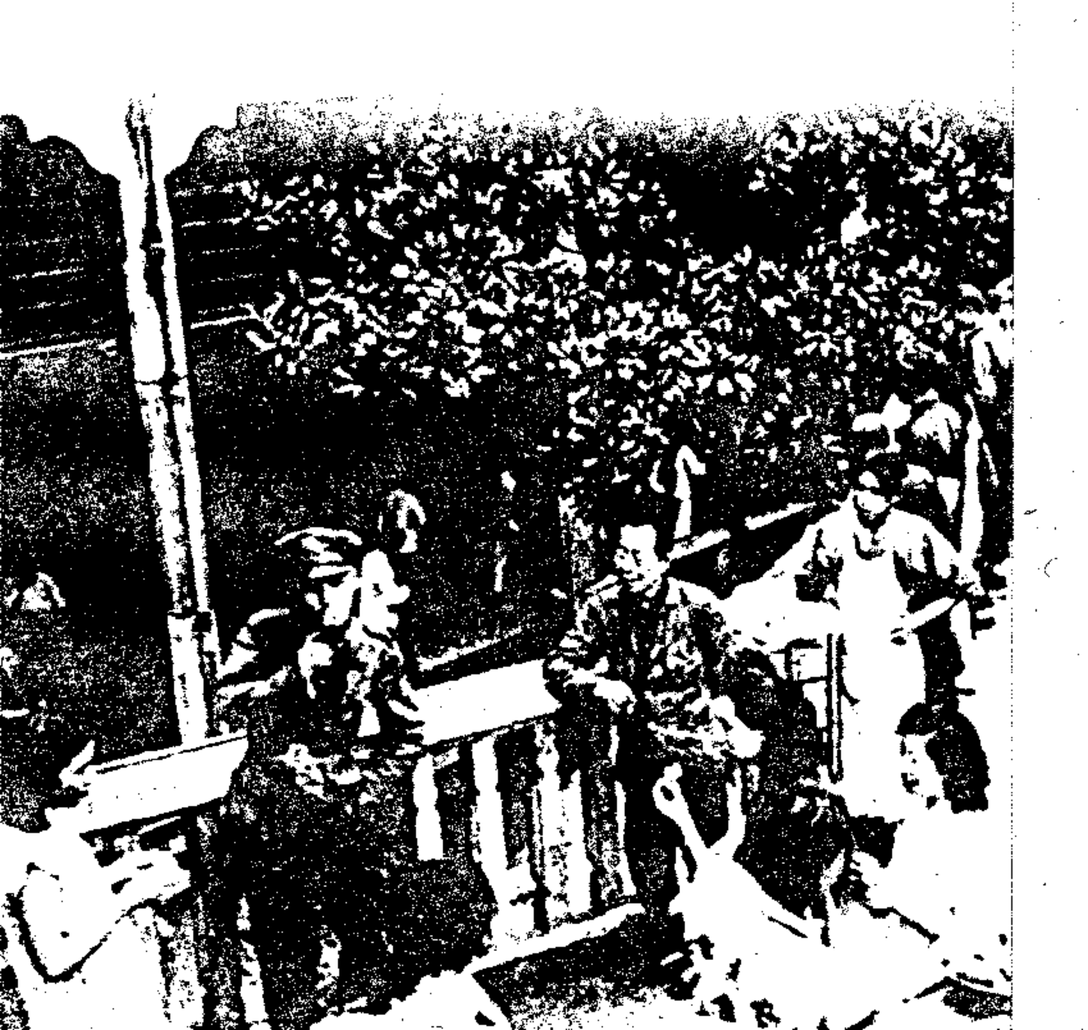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兰亭的部队被一再缩编裁汰，只是由于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的支持，陈才得以担任绥靖公署副主任，常驻重庆。1947年初在伪“国大”代表的选举中陈兰亭主要依靠袍哥的力量获胜，此后他又先后充任川东绥靖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川鄂边绥靖中将主任。在此期间，陈又命其下属在家乡石柱发展袍哥组织，培植个人势力，并指使所部退役和在役的官兵联手从达县等地押送烟土、枪弹入境，设厂制毒，公开出售，广开财源。在他的纵容支持下，石柱县城仅衙门口一条街就有烟馆十余家，整个县城搞得乌烟瘴气。

四川临解放之际，陈兰亭审时度势，追随顶头上司潘文华到彭县起义，投向人民阵营。解放后他在石柱家乡自觉接受佃户们的减租减押，佃户们说多少他就认多少，没有二话。当然当地的百姓也没有为难他。因此陈在减退期间多次赞扬共产党的仁慈和家乡人民的宽宏。离开石柱返回重庆后，陈兰亭决意自食其力，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在他的晚年，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妥善安排了他的生活。

1961年5月23日，陈兰亭因中风医治无效，在重庆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邵　雍）

被告席上的“海上三老”



抗日战争时期，陷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区内，曾有所谓“海上三老”名噪一时，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出镜率”几超过战前的“三大亨”。随着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敲响，“三老”又将何以自处呢？



临时抱佛脚



闻兰亭，字汉章，祖籍江苏武进，1870年生于江苏泰兴。少年时代在靖江的棉花店为学徒，学艺颇精。后至上海闯天下，不数年便在纱界崭露头角。1912年在南京路集益里创办“纱业竞智团”，六年后又组建纱业公会，任会长，已是中国纱业巨头。20年代后，担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纱厂业联合会理事长等。成为沪上著名企业界领袖。

闻兰亭年轻时，深信占卦算命之说，常请“刘半仙”、“陈铁嘴”之流相面，算命先生几乎众口一词：面相虽佳，但经商便发，而从政则全无出息。这一暗示左右了闻兰亭的一生。

20年代初，闻兰亭已是海上工商巨子，功成名就。其时，杜月笙尚带着一帮弟兄抢鸦片、讲斤头，还在底层挣扎。为寻找靠山，攀龙附凤，杜月笙曾邀中人，备厚礼，欲拜闻兰亭为先生，效犬马之劳。闻兰亭看看精瘦的“水果月生”，连连推却“不敢当”，“不敢当”。将杜月笙挡在了闻门之外。

但到30年代，杜月笙由曲鳝修炼成龙，已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闻人大亨的他，便急匆匆欲报当年之羞。杜的中汇银行成立后，便强令闻兰亭在纱布交易所内划七十万元给中汇做“堆花”。闻知道杜准备算老帐了，便同意划三十万元以示退让。岂料杜月笙已有准备，派车将闻接到河南路中汇银行大厦，闻刚踏进杜的办公室，杜月笙就冷笑着逼其表态。闻推托说，这个数字我是同意的，但总要跟纱布交易所负责人穆藕初商量一下。杜一步不让道：“今天，我只要你答应一声，至于穆藕初，由我另外解决。”在杜的流氓大亨的淫威面前，闻只得答应。当他走出大楼时，禁不住老泪纵横了。

中年丧妻后，闻兰亭宣布三事：不续弦、吃长素、皈依佛门。其寓所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庸村，每日香烟缭绕。闻法号老莲居士，曾潜心研习佛学，并发表了不少高论，他还与各地的佛门长老频频往来，因此被推为中国佛教会会长。

数十年间，闻兰亭依靠其雄厚之财力，热心于慈善事业，曾长期担任赈济委员之职。南北各地一有灾难，便登高而呼，发起救济，因而名声远播，城乡咸知。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八一三”事变后，闻的家属由上海往江苏避难，经过苏北时，被一伙土匪绑架。当土匪们抢得财产，还欲伤人时，听说是闻兰亭的家属，连连扔掉屠刀，大呼“大善人，大善人”，马上连人带物礼送出境。

抗战爆发后，闻兰亭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工作。他身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立即组建救护队、运输队和战地服务队，奔赴前线输运弹药、救护伤员，开展战地服务。闻兰亭加入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配合屈映光、赵朴初等广设难民收容所。当中共领导的益友社，因抗日活动而遭租界当局取缔时，闻出面对租界官员称："益友社的负责人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正派人，我可以担保。"从而保存了益友社。此外，闻还多次向新四军输送人员和物资。

上海沦陷后，工商界的不少头面人物如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均远走香港、重庆，而留在上海的闻兰亭的社会影响则日益增大，连杜月笙门下的帮会人员也因群龙无首而转投闻的庙堂，一时，闻兰亭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滩上最有影响的闻人了。在"兰老"、"兰老"的恭维声中，闻兰亭亦自诩"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日本人自然求之不得。日本驻华公使田尻命令汪伪实业部次长袁愈佺充当说客，对闻百般拉拢。接着，伪实业部长梅思平设宴招待，在日伪的引诱下，闻被拖下了水。

1942 年 6 月，为将占领区建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日伪设立上海特别市商会，闻兰亭出任监事长。次年 3 月，日伪又在上海设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以统制整个沦陷区的物资收买配给，闻担任了商统会下的棉花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 年 6 月，又出任商统会理事长，汪精卫亲笔签发聘书，上写"特聘闻兰亭为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字样。这个商统会由伪行政院直接领导，负责按照"物资审议委员会"的计划，控制各业商人运销工业品和收购农产品，并稳定市场物价。商统会成立后，闻兰亭与袁履登、林康侯等到南京去朝拜傀儡小朝廷，是为上海大资本家首次集体公开投靠汉奸政权，直喜得汪精卫眉开眼笑，特举行盛大宴会来欢迎这些经济巨子。

老于世故的闻兰亭也设法给自己留条后路。他暗中与重庆的

特工人员联络，并让军统人员在自己寓所安置了一部秘密电台，并不时资助军统特工。同时，他还与恽逸群等中共地下人员接触，提供日伪内部的经济情报；中共地下人员被日伪逮捕后，他曾出面保释；当新四军准备开进上海时，闻也表示全力支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开展"肃奸"工作。1945 年 9 月 27 日，军统人员打电话称有要事相商，闻兰亭在其干儿子余祥琴的陪同下，踏进军统"优待所"，从此失去了自由。后押入提篮桥监狱。这时的闻兰亭沉默寡言，常常独坐角落，口中喃喃低诵佛号，有时在同狱犯人的怂恿下，还升座讲佛。闻与袁履登、林康侯同囚一室，兴之所至，作诗唱和。闻曾作诗云："无限青山散不收，云奔浪卷入帘钩。直将眼力为疆界，何啻人间万户侯。"看似不作尘世之争，实际极度担心未来的命运。

闻接连写成《自白书》、《陈述词》，竭力洗刷自己的汉奸罪行。他在《自白书》称："鉴于商统会为商民自治机构，前任办理粗具规模，若继起坚持则解除商民痛苦，保全国家元气，设法破坏统制方案，暗中阻挠敌伪阴谋，尚有可为。抗战期间，凡有利于国家或社会之事务，无不竭其心力为之。"因此他时常申辩说："我反躬自省，为了百姓，为了国家的物资，我是汉忠，决不是汉奸！"当然，闻也清楚，他的辩解不会有多少人相信的。

闻兰亭被捕后，虽有了几次传讯，但一直没有公开审判。直到 1946 年 8 月 23 日，才在提篮桥监狱内的高等法院特刑庭开审，但闻兰亭没在传票上签字，因此也拒绝出庭。法庭直到第五次提审，闻仍坚决拒绝。于是，法庭决定在 9 月 5 日第六次开庭，并宣布闻再顽固对抗将采取断然措施。同狱中人也冷嘲热讽说："闻兰老既然抱有为我佛入地狱的宗旨，尽管去受审，害怕什么呢？"

当天上午，闻兰亭由法警扶着步出忠字监。到候审室见到多日不见的孙子，不禁老泪纵横。

开庭后，检察官首先宣读起诉书，以汉奸罪提起公诉。接着法

官开始讯问，闻即起立回答："本人不承认通谋敌国，更不承认是汉奸。"此语一出，四座哗然。辩论开始，检察官严正指出：伪全国商业统制会是日本在我国统制物资之最高机构，被告先后历任该会之监事长及理事长，又兼棉统会主任委员，代敌搜刮物资。实属甘心附逆无疑，应请庭上处以应得之罪。此后，闻之辩护律师江庸、朱扶九、沙彦楷三人答辩，强调闻兰亭营救之地下工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等等。最后，刘庭长宣布该案定于 12 日上午宣判。

12 日上午，闻兰亭身穿蓝绸长衫，脚着黑布鞋，由两名法警扶出，长须飘拂，却步履蹒跚，一时其门生故吏纷纷站起，鞠躬迎候。

审判长宣布："闻兰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八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闻兰亭听完宣判，神情呆滞。

押回监狱后，闻兰亭即患肠胃急病，生命垂危，急送入监狱医院抢救。此后七天未进饮食。辩护律师要求交保出外就医，狱方同意。

1947 年初，闻兰亭保外就医离开监狱，闻神情激动，全身换上新衣服，被抬入红十字会的救护车时，连连叫道："老而不死，老而不死。"

法院判决后不久，闻便提出上诉。后经最高法院复判，决定撤销原判，发回上海高等法院更审。在更审终结之日，闻兰亭是由救护车送入高院，用担架抬到法庭上去的。1947 年 8 月 5 日，上海高等法院更审判决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但闻兰亭仍然不服，再次提出上诉。

此时，闻兰亭病情加重。华山路红十字第一医院诊断为胃癌，然开刀后并未好转。1948 年 7 月 5 日在医院病死。时年七十九岁，尸体土葬于上海联义山庄。

（陈　蒙）



白头做囚徒



林康侯，名祖谓，字康侯，1875年生于上海。家境殷实，幼入私塾，十七岁中秀才。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附小教员，旋赴日本考察教育，注重学习新式教育，回国后在附小推广，深得校方赏识，遂担任“总教”（校长），连任八年。后弃教从商，先后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上海总商会主席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等职。

30 年代中期的林康侯，拥有数十个理事长、董事长的头衔，俨然是上海滩上一商界大亨。就在林康侯平步青云、踌躇满志之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中国。“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林康侯追随杜月笙等，加入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参与募捐、置物等。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常务理事，林康侯还经常到新闸路上的红十字会总部办公，到医院探望伤兵，去收容所救济难民，着实忙了几个月。1937 年 11 月上海沦陷，林康侯走香港避难，在杜月笙的麾下搞救济工作，专门处理海外华侨的抗战汇款。后又以中国资方代表的身份，与劳方代表朱学范一起到日内瓦出席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再后来，参加了世界红十字会的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会后林畅游欧美诸国，灯红酒绿的异国风情，使他忘却了烽火四起、敌军肆虐的中国大地，一直到 1938 年底才重返上海。

此时，日军正伙同特工总部竭力拉拢上海工商界的上层人物，然而，工商巨子们或拒不资敌，或托辞隐匿，或远走高飞。此时，从国外返沪的林康侯，自然引起了日伪当局的重视，他们频频向林康侯招手：财政部长一职正虚位以待。

对于日伪的引诱，林康侯并未立即呼应，“附逆”毕竟是当时上海人最痛恨的末路。日伪特务见林不肯乖乖就范，便实施威逼。一日，当林康侯单独外出之际，被四个彪型大汉“请”到了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丁默邨、李士群等轮番软硬兼施，勒逼其同意加入汪精卫政府。林知道在此魔窟硬顶肯定要吃亏，便耍了个花招，表示“此事完全可以考虑”，但须让他回家好好准备一下。日伪特务见目的已达到，同意放他回家。

林康侯脱离魔窟后，回家稍加收拾，便悄悄潜入一密友家中藏匿。日伪当局见林康侯仍执迷不悟，不禁恼羞成怒，立刻下令通缉捉拿。林一看上海已无法立足，便秘密逃离上海，到香港才算松了

一口气。

岂料，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当夜即攻人香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30 日，滞留在港的林康侯被日军逮捕，囚禁于香港大酒家。日军为笼络林康侯等国民党有关人员，生活上十分优待。

1942 年 4 月，日军将林康侯等押回上海，软禁于锦江饭店，并各个攻破，胁迫他们出山。这时的林康侯，立场已经动摇，眼看战局恶化，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对抗战前途已经绝望；思量不如趁机投靠日本人，亦可免去眼前的痛苦，于是走上了卖国求荣的道路。

对日伪当局在上海设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专门搜刮中国的各种物产，该会由唐寿民任理事长，林康侯等担任理事。为此，林曾与闻兰亭一起到南京见汪精卫。后来，闻兰亭接替唐出任该会的理事长，林康侯便做了秘书长，负责主持日常事务，大量的战略物资通过他的手，源源不断地供给了日本侵略者。

汪精卫得知林康侯积极为其工作时，曾亲笔给他一函，以资鼓励。林得此信，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珍藏于保险箱之中。除商统会外，林还兼任伪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等，时常与日伪要人相往来，收入当然极丰，其权势达到顶峰，时人将林与同样落水的闻兰亭、袁履登一道合称“海上三老”。

1945 年 8 月，日军战败，上海人民重见天日，林康侯则惶惶不安，他预感罪责难逃。

9 月 27 日，林康侯被国民党军统局逮捕，林完好保存的汪精卫给他的信函被搜出，并成了林的一份罪证。

此后，林康侯与闻、袁二人同囚在提篮桥忠字监内，被上海舆论讥为“三星聚会”。初时，林康侯与闻、袁每日高谈阔论，作诗吟唱。后来，眼见一个个汉奸被判刑，遂无心对句了，仪表堂堂的林康侯后来弄得蓬头垢面，憔悴不堪。经过近一年的审讯，1946 年 8 月，上海高等法院判决林康侯有期徒刑六年，财产没收。已经古稀

高龄的林，立即上诉竭力洗刷自己的汉奸罪名，并动员门生朋友为其打点疏通，甚至让他的大小老婆到处求人，鸣冤叫屈。1948 年 4 月，南京最高法院改判林康侯为有期徒刑二年。

刑满释放后，林康侯于 1949 年初赴香港定居，1965 年病死，终年九十岁。

（陈　蒙）

袁履登 急难颂阿门



袁履登，原名贤安。1879年出生于浙江鄞县，幼年受洗入教。1893年以第一名成绩获得伦敦礼敦路主日学校的奖学金，为感恩典，改名礼敦，并取字履登。1897年，入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后返甬出任宁波斐迪学校副校长。1913年再回上海闯荡，从为黄楚九推销"小囡牌"香烟起家，后担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投资遍于地产、电影、渔业等，30年代跃为上海滩一大闻人。

1946年5月31日，上海高等法院宣判：袁履登通谋敌国，购办谷米，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这时，只听一阵声嘶力竭的呼叫从被告席上传来："冤枉啊，冤枉。""我一生信奉耶稣基督，一向以行善为本，可从来没有害过人啊！"

他，就是被称作福、禄、寿"海上三老"之一的袁履登。

"八一三"事变后，大批难民涌人上海租界，各界人士纷纷设立收容所，安置难民。虞洽卿筹建上海难民救济协会，邀袁履登担任该会秘书长，该会先后收养难民八万余人，袁因此博得了"大善人"的名声。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华界，租界沦为"孤岛"。热心于慈善和教会事业的袁履登其时也颇为活跃，汪伪阵营便打起了他的主意。"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头目丁默邨、李士群相继找袁谈话，拉他参加伪组织。袁开始顾虑重重，便采取引退养老以为应付。一心要拖袁下水的丁、李见他不肯就范，便采取绑架手段，时袁履登亦知其不会善罢干休，于是隐匿行踪，密藏于亲朋好友之间。岂料，特务爪牙多，最后还是被丁、李从黑人牙膏厂老板严某寓所搜出。敌伪将袁押至虹口软禁起来，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要袁与日伪合作。

青少年时代十年教会学校的熏陶，使袁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奴才性格，而后来的买办生涯更使他习惯了依赖外国主子的生活。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何时能收复失地？袁权衡以后，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与日本人合作。

于是，袁履登出任受日方控制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市商会理事长。1942年2月，日伪为了有效控制上海，设立保甲筹备委员会，推行保甲制，袁为虎作伥，出任会长，并亲手创建"保甲自警团"。次年，日伪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及各种统制委员会，袁又担任相当重要的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袁的主持下，"米

统会"在苏、浙、皖三省产米区设立办事处，布置统制网络。统购来的粳米全部供应日本侵略军，而配给市民的则是泥沙掺杂的"户口米"。对此，上海民众愤怒不已，而袁履登不但丝毫不为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羞愧，反而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我国于物资上之供应，尤其是主要粮食的源源接济，实在责无旁贷。"后来，由于发生了伪粮食部长顾宝衡贪污案，汪伪政权秉承日本主子之旨意，将粮食部撤销，于是，"米统会"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米粮统制机构。

就是在日伪时期，红得发紫的袁履登与闻兰亭、林康侯合称"海上三老"。

1944 年，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呈明显变化，日本侵略者的败势日益明显。袁履登为摆脱战后惩罚的下场，于 5 月向汪伪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周佛海提出辞职，并设法与重庆联络，但为时已晚矣。

1945 年 9 月，袁履登也随着闻、袁两人跨入了愚园路军统"优待所"的大门。"优待所"原是汪伪特工大队大队长吴四宝的住所，袁履登名为在押，却也可占居一室，饮食丰盛，在花园中散步，也可与家人朋友通通电话。后来，进来的汉奸人满为患，"海上三老"遂被转押到楚园，楚园原是汪伪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的寓所，环境优美，更胜于前。袁履登每天可读到各种报刊，所需衣物乃至香烟之类，也可通知家中送来，一日三餐，顿顿是佳肴。只有一件事极不如意，原来袁履登嗜酒如命，曾作诗"不可一日无此君"，而当局怕他们喝酒闹事，连啤酒也是禁绝的，这使得袁有度日如年之感。他多次以年老病重为由，要求保外候审。但狱医检查后报告：只有痔疮复发，并无其他疾病，法院拒绝了袁的请求。

1946 年 5 月 31 日，上海高等法院判处袁履登无期徒刑，这意味着袁将终老提篮桥监狱。于是，他立即上诉，再作挣扎，并动员朋友、同学、亲戚四出运动。袁在上诉状中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罪责，不仅坚称所任伪职"全为安定商业起见，毫无自私之心"，还吹嘘在抗战期间从日宪兵队保释数十名同胞。最高法院根据其上诉状，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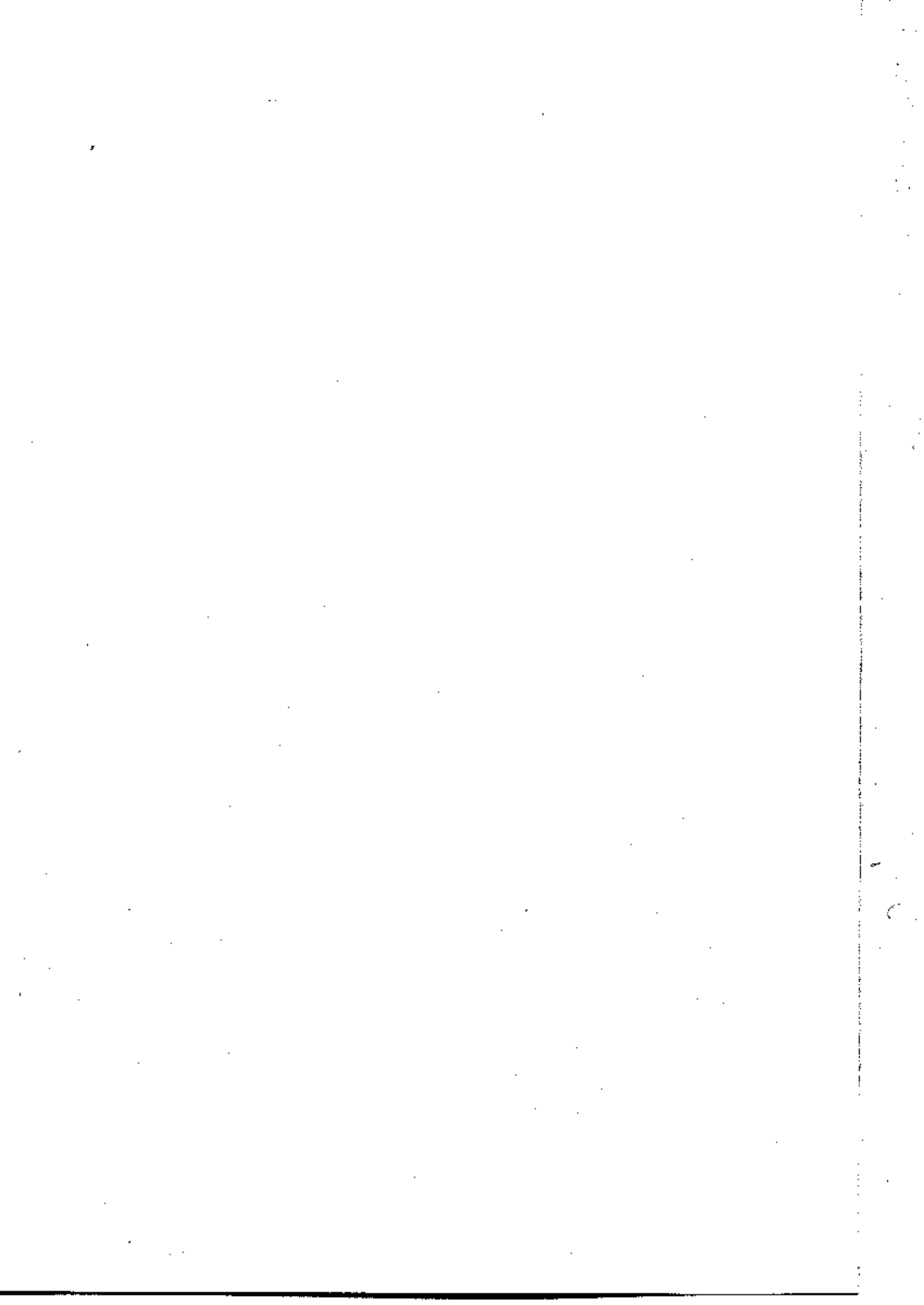
令上海高院进行复审。1947 年 9 月 30 日，上海高院以袁任伪职时曾营救重庆方面人员为由，将袁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 7 年。减刑幅度极大，然袁仍不满足，再度上诉，但这次被最高法院驳回，并指出："声请论旨显系饰词狡展，无可采信，原判现无不当，依法应予核准。"

这样，袁履登只能入提篮桥监狱服刑，尽管其待遇远较其他囚犯为优，不仅床铺、被褥、日用品和食品是外面带进来的，连起居也是狱警侍候，但他的心情没法好起来：这里毕竟是阴森森的监狱。袁履登只好每日忏悔和祷告，诵读圣经来打发时光。于是，同一囚室中，这厢闻兰亭嘴中念佛，高呼佛力无边；那边袁履登口颂阿门，低唱上帝救我，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不久，袁履登又闹称病重就医，这次狱医一看，袁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和肾炎。经高院同意，1948 年 1 月 29 日，袁具保移送虹桥疗养院治病。

1948 年 3 月，蒋介石当选总统，特赦犯人以示庆祝，袁履登也在其中。袁获释后继续在沪治疗，不见好转，遂于 1949 年春由其妻子陪同去香港就医。但结果更糟，到 1951 年突然中风，病势垂危。其亲属们由沪到港，连寿衣寿材也同时运到。这以后，袁的病情又有好转。由于香港费用太昂贵，遂决定返沪定居。

回到上海后，上海市人民法院于 1953 年 8 月，复以汉奸罪判处袁履登有期徒刑 10 年，但因袁年迈重病，宣布免于执行。1954 年 12 月，袁履登因患动脉硬化而死亡，时年七十六岁。

（陈　豪）



江湖游侠的沉浮



绿林啸聚，草莽独行，出入于“社会”内外的“刀客”、“游侠”，往往是民间口耳传奇的主角。其实他们的活动并不能游离于历史所提供的时空条件，用时代的尺度衡量，自然就有了高下良莠的判别。

义侠杜心五潜心武术

杜心五，湖南慈利人，1869年生。六岁开始受私塾教育。因喜爱武术，曾先后拜十多位武师学艺，后经人介绍，又拜川黔武林高手徐矮子为师，学习武林绝技——自然门，苦练八载，成就一身好武功。此后，他还不断往返于川、黔、桂、滇，博采各派所长，丰富发展自然门武艺。后任镖师，出入江湖，曾孤身剪除过一个臭名昭著的武林败类李老大。由于他行侠仗义而名重一时，人称南北大侠。

杜心五是个心怀大志的人，他不甘心一辈子做镖师，决定东渡扶桑，另谋发展。在国内时当他看到民众疾苦内心焦虑万分，就决心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造福乡里。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他考入了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农科。春去冬来，转眼间已是杜心五在日本潜心攻读的第四个春秋了。这时，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事。

时值1905年8月20日，这天杜心五外出散步，他来到一处，瞧见门外华人云集，心中疑惑，不觉留起神来，只见屋内挂一横幅，上写"东京各界华人庆祝同盟会成立大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心中大喜，早就听说这个救国救民的组织了，今日终于得以一见。当下，快步走进大厅，见有个身穿西服、留着分头、目若朗星、身材不高的青年在高声演讲，人说这是宋教仁。就听他说："同胞们，我中华乃数千年之文明古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然道光以来满清政府丧权辱国、崇洋媚外，割国土，赔巨款。人民生计日蹙。国事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我等华夏子孙，岂可无救国之思？……"

杜心五听后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息。"呜—，呜—，呜—"一阵急促的警笛在会场外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定神一看，就见在清廷官员指使下，一群日警冲进会场直扑宋教仁等人，场内乱成一片。"住手！"杜心五大喝一声，操起一条板凳冲了上去。他旋风般地扫倒一批日警，然后三拳两脚，击倒扭住宋教仁胳膊的日警，拖住宋教仁往外猛冲。

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杜心五才放开宋教仁。宋由于心系同伴，也不多言，向杜深深一鞠躬道："多谢兄长相救，咱们后会有期。"

果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有一次，当宋教仁为保护一个姑娘免受日本浪人侮辱，被浪人步步紧逼之际，杜心五及时赶到，他三下两下就将那浪人打倒在地。回头又对宋教仁亲热地说："走，兄

长，咱们今天好好聊聊。”

两人走进一家客店，坐定之后，宋教仁微笑着说：“若是小弟不曾看错的话，仁兄可是杜心五先生？”

杜心五大吃一惊，“宋先生何以得知在下贱名？”

宋教仁哈哈大笑：“小弟亦是湖南人，仁兄为民除害，官府四处画像缉拿，谁不认得足下。”

“惭愧，惭愧，心五乃一介武夫，何足道哉，宋先生才是我民族之栋梁，心五慕名已久。我中华有孙文、黄兴、宋先生执导，何愁革命不能成功！”

两个越谈越投机，互生仰慕之心，最后互问年龄，结拜金兰，杜心五为兄，宋教仁为弟。不久，杜由宋引进，认识了孙中山，并参加了同盟会。

杜心五由于武艺超群，古道热肠，不久被委以重任——担任孙中山的保镖。当时，宋教仁就慎重地嘱托他：“逸仙先生的安全，关系中华大业，大哥千万不可大意。”为了不负重托，从此杜心五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地保护孙中山。

一天，孙中山正在对东京华侨界发表演说：“……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有志之士都起救国之思。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凡我会同志，务须矢忠矢信，遵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之革命纲领……”

杜心五在人群中，神情肃然，一面倾听孙中山先生演讲，一面警惕地四下巡逻。忽然，他看到离会场十步开外处有几个乞丐和江湖艺人在东张西望，神色可疑，杜心五不觉提高了警惕。他走到了一个乞丐跟前，见那乞丐双手白净，心中明白“定是清廷蔡钧派来的鹰犬”，猛地揪住他的衣领，一把撕开他的上衣，胸脯上立即露出一条青龙。乞丐见伪装败露，回身一拳朝杜心五打去，旁边装扮成江湖艺人的也纷纷拔出匕首，一齐朝杜心五扑来。杜心五神情镇定，拳来脚去，几个回合，将几个人打翻在地。随后一个箭步上前双

手钢钳般地搭住乞丐两肩，“谁派你来的？”他大声吆喝。乞丐痛得无法忍受，连连讨饶：“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是蔡公使，蔡大人……”杜心五朝旁边几个同盟会员一扬头：“检查他们的货担！”几个会员上前搜查，果然发现货担内藏有炸药。一场惨剧得以消弭。

其实，杜心五并不是每天跟随孙中山。他的主要任务是遇重要会议组织保卫会场内外安全，以及担负在车站码头接送孙中山的任务。杜心五在任保镖期间，对孙中山赤胆忠心，多次挫败清廷刺客，使孙先生等同盟会首领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过了几年，杜心五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联络组织秘密会党，策应革命。他到处活动，足迹遍及全中国。由于他义薄云天，深明大义，渐渐赢得了江湖会党的广泛支持，成为清末中国秘密社会史上从未有过的“双龙头大哥”。后来，他将南北会党统一，歃血约定，一旦时机成熟，便高举义旗，推翻清廷。当一切安排妥当后，他又回东京复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当时，宋教仁任农商部总长，杜心五任农商部参事。杜欣喜万分，认为多年夙愿可了，决心大展鸿图。谁知风云突变，就在1913年3月国会开会前夕，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杜心五赶赴上海，手捧宋教仁遗像，心中悲痛万分，一是为痛失好友，二是因多年理想眼看将化为泡影。

不久，二次革命又惨遭失败，杜心五终于心灰意冷，闭门谢客。直到1919年，杜心五第二次“出山”，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会党组织，成为青红帮的“老太爷”。不过，他始终是淡出江湖。1923年，他选万籁声为弟子，传授自然门功夫，自己长年潜心研究武术。

解放后，杜心五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后为湖南省政协委员。1953年，杜心五在湖南逝世，终年八十四岁。这位民主革命时期声名卓著的斗士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

（陈　洁）

刀客失风授首



张寡妇，原名贺贞，1880 年生于河南洛宁草庄村，1898 年嫁与同县德里兆农民张有为妻，生子三人；1906 年张有病故，遂以“张寡妇”称。其后，张寡妇的长子张振升因求佃种大伯张更山的田地引起争执，遭到毒打，旋离家投奔啸居在宣阳、洛宁交界处的“刀客”，意欲劫杀仇家张更山、张清溪，结果先遭黑枪身亡。1922 年秋，张寡妇为报杀子之仇，带次子张明升上山投入匪伙，成为豫西著名的女“刀客”。

寒蛩悲鸣，枯叶满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张寡妇向留在村里看家的老三交待了几句后，便带着老二明升离开德里兆，连夜摸上宣、洛边的洪崖南山，开始了她的“趟将”生涯。

张寡妇有勇有谋，处事果断，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加上她又是振升的母亲，年轻人都把她当长辈看，尊重她，把她推为“总驾杆”，并称她为“干娘”。张寡妇对“孩子们”说：“以前我只会拿针、拿线，现在叫拿刀拿枪，没办法呀，人家逼的，要从头学，跟你们学，大家抬举我，让我当总驾杆，推不掉咱就一块儿干吧。不过我有几句话要讲在前头：第一，眼前咱要抢富户、拉肥票，招兵买马，购进枪支弹药，扩充势力，第二，只拉票不伤人，女票不能欺侮，快结婚、还没出嫁的快票，谁也不准近身……。”

规矩甫定，张寡妇立马树威。那些拉来的大户人家的必须当天赎回的“快票”，如果当天来不及赎回，必须隔夜的，张寡妇对她们特别优待，有时亲自为她们放哨保护。有一次，一个土匪想“尝鲜”，被张寡妇一枪打死，从此，再没人敢对“快票”起歹心。因此，开始时，凡张寡妇的“快票”，家属总是放心及时的凑款赎回。

名声传开后，一些散杆从四面八方跑来投奔张寡妇，慢慢形成了一支品流混杂的绿林武装，大则攻村破寨，小则抢劫拉票。张寡妇也渐渐地变了，对部下放任自流，虽不每每亲自出马，却也时不时地跟随指挥、坐地分赃，弄得洛宁一带绑票风气盛极一时，人心惶惶，豫西几百里内一提起张寡妇，大人惊愕，小孩止哭。地主老财们对她更是恨之入骨，编了几句顺口溜：“蛇蝎心毒，寡妇心狠，犯她手下，挖苗断根。”一天夜里，几家富户联合行动，把张寡妇留在家里务农的三儿子先升拉到洛河滩活活打死。噩耗传来，张寡妇悲痛欲绝，发誓要用德里兆村富户的人头祭奠儿子的亡灵。

恰好此时，驻扎在洛阳的镇嵩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公派其拜把兄弟杨彪来收编张寡妇的匪伙。张寡妇听后厉声道：“我拉杆是为

了报仇,不是想当官,请转告你们师长,多谢他的好意。"杨彪笑了几声,回过头说:"久闻干妈礼贤下士,今日一见,不过如此! 再说,冤仇早晚都能报,可是刀客不能当一辈子。你的部下都还年轻,你不要误了他们一辈子。"张寡妇听罢,暗自佩服对方胆识,同时也认为他言之有理,便答应考虑考虑。

除极少数人不愿下山外,大多数都愿意接受招安,认为收编后有固定军饷,不怕围剿,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张寡妇心想:"人心如此,不如顺其所愿,日后在军队有人手,遇事也好照应。"遂答应接受收编,条件是:(一)按实有人数改编;(二)不能遣散原班人马;(三)收编后,所有军官,统统由张寡妇亲自指派。条件谈妥,1926 年春,在洛阳城内按实有人数编成了一个团。张寡妇指派杨德廉为团长,次子明升为连长。

人马枪支点验完毕,张寡妇又匹马单枪回洛宁南山鸳子岭去拉杆子。

凭着自己的"威望",很快使那些小杆子聚拢,尤其是散居在洛河南北的零星股匪,更视张寡妇为救星,很快聚集了上千人。他们不仅在洛宁东河南的洛宜交界处打家劫舍,还去渑、陕交界的地方闹腾,把个熊耳山、伏牛山之间弄得神鬼不宁。1929 年,张寡妇照样把部下又交给了前来收抚的叛冯投蒋的万选才,自己再次回洛宁拉杆。很快,又聚拢了一帮人。

1931 年,当连长的二子明升到陕县头峪去催办"日行兵差"。他性情暴躁,稍不顺心,轻则骂人,重则伤人,引起公愤,被一士绅打死在酒席上。张寡妇闻讯恼怒交加,血洗了头峪,烧杀抢夺数日,全村老小,死伤惨重,幸存者寥寥无几。张寡妇的这次行动,充分暴露了她土匪的凶残面目,老二的仇是报了,但是她却欠下了头峪人民一笔大血债。

复仇的欲望又趋使她决定袭击德里兆村,血洗张更山家宅。她命令到达目的地后,要杀个鸡犬不留。由于先头领路的二驾杆误认

为上陶峪村的兆村就是目的地，于是见男人就杀，一下杀了三十三口。等张寡妇赶到，才知道弄错了，原来真正的兆村还在西边的一道峪里。她捶胸顿足，对此次误杀无辜，悔恨万分。这么大的行动，很快就惊动了王召峪各村，他们都鸣锣聚众，村村严阵以待，县保安团也赶来追剿。张寡妇眼看报仇之愿望难以实现，便面向德里兆村大哭一场后，带着人马向东南山而去。

随着军阀混战高潮的过去，社会秩序也逐渐趋于安定，在国民党对土匪软硬并施的政策下，土匪分裂瓦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张寡妇的原有部下已被分别编入各部而不复存在，威名豫西的“张干妈”此时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十几年的刀客生涯，使她过早地两鬓染霜。然而，晚年的潦倒处境并没夺去她为子报仇的坚强信念，她决心铤而走险，完成夙愿。

1933年秋，张寡妇带着几百两鸦片烟土，匹马单枪，坐着人力车到许昌贩卖枪支。途经郏县一座小桥时，遭遇两土匪拦路抢劫，高处土匪向她喊话：“站住，带私货没有？”另一土匪上车要搜，只见张寡妇从容不迫，慢慢从车上下来，把包袱掷于地下说：“查吧。”土匪正要解开包袱，张寡妇迅速掏出手枪，一枪把高处土匪的手枪击落，高声叫道：“老娘就是张寡妇！”二土匪当即跪地求饶，张寡妇扔给他们一包枪伤药，嚷着：“以后把眼放亮点，要眼不是光占脸的！”说罢，若无其事的上车继续赶路了。车夫好生奇怪，问：“你为啥不打死他们？”张寡妇笑了笑答道：“打掉他两个手指头，教训一下就够了，他们要有办法，也不会来劫路。”

许昌买完枪后，她本打算返回洛阳。没想到在郑州火车站被人认出盯上，那人看准她住进的旅社后，马上跑到周公庙警备司令部作了报告。很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旅社，并架起了机枪喊话。张寡妇一看这情形，冷笑道：“何必做这阵势！要人跟你去，要枪给枪！老娘不是孬种，不会逃跑的。”说罢，扔出枪，整了整头发泰然自若的走了出来。

审讯席上，张寡妇旁若无人，“是的，张寡妇就是我，我就是杀人放火的大刀客头张寡妇……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的事，我不赖……要杀要剐随你们……”经审讯属实，张寡妇被枪决于洛阳东关大石桥下，至今洛阳老城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还清楚地记得枪毙张寡妇那天的情形……

一阵喇叭声冲破了人群的喧闹，人群潮水般两边散去。一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卡车从周公庙警备司令部徐徐开出。车上，两个彪形士兵架着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老妇人被反绑着，背上的亡命旗清晰触目。她态度安详，两缕灰发在写满皱纹的脸上随风飘拂着，站在高处的围观者，还能看到她的小脚。

车到井胡同口，她突然抬起头用洪亮的嗓子叫起了牌子：“乡亲们，你们都听着，我是被逼当刀客的，我杀过人，放过火，可我的仇还没有报！我今年五十三岁，再过五十三年，我还是这粗这长。”张寡妇喊着，车开着，一直到东关，她的喊声没有中断。刑场上，她面不改色，“死了也要报……”，“仇”字与枪声同留人间。

（侯平安）

双枪黄八妹下海做匪

黄百器，闺名翠云，女，排行八，以“八妹”行称，上海金山人，1905年生。幼年从父亲学骑射，及长双手能同时发枪中鹄的，人称“双枪黄八妹”。后随丈夫徐阿书（即“太保阿书”）啸聚太湖为匪，曾以绑架法国驻沪领事夫人勒赎一案震动一时。徐阿书犯案斩首后，黄八妹又因贩卖私盐遭当局通缉，逃至奉贤南桥，嫁与当地绅户姚忠修为妾，一度销声匿迹。

1937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抗战,南桥镇也热闹起来。黄八妹坐不住了。"还我河山"之类的壮语,八妹不会说,但总觉得心里头有种抑制不了的激动,她想为国家出点力,她也要打那些个"矮东洋"!

11月5日,南桥镇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黄八妹聚了十几个姐妹,先到北乡躲几天。第二天一早便动身,预备了条船,沿横泾水路,驶向西渡……没多久,只听得"叭叭"的枪声和叽哩哇啦的说话声,船当即调头,搁在浅滩上,黄八妹召呼姐妹们拼命往苇丛里走。可是,女人们终是逃不过日本鬼子的追赶。接着,黄八妹听到的是撕心裂肺的哭号声、惨叫声。伏在苇丛里的黄八妹咬牙切齿,泪水扑簌簌。回到滩涂上,她看到的是惨绝人寰的迹象,姐妹们一个个血肉模糊,身躯支离破碎,她喃喃地发誓:"只要我八妹活着一天,就一天不忘替你们报仇。"

黄八妹用自己的家产去买枪,这十年结交的金兰姐妹聚起来有三十多人,结成了"死党"。她们展开游击战,对零星下乡的日本鬼子放暗枪,半个月下来杀了好几个。鬼子杀得多了,镇上都说乡里有支神出鬼没的队伍,头头是姚家做小的黄八妹。八妹心里明白,既然拉起了队伍,要干就干大的,关键要弄些个枪来。

还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即将结束,日军登陆上海时,黄八妹扮成难民来到上海,找到当年略有交情的杜月笙。当时,杜月笙正在收罗人搞"淞沪别动总队"。见到这个江湖上小有名气的女将来找他,正中下怀。黄八妹开门见山:"我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上门是来伸手的。"她原原本本地讲了湖荡的惨剧及自己拉队伍杀鬼子的事。杜月笙静静地听着,而后又独自盘算了一阵子,开口说:"八妹,不是我捧你,看得出你是个干番大事的人。枪,我替你凑一部分。你自己干势单力薄的,不如就算我们淞沪别动总队的人吧!"而后又委了八妹一个上尉。这趟八妹的上海之行大获成功。兴冲冲地回

到奉贤，有了枪，有了名义，她就放开手脚干了。

当时，国民党六十二师师长钟录办了个“挺进纵队军官速成班”，黄八妹也被正儿八经地叫去“速成”，反复地灌输服从“党国”，服从“领袖”，还有就是“反共”。在速成班中八妹结识了谢友胜。在谢友胜向八妹提出两军合并的事时，却有消息传来：黄八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走了。

日本人以母亲的性命为威胁，要黄八妹投降，部队收编。八妹曾立誓要为湖荡丧身的姐妹报仇，对日本人早已是恨之入骨，更何况如今自己是个抗日军官，算是爱国人士，要投降，说什么也是不干的。八妹的母亲，虽是个普通农妇，但她也深知日寇的劣行种种，不想拖累了八妹，自己撞死在牢房。

消息传来，黄八妹悲痛万分，嗓子都哭哑了，国仇家恨更是激起了她心中的仇恨之火。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日本人前来袭击八妹的驻地，将祠堂重重包围。但黄八妹仍率领一百多人杀出了重围。两天后，她带着部队到了乍浦镇西北的黄山与谢友胜会合。谢又提出两支队伍合并的事，并允诺让八妹坐第一把交椅，并有意与八妹一起过。

此时，黄八妹的心头又一次浮起那个字：命。几天后，八妹与谢友胜同居了，两支队伍也合并，称为“江南挺进总部第三纵队”，黄八妹当了司令。

一日，谢友胜和麻子志祥他们正在议论：“据消息说，日本人在注意八妹，守备队长米山已命令人打听八妹的行踪，要抓她！”八妹听到后，冷笑一声：“看谁抓谁？”麻子志祥忽地一拍大腿，对黄八妹说：“要抓他也不难，这个人是个色鬼，只要有女人作饵，他肯定上钩。”

这一夜他们细细地商量了捉米山的办法。

第二天，便有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子在米山部队不远处的布店里聊天，等米山走近她们时，她们又像害怕似的散开。这样经过两

三天，弄得米山浮躁不安。第四天，她们将米山引到竹园深处，忽然女子变成了大汉，先是将米山拳打脚踢了一番，而后只听得："你不是要抓黄八妹吗？我来了！"米山被弄得愣愣的，被几个人五花大绑押到了新仓镇西市，就地枪毙。

杀了米山，黄八妹的名声大震。

黄八妹的枪法，也被人们愈传愈神，传到天目山时，她已被说成是飞檐走壁、神出鬼没的女侠，引来了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召见。黄八妹大包小包地去于潜拜见顾祝同。对前来接她的顾祝同的副官出手大方，使得副官对其十分殷勤。还捧她为游击英雄之类，并再三叮嘱见了墨帅(顾祝同)不要紧张。顾祝同与黄八妹谈话间，称赞八妹是"抗日女杰"、"巾帼英雄"。在洗尘宴上，八妹出了个小小的洋相：酒过三巡，黄八妹敬过顾祝同之后，脱口而出道："不知这位长官说的'墨帅'是哪一位长官？我也敬他一杯。"说着，望着副官。急得副官抓耳挠腮。在顾祝同示意下，没有点破。

黄八妹到于潜，一副走江湖的气派，出手阔绰，得到顾祝同周围上上下下的交口赞誉。第二年，黄八妹便正式当上了突击队长，官阶升为少校。

1939 年清明前几天，黄八妹的部队被调到武康、临安京杭国道南面的前线。黄八妹作战心切，将行军赶得又饿又累的军队组织起来，冲进柏大庙，在日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阵乱枪，日本鬼子先吃了亏，打了一阵逃进山里。这样双方位置调了个头：他们在明，日寇在暗，必然要挨打。而八妹却是顾不得这许多了，命手下进山追击。在战斗中，她身受重伤，幸亏躲进棺材中，才能逃命。几天后部下发现她时，已是生命垂危，凶多吉少了。

一时间，浙西的报纸大登特登黄八妹的战功，浙江省委主任黄绍竑、浙西行署主任"天目王"贺杨灵也一起捧场。百姓们凡受到日本鬼子的欺压，总是暗暗咒道："你别凶，晚上出门碰上双枪黄八妹，叫你不得好死。"

黄八妹病愈之后在杭嘉铁路沿线打游击。接着她的官衔也越来越多，什么“平湖县自卫大队长”、“杭州湾护航纵队司令”。其间，旧时挚友陈有娣曾与黄八妹前来叙旧，并作为共产党员，对黄八妹说：“打日本鬼子，我们和你是一条心……”然而，黄八妹在国民党官禄相许和吹捧诱导下，将挚友的话语忘了个干净。1942 年，三北游击队还对黄八妹演了一出“捉放曹”，八妹表示要一同抗日到底。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了。黄八妹、谢友胜原以为自己是“有功之臣”，兴奋不已。谁知，上头却是把黄八妹给忘了，后来仅挂了个“平湖县参议员”的头衔。1948 年初夏《新光日报》记者去看她时，黄八妹成了个吃斋念佛的半老徐娘，她说：“想想从前，我杀业太重，阿弥陀佛！现在外头的事再也不管了！”

1948 年，蒋家王朝已在作最后的挣扎了，衢州“绥靖主任”汤恩伯忽又想起黄八妹来，委她以“浙江省绥靖第一团团长”，军阶也变成了上校。佛门终究是没有锁住黄八妹的心，她又重出江湖，招降纳叛，充当起国民党的打手。平湖临解放前，黄八妹被封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兼平湖县县长，率领一群乌合之众往杭州湾口的大羊山岛流窜。走时是一个漆黑的夜里，她估计：这次出海，恐怕再也回不来了。她竭力地想在漆黑中看见点什么，怎奈是乌黑的夜包围一切。

大洋山岛东到西、南到北都不过十里，全岛是荒凉的山石。几个月后，由大陆带来的食物告罄，黄八妹和她的“海北纵队”便以掠劫渔轮商船为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完全堕落为海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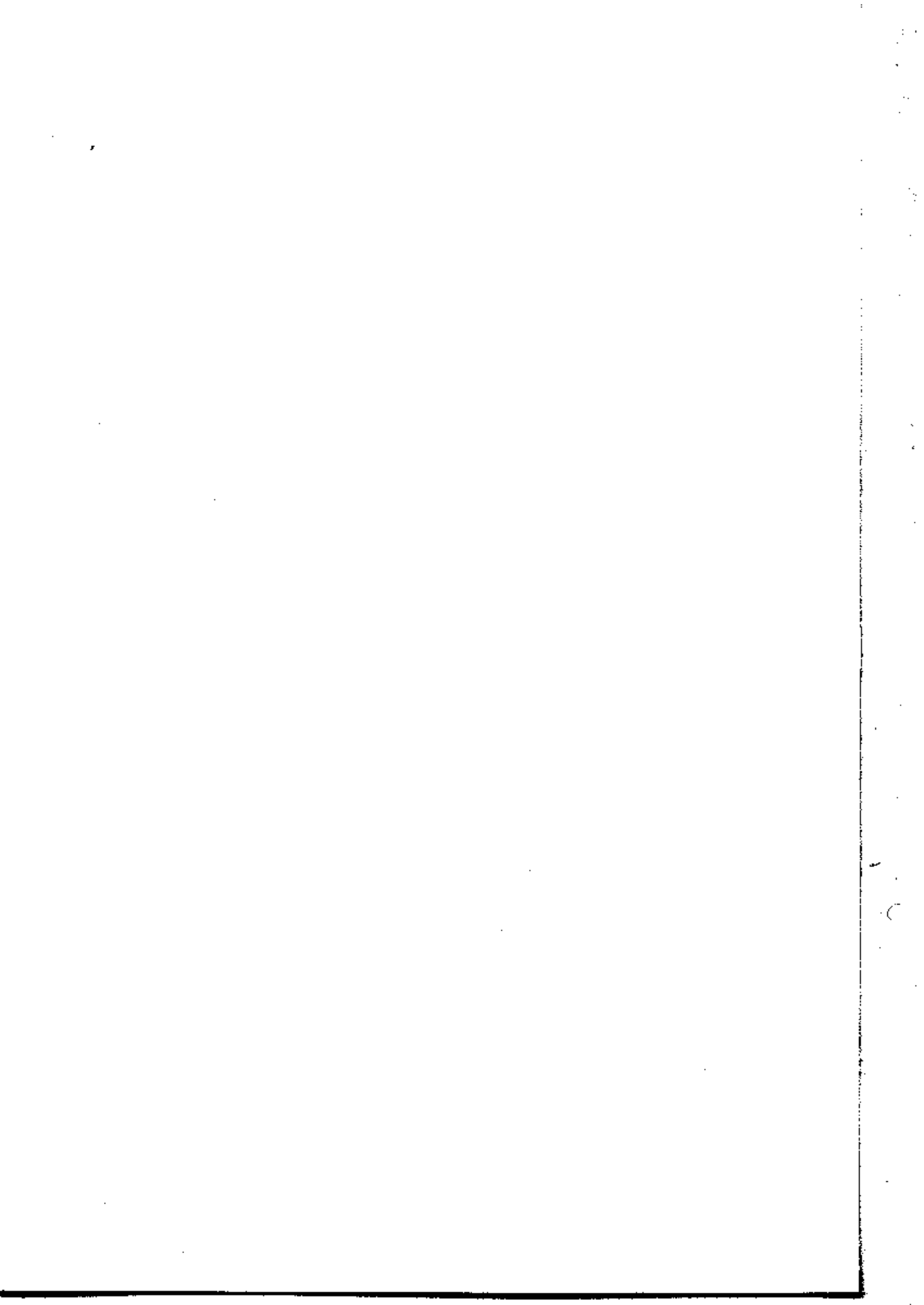
1950 年，红旗插上舟山群岛，黄八妹一伙又窜至大陈岛，被胡宗南捧为“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总会浙江分会”主任委员，继续与人民为敌。

大陈岛解放后，黄八妹漂到台湾，还指望以负隅海岛数年“反共”的履历，向国民党残余政权分一杯羹。然而在顾祝同、胡宗南这些大员眼里，此刻的黄八妹已经成为毫无作用的土匪婆，懒得再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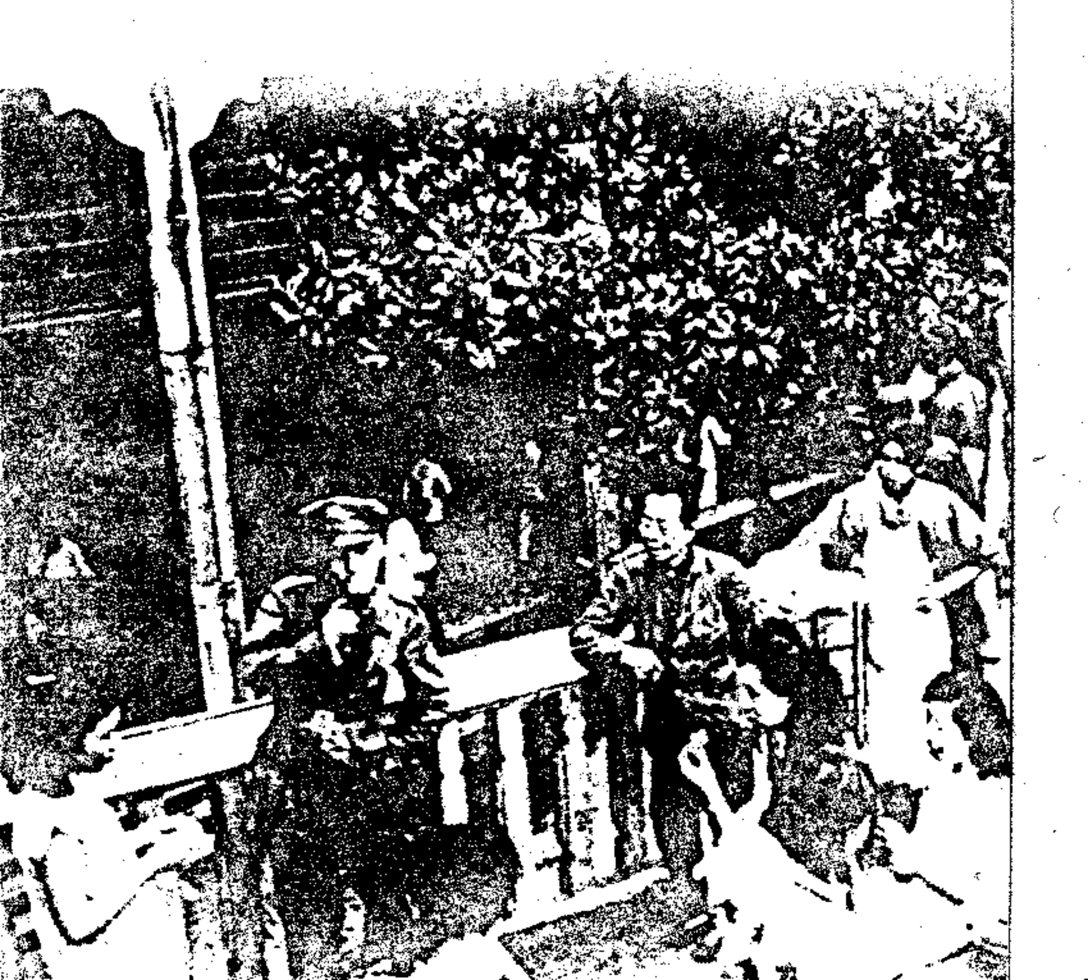
睬她。凄伤之际，黄八妹只得领着那些被她裹胁出来的乡党在新店大坪林办了个“大陈义胞妇女技工互助合作社”，从此由土匪婆转入“缝穷婆”生涯，惨淡经营自己的余生。

1982年5月4日，用错杂色彩涂抹一生历史的黄八妹在台北去世，終年七十七岁。

（石　瑛）



助纣为虐的帮会头目



毒焰弥空，鼠辈跳梁，黑社会头目与反动政治势力的同流合污，敷演出民国政治史上最龌龊的一幕。在本章中登场亮相的，是来自几个“大码头”的丑角。

太湖帮五哥邀功讨死

应桂馨，字夔丞，浙江镇海人。年少时即放浪于上海的妓院、烟馆之中，是个流氓习气十足的公子哥儿。清末，捐得候补知县的虚衔，后实授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在政治投机活动中，偶识陈其美，借便混入革命阵营，迭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庶务科长、江苏巡查长。同时利用金钱为诱饵在江浙会党势力中占一席之地，为太湖帮“五哥”，1912 年，出任流氓帮会组织“中华共进会”会长。

1913年3月21日，上海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这样一则消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先生昨日在沪宁车站遇刺，生死不明，凶手不明。"这就是民国初年震惊中外的"宋教仁血案"。该案的主谋是窃居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而直接主使人则是他的鹰犬、上海大流氓头子应桂馨。

应桂馨出生在一个以坑害百姓起家的奸商家庭里，自小不务正业，稍大一些就在上海狂嫖滥赌，吸毒狎妓。先是为雏伶小喜凤赎身并开设"桂仙戏馆"，串演淫戏，被租界捕房拘押。继而又谎称自己是安徽省筹赈委员，因大闹公堂而锒铛入狱，趁夜挖开狱墙逃之夭夭，流窜到外地，一年后才偷偷回到上海。

几经波折以后，应桂馨感到自己没有一张护身符，难以遮掩他的不法行为。于是在苏州从他的那些脏钱中拿出一部分捐了个候补知县的虚衔，如此一来，应桂馨由普通流氓一跃而为政治流氓，并结识了陈其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借助会党势力发动起义，光复上海，出任沪军都督。应桂馨凭借与陈其美的关系，积极为革命党提供各地消息以骗取信任，因此得在都督府中捞到一个谍报科长的美差。此时浙江平湖县革命军首领张献贞策动起义，打倒了应桂馨的拜把兄弟原知县高庄凯。应桂馨为了给把兄弟报仇，设计欺骗张献贞要他到上海共同组织北伐军，在半路上摆下埋伏将张献贞枪杀。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陈其美委派应桂馨率谍报科和庶务科人员负责中山先生的起居与安全。12月30日，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应桂馨又奉命组织卫队护送孙中山抵达南京，夤缘获任总统府庶务科长。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总统府任职期间，应桂馨克扣贪污公款事发，按律应该严惩，但孙中山碍于陈其美的情面，从宽处理，

将他就地免职。

回到上海后，应桂馨随时伺机东山再起。正巧当时江浙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青红帮在组建“中华共进会”，应桂馨就以提供活动经费为条件，谋取了会长的职务。所谓“中华共进会”实际是一个流氓“大杂烩”，根本称不上政党组织，会中的大小流氓时常在社会上打、砸、抢，制造事端，乃引起坐镇北京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注意。

当时应桂馨正因“共进会”参与武昌兵变而遭黎元洪通缉。袁世凯便利用这个机会，要其“智囊”内阁总理赵秉钧派出心腹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南下上海收买应桂馨。作为招抚条件，洪述祖通过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关系让黎元洪取消了对应桂馨的通缉令。此后，袁世凯又将应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为江苏巡查长，并给予五万元活动费。由此应对袁世凯感恩戴德，顿足捶胸地发誓要替主人效犬马之劳。回到上海，应桂馨用赵秉钧给他的密电码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电信联系，根据洪述祖的指示，亲自选中一个名叫武士英的兵痞为杀手，开始了谋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的策划。

1913 年 3 月 20 日，宋教仁要乘火车赴京，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应桂馨布置了三个流氓打手和武士英一起去执行暗杀的任务。晚上 10 时 50 分，宋教仁等人走出贵宾候车室，早已埋伏在候车室外的武士英看到走在中间的那人的长相与应桂馨给他的宋教仁照片一模一样，便一个箭步冲上去朝着宋教仁的腰部就是一枪，随即向站外狂奔。恐慌之下，他又向后连开两枪，趁乱逃出了车站。

宋教仁遇刺身亡，举国震惊，国民党人更是悲愤异常，悬赏白银一万两捉拿凶手，沪宁铁路局和江苏省地方检察厅也发出赏格。应桂馨从报纸上证实了宋教仁确实死于医院后，赶紧拍电报向袁世凯邀功：“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应某人自以为此事干得滴水不漏洋洋得意，便又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只等着大总统给他授勋。

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3 月 23 日，宋教仁出殡的当晚，设在南京路通运公司楼上的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来了两个四川口音的学生，交际处主任周南陔接待了他们。原来这两个学生是来沪投考的，住在四马路(即福州路)鹿鸣旅馆。据他们称在其隔壁住着一个衣衫不整、面目凶恶的小个子，名叫武士英。一天，武士英向他们借了两块大洋，说有人要提拔他，叫他干大事，事成后就能大富大贵。武士英还拿出一张照片，说照片上的人该杀。他又取了一张名片，称名片上的人就是要提拔他的大人物。两人当时并不在意，但第二天在报上看到了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以及宋教仁的照片，发现与武士英的那张竟然是同一个人。周南陔觉得事有蹊跷，忙问：“名片上的人叫什么?”两个学生回忆半天，就只记得此人姓氏有长长的一撇。“难道姓周、姓唐、姓廖还是……”周南陔百思不得其解。他一面秉报陈其美，一面派人监视武士英。

可是等周的部下赶到旅馆，武士英早就结帐走了。但在搜查他的房间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张名片，上写“江苏巡查长应桂馨，法租界西门路文元坊”。这个不大不小的收获着实让周南陔等人欣喜。他们赶忙会同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西探总目阿姆斯特朗率巡捕直奔西门路(今徐家汇路)文元坊应家，但扑了个空。应桂馨的家人说主人到妓女胡翡云家去了。赶到胡翡云那里，又知应桂馨正在湖北路迎春坊妓女李桂玉处喝“花酒”。巡捕们又即刻包围迎春坊。应桂馨身怀武功，众人不敢打草惊蛇。周南陔曾与应有一面之识，应桂馨在宋教仁出殡时还忙着帮助张罗过，所以由周南陔出面唤出应桂馨。当时，应桂馨饮酒正酣，忽听得楼下有人呼唤，就摇摇晃晃地走下楼。一见是周南陔满脸陪笑说：“周老兄，上楼喝两盅吧。”话音未落，阿姆斯特朗带着一群巡捕一拥而上，“咔嚓”一声铐住应的双手。应桂馨这才如梦方醒，知道事情败露，他吓得面如土色，双腿颤抖，乖乖地束手就擒。

武士英还未落网，并且像应桂馨这样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

人物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告不倒他的，因此第二天，周南陔协同巡捕对应府进行搜查。应桂馨的宅第位于小西门外，是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子，装潢华丽，陈设阔绰。众巡捕在应家翻箱倒柜，把衣橱、抽屉、书架各处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片纸只字。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为寻找证据而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周南陔"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悄悄走到二楼软禁女眷的厢房，屋子里应桂馨的三妻四妾们个个胆颤心惊，缩成一团。进门后，周南陔谎称是应桂馨的知交，受应的嘱托，来取走秘密文件转移。女人们将信将疑，周南陔又装作着急的样子催促道："快，快点！如果让巡捕房翻出来，应大哥就危险了。"这些女人果然中计，一个小妾站起身撬开墙角的地板，取出一个小箱子交给周南陔，说："阿拉是晓得的，刚刚外面看得太严，没有弄出来，现在给你。"周南陔故意装着很平静的接过箱子，连忙又问："还有别的要紧东西吗？"应妾摇摇头。于是他将箱子揣在怀里，转身下楼。

在楼下客厅里周与阿姆斯特郎等开箱检查，只见箱内藏有应桂馨与北京方面的往来电函、信件、文稿，以及一支剩下两颗子弹的五响勃朗宁手枪。由于电函多用密码，众人费了几小时才破译出其中的关键字句，如"毁宋酬勋"、"梁山匪魁"等字样。周南陔等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应桂馨背后竟有如此大的后台。

物证到手，大家松了口气，接下来就是要把凶手武士英擒拿归案。或许是开玩笑，国民党人陆惠生有意无意地向被扣留在应家的闲杂人等中喊了一声："武士英！"岂料，立刻有人应声"有！"这一声令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但见一个矮个子从人群中走出，承认他就是武士英。后经两个四川学生辨认，证实确是武士英。原来这天上午，武士英跑到应宅来讨赏钱，谁知正落入法网。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应桂馨、武士英被抓获后，"宋案与北京政府有关"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在国民党和各界的压力下，江

苏都督程德全与北洋政府驻沪交涉使陈贻范向上海领事团提出将二犯移送中方审理，并要求把从应家搜出的证据公诸于世。但领事团称两案犯是在租界被捕的，应由租界法庭进行预审，证据确凿才能交人，至于公布物证一事关系中国政局，必须向北京公使团请示，显然，帝国主义是在有意袒护袁世凯。

在租界法庭上，应桂馨百般抵赖，使审讯陷于僵局，加上江苏地方当局再三交涉，上海领事团不得不在 4 月中旬把应、武二犯及物证移交上海司法机关。在黄兴、陈其美的支持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厅长应德闳答应在 4 月 25 日将应桂馨与洪述祖、赵秉钧的来往密电电告袁世凯、参众两院和各省军政长官，并决定在同日开庭审理。就在开庭的前一天，武士英暴亡，此乃杀人灭口是毫无疑问的，但法医多次验尸，却查不出死因，既不是外伤，也没中毒迹象。武士英虽然罪该万死，而他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

武犯一死，对应桂馨的审讯暂时搁置。为了防止应犯自杀或被暗杀，当局特意派兵一团加强了对他的看管，甚至连吃饭都由守军的营团长陪同。在狱中，应桂馨还享受到了其他犯人望尘莫及的待遇——吸食鸦片。应桂馨是有名的“瘾君子”，虽然监狱每天给他戒烟丸四至八粒，可毫无作用，烟瘾一发作，应桂馨就蒙头蜷缩成一团，手足冰冷，口吐白沫，要死要活的。出于无奈，当局只好购买鸦片精，供他服用。

4 月 25 日 12 时，程德全、应德闳如期将“宋案”的初步调查结果和证据通电发布。次日，《民立报》等报刊以醒目的标题全文转载了通电。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心以武力征服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1913 年 7 月，蓄谋已久的军事进攻发动了。

国民党仓促应战，战争形势每况愈下。当国民党人被迫撤出上海时，有人向陈其美建议将应桂馨就地枪决。陈其美考虑再三，认为不依法处决应桂馨会有损国民党的声誉，而且陈其美认为自己与上海的青红帮势力有密切联系，谅应桂馨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由于他这心慈手软的一招，给了应桂馨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在国民党撤退时，应桂馨在其党徒的策应下趁乱越狱逃跑。

应桂馨出逃后不敢留在上海，先在青岛躲了一阵，尔后溜进北京，自恃有功找袁世凯兑现"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狮子大开口要求袁世凯再给五十万元。但是在刺杀宋教仁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之后，国人皆知袁世凯是刺宋的主谋，国民党也已同袁世凯兵戎相见，应桂馨对袁来讲已是一条无用的走狗了。可应桂馨以仍藏有袁世凯唆使他暗杀宋教仁的密证为要挟，一再邀功请赏。袁世凯为了保留最后一层面纱，对应桂馨虚与委蛇，给了他一些钱物。这下应桂馨乐昏了头，在北京打着袁世凯的招牌招摇撞骗，还讨了旧相好胡翡云做姨太太。

袁世凯岂能容他如此嚣张。1914 年 1 月，袁世凯交给应桂馨一笔钱，命他南下办一桩事。应桂馨明知有诈，但也知道袁世凯不好惹，就勉强答应。1 月 19 日，当应桂馨乘坐的火车刚过天津以南的杨柳青，袁世凯的杀手——北京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闯入应桂馨的车厢，将他乱刀捅死。坏事做尽的应桂馨就这样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张姚俊）

天津卫脚霸  恶贯满盈

巴延庆，天津人，1897 年生。少年时随父业“脚行”，后投河南宏卫军，曾任许昌毒品缉查处稽查员，因受贿案发下狱。获释后后又往南京投奔设赌抽头的舅舅。1924 年返回天津，任警察署缉查班稽查员，专管查缉赌场，同时在天津日租界四平里自设赌局。1926 年 3 月，新任直隶都督褚玉璞委任其青帮师父厉大森为天津军警督察处处长，巴延庆拜在厉的徒弟督察分处长白玉生门下，从此“在帮”，并逐渐混出“津沽闻人”的名头。

1931年巴延庆之父巴有顺与河北大街脚行把头李任晴打官司败诉，一气之下躺倒了，于是就把"子孙签"传给了巴延庆。当时河北大街脚行共有三十三根签，分在十几个把头手中，巴延庆手中只有一根，势单力薄，一个月所得无几，有时甚至分不到钱。为了打破李任晴的把持和操纵，巴延庆联合该行其他把头用一支没有子弹的枪迫使李交出帐簿同意清帐，旋又将李撵出脚行。

1933年巴延庆与西窑洼脚行、西街庄脚行、大红桥脚行、河东扇面脚行等把头联合发起成立了天津市运输业同业公会，在天津市长萧振瀛的支持下通过重新登记全市脚行的办法，实际上废除了二百多年来天津四口（即四个城门）脚行的"官脚行"地位，巴延庆的同业公会在挤垮四口脚行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很快膨胀为有一百零八家脚行参加的组织，巴被推选为理事长。

1936年，巴延庆通过同业公会书记李同江结识了洪帮太行山首领姜般若，未几便由姜引路，加入洪门。此后，巴延庆在脚行业中发展把头马文元、刘德山等五百余人入帮，因此被封为洪帮内八堂候补"护印"。借此形成运用帮会势力把持同业的条件。同年冬，巴延庆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入社后通过天津铁路机务段李俊搜集日军在天津东站上下车的人数、军械数量等方面的情报，同时通过在天津日本宪兵队任中国便衣的拜把盟兄赵锡钧刺探日军动态，通过复兴社转报戴笠，深得戴笠的重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于7月30日占领了天津。日本侵略者在拼凑华北伪政权的同时，筹组伪社团新民会。在天津实际负责筹备新民会的是日本人田中，此人早在北洋军阀时期在新疆天津帮福泰成商号搞业务时就和巴延庆合伙贩过烟土。巴延庆回津后，福泰成天津分店的货物装卸起运又是由河北大街脚行承包的。两人关系极熟，此时田中便推荐巴延庆任天津新民会运输分会的会长。

巴延庆下水后，甘为侵略者驱使效劳，在脚行中大量发展新民会员，同时依然担任天津市运输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汉奸市长潘毓桂为笼络巴延庆，曾发表天津特别市公署第六十号布告，支持巴对全市各脚行的统治。在日伪的支持下，巴延庆以调停纠纷等名义，向同业大肆搜刮，据估计光是这方面的进项，每年多达三四千万伪钞，以至于具体数字连他本人亦说不清楚。另一方面，以其多年混世的历练，巴也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留条后路，他曾设法帮助天津老西开瀛洲小学校长、国民党骨干分子王任远离津南逃，并承担了姜般若、王任远两人留津家属的生活费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巴曾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以汉奸嫌疑扣押了十九天，后经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时子周、执行委员王任远同时向稽查处长陈仙洲担保，说明巴是复兴社的地下工作人员而获释。不久巴当上了国民党第七区区分部委员、三青团运输分团主任。他指使"运输业同业公会"的办事人员将所管辖的搬运工人全部按花名造册集体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借此当上了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督导员。

1946年7月军统天津站的外围帮会组织天津忠义普济社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召开成立大会，军统天津站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亲自出马担任理事长，姜般若任顾问，巴延庆是该社九个分社的社长之一。同年8月，运输业同业公会进行改组，巴延庆连任理事长。国民党为了重用他，特意于1947年保送他去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三个月。自南京返津后，巴延庆的地位迅速提高，任全国总工会理事，并经国民党中央提名被分配在天津工会系统中竞选伪国大代表。巴延庆在竞选中依靠运输业同业公会等五个行业公会的选票，以二千九百张选票如愿以偿。同时又被当选为天津市参议会的参议员。

权倾一时的巴延庆控制了全市三千余名封建把头，并将九百零一个大把头中的三分之二拉入洪帮、忠义普济社、三青团这三套

组织之中。巴延庆经常派出这些人充当打手去破坏学生运动。1947年5月20日天津学生进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时，巴延庆指使以三青团骨干和忠义普济社分子为主的地痞流氓诡称"天津学生爱国团体联合会"成员，狂呼"反对罢课，铲除不良分子"等口号，冲乱行进至南市美琪影院的学生游行队伍，大打出手，和反动军警一起破坏了这次游行。6月2日当天津各界群众共同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时，巴延庆又直接组织流氓打手在东马路一带，用木棍、铁钩等殴打游行队伍中的青年学生，一时血流遍地、伤者甚多，酿成了一起震动一时的大血案。

1948年人民解放军神速入关，包围天津。国民党天津市当局为死守天津，专门成立了"戡乱委员会"，统一指挥守城之战。巴延庆亦列名其中，他强迫脚行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洋灰、钢筋等建筑材料运往前沿阵地构筑城防工事；还命各脚行派人派车去忠孝门、新开路、津塘路一带，刨挖路面上的石子，供国民党军队在市内修建飞机场接受空投之用。

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占了天津，粉碎了巴延庆南逃台湾开厂的迷梦，但是这个集国民党党棍、封建把头、特务帮首于一身的恶霸非但不思改悔，甚至连末路到来似也未意识，仍图凭借他在津门的恶势力与人民政府较量。

在天津军管会明令进行反动党团骨干、特务自首登记后，巴延庆曾纠集同伙刘德山、马文元等在旺道庄、西老公所等地秘密集会十余次，商议对抗共产党的办法，甚至利令智昏地派人赴京向华北人民政府告状，要求保存封建的脚行制度。巴延庆还不遗余力地破坏工人组织，压制解放后工人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激起脚行工人无比愤怒，严惩巴延庆遂成同业员工的共同呼声。

1949年6月24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依法逮捕了巴延庆，1951年3月巴延庆和马文元、刘德山一道被判处死刑。

（邵　雍）

“香港杜月笙”滚晃台湾

30年代初，杜月笙以其无处不在的庞大势力、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仗义疏财、礼贤下士的处世品格，赢得了“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隆誉，成为中国黑社会的最高楷模。时人常将各地黑道一号人物冠以“某某杜月笙”，如“天津杜月笙”、“广州杜月笙”、“汉口杜月笙”、“旧金山杜月笙”等，其中有一位也是出自上海的后来居上的青帮首领，他就是人称“香港杜月笙”的李裁法。

李裁法祖居何地、生于何时,已难以细考。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很早就在十六铺、八仙桥、九亩地等处,与瘪三乞丐为伍,赤手空拳打天下。稍长加入了青帮,成为通字辈人物后,才局面有了改观。他在法租界有了住所,娶妻生子,但所干之事业仍是为大流氓做"包打听",为赌场"抱台柱"(当保镖)之类,时间最久、功夫最深的是秘制吗啡。

晚清以后,上海为世界最重要的毒品中心之一。20年代初,随着各地大小军阀的崛起,罂粟种植亦再度兴盛,鸦片税成为军阀进行武装割据的主要来源。一时,滇土、川土、黔土、热河产的北口土、安徽的亳浆等国产烟土,再加上波斯土、印度土等云集上海。由于供应过剩,使鸦片的价格骤降,为增加利润,刺激毒品消费,将鸦片炼制成吗啡的加工业便出现了,吗啡因其拥有比鸦片更大的刺激性而广受瘾君子们的欢迎,当时的上海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吗啡制造地之一,在北洋军阀、租界当局和帮会流氓三位一体的合力之下,南市、法租界和郊区均有规模不等的吗啡提炼工场。

青年时代的李裁法曾长期在吗啡工场混,对提炼吗啡的技术了如指掌。但他只是一个小角色,尽管毒品交易被称为世界上利润最丰的行当,但每次分到李裁法手中的,早已是残羹剩饭了。这时的李裁法虽手脚勤快,身强力壮,且也有几个铁心的把兄弟跟随,但在上海没有任何名望。须知30年代的上海,真是黑道人才辈出的时代,且不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三头六臂的头等大亨,也暂不论像顾竹轩、严九龄、尤阿根、叶清和、浦锦荣等各霸一方的二等闻人,就是已成名的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孙介福、许荣福等三流角色亦成百上千,举不胜举;而李裁法即使遇到这三流角色也须叩首作揖,唯命是从。上海滩黑道人物的过于密集,使李裁法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他逐渐萌生出到外地去打天下的念头。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战役炮火西移之时，李裁法也跟在上海的大亨富豪的后面来到了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称“小上海”，在帮会道门方面，也只有三二洪帮山头，李裁法便拿定主意以香港为基地。他以钱财结交地方人士，逐渐建立了一个关系网，经过半年创业，李虽已站稳了脚跟，但还没有一举成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在这时，李裁法有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1938 年的一天，李在街头遇到国民党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王嘱咐李说：“沦陷后的香港秩序，你要尽力维持，我们陷在香港的人，也请设法救援。”

尚有爱国心的李裁法即发动他的青帮弟兄协助陈策将军维持治安。时香港五方杂处，包括日本特务、汪精卫集团的人物时常光顾。李裁法协助重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1941 年底，日军进攻香港，李裁法并没有同杜月笙等一道离开香港前往西南，而是仍在香港活动。日军占领后，宪兵队马上看中了有帮会背景的李裁法，要其担任侦缉队长。李立即设法与重庆联系，戴笠指示其利用这一机会，与日军合作，暗中挽救抗日人士。于是，李裁法利用近水楼台的机会，遵奉重庆方面的指示，一连救出不少日军指名逮捕的重要人物。如侍奉孙中山原配夫人卢太夫人脱险，掩护魏道明、杭州市长周象贤的双亲离港，引导陈策夫人、国民党港澳地区负责人沈哲臣等共一百多人，平安撤离。

李裁法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日军的怀疑，李希望返回内地，杜月笙希望他坚持到盟军反攻。但后来，日军决定逮捕李裁法，李在这时才离港到沪，然后绕道赴渝。行抵西安时旅费不继，杜月笙立即汇给他二万大洋，使李裁法不胜感激。到重庆后，李受到审查并被捕，又是杜月笙四出营救，才保平安。

抗战胜利后，李裁法返回香港，有着抗日英雄美誉的李已今昔迥异，他在香港北角开办的丽池花园游乐场，有餐馆、舞厅、游泳

池、高尔夫球场等，规模极大，美国《生活》杂志将丽池誉为远东规模最大的游乐场，李裁法也获得了“香港夜总会皇帝”的称号。此外，李还担任东方体育会主席、北角街坊福利会副理事长、华侨子弟学校校董、孔圣会名誉会长、广东省政治参议等职。人们送了一个他十分得意的外号——“香港杜月笙”。

1949年5月1日，杜月笙离沪到港定居。李裁法对恩人杜月笙一心图报，乐意效力。时上海的富商巨贾云集东方明珠，当地的粤菜根本不合“阿拉上海”的口味，于是，杜月笙将上海德兴馆的一批大师傅召到香港，李裁法即在丽池设立沪菜部“德兴馆”，一时，上海客云集，每日客人满座，营业更加兴旺。

正在这兴旺之时，杀出了一个程咬金。香港有一英籍犹太人查理经营舞厅有方，人称“香港舞厅大王”，与李裁法这个“夜总会皇帝”正好对头。他投资一千万元，针锋相对地也在北角创办了天宫夜总会(Sky Room Night Club)，有心与李一决高低。尤其是开幕那天，不惜蚀本，进行盛大宣传，于是，客人好新鲜，纷纷离开丽池而入天宫。是晚9时，李裁法看看空荡荡的大厅，正在发愁之际，杜月笙拖着病体，亲自到丽池来捧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天宫里的客人一哄而散，回到丽池。从此，这里成为上海帮会三山五岳人物的大本营，长盛不衰。而天宫一蹶不振，后来竟难以维持。

此后，李裁法又与杜月笙合作创办青山酒店，后来该饭店又成为九龙的一大名胜。李也投桃报李，唯杜月笙之命是从。时有上海叉袋角豪富朱如山妻妾成群，逃到香港时也是招摇过市。香港《罗宾汉报》即刊出独家连载“朱门丑史”，一时港人尽知朱如山，而朱却是杜月笙在沪的赌友，朱求救于杜，杜侦知《罗宾汉报》的社长徐镇南是李的徒弟，即委托李办理，经过李裁法的干涉，“朱门丑史”当然不见下文了。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死。正值壮年的李裁法接收了杜门的一些难兄难弟，并广揽徒众，以香港青帮第一人自居。接着，李

又准备在跑马地举行盛大的青帮开坛盛事，并邀请台北的两位大字辈师父坐镇，还在中环最大的酒家订下一百桌酒席，以款待帮友嘉宾。

然而，就在开坛日的早晨，警方突然命令：取消一切活动，否则将逮捕青帮骨干。李无可奈何，公开壮大青帮的企图化作了泡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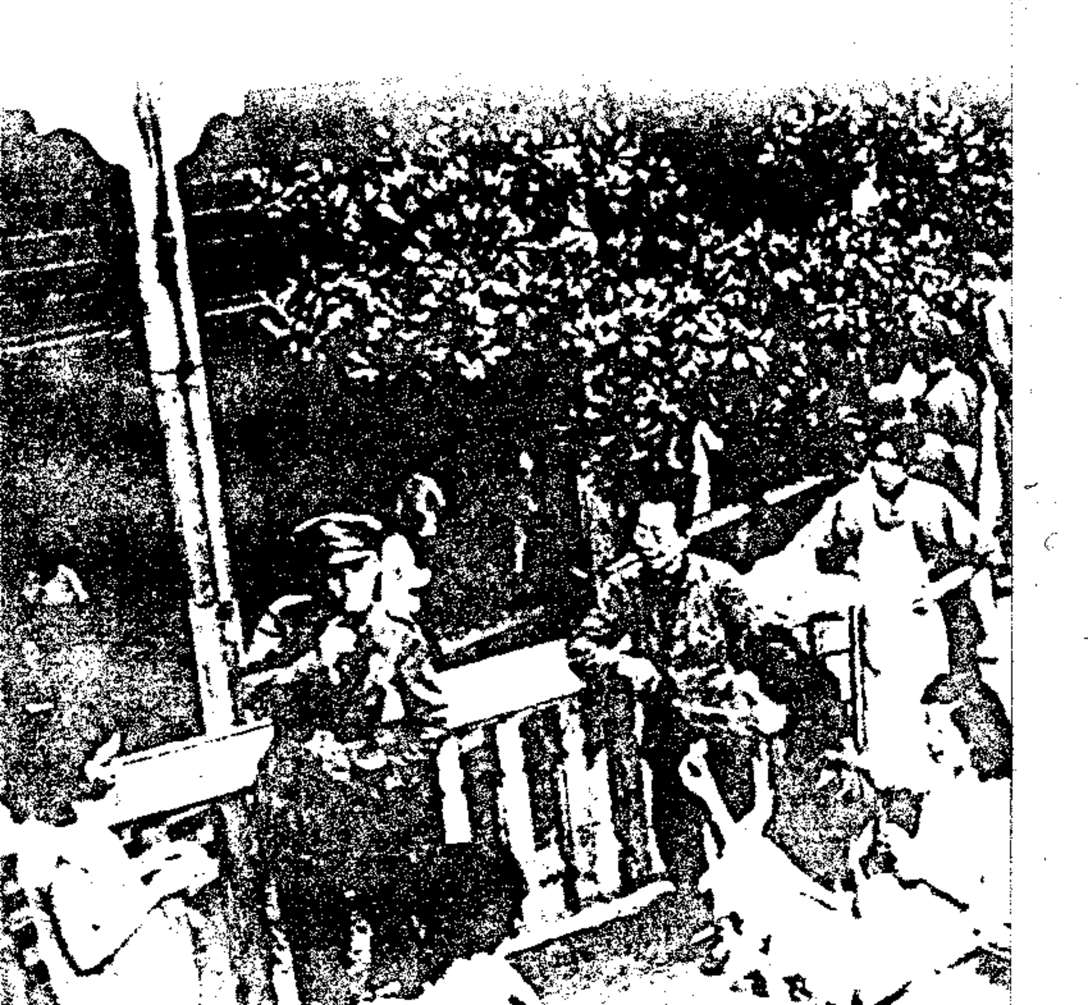
此后，李裁法将青帮组织转入秘密状态，派十名得力助手深入港九各社区，宣传青帮的要旨，发展下层民众入帮。同时，李将重心转移到了制毒贩毒方面。

原来这时大陆各地的不少瘾君子云集于香港，而吗啡之类的毒品又相当缺乏，因此利润极大。李裁法遂将早年在沪制作吗啡的技术移至香港，设立吗啡工场。此后，青洪帮纷纷设立毒品工厂，香港成为战后吗啡生产销售的基地，到 60 年代，这一技术经改良又生产毒性更大的海洛因，影响更广。

李裁法的毒品工厂和贩毒网最终被警方破获，其本人被勒令离开香港。李只得到台北活动，因争夺地盘，卷入黑帮内争，终至酿成杀人命案，于是，李又潜回香港，依靠徒孙隐匿起来，但是仍被警方侦悉逮捕，然后交给台湾方面。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1978 年冬，李裁法因“行为良好”而获准假释，时终究已风烛残年，出狱后不久，这个昔日的“香港杜月笙”就一命呜呼了。

（苏智良）

分道扬镳的青帮首领



青帮由清代漕运行会性的秘密结社衍化而来，迨清末民初，已逐渐堕落为投靠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结伙称霸欺压人民的黑社会势力。然而因其复杂的阶级成份构成及自身联系松散等原因，作为一个特定概念的社会群体，青帮又在时代风浪的冲击下不断地发生裂变，这种因主客观条件联系变化而位移不定的演绎过程，自然也通过其帮首们的不同归宿，得到一个侧面的展示。

徐宝山 血肉横飞



徐宝山，字礼让，江苏镇江人，1866年生。早年在江淮一带贩卖私盐，后加入青帮，成为著名的“盐枭”头目和帮会首领。他联络洪门，创设“春宝山”山堂，建立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帮会武装，成为清朝统治的威胁力量。但1900年归顺清朝，为清廷效忠。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革命。1912年袁世凯窃取政权，又与袁勾结，同革命党作对。

徐宝山自“归标”以后，颇得清廷信任，被任命为新胜(水师)缉私营管带。两江总督刘坤一又任命徐兼虎字陆营管带。徐宝山感恩戴德，甘心充当鹰犬，竭力帮助清政府控制地方治安。不到几年，原本盐枭遍地、帮会林立、土匪丛生的江淮一带秩序井然，盐务专卖有了保障，民间缙绅、盐商是一片颂扬声，徐宝山一时声名大震，徐老虎的威名是妇孺皆知。因功劳卓著，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时，徐宝山升任江南巡防营帮统。从此，他率领水陆两军，游弋于长江下游的江淮地区，威震一方。

在一帮土匪、帮会头目中，徐宝山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嗅觉比较敏锐的人。他非常注意政治风云的变化，善于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周旋。1911 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徐宝山时年四十五岁，早已是一个野心勃勃、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阀了。这时他所考虑的是如何保存实力，扩展个人势力。

辛亥革命前夜，形势紧张，两江总督张人骏为加强南京城防务，调巡防营统领率巡防营大部赶赴南京。江北防务就交与徐宝山，并擢升他为巡防营统领，驻守镇江。当时徐宝山手下仅有一个营的兵力，于是张人骏另拨给徐十万元，要他招募二万人编练成军，以防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会员林述庆、李竟成奉命到镇江酝酿光复，住在江边的三益栈。三益栈老板的妹妹是徐宝山的儿媳，弟弟又是李竟成的妹婿。李竟成利用这一关系，与徐宝山接上了头。林述庆也派人做徐部下的工作。善于投机的徐宝山见反清浪潮不断高涨，清政府已摇摇欲坠，加之自己的部下日益倾向革命，于是见风使舵，开始倒向革命势力。但他不忘利用这一时机，向林、李二人索取利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1 月 3 日，徐老虎到三益栈同林述庆、李竟成立约，“将来革命成功，许以(徐)特别扬鹾利益。”

11 月 7 日，徐宝山宣布镇江光复。一江之隔的扬州也立即沸

腾起来。当天晚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扬州的坐探孙天生发动一部分士兵和一些下层群众，举行起义，宣布扬州光复。孙天生的行动触怒了扬州绅商，他们以孙天生在扬州暴动抢劫为名，不断派人到镇江，要求都督林述庆派徐宝山率部到扬州镇压孙天生。徐宝山一向把扬州视为自己的禁脔，不容许别人染指，他恨不能立即将孙天生等人斩尽杀绝。镇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孙此举也极不乐意。李竟成说："孙天生不该发展个人野心，不通知我等就去独占扬州。"他们污称孙天生等人为假革命党人。为发展自己势力，林述庆很快答应了扬州绅商的要求，命江北部队司令李竟成会同徐宝山光复扬州。徐宝山随即组织自己手下那些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几百人，编成敢死队，连夜赶赴扬州，经几天搜杀，镇压了孙天生起义，并且出兵泰州、兴化、东台、盐城、阜宁等地，帮助各地光复，维持地方治安。11 月 9 日，徐宝山在扬州成立军政分府，自任军政长，当上了扬州的土皇帝。

11 月底，徐宝山率军配合革命党江浙联军收复南京，并在津浦铁路葛塘集一带截击清将张勋北退归路，使张勋仓皇败遁，并截获无数械弹、衣物和白银，发了一笔大财。到此时，徐宝山已用张人骏给的十万元，拚命招兵买马把队伍扩大到二万人。徐宝山在扬州成立第二军，自任军长，兼扬州军政长，坐镇扬州，统辖苏北地区，颇有"苏北王"雄称。

投机革命成功，徐宝山的军事实力、政治势力、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但他"秉性难移"，流氓习性没有改变，反而随之恶性膨胀。攻占南京以后，各路军队齐集南京，准备北伐。林述庆奉命到扬州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此举触犯徐宝山忌讳。他以强迫剪发为名，派人将总司令部二百名卫兵全部缴械，林只身逃出，幸免于难。

1912 年 3 月，南北议和，袁世凯窃取了民国政权。这时徐宝山又见风转舵，投靠袁世凯，对之极力逢迎。在临时政府建都北京还是南京的问题上，他本来一直主张建都南京，但为了附和袁世凯，

于是叫喊"觉现在亦无舍北就南之理",要求建都北京。为了迎合袁世凯"统一治权"主张,他要求全国各地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听从袁世凯。他还电请政府取消军政府和军政分府,说什么"查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设,原为一时权宜之计。宝山苏人,眷怀时局,忧心如捣,谨请率先取销扬州军政分府,以为统一倡"。徐宝山这个首倡之举,自然深得袁世凯赞许。

1913 年春,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同革命党人矛盾日益尖锐,冲突已不可避免。扬州战略地位重要,为各方必争之地。从革命党方面看,如欲沪宁并举、联成一线,必须争取扬州。得了扬州,进可取徐州,退可夺长江;失了扬州,沪宁之间被打入楔子,烽火未举,败局已定。为此,国民党人极力争取徐宝山,派人劝徐反袁,徐对来人"笑而遣之,若无其事",根本不予理睬。相反,作为一个有奶就是娘的草头王,他接受了袁世凯派人送来的二十五万元贿赂,为表示效忠,他将儿子送到北京作人质,同时致电给袁,表示愿与宿敌张勋和解,"紧要时,当与张勋联为一气",尽效犬马之劳。徐宝山的变节行为引起了国民党人的愤怒,国民党人决定除掉徐宝山。一时社会上要刺杀徐宝山的传闻四出,但徐宝山毫不在意,自认为武艺高强,并拥有重兵二万,雄踞江淮,别人奈何不了他。

徐宝山是一介武夫,但随着地位的上升,并占着两淮盐场,手头财富颇丰,也附会风雅冒充文人。他作出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姿态,同一些文人结交。国学大师章太炎同徐宝山就有很深的交情。他模仿旧日扬州富豪,到处求购古玩,尤其是瓷器。1913 年春天,他想买一个"美人霁"花瓶,于是派古董商吴慕贤、艾玉才两人携巨款到上海购买。吴、艾二人察访到某一商人有此奇货,遂写信回报请示。吴将信交茶房寄出,不料茶房遗误,将信丢在台上,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侦探窃走。陈决定乘机除掉徐宝山。他把一枚精巧的炸弹装在一个木匣内,伪装古董,派一个操浙江口音的少年

送到扬州。同时带着一封吴慕贤写给徐宝山的信，上有“不日当有古瓶一只寄上”一语。5月23日晚，那位浙江少年赶到徐宝山住处。徐手下传事人说，徐已睡，且放在此，明日十时来候回信。传事人随即将“花瓶”交差弁高镇清存放在徐书房。第二天8时，徐宝山与高弁及另一王弁入室观看“花瓶”，命高弁和王弁开盒。王弁因为盒内为珍贵之品，不敢用力，盒未打开。徐即叱其靠边站，自己同高弁合力开盒。徐宝山害怕盒动而瓶受损伤，就用腹部抵住盒子。盒盖方启，一丝青烟冒出，徐宝山大叫一声不好，转身欲走，说时迟、那时快，不等徐转身，只听一声巨响，血肉横飞，徐宝山两只手飞向空中，肠腹洞穿，当即毙命，高弁也同时身亡。

徐宝山被炸死后，“春宝山”势力也告衰落。徐宝山的余部由他的弟弟徐宝珍及马玉仁等人统率。1927年北伐军进入苏浙，徐宝山的余部最后溃散，徐手下大将张仁奎等人移居上海。这一次徐部溃散，张仁奎等人赴沪，是苏北帮会的一次大东迁。这些原属徐宝山系统的帮会成员到上海后团结紧密，并且都因曾担任一定的军、政职务，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到30年代，几乎都成了上海帮会的头面人物。上海青帮中的大多数人也因此都把苏北帮作为青帮的正统嫡传。

（黄寿东）



大义为重

张仁奎，号镜湖，山东滕县人，1859年生。早年贩私盐为生，加入青帮，为大字辈人物。青年时代在江苏靖江参加清军，后在徐宝山部供职。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后，张以通州总司令名义在南通通电宣告独立。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二军步兵二十四旅旅长。1913年11月起至1924年任江苏陆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为北洋政府陆军上将、杰威将军。

1924年张仁奎因病退休，隐居在上海法租界，同时在山东原籍滕县盐店街投资建房一处，花木楼台俱全。他偶尔在春秋佳日离沪北上返老家小憩。北伐战争兴起后，张仁奎出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出谋划策，颇有赞助。据他的得意门徒韦作民私下透露，蒋介石曾在上海经人介绍拜张仁奎为师入帮。

1928年10月，张仁奎在南通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黄金荣为徒。黄金荣原先并非青帮却仗势擅自收徒，说他属于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划，引起了青帮人士的不满。这次在上海青帮大字辈高士奎、曹幼珊等人的竭力劝说下，黄金荣才下了决心向张仁奎投帖拜师，同时带去共舞台一班艺人为张演剧祝寿。中国国货银行总理朱成章被绑票案发后，交通银行的钱新之为了利用张仁奎的声威镇慑上海流氓，决定将张仁奎请进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范园内供养。不少商界人士、军政官员得悉张是青帮大字辈又是黄金荣的师父，为了寻求保护或为了在社会上谋求发展，纷纷前往范园拜师，其中有国民政府交通部高级官员韦作民和张竞立。张仁奎收韦、张二人入帮后特许他们在南京设立文社，以交通部官员和复兴社成员为主要发展对象，向政界扩张他的帮会势力。

1933年9月中旬张仁奎返回原籍为长子张殿梁操办婚事，新娘是滕县望族、清末翰林高熙喆的长孙女高同云。一时间滕县张寓冠盖云集，高朋满座，山东全省军政要员、各埠商会会长、知名人士几乎倾巢出动前往祝贺并向张仁奎请安，以至于韩复榘临时决定召集全省军政会议时，出席者廖廖无几。韩复榘大怒，下令其心腹随从星夜赴滕县密查。韩复榘接到调查密报后立即从省城济南拍发急电至滕县，在致贺道喜之余敦请张仁奎莅临泉城指教。张仁奎接电后登上韩派出的蓝钢皮专列在驻滕县孙旅长的亲自护送陪同下抵达济南，步出火车站之后即钻入韩复榘的轿车直抵省政府大厅。只见大厅内蜡烛高烧，香烟缭绕，张仁奎在韩复榘陪同下步入

大厅时军乐大作。韩复榘随即坚请张在正中座椅上就坐，郑重其事地向他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然后毕恭毕敬地呈上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门生红帖。张仁奎见堂堂省政府主席如此心诚意切，便顺水推舟，认了这个新徒入帮。

1935 年 5 月由张门弟子组成的仁社俱乐部经上海市社会局批准立案，在福煦路 419 号正式开张。张仁奎从他的三四千个徒弟中精心挑选了二百余人作为仁社成员，其中有杨虎、蒋鼎文、韩复榘、陈铭枢、黄琪翔、孙桐萱、范绍增、张镇、黄金荣、董显光、郑介民、韦作民、张竞立等。据说只有社会上层人物即文职是特任、简任、荐任以上者，武职是将校以上者才有资格加入仁社，故有"一时国内海外群英并集于夫子之门墙"之说。仁社每年的会员大会定于 10 月张仁奎的生日召开，该社的宗旨是团结张门弟子，以谋互利，至 1937 年初已发展会员近千人。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1935 年 11 月日本派天津驻军司令多田骏飞抵济南，邀韩复榘参加冀察鲁"自治"的商谈，次年 3 月日本新任第十二师留守师团长土肥原赴济南活动，与韩复榘商议山东"自治"问题。在土肥原的威胁利诱下，韩复榘为了利用日本势力实现独霸山东的野心，竟与土肥原签订秘密协定，要点是接受日本的"经济援助"，拒绝中央军进驻山东。韩复榘还宣称救国"务要镇静"，取缔反日宣传，下令解散"反日会"。蒋介石获悉后对韩的何去何从十分焦虑不安，他认为韩复榘拥兵四师一旅，非中央所能绝对控制。如果处置不当，致使韩公开倒戈卖国，后果极为严重。为了尽早查明"韩土秘密协定"的虚实，戴笠赶紧派出张仁奎在南京的高徒董显光赴沪，纠约张仁奎的得意门生、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人一道赶到范园，敦请张到南京与蒋介石共商山东大事。张仁奎乘坐蒋介石特意派出的专列抵达南京后即晋见蒋介石，蒋见张时按青帮的规矩称张为"张老太爷"，要他以闲云野鹤之身，北上山东奉劝门徒韩复榘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统一为上，相机釜

底抽薪，消弥隐患，并慨然表示如果韩复榘能够回心转意，中央保证立即增拨协饷以示慰劳。张仁奎受命北上济南向韩复榘指陈利害，以古哲先贤为例，劝导韩万不可贪图小利而成为民族罪人。韩复榘听尊师言之有理，频频点头称是。张仁奎在泉城逗留的短短一周内，还频繁会见包括地方军政要员在内的众多门徒，宣传抗日爱国的主张。在韩复榘几个具有帮会身份的师长的敦促下，韩最终打消了联日自雄之谋。张仁奎返沪后，蒋介石决定将驻守苏鲁交界的正规军改编为以黄杰为首的税警总团进驻青岛，以加强山东海防。不料韩复榘根本不买黄杰的帐，对黄置之不理。黄杰后根据戴笠的建议，专程赴沪经杜月笙引见拜访了张仁奎。张仁奎事先已得戴笠电告，一见黄杰就主动表示要他的徒弟韩复榘对黄多加关照，搞好关系。黄杰借此机会拜张为师，于是成了韩复榘的同门弟兄。不久在青岛市长沈鸿烈举行的宴会上，韩复榘见到黄杰时主动起身与之握手，称兄道弟，税警总团进驻青岛一事也随之迎刃而解了。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张仁奎的仁社为抗日军队捐募了一大批军用物资。上海沦陷后张仁奎因年事已高，滞留上海法租界内，称病闭门谢客，拒不与日伪势力合作，暗中则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多方保护抗日爱国志士，给他们以资助支持。他还时常寄语训戒众门徒要亲君子、远奸佞，忠贞自葆，以待河清之日，并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日寇察觉张仁奎的地下抗日活动后，由日本上海司令官、武士道高手矢野尧一前往张仁奎住所，以比武为名进行挑衅。张仁奎年青时，以单刀武术驰名江淮，曾闯入数十地痞中空手夺刀，救出被他们围殴的同伍。现在张仁奎虽已年过八旬，但英雄本色不减当年，他拿起大刀镇定自若地迎战持剑的矢野，仅仅两个回合就决出分晓。只见张仁奎用刀柄连续点击矢野腕部穴位，迫使对方撒手弃剑，大败而归。在这之后日方并不甘心，各式人物接踵而至，对张威胁利诱，但张不为所动，疾言厉色将他们叱之于门外。然终以忧愤成疾，一病不起，1944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范园逝世。

次年春陪都党政军商学各界千余人举行追祭仪式，蒋介石以主席之尊亲自为之题词“海岱硕望”。同年10月2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张仁奎，“以彰忠义”。

（邵　雍）

张树声 呼吁抗日

张树声，字俊杰，河北沧县人，1877年生。行伍出身，曾任清军第六镇第十一协哨官、营长。进入民国后历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参谋长、第十一骑兵团长、察哈尔察东镇守使、国民一军骑兵第一师师长、察哈尔军务帮办、徐海招抚使、西北革命军东路军团副司令。

1930年秋，西北军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失败崩溃后，张树声以上海为据点从事帮会活动。早在辛亥滦州起义失败后他就南逃上海，并在上海加入了青帮和洪帮。这时张树声以青帮大字辈兼洪帮太极山、长白山山主的身分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徐州、开封、汉口等地广收青洪帮徒弟。他喜爱并倡导武术，以强身强国为夙愿；每每在传徒时将"祖师创帮主旨，及帮会之种族革命精神，隐含于规矩仪注中者，咸为抉发无遗，必使受戒之徒，在入道之始，留有深刻之印象"。张树声每到一地即拜香堂一次，吃住照例由徒弟负责开销，临走时由徒弟买好头等车票送至车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树声加紧招收帮会门生弟子，拥护国民政府抗战。1938年初，他自上海抵达河南开封，在鼓楼南马道街百货公司下榻。当时正值蒋介石召集第一、第五战区旅长以上军官开会拘押韩复榘之时，张树声抓住时机，邀请原西北军的将领吃饭，共叙旧情。应邀前来的有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三十七师师长张凌云、二六一师师长孙玉田、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三十七师旅长吴振声、王为贤、一三二师旅长柴建瑞、刘景山等十余人。到场的师长旅长们酒足饭饱后随即步入香堂，齐拜张树声为师，并每人出资一百多元作为拜香堂之用费。

不久张树声取道湘黔赴陪都重庆，在贵阳逗留期间又收了欧佛同等百余人为徒弟。到重庆后他常住上清寺河北饭馆和校场口附近的天津饭馆，由于他每隔几天就要开一次香堂，少则十数人多则几十人，开过香堂之后总要大摆酒宴，因此只要他在哪家饭馆住下，那里就高朋满座，生意兴隆，被饭馆老板视为财神爷。当时在重庆收徒的青帮大字辈只有张树声一人，并且他还是华北五省洪门各山堂的总山主，所以上至蒋介石周围的工作人员下至中统军统各机关码头都有人拜他为师。至1940年前后张在重庆的徒子徒孙已高达九万人之多。1944年他还应安岳县袍哥舵把子李鸿图等人

的邀请，专程前往安岳，在该县城北街李氏祠堂及隔壁濂溪祠堂大摆香堂。一时间红烛高烧、爆竹不歇，涌向这两座祠堂的人流源源不断，成了安岳县境之一大人文景观。张树声在当地士绅政客中收了青帮通、悟、学三代徒弟，每天收进的贽敬礼法币多得要用口袋来装，如此这般大搞了一个多月后才得意地满载而归。

1940年戴笠、杜月笙在重庆交通银行大楼举行鱼翅宴，张树声和各地青洪帮头目一道应邀入席。席间戴、杜两人对来客十分客气，频频为客人们斟酒挟菜。由于搞不清戴、杜两人葫芦里卖什么药，这鱼翅宴张树声怎么也吃不出个味道来。宴会结束后来宾们被邀进入客厅，开始饮茶会谈。这时戴笠才不急不慢地亮出底牌，把蒋介石“把全国青、洪帮联合起来帮助政府来共同抗日”的意思说了一遍。杜月笙接着提出是否可用“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名称作为全国青洪帮会大联合的对外名称。当即大多数人均表示赞同。张树声坐在一旁，边品茶边思考，茶味越来越淡，他的思绪倒是越来越清晰了：原来戴笠是企图借此一举控制全国的帮会，同时帮助在四川吃不开的杜月笙拉拢袍哥打开局面。他本想起身表示反对，但这既是委员长的旨意，公开抗命总是不妥。于是他打定主意，佯装耳聋，一言不发，以沉默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过，胳膊扭不过大腿，在国民政府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张树声在人民动员委员会正式成立后还是就任了该会的常务委员，负责包括苏北、山东、河北的津浦区的帮会工作。

为了启迪帮会人士的国家民族思想，申讨汉奸叛逆，他发愤编写了《民族精神》又名《通漕道义》，他在这本一百零五页的小册子中提出“民族精神团结之根本，在‘义气千秋’四字”，希望帮会同人在国难当前之际“人人却私奉公，勇于赴义，庶几唤醒人心，挽救狂澜，济此国难”。《民族精神》1941年5月在重庆付梓后，张树声意犹未尽，奋笔疾书，又在1943年写就了新著《民族精神续录》。《民族精神续录》突出地强调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号召

青帮老少"束身自爱"，忠义奋发，于家庭求为佳弟子，于帮求为好门徒，于国家求为有用之公民，于本党求为忠实之同志。在我最高领袖领导之下，服膺三民主义，于抗战建国大业，悉其全力以赴之"。张树声对青帮徒众的要求如此之高，是青帮史上绝无仅有的，至于这些人能否做到这些，只有张树声心里明白。不过他的一番苦心还是得到了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赞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欣然为之作序，声称《民族精神续录》一书"孕大涵深，贯微洞密，诚清门不朽之书也。刊行问世，必将不胫而走"。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在序中也认为"今者张友……择幽抉隐，反始要终，推事于种族主义，归纳于民主新说……足令帮会反本归真，洵可贵也"。《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续录》相继出版后，张树声声名大振，重庆许多店铺纷纷找上门来，要求为之题写匾额、招牌。张树声来者不拒，一概应允，忙得不亦乐乎。有一次他身体欠佳，在重庆最阔气的上清寺宽仁医院中包了二楼整整一楼区的房间，每天前来探视慰问的人络绎不绝，所送的礼品摆满了两个房间。抗战期间张树声还编写过《洪门会概说》，根据当时的局势修改了洪门十规要和三十六誓，加入了一些抗日的积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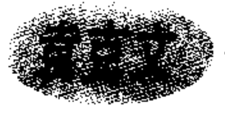
张树声在贵州的帮会徒众也很多，其中有步兵学校教育长、辎重兵学校教育长、遵镇师管区司令、监护第五总队总队长、保安团团长等上层人士。1947 年秋，他又应贵州青帮首领欧佛同、姚海泉之邀，在多人陪同下乘吉普车风尘仆仆地赶到贵阳，在各界人士中收了四百人为徒。与往常一样，对于门徒们交来的礼金照单全收，所不同的是这次他并没有将礼金随身带走，而是将一千三百元礼金全部捐赠给了冀鲁豫小学，扩大了青帮在贵阳的力量和影响。

在政治上，他与老上司冯玉祥较为接近，常有来往。冯玉祥在《民族精神续录》出版时欣然题诗："家国伤心万念侵，一生低首拜亭林，梨洲老去船山古，逸韵流风何处寻。"受冯玉祥的影响，张树声曾多次运用帮会力量保护革命志士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有

一次他获悉特务准备绑架一革命同志，便特意设法与他会面，面告险情。不料那位同志说："我有两个月没进城了，城里出了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张树声顿感情况严重，立即叫来一个副官，关照说，"告诉他们那边，这个人我们这边担保啦！"由于张树声的大力担保，那位同志就化险为夷，以后没有出什么事。当然要张树声完全划清"这边"与"那边"的界限还是相当困难的。1948 年张树声在重庆二千六百余名青帮徒弟的支持下当选行宪"国大"代表。

1949 年 9 月 17 日张树声病逝，参加治丧出殡的不下万人。

（邵　雍）



病卒津门



袁克文，又名袁寒云，字豹，为袁世凯的次子，人称“民国四公子”之一。1890年7月出生于汉城，其母金氏为朝鲜李王妃之妹。袁克文一生多才多艺，素有“袁门子建”之称。同时，他又四处漂泊，交游广泛，既与各界名流、文人骚客多有交往，又涉足青楼，广结粉黛，同时为青帮大字辈人物，一生传奇色彩浓厚。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后，妄想称帝。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反对，就连他的二公子袁克文也反对此举。他的那首著名的诗《分明》写道，“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淹孤月，东去骄风黯九城。隙驹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最后两句广为传诵，成为袁克文反对帝制的呼声。

虽然袁克文反对其父称帝，袁世凯在几个儿子中还是最喜爱克文的。当时，袁克定（袁世凯的大儿子）极力赞成袁世凯称帝，这样他好做大太子，将来好登基，因此，对袁克文的反对帝制极为怀恨，想方设法陷害袁克文。袁世凯为防不测，命人刻了一方“上第二子”印送与袁克文，让他使用。有一天，袁世凯趁袁克定不在身边时，叫着袁克文的乳名说，“你何不出京去游玩？”袁克文领会到父亲的意思，当即回家收拾东西，然后跟父亲道别，离开总统府前往火车站赴津。这次离京，袁克文还带走了数十名青帮中人。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袁克文回家收拾好东西后，就让他的仆人去火车站买当晚到天津的火车票。令仆人吃惊的是，袁克文让他买近二十张。他不便多问，只是遵命照办。原来当时反对帝制的也有青帮之人。其中近二十人被关押在军法处。袁跟父亲道别后，径直赶往军法处，提取这十几位青帮中人，说是老头子亲自问话。军法处的人一看是二公子亲来提取，想不会有错，就让他带走了。哪知袁克文带着这些人直奔火车站。等到火车开动后，他才对这些人说，“我假托老头子的命令放你们出来了。北京是不能回去了，还请各位帮忙使我加入贵帮。”这些人方才明白过来，对他的豪爽、义气大为钦佩，一致表示一定帮他加入青帮。没过多久，袁克文赶到了上海。袁世凯派遣陪同袁克文的总统府秘书步林屋先期抵达。当时，青帮中“理”字辈只有张善亭一人，由于年事已高，早已关闭山门，不再收徒。这次为袁

克文特别破例，1914 年，袁克文、步林屋等近二十人一同拜张善亭为师，列为“大”字辈。袁年龄最小，为末座。

袁克文这次离京，直到袁世凯死去才得以返回。后来在安葬袁世凯的墓地选择上，他又与袁克定等人发生争执。最后袁世凯归葬洹上，袁克文力争失败，被迫出走天津。下葬之时，袁克文又没有到场。在他的自述里，他痛心地写道，“此文终天之恨，而不或逭之罪也。”在这场总统府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袁克文是一个牺牲品，他的“袁门子建”的另一层含义也就在此了。

袁克文与兄弟不合的同时，自己家庭内部也毫无温暖之感。他曾长期寓居天津，在天津的寓所由他母亲和妻子梅真夫人居住，他则寄居在国民饭店，开着长期房间。隔一段时间才回家探望一次，家中人对他如同宾客。有一年除夕，他忽然大哭，说“既不得父兄，又不得于妻子，家庭骨肉之间，有难言之痛。”其实这种状况与他自己的生活作风大有关系。

袁克文养成追香逐玉的劣性，每到一地，必定要去的是妓院。他的妻妾有名可查的不下十人。但这些并不是同时纳娶的，往往是此去彼来。其中有几位是值得一提的。一位叫栖琼，克文与她感情不是很深，倒是他的夫人梅真喜爱无比。梅真动用了自己的私房钱，把栖琼从妓院中买了出来，常常让栖琼陪她一同观看电影。这位梅真夫人倒也有些菩萨心肠了。

另一位与他相处最久的是唐志君。传说这位女子颇有文采，曾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发过几篇文章。袁与她同居上海许多年，感情相当深厚。因为袁克文这人庸懒异常，常常是从早到晚靠在床头，只顾吞云喷雾，吸食大烟，既使有客来见，他也只在床上欠欠身。于是，他的一切饮食全都由唐志君悉心照料了。袁克文也写了很多诗篇送给唐志君。但袁不是矢志不移的那种人，后来他北上天津，见异思迁，就把唐志君给忘了。

袁克文不仅广涉妓院，博采众花，他的另一极大癖好就是吸食

鸦片。白天他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一到晚上吸足了鸦片，那又精神抖擞。因此，每天晚上袁公馆里面是烟雾缭绕、人声鼎沸，许多朋友纷纷前往，大家海阔天空，热闹非凡。

说起袁的烟瘾，大得惊人。那时的大米每石大约是十元。他每天鸦片烟资绝对不比二十元少。一有空闲时间，他就狂吸。那些替他煎膏熬烟的当差，却也因此揩了不少油水。但你说袁克文糊涂吧，有时他也精细得很。有一次，厨子买回来一只鸡，他就问多少斤两。厨子以为他是随口问问，就多报了几两，想从中捡点便宜。谁曾想，袁克文让厨子找来一杆秤，亲自称了称，这下把厨子吓坏了，没沾到便宜反挨了一顿训斥。从此后，他再也不敢乱揩油水了。直到1927年，袁的遗产已挥霍告罄，生计艰难，这才发誓折了烟枪。

袁克文最值得称奇的是写对联的本领。那就是不用桌子，把联纸悬空，联纸也不叠格，侍者拉着纸，他挥毫淋漓，笔笔刚健有力，但纸并不坏，并且整齐有致。这可不是一般书法家所能做到的了。他写小字时也颇为奇妙，常常是仰卧在床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凭空而写，字迹非常娟秀，绝没有扭歪疏懈的感觉。见过他这一本领的人，无不惊叹不已，当时上海的各杂志、小报，纷纷请他写报头，他是有求必应。一些长篇小说，也请他题签。不过，有时这种题签也会给他带来尴尬之事。有一次，有个人拿所著的《民国艳史》请他写封面，他一挥而就，颇为爽快。但等到后来小说出版，作者送他一本，一翻之下他大为懊丧。原来书中大骂其父袁世凯。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轻易应酬了。

袁克文自己也在报上发表些作品，他曾在上海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期间为《晶报》写一专栏《辛丙秘苑》，由于颇多秘辛而文笔甚佳，使得《晶报》销量大增。但克文懒散无比，迫使《晶报》主编天天上门催稿，常常是每晚八、九点钟才写好，这位主编余大雄者急忙带回去排印。余大雄因此也赢得了“脚编辑”的名声。忽然有一天，克文声明不写了，原来他看中了另一收藏家的一件珍品，想以此为

交换条件。这下急坏了俞大雄，因为读者反应强烈，纷纷要求读下文。俞大雄只好出面周旋，最后以袁克文的三件藏品作抵押，以稿费为代价换来了那件藏品，袁这才重新写了下去。

袁克文加入青帮后，第二年也开堂招收弟子。他性情比较平和，不肯得罪人，对朋友或门生弟子都没有架子。据传他的弟子众多，并且不同阶层都有，他一视同仁，绝不分高低看待。有一次，他对手下弟子说，“切不可轻视下流社会，因为下流社会的知识虽然简单些，但只要不轻视他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这是我在上海孝祖后的经验。自从我孝祖之日起，随时随地都有人做我的临时保镖，这些义务保镖都是下一流的人派来保护我的。因为我对他们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们都服从我的指挥。”袁克文的这番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大半生四处漂泊，每到一处，都有青帮中人暗中保护，给他减少了许多不便。

1928 年，袁克文在他的一个弟子李金标的怂恿下，接受了张宗昌的“挺进军总司令”的委任状。这个李金标是上海当时的一个大流氓，手下弟子众多，但都是些乌合之众。袁克文没有听从他的其余几个心腹弟子的劝告，只身来到天津，成立了“挺进军总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设在他原来的住宅里。过了不久，李金标也赶到了天津，将克文手下的总管、号房、当差，甚至装烟的人全都收归在他自己的门下，算作他李金标的徒弟。这样一来，所有袁克文家里的人都变成了他的徒孙，改称袁克文为“爷爷”了。袁克文这才看清李金标的意图，对这一举动大为生气，但生米已成熟饭，也无法改正了。

总司令部虽然成立了，但自始至终只不过有几位卫岗和卫士。过了不久，国民军打到了天津，袁克文的这个总司令部倾刻烟消云散，他的住宅也被没收。袁克文被迫逃进日本租界，不久就患上猩红热转肾炎，医治无效，于 1931 年 3 月 22 日死去。消息传到上海后，《晶报》连日刊登挽文、挽联，其中两联可为道出了他一生的经

历，一为“身世难言，词赋江关空寄慨；华年逝水，烟霞风月够销魂”。另一联为“穷巷鲁朱家，游侠声名动三府；高门魏无忌，饮醇心事入重泉”。他生前在上海的好友，如包天笑、步林屋、余大雄等人发起召开了追悼会。

据说，袁克定接到袁克文夫人梅真的电报后，也专程赶到了天津，为其弟料理后事。生前两人矛盾尖锐，互不往还。死后烟消云散，俱往矣。曾有人挽克文道：“风流不作帝王子，更比陈思胜一筹。”兄弟骨肉之间的那种难言之隐又岂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赵兰亮）



顾竹轩 心向光明

顾竹轩，1885年农历3月14日生，江苏盐城人，排名第四，故小名顾四，又名如茂。少时家境贫寒，十六岁那年苏北大灾荒，顾随难民大军到上海谋生，以拉黄包车为业。后加入青帮，逐渐在闸北扩展势力，收徒纳众，成为著名的帮会首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时候，人们惊异地发现顾竹轩这个著名帮会人物并没有像杜月笙一样逃亡海外。是年8月，上海市召开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们又看到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而出席会议。人们不禁要发问：顾竹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20世纪初，当顾竹轩背着被头铺盖踏上十六铺码头时，他望着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不存任何奢望，以丰衣足食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没有任何靠山，只有一身力气，遂在闸北新疆路租了间破棚户，靠拉公共租界协记公司的人力车过活。人力车上海人称黄包车，拉黄包车也非好差使，三九日西北风直刺骨头，手脚上生满冻疮，大伏天马路上的柏油被晒得滚烫，脚上烫起一排水泡。十六七岁的顾竹轩不怕吃苦，终于挺了过来。

顾竹轩为人慷慨仗义，敢打抱不平，在苏北帮黄包车夫中崭露头角。经人介绍，顾竹轩遂拜青帮头目刘登阶为老头子。刘登阶，江苏泗阳人，是青帮嘉兴卫帮大字辈首领；移居沪上后，一度从政，同时广收门徒，逐渐在闸北、虹口、曹家渡一带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顾竹轩有了帮会靠山，列名通字辈后，便顺利进入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华探。租界时代的华探，在外国主子面前是走卒，在市民跟前可是阎王。薪水虽然不高，但油水可是极大。顾竹轩当华探，不仅大大扩大了社会关系，而且也学到不少尔虞我诈、敲诈勒索的本领。另外，也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为站稳脚跟，拓展事业，顾又拜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为师。

积累了一笔资金后，顾竹轩辞去了巡捕房的职务，买进了几辆黄包车，在闸北开了一家车行，开始当老板了。当时的上海滩上，租界的巡捕、华界的警察盛行攥照会，即借口违反交通规则，将黄包车的牌照没收，再迫使业主化钱去赎回。因顾曾是巡捕，所以昔日的同行总要给他些面子，这样，他车行的黄包车总能通行无阻。当然，对于华界的地头蛇们，顾竹轩往往也礼数周全。每当闸北的第

四区警察署新署长上任之时，他都送上一辆崭新的包车。于是，顾的车行越开越大，成了人力车行业的“大王”。顾竹轩成了苏北籍苦力敬仰的目标，他们投入门下，顾便开堂纳徒，扩张势力。接着顾又在蒙古路开设同庆舞台，上演江淮戏，这里成为沪上苏北帮的集聚之所。然后又在新疆路建立德胜茶楼，协调手下人之间、及与其他帮会流氓势力之间的纠纷。一时，德胜茶楼成了闸北地区“吃讲茶”的权威仲裁机构。

有了底层社会势力的基础，顾竹轩又开始向政商两界挺进。正好这时，日益强大的闸北商界酝酿建立闸北保卫团，顾与之一拍即合，当上了保卫团副团长。团部设在大统路，分九个队，成员多是散兵游勇，市井无赖，他们投靠顾竹轩，遂穿上老虎皮，继续为非作歹。接着，顾竹轩又当上了闸北商会会董、江苏绥靖督办公署参议、陆军第二师参议等，成了亦官亦匪的风云人物。

20 年代初，喜爱戏剧的顾竹轩与人合开天蟾舞台，1923 年后独资经营，舞台设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后来，永安公司老板串通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顾将舞台移址改建为永安公司东部时，顾聘请外国律师，据理力争，同工部局打官司，这场纠纷一直闹到英伦最高法院。结果判决工部局应赔偿天蟾舞台损失费十万元。此为近代中国人在法庭上击败外国人的少数几个事例之一，一时，顾竹轩声名大振。1930 年，顾竹轩将天蟾舞台迁到福州路，座位扩建到三千四百多个，南北名角轮流在此上演拿手戏，成为上海著名的四大舞台之一。

这时，踌躇满志的顾竹轩搬到了湖北路 203 弄迎春坊 13 号，这里既宽敞又豪华。成名之后的顾，颇讲情义，经常资助穷人。1930 年苏北遭受水灾，顾将沪太路上的天蟾玻璃厂卖掉，集资六万元送到家乡救灾。顾也将收山后的青帮师傅刘登阶供养起来，1932 年 1 月 22 日，刘病死于大连湾路鼎康里寓所，顾亲自披麻戴孝，在天蟾舞台为刘治丧，从而引来上海滩帮会三头六臂弟兄的一片叫好声。

四十多岁的顾竹轩达到了事业的鼎盛时期，然而，大世界经理唐嘉鹏被杀案又使顾陷入了困境。

大世界游乐场为商人黄楚九于 1917 年创办，1931 年底黄楚九猝死后，大世界由黄金荣接办，称"荣记大世界"。黄的得意门生唐嘉鹏担任了经理。唐嘉鹏诨名小二子，祖籍苏北盐城，自幼长在上海，依靠叔父唐大麻子生活。说来唐家与顾竹轩有段关系。20 年代，顾竹轩已是著名的"江北大亨"。唐大麻子以同乡之缘，请顾提携侄儿，于是，唐嘉鹏到顾宅讨口饭吃。不久，天资聪颖、手段狠辣的唐嘉鹏得到顾的赏识，为了提携与笼络唐嘉鹏，顾将容貌姣美的堂妹嫁与唐，唐感激涕零，视顾为再生父母。然而不久，顾在安排坐位时，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冷落了唐，唐遂怀恨在心，立刻倒戈相向，投入黄金荣的门下，从此也与顾结下了怨恨。

唐嘉鹏生性贪财好色。他担任大世界经理后，蛮横地控制游乐场内的一切剧团，看中的年轻貌美的女演员便一定要弄到手，否则就给该剧团的老板以颜色。一时，唐的风流韵事在法租界内流传开来了。副经理水果荣生认为如此下去，有碍大世界与黄老板的名声，便规劝唐收敛些，岂料唐大为不快。水果荣生便跑到老头子那里告了一状，黄听后大为赞许，因为唐近来正凭借可以任意出入黄公馆的特殊待遇，对黄金荣新寡的儿媳李志清频送秋波，所以两桩事相合，黄金荣已下定由水果荣生来接替唐的位置的决心。

然而没几天，水果荣生被人枪杀于南洋桥。他的死使黄金荣蒙上了一层阴影：究竟是谁有豹子胆敢杀我黄金荣的得意门生，也许是内部门生倾轧？莫不是唐嘉鹏？正当他满心狐疑之时，顾竹轩来到钧培里黄公馆，告知是唐嘉鹏的干将樊良伯暗杀了水果荣生，黄不由大怒。顾一看火候到了，说："这种赤佬一定要清除，竹轩今天来打个招呼。"

1935 年的一天晚上，唐嘉鹏正准备坐自备车从大世界回家，这时一条凶汉冲来，一枪就将唐击毙在大世界门口。

唐被杀后，公共租界捕房的探长金九龄负责破案，不久便查出凶手是王兴高。王兴高兵痞出身，力大凶狠，枪法极准，曾长期为顾竹轩当保镖，但此时也曾经常进出钧培里，准备"跳山门"。据说是黄金荣指令其门徒许福葆收买王兴高，除掉唐嘉鹏的。王兴高被捕后，黄为了开脱罪责，掩盖内部倾轧的丑象，并排挤与打击势力日增的顾竹轩，收买王兴高，诬说是受顾教唆。结果顾竹轩被捕，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而王兴高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

顾竹轩在狱中被关了一年余，期间，其亲朋好友多方疏通，包括其族亲顾祝同的帮助，被释放出狱，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宣判无罪。

1953 年，黄金荣临死前曾在钧培里亲口对顾竹轩表示道歉，说："唐嘉鹏的事你受冤枉了，对不起你，无论如何要原谅我。"

经过唐嘉鹏案件，顾竹轩一度有所消沉，抗战前后，再度活跃。当时他担任的主要职务有：大生轮船公司经理、三星舞台总经理、大江饭店总经理、上海市平剧院联谊会主席、武陵中学董事长、正民中学董事长、中国红十字会理事、天蟾舞台总监、上海市平剧院联谊会监察、江淮旅沪同乡会主席。

顾竹轩看到国民党内贪污腐败成风，不得人心，便开始接近共产党，向往进步，为民众做些益事。

早在大革命时期，顾竹轩就曾营救过上海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姜维新(姜是顾竹轩侄女婿姜维山的弟弟)，从而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扬；后来，又多次掩护法电公司的地下党员朱俊欣等的活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顾竹轩曾亲率闸北保卫团配合十九路军抵抗来犯的日军。"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顾竹轩又将天蟾舞台改作难民收容所。上海沦陷后，日伪警察局长卢英诱逼顾投敌，顾坚决回拒说："我死也不当汉奸。"当时顾的侄儿顾叔平是共产党员，顾竹轩帮助他护送和营救共产党人进出上海。1943 年秋，顾竹

轩协同顾叔平将地下党员藏在寺庙里，因为信佛的日人一般不会搜查寺庙。有时，苏北的新四军干部因病到沪开刀就医，也住在顾竹轩的家中。为此，日军贝当路(今衡山路)宪兵队曾到顾宅和天蟾舞台搜查。顾还利用他所控制的租界码头，将药品运送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为表示向往革命之心，他还将十五岁的小儿顾乃瑾送到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局为了利用帮会势力与国民党展开斗争，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顾叔平也是委员之一，负责青帮工作。顾竹轩对地下党的工作全力支持，帮会工作委员会设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的经理室，这里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最安全的碰头场所之一，因为警察中有不少是顾的徒弟，或者徒孙，祖师爷的办公室自然无人敢去打搅了。

1946 年，中共上海局决定让顾叔平出面，利用与顾竹轩的关系，公开竞选榆林区副区长。顾竹轩亲自出面为侄儿的竞选出力，他要求苏北旅沪同乡会及其门徒朋友同心协力，结果自然竞选成功。顾叔平当上副区长后，了解并搜集了不少重要情报，为解放上海作出了特殊贡献。

解放后，顾竹轩留在上海，督促青帮徒弟和朋友，不与共产党为敌。1949 年 8 月，上海市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上海市长陈毅曾亲自到天蟾舞台看望顾竹轩，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顾竹轩还曾到香港去访问。后来因病较少露面。1956 年 7 月，顾竹轩患鼓胀病而逝世，时年七十五岁。

(苏智良)



定居台岛



万墨林，原名万木林。1902年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追随青帮大亨杜月笙多年，深得杜的信任。日军攻陷上海后，配合国民党军统特工，先后帮助或策划了多次暗杀汉奸活动，名噪一时。

万木林出生在上海浦东高桥镇，这里本是非常兴旺繁荣的商品贸易中心；但晚清以后，天灾人祸频仍，浦东一带迅速萧条下来。万木林的家境也一日不如一日，迫于生计，十一二岁的他不得不像许许多多的浦东人那样，西渡黄浦江，到十六铺的一家水果店里做小伙计。

万木林长得膀阔腰圆，笃头笃脑，加上是初来大上海，总显得不大灵活。所以虽然前后两次改换门庭，却一直没有出头之日。只是人的一生总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时某一件偶然的事情会改变人的一生。靠着他与杜月笙的关系，使他的一生迅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杜月笙是万木林的表兄，当年只身闯荡上海滩，尽管为人机灵，却嗜赌如命。终于有一天将身上的棉衣也悉数输光，被人赶出了栖身的小客栈，病得奄奄一息。此时多亏了万木林，精心照顾了整整一个月，才使杜月笙逐渐康复。这件事情使杜月笙深受感动，从此以后对万木林信任有加。

杜月笙投靠黄金荣发迹以后，没有忘记万木林，将他带到自己身边，又把堂兄的女儿许配给他。从此，万木林与杜月笙的关系又多了一层，他也因此称呼杜月笙为“爷叔”。万木林虽然貌不惊人，却聪明乖巧，对于杜月笙和夫人交给的事情，都办得十分认真，将个杜公馆安置得井井有条，深得杜月笙的赏识。杜出门入户，万木林都不离左右；同样，杜月笙要办的事情或别人求杜月笙办的事情，也要由万木林作中介。万木林胸无点墨，记忆力却强得惊人，只要是与杜月笙有交往的朋友、门生，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抗战胜利后，当军统头子戴笠向杜月笙要两个得力的人时，杜当即推荐了万木林。这当然是因为他与万木林的特殊关系，但同时万木林是个活的电话号码簿，联络方便，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1932 年 11 月，杜月笙的门徒成立了公开的帮会

社团组织“恒社”，万木林虽然不担任什么职务，而实际事务却由他一手操持。他又通过代填申请入社人员的“履历表”，捞得了许多油水。谁想拜杜月笙为师，当然更不可少地要铺好万木林这条路。以后他又靠着杜月笙的面子，开起了万昌米厂，成为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因此当后来万木林被捕入狱时，他能够一掷千金，也就不难理解了。

万木林成为杜月笙的红人以后，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气，与自己日渐提高的身份不相匹配。于是请经常出入杜府的杨度帮忙，遂改“木林”为“墨林”，一字之差，但儒雅之气则多了几分。

1937 年 8 月 13 日，“八一三”事件爆发，上海沦人敌手。杜月笙因为在抗战中表现十分积极，因而遭到日本人的不满并被特务监视。为此，杜决定远遁香港，以避避风头。而家中的大事小事，则托给了万墨林负责。在以后的八年抗战中，万墨林几乎一直呆在上海，不折不扣地执行杜月笙从香港发来的命令。这个时期的万墨林，凭着在上海滩的天时、地利、人和，活动十分频繁，处处得手。万墨林因此得到杜月笙的高度褒扬，称他不仅“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

上海沦陷后，在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的诱惑下，原上海国民党党部的许多成员，纷纷投入敌人怀抱。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权威，蒋介石成立了由杜月笙为主任委员，中统骨干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势力相较劲。当时杜月笙遥居香港，万墨林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统一委员会”的重要人物，他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任务——迎接并妥善安置来沪的“统一委员会”骨干。准备就绪以后，就开始了所谓的“铁血锄奸”活动。当然，说是“锄奸”，也免不了趁此机会报些私仇旧怨。

“锄奸”行动是由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陈默负责的。1938 年 1 月 14 日，万墨林以数千块大洋开道，配合陈默刺杀了当时正准备出

任日军控制下的两特区法院院长的范刚。接着又刺杀了汉奸周凤岐、顾馨一、尤菊荪等人，制造了几十起恐怖血腥事件。而这一系列行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影响最大的，则是当时的上海闻人张啸林和傅筱庵被杀案，它们与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被刺案一起，被万墨林称为是当时的三件大案。

俞叶封是张啸林的儿女亲家，也是张的得力助手。"八一三"以后投靠了日本人，汉奸行径恶劣。他的行为引起了戴笠所组织的"行动小组"的强烈不满，必欲去之而后快。俞叶封当时正迷上了坤剧名角新艳秋，频频为其捧场。1940年1月15日，俞叶封坐在上海更新舞台楼上第一排看戏，正当高潮叠起时，被"行动小组"负责人陈默率人射杀在座位上。按照老上海的说法，俞叶封是碰上了坐命殃夫的白虎星君。其实，这一方面是他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另一方面，也是"行动小组"的一个策略，因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万墨林深知俞叶封与张啸林的关系，除掉俞叶封，无异于剪去张啸林的一张羽翼。

张啸林是当时上海滩上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三大亨之一，为人十分凶悍狡诈。当时，张啸林与杜月笙同住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而万墨林因为杜月笙的关系，对张啸林也以"爷叔"相称，关系非同一般。只是万对张素无好感，因此听说要刺张啸林，他打心眼里赞成。

抗战爆发以后，张啸林顾目四盼，决定趁此机会扩充势力，独霸上海。不久，日本侵略军以"浙江省主席"的头衔相诱惑，张啸林便公开投敌，充当了汉奸，而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军统头子戴笠发布命令，决定将他迅速除掉。

自从俞叶封在戏院被刺，张啸林形同惊弓之鸟，行动也更加谨慎。因为俞叶封被刺的那一天，张啸林本来打算陪同亲家一起去看戏，只是因为临时有事才没有去成，捡回了一条性命。俞叶封死后，张啸林接连许多天足不出户，然而无奈赌瘾发作，便不顾家人的劝

阻，决定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自己的豪华大赌场去一赌为快。殊不知，张啸林的行动及行车路线，早已被作为近邻的万墨林所获悉。“行动小组”便作出决定，设法在张啸林的座车开到某个十字路口时打出红灯，等座车停稳以后再用机枪扫射。不巧的是，这一次子弹仅将张啸林的汽车玻璃击穿了几个洞，张啸林再一次死里逃生。

万墨林获知第二次刺张计划破产后，开动脑筋，设法把枪法极准的林怀部推荐给张啸林当保镖。1940 年 8 月 14 日中午，林怀部借故在外吵闹，待张啸林伸首窗外时一枪射穿了他的咽喉。

与张啸林、俞叶封一起被列入暗杀名单的还有伪上海市长、当时的另一上海闻人傅筱庵。而这次行动，作为军统“行动小组”总交通的万墨林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首先通过杜月笙的一位姓张的保镖，由他去收买他的同乡、当时是傅筱庵贴身保镖的朱生，让他相机行刺。1940 年 10 月 9 日，朱生趁傅筱庵大醉熟睡之机，手持菜刀结果了这个大汉奸的性命，干得十分干净利索。

除了配合“铁血锄奸”以外，在万墨林后来所著述的《沪上往事》一书中，不惜笔墨，大书特书的，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护送高君武、陶希圣及家属出走上海。另一件是他因为同汪伪及日本人作对而两度入狱。

高陶二人原是汪伪集团的骨干，因分赃不均失宠后又准备另投门路。杜月笙获悉这一消息后，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决定将他们拉出汪伪集团，以此打击亲日派的势力。万墨林的任务，就是帮助高陶二人脱身。事成之后又设法让陶希圣的三个孩子脱离虎口，一切都处理得十分圆满。“高陶出走事件”曾轰动一时，万墨林后来在《沪上往事》中称之为“高陶事件举世震惊”，“三连环的脱险妙计”，“陶氏三姊弟突围记”云云，足见其对此事的洋洋自得。

万墨林在数次事件后声名大振，引起了汪伪政府的恼怒，将其列入通缉名单。1940 年 12 月 21 日晚，万墨林受骗被捕。据他后来

回忆，他在汪伪的特工总部里被吊毒打，甚至尝了老虎凳、灌凉水等酷刑，但对“行动小组”的活动守口如瓶。对张啸林、傅筱庵等人的死，更是不吐只字。因为张啸林是杜月笙的拜把兄弟和救命恩人，而万墨林又是杜的亲戚，也可以说是杜的学生。自己的学生杀了自己的把兄弟，在江湖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万墨林被捕后，急煞了在香港的杜月笙，他通过自己的门生弟子上下打通关系，又靠着银元铺路，终于获释出狱。万墨林对这段经历一直刻骨铭心，三十年后，当他在台北举行七十大寿宴会时，一大群新朋旧友都以此大肆吹捧。1974 年 5 月 18 日，当时已经是七十三岁高龄的万墨林到日本。在一次发言中，还不忘把这段历史重温一遍，其所占整篇发言稿的篇幅，竟在五分之三以上。

1944 年 5 月 11 日，万墨林再次被捕入狱，而此时的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沾时势的光，他这次被捕没吃什么苦头，行动也比较自由。1944 年 11 月 21 日，万墨林重新获释。

抗战胜利以后，万墨林被捧为“抗战英雄”，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又当上了上海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甚至被选为第一届“国民代表会议”代表，俨然成为上海政界的风云人物。然而，随着杜月笙地位的江河日下，万墨林是终究站不住脚跟的。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侮既失，蒋介石开始限制一切不利于自己权力集中统一的社会力量。杜月笙的野心勃勃，精明狡猾，树大根深是世人皆知的，蒋介石对其的限制和冷落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了。而万墨林却不识权宜机变，闹起了“粮食贷款案”，使自己栽了跟头，也抹了杜月笙的面子。

当时的上海一片混乱，前来接收的官员和军队，都趁此机会大肆劫掠，造成了物价迅速飞涨，粮油供应尤其短缺。作为上海市豆米行商公会理事长的万墨林拥有当时上海最大的米店之一的万昌米号，又自恃抗战八年劳苦功高，趁机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哄抬米价，从中大发横财。上海的粮食市场因而更趋紧张。为争购大米，

甚至出现了市民被挤压致死的惨案，如此为富不仁，万墨林变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而面对民怨沸腾的局势，万墨林不仅毫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终至于东窗事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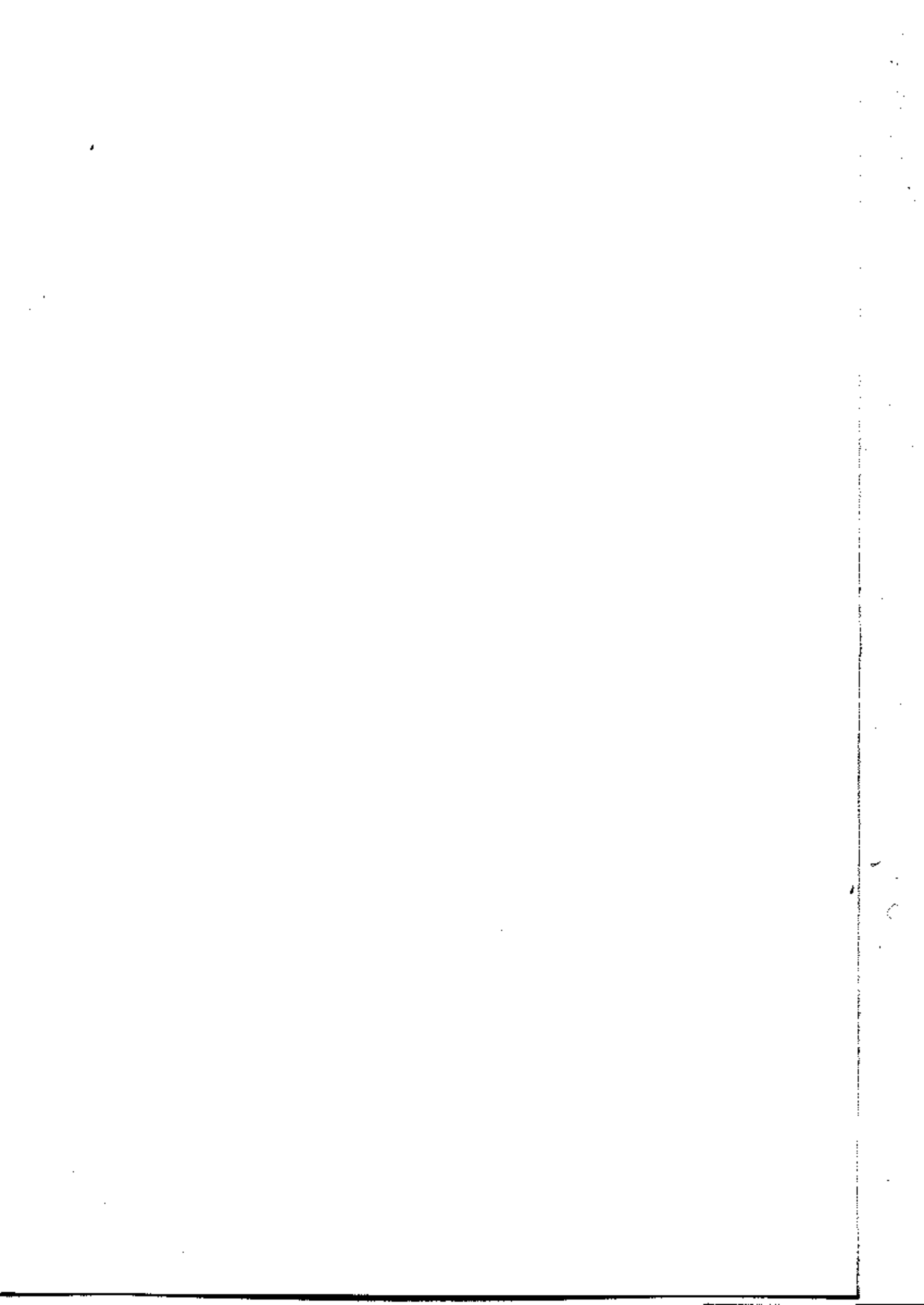
1946年4月，国民政府为缓和上海粮食局势，贷出巨款资助上海粮商的经营，并作出规定，此款项只能用于粮食经营，不得挪作他用。而万墨林再次利用行业理事长的身份，从中牟取暴利。致使贷款发出以后，不仅没有解决粮食市场的问题，反而推涨了粮价。当时上海有个滑稽戏演员筱快乐，编了许多戏词抨击万墨林，称之为“米蛀虫”。因为上海市民对粮食市场和米价极为不满，所以以谩骂万墨林为题材的滑稽戏也立即风靡全上海。万墨林简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情急之下，万墨林派人对筱快乐进行了人身威胁，岂料筱快乐根本不把那些白相人(即指流氓)放在眼里。万墨林只好抛出最后的杀手锏，派人冲进筱快乐的家里，遇人便打，见物就砸，还把他妻子打成重伤。消息传开以后，舆论为之哗然。众怒难犯，上海市地方检查院决定侦讯万墨林。无奈，他只得求助“爷叔”杜月笙。而此时的杜月笙已经深知此时非彼时，当局既然敢传讯万墨林，其实矛头已指向了自己，不过是杀鸡给猴子看而已。杜月笙当时因为痛伤戴笠猝死而身患重病，不顾众人的反对，命令万墨林前去自首。无奈，万墨林只好卷起铺盖走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虽然他在《沪上往事》中不曾多提，但这确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入狱。不久，杜月笙运用手段，让警备司令部医务所出具“万墨林病危”的证明，将万“保释就医”。至1947年6月，蒋介石当选为伪“大总统”，颁布“大赦”令，“粮食贷款案”才告了结，但从此而后，遭此一击的万墨林再也难圆他所追求的大亨梦了。

1948年8月，已经是全国解放的前夜。蒋介石不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对如潮涌来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更是疲于应付。为挽救败局，蒋介石强制进行币制改革，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派“太子”蒋经国来沪主持经济工作。蒋经国到上海后，对于

私藏金银、违抗法令者严加惩办。他不仅不买杜月笙的面子，传万墨林训话，态度极为倨傲，甚至拘捕了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经过了这些事情，万墨林心里已经十分清楚，他和“爷叔”杜月笙在上海滩威风八面、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49 年 4 月，杜月笙逃到香港，万墨林前往侍奉。1951 年杜月笙死后，万又辗转到了台湾，以后长期定居于台北。

（曹 憬）



南北巨匪的末日



天灾人祸、苛政兵燹、千百年来绝未泯灭的匪患，迨民国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猖獗。巨枭元凶的结局，或得应验往复果报之说，但其最具有认识价值的，倒在于为人们观照那个社会制度的腐败黑暗，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角。



老洋人 匪窝挨黑枪

老洋人，本名张庆，曾用名张廷献、张国信等。河南省临汝县人，1893年出生。早年因家贫、父母病故而随兄投奔白朗的农民起义军，1914年白朗起义失败后返回老家。为避免官府的追究，投入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新建的宏威军当兵，历任连长等职。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河南督军赵倜企图联奉反直，结果其弟赵杰的宏威军被直系冯玉祥击败，只得退往豫东的中牟县，旋又被吴佩孚勒令解散。宏威军余部部分退往山东，大部则拖枪为匪，张庆便为其中的一员。

这时已升为宏威军连长的张庆率领所部及散兵三百多人拉杆起事。他们从中牟南下豫西，一路经过宝丰、鲁山、栾川和卢氏等县，然后北向直指陕州（今陕县）。据说，张庆这一路上"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由于沿路各县都是些贫穷的山区，素是土匪啸聚的场所，因此张庆的队伍一路前进，一路上便有许多贫苦农民和人少势单的匪帮加入进来，先后有张得胜、李明胜、任应岐、崔二旦、李老末、常建福、韦凤歧等三十多支土匪前来投奔，总数达到了七八千人。张庆被称为"老架子"或"总架杆"，即总杆首之意。

张庆的队伍成员主要是士兵、土匪和贫民，其声势浩大时，行进中的队伍"前后延至三十里，广亦十里"，甚至"占有四十余里之宽，延长至五六十里"。他们武器的种类既多且杂，多来源于溃兵携械来归、勒索、掠夺和购买等。他们的口号有时是"不要银钱，不拉票"，高举"替天行道"的旗帜，而且也有类似的表现。这从他们的"军歌"中也能得窥一二：

枪声镗镗，鼓声汪汪，老天不下雨，百姓去逃荒。

枪声隆隆，鼓声通通，督军立大功，百姓血流河。

枪声熊熊，鼓声同同，督军三天成富翁，全省百姓个个穷。

然而若要以为张庆言行始终如一地保持这般"正义"，则未免太简单化了。1923年11月间，张庆攻克进行顽抗的豫南淅川县李官桥镇后，便大肆焚掠，根本不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地戮杀一番，充分显示出了其匪性难移，据报载：

"匪众"攻入寨内，大肆焚掠，人民于枪林弹雨中，纷纷逃

散，呼号哭泣之声，惨动天地。死于践踏者十之二三，死于枪弹者十之五六，死于水火者十之三四。尤可惨者，束缚男女数百，泼之煤油，与房屋财物同付一炬。斯时欲生无路，求速死不得，不独受者惨苦，即闻者当亦堕泪。旋即骨肉化为灰烬，烟焰都带血腥。……总计死亡达四千余人，全家覆没者七十余家，焚毁房屋六万余间，街衢遍属残尸，阖寨尽成瓦砾。

类似的大屠杀在安徽阜阳、在湖北郧阳（今郧西）和枣阳、在许多有名无名的村镇屡屡发生。其最猖獗时，竟连京汉线上的政府护路军也退避三舍。那次张庆部从京汉线石桥站与临颍站之间折口豫西，护路军用电话通知京汉线南北行驶的列车回避。当时南下的五趟列车便停留在许昌，北上的四趟列车则逗留偃城，数小时后待土匪越过铁路后，方才通行，遂造成随后数日所有列车的误点。消息传开后，一时中外人士莫不视为奇闻一件

土匪绑架人称之为票，张庆除绑架被称为“本票”的中国人外，还特别“喜欢”绑架被称之为“洋票”的外国人。据粗略统计，从1922年6月至1923年12月间，约有二十四位外国人被张庆绑票，其中包括美国人、意大利人、挪威人、法国人、瑞典人、英国人等；其职业则既有传教士、工程师，又有普通游客；既有男士，更有妇女乃至六岁的童子。

张庆绑架外国人的目的颇为复杂，其中既有勒索财物、要求提供弹药者，又有借此钳制官军进剿行动、将他们充当挡箭牌者，还有藉此威胁政府、将它改编成正规军者。如1922年初冬，老洋人股匪冲破直军关佩孚、冯玉祥在豫西的三路合围往东逃窜时，尽管沿途迭遭机枪大炮的堵截，而土匪们经过多时转战，枪械损坏很多，子弹也极匮乏，人员减少到了三千人左右，实力大减，但因此时他们已拥有了七个“洋票”，故而土匪们颇为有恃无恐，而官军果真不急于发动总攻，怕一时“玉石俱焚”也。

“洋票”案件不断发生，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烈抗议，迄老

洋人股匪窜至豫东、皖西一带后，"洋票"数量更是激增，而且每遭官兵团剿时，这些洋人便被推上火线充当"肉盾牌。"为此，列强驻北京公使团再度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北洋政府束手无策之余，只得对外交使团表明，外来压力过分强大，促使中国政府必须在短期内满足土匪的非法要求，以换得外国人之获释。这样恶性循环，只会使土匪更加得寸进尺，外国人的安全更无保障可言。外国舆论对此亦很有同感。故而无论中外人士对洋票绑架案均深感头痛。

相传张庆之绰号"老洋人"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因为他长得身材高大魁梧，黄发深目高鼻，颇有些洋人的模样。另一种说法则称，张庆有一次听到别人说洋人如何厉害，便愤愤地说道："我比洋人更厉害，我是洋人的老子！"据张庆的所作所为来看，这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值得我们相信了。

张庆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给北洋政府造成极大的威胁，派出官军进行追剿自然刻不容缓。1922 年 12 月间，北洋军中素以悍将闻名的靳云鄂率兵终于将疲惫不堪的张庆包围得如铁桶一般了。为避免张庆处的洋票被害，靳云鄂派人去张庆处招安。处于严重困境中的张庆一时无力对抗如此大规模的进攻，遂表示愿意投降，但有三项条件："第一，将其所统三部众一律改编国军，老洋人仍任统领之职。且其队伍之营连排长，悉由其队中选委之；第二、补发军饷半年。因其所统之军队，皆系赵杰、宝德全之队伍，凡非军队出身，允为遣散；第三，各匪受抚之后，必须指定地点，驻防半年，始受调动。但该匪驻地有一匪发现，愿受完全责任。"

张庆派人提出上述要求后表示，如果官方答应这些要求，他们立即归诚；否则将率众北去，窜入直隶、河南交界地，再图大举。主持此次进剿的吴佩孚本不愿意进行招安，最关键的是军饷困难，无法满足张庆的要求。但靳云鄂则有招安之意，因为本身无操胜券之力，且感到如招安成功可以扩大自己的声势。在这之下，张庆和靳

云鄂双方进行不断磋商后，终于议定了七项条件："第一，老洋人一股投诚，愿受改编；第二，改编之后，老洋人先将所掳外人释放，以示诚意；第三，兵匪约定各不相侵，不得无故放枪，以免误会；第四，由靳氏改编老洋人部众为十二营，一律先发一月粮米及全副军装，以示诚意；第五，改编后暂由老洋人、张得胜两人统带；第六，由靳氏酌给枪械，以便戴罪图功；第七，由靳氏代向曹、吴两使（指曹锟、吴佩孚）请求准该匪改过自新，编为正式军队。"

于是到12月底，张庆释放了所有的洋票，匪队也改编成正式军队——"河南游击支队"，共十二营属两个支队，分由张庆和张得胜统率，仍驻宝丰、郏县一带。靳云鄂还举行了接见仪式，并宴请营长以上的军官。席间，靳云鄂以关羽和岳飞为例，希望在坐各位忠心报国，并建议每人姓名的中间一字均改为"国"字。他当场将张庆改名为张国信，张得胜改名为张国威。

然而，靳云鄂救出被绑架的洋人后，就再也不管张庆他们了。于是张庆打起剿匪的旗号，收缴附近各县镇团防的枪支，吸收其中的人员，藉此扩充自己的武力。同时，他还根据靳云鄂"就地筹饷"的指示，堂而皇之地向当地官府和地方士绅要粮要款。私底下他的那些部下还不断地重操故伎，威胁着当地有钱有势人家的安全。在后者联名向吴佩孚发出呼吁后，吴佩孚遂令张庆率部"赴豫东就食"，计划将他们从豫西老巢赶往了豫东。

1923年春夏之间，张庆以豫边游击司令的身份率部驻防豫东归德（今商丘）地区。在这里张庆继续骚扰百姓，干着兵匪不分的坏事。然而，令吴佩孚最担心的是这个颇有计谋、懂得战术的招安土匪会被自己的敌人皖系或奉系军阀收买，做出大不利于自己的事情来。于是10月间，吴佩孚命令张庆率部去四川参加内战，这样既可以帮助站在自己直系一边的四川军阀杨森打仗，又可以借此机会削弱甚至消灭这股心腹之患的土匪队伍。

何等狡猾的张庆一眼便看穿了吴佩孚的阴谋，他借口饷械缺

乏、部下蛮横，一口拒绝了吴佩孚的命令。吴佩孚此时深悔当初同意招安张庆，且已得悉直系已秘密策动张庆倒戈，于是便下定决心彻底解决这股惯匪。10月中旬，吴佩孚密令苏、鲁、皖、豫、陕五省的四万军队从东、西两个方面兵分六路包围张庆，勒令缴械遣散。然而，张庆早已作出判断，连夜复叛，他们兵分两路向西突围成功。吴佩孚五省军队的围剿计划彻底失败了。

1923年10月下旬，重返豫西的张庆的势力不但很快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扩大，人数竟达六七千人之众。他们一边与官军周旋，一边残害地方，不断制造血案，绑架洋票。然而，此时的张庆虽然返回了豫西老巢，却毕竟成了强弩之末。其土匪在两个多月间奔窜豫、鄂、陕三省达三千余里，昼夜行军，连续作战，极为疲惫不堪。尤其是张庆返回豫西后，所到之处商民坚壁清野，逃亡一空，使匪队无法寻觅粮食，导致众匪人心浮动，怨声四起。潜在的危机即将爆发了。

1924年1月上旬，张庆被官军围困在豫西郏县西北山中，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动辄发怒。1月12日，在众匪首的会议上，他严责匪首之一的李二黑私通官军，下令处死以儆效尤。其实这一“私通”是其参谋长丁保成和其他匪首一手策划的，他们深知张庆深恨上次招安的结果，故而想先瞒着张庆与官军联系起来，事成之后张庆或许会顺水推舟予以应诺。所以此时不少了解内情的匪首纷纷起来替李二黑说情。然而张庆执意要杀李二黑，至此丁保成环顾众人，大声说道：“既然如此，咱们散伙！”

张庆闻言大怒，陡地从座位上跳起掏出手枪来，“呯”的一声枪响，倒地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庆本人。原来有一匪首早已暗中持枪在手，一见事急，便先下手为强地举枪击毙了张庆。张庆，这个以“老洋人”闻名于世的豫西惯匪最终竟命归于部下的黑枪之下。

（徐有威）



魂归抱犊崮



孙美瑶，山东省峄县人，1899年出生。其家世代为匪。1922年冬其兄孙美珠死后，被众匪推举为首。1923年5月6日聚众劫持了津浦线快车上的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成为耸人听闻、具有国际影响的“临城劫车案”之主谋。直到6月24日，官匪之间才最后达成收编之协议，孙美瑶出任“山东新编旅”之旅长。

在由抱犊崮参与“临城劫车案”的土匪改编成的这个“山东新编旅”中，孙美瑶为旅长，孙宏图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郭其才，第二团团长周天松，是颇为像模像样的“官军”了。

1923年6月24日是“山东新编旅”弃邪归正”的一天，因为在那天昔日的土匪下山了。从抱犊崮山区到枣庄这一路上，出现了一番空前轰动的热闹景象。本来是在泰安用于登攀泰山的特有交通工具——“爬山虎”(即二人抬)，都被调到了抱犊崮。那些刚被任命为“山东新编旅”的“军官”们，都坐在“爬山虎”上，顾盼自雄，神气活现得像是英雄。他们的家眷也跟着下山，她们多半是些从未离开过山区的村姑，第一次出山到枣庄，便都郑重其事地穿上了过年时才穿的新衣服，或宽襟大袖，或镶边滚珠，红红绿绿五颜六色。这支奇形怪状的队伍是军队又不像军队，颇像庙会散场一样，浩浩荡荡又零零落落地开往枣庄。

7月18日，剿匪总司令郑士琦代表山东督军田中玉，率领第五师第十八团团长吴可璋，在枣庄等地对“山东新编旅”进行了点验，并决定该旅旅司令部驻枣庄，第一团团部驻枣庄以西的齐村，第二团团部驻枣庄以东的郭里集。

按照北洋政府军队的正规编制，一个旅满员时可达三千多人，抱犊崮山区的土匪总共不过一千多人，其余的近二千人的空额则由当地的孙美瑶的老乡们滥竽充数了。当地物产贫乏，教育落后，农民很难生存，当兵和当土匪同样是不错的出路；这次他们老乡孙美瑶成了官军的旅长，驻地又在家乡，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再加上这次收编的协议是按照“有枪者编军”实施的，于是山区百姓凡有枪者，或能借到枪者，或能买到枪者，无不携枪前来投军。

这样的军队，且不说其武器构成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且不说他们毫无训练毫无军人素质，最令人头痛的是这批乌合之众毫无军纪胡作非为。他们将官军与土匪的身份合二为一，穿的是北洋军

的“二尺半”，饭馆里白吃，戏院里白看，商店里白拿。过去他们打家劫舍还毕竟是暗的，而现在却可以明目张胆地大干了。剿匪者本身就是土匪，这“官土匪”的厉害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情形使当地人民，特别是有钱有势的当地乡绅们极为痛恨，他们多次请求政府把这批惯匪调到的地方去。后来曾传说四川军阀混战时，政府拟调这支“山东新编旅”前去增援；又曾传说将此部队调往江苏，归淮海镇守使陈调元指挥；还曾传说曹锟的弟弟曹锳为扩充势力，想将“山东新编旅”收编为其部下。自然这些传说最终毕竟只是传说，“山东新编旅”的官兵们依旧作土匪状，在枣庄一带横行霸道，作威作福。

“山东新编旅”的官兵们为所欲为的同时，他们的领头人孙美瑶更是昏头昏脑，丝毫不知道把握时机，整训自己的部队，而是被当地官绅所笼络，以一些无聊之事为乐，正洋洋自得呢！

孙美瑶当时绑架中外旅客时，峄县境内最大的企业中兴煤矿公司一度曾成为官匪谈判的中间场所。而中兴煤矿公司的总经理便是北洋军阀时代显赫一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具体经办此公司的中兴煤矿公司驻矿经理处经理吴炳湘也曾出任过京师警察总监和安徽省省长等要职；他们对孙美瑶等匪帮的骚扰和抢掠深感无能为力。这次孙美瑶被收编后，他们认为应该对他极力拉拢，以维护一方的长治久安。孙美瑶得知如此声望卓著的大人物也有意与自己联络，便认为大可乘机抬高自己的地位，自然喜出望外。于是孙美瑶磕头认吴炳湘为干爹，吴炳湘也屈尊认了这个土匪出身的旅长为干儿子。从此孙美瑶“一步登天”，整天喜不自胜地与干爹之类的大人物交往游乐，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和大人物交往没有“表字”没有“号”不免太讲不过去了。孙美瑶虽是山里的穷孩子，但毕竟念过几年私塾，在抱犊崮占山为王时没空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优悠之余竟也想附庸一下风雅了。于是孙旅长寻访遗老遗少，屡加推敲，终得一“表字”为“玉峰”。从此他在

官场上便以“玉峰旅长”或“玉峰司令”自居自喜，在私下场合以人称之为“玉峰公”而自为陶醉。干爹吴炳湘也时不时亲热地叫上几声“我家玉峰”，及闻此言，孙美瑶早已飘飘成仙矣，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末日即将来临了！

“临城劫车案”爆发后，一大批北洋军阀的高层人物因此受到严厉惩办，山东督军田中玉丢官，兖州镇守使何锋钰也弃了乌纱帽。故而当北洋军阀的山东部队奉命前来收编孙美瑶时，他们内心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7 月 18 日，替代田中玉主管山东军务善后事宜的剿匪司令帮办军务郑士琦派出其嫡系的第五师第十八团团长吴可璋来枣庄点验“山东新编旅”，同时奉命在枣庄设立了一个稽查军纪的机构——“稽查新军执法营务处”，由吴可璋任处长。而吴可璋手下的一个连被调驻枣庄，专门负责监视孙美瑶的军纪。

其实，吴可璋的枣庄之行的秘密目的便是除掉孙美瑶，他直接受何锋钰的继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的指挥。张培荣经常公开或秘密地往返于枣庄和兖州之间，面授吴可璋种种机宜。首先，他们表面上对孙美瑶部的为非作歹不闻不问，这固然使当地百姓再度大失所望，但也使孙美瑶放松了警惕性。其次，吴可璋对“山东新编旅”大肆渗透，对孙美瑶的部下离间分化。吴可璋对其第一团团长郭其才假惺惺地表示：“你这一团的枪械好，人数足，督军很器重你，你将来有升任旅长的希望。”他又回过头来对第二团团长周天松重复了这套谎话，使这两人大喜不已。过了段时间，郭其才和周天松便贼心难按地问起了吴可璋进展如何，吴可璋便又分别偷偷地告诉他们：“督军要撤换孙美瑶，不过孙美瑶这家伙有恋栈的意思，恐怕不服从命令。也可能督军会下令杀掉他，你看这事怎么办好？”这两个团长都在梦想自己能取而代之当上旅长呢，所以无不拍着胸脯向吴可璋保证说：“我绝对服从命令！”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点，当孙美瑶被杀枣庄时，分别驻扎在西面齐村和东面郭里集的这两个团，虽然距离枣庄只是近在咫尺，却没有任何表示，更谈不

上援救行动了。吴可璋的离间计取得了成功！

孙美瑶的死期早已定了，然而，12 月中旬一封来自洛阳的信则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封信是直系第二号领袖吴佩孚发给郑士琦的，鉴于孙美瑶被收编后各地土匪仿佛受到了鼓励，纷纷群起而仿效，一时匪患日趋猖獗，使吴佩孚震怒不已。吴佩孚认为："山东自收编匪军后，而匪祸更烈，非杀孙不足以绝匪望。否则，临城巨案，恐将屡见，而不可复遏。"此信不啻孙美瑶的催命符矣。

1923 年 12 月中旬，随着布置大体就绪，吴可璋开始"惹事生非"了。

一天在"山东新编旅"的司令部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吴可璋和孙美瑶拍案大骂了起来。后来才知道完全是件小事，据说是孙美瑶得了几支枪，吴可璋想要，而孙美瑶不给云云。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稽查新军执法营务处和"山东新编旅"旅部之间一时剑拔弩张，好像要发生武装冲突似的，不由得惊骇万分。因为真的打起来后最先受害的肯定是老百姓，地方上将更糜烂不堪了。于是地方乡绅们紧急磋商，设法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研究了半天，乡绅们发现此起冲突的原由只不过是件小事。小事不难处理，只要双方会面相商，酒酣耳热之际定是顿释前嫌之时。于是地方人士公推德高望重的梁步海、金汉岑两位乡绅出面设筵，并请吴炳湘和张培荣作陪，专请孙美瑶和吴可璋前来赴宴。他们认为吴炳湘是孙美瑶的干爹，而张培荣则是吴可璋的顶头上司，在这种场合上吴、孙二人不管有多大的误会，总会给上述这些大人物面子的，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餐叙的时间定于 12 月 19 日中午，地点就在中兴煤矿公司后面的"老公司"内。

所谓"老公司"，即指中兴煤矿公司开创时所建的办公处，是一座坐北向南的老式建筑。随着矿务的发达，这一老办公楼的南面另建起了三座新式大楼，这就被人称此为"老公司"了。从正门进入这一建筑，东、西有着两个院落。西院为厅房，其间曲径幽栏相连；东

院为花园，花木茂盛。梁、金两位设筵便是在西院的正厅中。

12 月 19 日上午 11 点左右，孙美瑶飘然而至。只见他没有带随从，也没有带任何武器，只是手把鹌鹑神态悠闲。他与请客的主人寒暄一番尚未落坐时，张培荣的一个马弁便手把鹌鹑跟踪而至。这个服装整洁的军人向两位主人和孙美瑶致礼后说道："孙司令，你的鹌鹑不错啊，咱们到东院斗斗，你看我这只怎么样？"孙美瑶一口答应，便和来人一前一后走向了东院。

此时，突有吴可璋手下的稽查新军执法营务处的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从正门冲了进来，分别把守住了这一建筑的所有出口处，另外有七八人冲入东院。在西院门口把守的士兵对惊慌失措的主人们说："请不要害怕，不要动，没你们的事！"这时只听到东院里响起一阵叱喝喧哗之声："把他架到后面去！"此时只见两个士兵把孙美瑶的双臂扭向后背，架持着踉跄着走在前面，六七个士兵则持枪紧随其后。他们走出后门，向东一拐弯，只听"呯呯"两声枪响，东院后面的墙根下便倒下了孙美瑶这一惯匪的尸体。是年孙美瑶年仅二十四岁。

（徐有威）

刘黑七送命土围子

刘黑七，本名刘桂堂，字兴田。因其人长得黑，在与其他土匪结拜时排行第七，故得绰号刘黑七。山东费县人，1892年出生。出身贫寒，1915年拉“杆子”为匪，啸聚匪伙最多时达三万余人，先后窜扰晋冀豫、苏鲁皖、察热绥等十几个省市，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其间曾为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多次收编，但又屡次反叛。

1937 年卢沟桥一声枪声,掀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这时被山东军阀韩复榘刺伤的刘黑七正养病天津,他看到时局大变,立即召集潜伏各地的土匪旧部前去投降日寇。然而因为过去他曾"背叛"过日本人一次,故而日寇认为他不可靠,不愿意再向他提供武器。刘黑七素有"孝子"之名,于是他找来一名讨饭的妇女,让她自称是刘母而派去日军作为"人质",日寇果然上当,就给他发了三千人的武器装备。到 1937 年底,业已摇身变为日本"皇协军前进总司令"的刘黑七,随着日军杀回了山东老家。

由于韩复榘一味自保实力,不战而逃,所以刘黑七顺利地进驻胶东一带,在掖县、即墨等地大量扩充队伍,不久便迅速发展到了三千余人,到处残害人民。这时日本侵略者鉴于刘黑七反复无常的过去,想将其土匪部队进行整编而加以约束。刘黑七非常刁滑,本着"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的秉性,识破了日军的阴谋,立刻和日军翻了脸。1938 年底,他率部撤出胶东,以"反正抗日"的名义向鲁中南开去。

这时的鲁南一带是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控制的地盘,他的政治部主任周复正好与刘黑七的参谋长朱复宇极有交情。而这位周复很得蒋介石的赏识,曾在国民党内极端秘密的政治团体力行社内担任要职,故而被蒋介石派到于学忠部担任战区政治部主任一职。刘黑七充分利用了这层关系,首先通过朱复宇联络上了周复,让周复电告蒋介石通报种种。最后经蒋介石同意,刘黑七部被收编为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刘黑七任师长,归属于学忠所辖。1939 年春,刘部进驻费南、费北两县,在费南他的老家南锅泉村大兴土木,将师部安营扎寨于此,而其八千多的人马则分布于四周各村。

然而刘黑七土匪成性,一副惯匪的作风,不到一年的功夫他就又和平邑镇的日军暗中勾搭上了。日军不仅供给刘黑七大量的枪

械弹药，而且还让刘黑七在平邑镇日军首脑机关中设立了联络处。反过来他又答应国民党曲线救国，因此得到了国民党定时从安徽阜阳供应来的弹药。他明里是国民军三十六师师长，暗里却还挂着“和平建国军”十军第三师师长的头衔，再加上过去“皇协军前进总司令”，真是“一身三职”。他的队伍挂着红日、白日两个旗号，有黄色和灰色两种颜色的军装，吃着日伪、蒋军的双饷。深知其中奥秘的当地老百姓无不讥讽地称之为“双保险”。

刘黑七被改编成国民党三十六师回到山东后，正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之际，我抗日根据地的费南、费北两县人民都曾对他表示欢迎，而刘黑七也打起抗日的旗帜，以避免我驻费北的一一五师的打击，从而先安下营寨扎稳脚跟。

1940 年春，刘黑七便公开了他的反共急先锋的面目，他配合日寇，对我费南、费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到处捕杀抗日人员，封锁我抗日根据地。1941 年 5 月 1 日，刘黑七勾结日寇，突然包围了我费南二区区公所，我区公所同志奋勇抵抗，一直坚持战斗了十二个小时，打败了敌人的多次攻击。最后万恶的敌人竟施放毒气弹一百余发，使我五十余人光荣牺牲。同年秋天，刘黑七配合日寇二千余人，又突然包围了我设在费南郑城附近的一个干校。负责保护此干校的我三团派出一营护送干校转移，另两个营把敌人引上山去，在这场战斗中，又有我一百二十名抗日战士壮烈捐躯。

不久，刘黑七的三千多人又突然包围费北杨谢我部六八六团，遭到我部英勇反击，一举消灭了其五百余人。刘黑七恼羞成怒，由此更大规模地捕杀我地方抗日人员，用分割、包围、蚕食、封锁等办法，打击我地方武装，缩小我解放区。我费南县政府驻地老持峪村，即被刘黑七包围，捕去我干部二十四人，县长马健光着膀子杀出重围，县政府被迫撤至邹东山区。而刘黑七竟还下通缉令，扬言捉到马健者赏银元一万二千元。随后刘黑七又率三千人包围了我费北行署，他亲自指挥四面包围我费北行署和费北大队共四百余

人，最后由于我费北行署派人调来六八六团，打退了刘黑七的围攻。

刘黑七遭此挫折后，对我抗日人员的虐杀更为残酷。凡被刘黑七捕到的我抗日人员，都被逼着自己挖坑，然后被敌人用刀刺破腹，扔入深坑中活埋。或者将他们扔入深坑，土埋至胸膛后，再刀刺头顶，放血花而取乐。另外，凡是刘黑七认为有八路嫌疑的，更是一律活埋。我六八六团中山西籍和河北籍的战士后脑勺稍平，刘黑七便将所有后脑勺稍平的人一律说成是六八六团的"密探"而活埋。这年鲁北乐陵县闹灾荒，不少灾民逃到沂蒙山区度荒。恰巧这些灾民后脑勺都很平，刘黑七便用假放粮的办法，把灾民骗到一起加以活埋。仅此一次，被活埋的乐陵县人就达数百人。

刘黑七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我人民群众的切齿痛恨，鲁南军区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为配合鲁中等地区的反扫荡斗争和从根本上改变鲁南的斗争形势，决定集中鲁南部队主力攻打刘黑七部。

1943 年夏天，刘黑七在山东郯城一带被我鲁南三团和民山支队阻击，两军对峙一月之久。刘黑七见势不妙北逃至三阳等地，又遭到我鲁中军区部队的迎头痛击。刘黑七又率部向西流窜，又正入我军的包围圈之内。仅此两仗，刘黑七就损兵折将一千多人。

这时我军已逐渐占有优势，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布下了天罗地网，刘黑七到处挨打，每个地方不敢连续住上三天。日寇由于自身难保，根本没有力量帮助刘黑七，而山东的其他土匪也都处在我军民包围之中，自顾不暇，更谈不上助其一臂之力了。至此刘黑七只得窜回老巢，破坏了其苦心经营多年的军事设施，将其家眷送往天津，随后开始了游击活动。

刘黑七不愧为流窜江湖长达二十九年的惯匪，他一会儿穿军装，一会儿换便衣，还找了七八个和他相似的矮胖子和他一样的打扮，充当他的替身。刘黑七行踪不定，很难捕捉。等我内线人员搞到情报后，再报告部队前去追捕，最后捕到的往往是一个假刘黑七 。然而无论刘黑七窜到哪里，我军就尾随追到哪里。刘黑七军心

涣散，弹药不足，人员减少达一半。这年秋天，刘黑七逃到了鲁南山区东柱子村潜伏了下来，而这一行动很快为我军侦得，一场彻底消灭这股政治土匪的军事行动立即就开始了。

为了一举成功，我军采取一系列新的对策，以假乱真，麻痹敌人，以期最后一击之圆满无缺。

首先，我军在政治上对其进行麻痹。我军抓住刘黑七是"孝子"的特点，利用地方关系将刘黑七的母亲请来，对她进行说服工作，同时生活上进行很好的照顾。随后派人给刘黑七送去其母亲的信件，并请刘黑七派人来鲁南军区看望其母亲。后来刘黑七果然派其副官来军区看望刘母，我军便利用副官来做刘黑七的工作。该副官将此行的所见所闻报告刘黑七后，刘黑七不仅放回了扣压的我方人员，还假心假意地表示要与我方往来。我军将计就计，遂派人前往，藉此了解其驻地的详细情况。

其次，我军在军事行动上也加以麻痹。为了消除刘黑七的疑惧，我军有意将主力部队调走，并经常不断地派地方小股武装向其驻地进行袭击。而等他反击时，这些武装早已撤得无影无踪了。在这段时期内，刘黑七被搞得非常疲惫，久而久之便习以为常放松了警惕。故而当我军在 1943 年 11 月 15 日夜发起最后的凌厉攻势时，刘黑七还躺在床上吸大烟，其手下警卫前来报警后，他还满不在乎地说："早听到了，又是毛猴子来扰乱，不要理他们。"这就充分说明这些措施的得当。

我军还在其他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并对刘黑七的老巢东柱子村进行了极其详尽的侦察。刘黑七非常喜欢听京韵大鼓，为投其所好，我军派出军区宣传员化装成说书先生，通过东柱子村的地下关系前去说书。结果连续十几天，刘黑七和他手下的匪徒们都被迷住了。借此机会，我宣传员将刘黑七的住处，匪徒人数和武器装备等作了了解。11 月 10 日，我军又派出三团二营营长曹明盘亲自率领的侦察小组，化装成卖盐的、卖菜的、割草打柴的，对东柱子

村再度进行了详尽的侦察，将东柱子村内的大街小巷及敌火力配备绘制成图，供我军进攻时参考。

对刘黑七发动最致命打击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场战斗由鲁南军区政委王麓水亲自指挥两个团进行。为取得圆满的成功，战前我军精心研究了作战方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并从思想和军事训练等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

1943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5 点左右，只听一声令下，我军出发了。为了迷惑敌人，部队并未直奔东柱子村，而是绕着崎岖的山路向梁邱以东行进，尔后才向西折回，扑向东柱子村。

晚上 10 点多，部队抵达了东柱子村附近的指定位置，战斗打响了。担任主攻的部队仅用几分钟时间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围墙，匪徒们仓皇逃入小围子，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我军在机枪掩护下，最终让爆破手炸开围墙，喊声震天的战士冲入小围子，解决了全部的残敌。然后，攻占了刘黑七总部后现场并没有发现刘黑七本人，只是活捉了其最宠爱的小老婆。一场紧张的搜索随之展开了。

负责打"出水"(逃跑之敌)的四连指导员耿春涛带着通讯员何荣贵此时正蹲在连队阵地西侧的一片坟地里，密切注视着东柱子村大围墙上的动静。这天虽有朦胧的月光，但由于距离围墙较远，所以看上去仍是模糊不清。于是耿春涛和何荣贵便慢慢向围墙靠去，同时注意围墙方向的情况。

突然，他们发现围墙上滑下了三个黑影，一个高个子，两个矮个子，他们迅速离开围墙向西面逃去。耿春涛和何荣贵来不及通知部队，立即追了上去。只听"乒"的一枪，其中一个黑影倒下了，另外两个黑影向着不同的方向继续狂奔。于是耿春涛和何荣贵兵分两路，各追一人。何荣贵追的是个矮胖子，在相距四五十步距离时，何荣贵向黑影打了一枪。矮胖子随即也回了一枪，子弹从何荣贵的耳边擦过。双方时有射击，最后那弹尽了的矮胖子竟掷过来一块石

头，打在了何荣贵的鼻子上，但何荣贵忍痛追击。最后矮胖子慌张地爬上了一道地堰子，呼呼直喘。何荣贵此时看清此人的外貌与刘黑七很接近，便一心想活捉他。可那矮胖子急眼了，还是拼命朝前跑。何荣贵无奈之余决心干掉他了事。当矮胖子又一次翻上一道土堰时，何荣贵抬手就是一枪，矮胖子应声倒了下去。

后经俘虏辨识，何荣贵击毙的正是恶贯满盈的巨匪刘黑七，横行二十九个春秋的歹徒终于一命呜呼，魂归西天。

（徐有威）



汆尸姚渡河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湖南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人，1882年出生。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中匪首“田大榜”之原型。幼时上过私塾，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学堂。因长得两腿滚圆，两膀粗大，被父母昵称为“大膀”。“膀”、“榜”谐音，遂得此名。十六岁时因“仰慕”“强人”的行为而开始了其长达五十多年的土匪生涯。

刚上匪道的姚大榜毕竟胆小，第一次大开杀戒的地方选在远离家乡的贵州岑巩县，从中得到一笔横财后便回到老家，逐步发迹成了“闻名”湘黔边界的老惯匪、大地主和大恶霸。其家产由原来的六十石田扩充到了一千二百多石田，并开设了不少兵工厂以铸造枪枝。手下拥有二百多喽罗，曾先后抢来五名民女供姚恣意玩弄。姚大榜在湘西还有些“传奇”故事。据说他年过花甲后仍能健步如飞，有一次他和随从数人在路上看到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随从谁能去把狗捉来，随从们个个摇头。姚大榜二话不说，卷起衣袖，三步并作两步趋步向前，一会儿便把狗抓了回来，旁人见了莫不惊愕不已。

姚大榜深知“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石”的“道理”，他为非作歹，却不允手下人在老巢附近为非作歹，否则将处以极刑。他还在老家以“老辈子”身份“主持公道”，赢得了所谓的“声望”。他还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又博得了不少的称赞，而其实这不过是勾结各地土匪的据点罢了。

杀人越货血债累累的姚大榜深怀疑惧心理。他的双枪总是放在衣袋里，与人说话时也是手不离枪。一天他与一客商在一店内谈话，对方由于感冒，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姚大榜则怀疑他心怀不轨，立即掏枪将他击毙。事后还气愤地向别人解释道：“你们不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枪，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当众人抬起死尸，抽出衣袋内的手时，看到的不过是一方手帕，观者无不为之愕然。故而熟悉姚大榜所作所为的人们对他有一极形象的说法，称姚大榜“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

姚大榜另一特点是反复无常，这点在他和国民党关系上特别明显，即屡招屡叛，令国民党对他束手无策。

早年北洋政府即曾封姚大榜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大队长，但姚大榜却趁机扩充队伍，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

重操旧业；北伐军在贵州招兵买马时，姚大榜前去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但得了不少枪弹军饷后即回老巢“快活”去了；1934 年国民党为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但第二年其“匪性”便又复发了。国民党对他恼恨不已。

1940 年 8 月国民政府派出部队前去“清剿”，却屡遭失败。一天清晨得到情报的清剿队摸到姚大榜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不妙，顺手捞起一顶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支快慢机放在装满粪水的粪桶里，装扮成一老农走向寨外。没走多远清剿队队长便抓住他问：“老头，姚大榜在家吗？”姚大榜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一换肩，粪水溅到了队长的裤子，队长后退一步又问姚大榜在哪里。姚大榜用手指着一房子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清剿队迅即包围过去，将那房子团团围住。而此时姚大榜早已过了两条田埂，把粪桶一扔，掏出两支快慢机逃之夭夭了。清剿队进他家搜查后，只见到了他的一群老婆和女儿，队长问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们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立即下令去追赶，但为时已晚矣。

在晃县有一人使姚大榜恨之入骨，他就是湖南省参议员张本清。这位张本清早年曾任蒋介石的警卫团长及正规军旅长等职，后因反蒋才被迫回到家乡从政。他曾在晃县参议会上称其坚决反对土匪：“我不允许土匪们作乱，谁要作乱，我就杀了谁。”由此，晃县土匪一时不敢放肆，故而姚大榜视其为眼中钉，但在表面上还能和睦相处。1939 年姚大榜还得到过张本清的一次帮助，为此姚大榜开口闭口称张本清为“救命恩人”。然后张姚终有不可调和之矛盾，姚大榜杀念不绝于心。

1949 年 3 月 13 日是龙溪口赶场日，姚大榜派其亲信吴玉清带多人化装潜入龙溪口，意在暗杀张本清。没过多久张本清带一警卫来到街上，警卫去办其他事情，张本清一人来到小摊上买烟。等候多时的吴玉清向前喊道：“张旅长，你买烟。”张本清刚回头，身着

长袍的吴玉清对准张本清的太阳穴就是一枪，吴玉清的两个随从又窜出来补了两枪，张本清顿时毙命。吴玉清等人则乘混乱逃走了。

张本清死后，姚大榜实现了其称霸晃县的美梦，他带着其土匪"部队"进驻龙溪口，随即成立了晃县保安第二团，自称团长，并兼晃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和警备第一大队队长等职，达到了其土匪生涯的顶峰。

1949年冬，我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姚大榜之流的丧钟。为了阻挠我军解放湘西，国民党芷江警备司令、匪帮"复兴楚汉宫"的所谓"双龙头"杨永清于同年8月和10月先后两次窜到晃县同姚大榜策划，妄图扩大"楚汉帮"这一匪帮组织。姚大榜以晃县"楚汉帮"龙头大爷的身份与其聚谈，密谋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姚大榜任副总指挥，率其匪部隐藏在贵州玉屏的樟寨，以及玉屏、万山和晃县的交界地六龙山，伺机反扑。

与此同时，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姚大榜进行政治争取，他们利用姚大榜的救命恩人、晃县中学教员胡秀琐去劝其投降。姚大榜深知天下大变，其处境日趋困难，也产生过回心转意的念头。一次经过反复做工作，姚大榜表示愿意下山去见解放军有关人员，甚至抬他的滑竿也准备好了。因为姚大榜素来爱吃鲤鱼，村里有鲤鱼都要送给他尝鲜，正在这时一乡民给姚大榜送来了两条很大的鲤鱼，他边走还边喊着："姚公，鲤鱼！"狡诈多疑的姚大榜一见到这鲤鱼脸色顿时大变："妈的，鲤鱼上钩，歹的兆头。去不得，去不得。"就这样，他对解放军的政治争取和劝说均加以拒绝。

姚大榜的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思想颇为进步。他看到解放军进入湘西后，各地土匪纷纷落网，便数次劝说姚大榜不要再干下去了，应该放下武器以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刚愎自用的姚大榜见姚应科数次相劝，极为不满，眉毛一竖双眼瞪圆，露出了杀人魔王的面目，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虎不食虎子，今天我就吃了

你。"说完即掏出手枪开火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的一喽罗忙抬高姚大榜握枪之手，只听"叭"的一声枪响，子弹朝天飞去。姚应科一看苗头不对，慌忙逃命去了。从此父子分道扬镳，姚应科还暗中将国民党晃县县党部给姚大榜的二十四条大小枪支交给了解放军，自己到贵州教书去了。

1950 年春，姚大榜趁我解放军驻晃县部队主力前往怀化支援中心区重点剿匪之机，纠集了六百多土匪攻打晃县县城，被守城部队击溃。

同年 8 月 30 日，湘黔边界五千多名土匪蜂集于凉伞(土匪称之为"小台湾")，姚大榜出任"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妄图在此负隅顽抗。然而这帮乌合之众哪是解放军的对手，一战下来数千名土匪即被歼或被擒，姚大榜溃退至壕庆湾。解放军乘胜追击，在壕庆湾再战一场。至此姚大榜的人马损失殆尽，他的儿子、匪营长姚应金被当场击毙，他的老婆彭氏、女婿杨宗振和舅子龙永安等被活捉。姚大榜仅带几十名匪徒逃脱免死，在十家坪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在此偷渡过姚渡河，回到六龙山老巢继续与解放军相抗。由于解放军和我地方部队跟踪追剿，土匪们疲于奔命，饥寒交迫极为狼狈。12 月 25 日姚大榜在十里坪召开匪支队长、连长以上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对策。在会上他声嘶力竭地说道："我们好坏、死活就在这一夜，如能过河到六龙山，就有安身之所。大家要同心协力，成败就在此一举。"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的姚大榜说罢，竟从眼角里掉下了串串泪珠，半个多世纪横行湘西的威风早已不见了踪影。

脱钩的鲤鱼最终还是上钩了。

当晚 12 点，土匪按照事先的准备，开始偷渡姚渡河。其实这一计划事先早已为我方得知，在中共晃县县委书记杨建培的指挥下，十家坪的河对岸埋伏下了堵截姚大榜的部队和民兵。当两船满载土匪的船渡到河中时，埋伏部队立即开枪射击。土匪顿时慌作一

团，一只船调头回逃，姚大榜乘坐的那只船在慌乱中翻了，船上的人都掉入河中。第二天民兵从河里打捞起十多具漂尸，其中有一具挎着一支快慢机。经辨认，此人正是姚大榜！

（徐有威）

烟贩毒枭的覆灭



几乎贯穿民国始终的鸦片交易，不仅是一项能牟取暴利的“特种买卖”，它还与各种势力竭谋操纵军政财权的争夺纠缠在一起，郁结成旧中国肌体上百毒俱全的恶瘤。即便是对几个三流毒贩沉浮始末的解剖，也能写照那个时代的一面。

叶清和 尸骨无存

叶清和，福建厦门人，1898年生。自20年代初起在杜月笙支持下从事贩毒，先后在上海、厦门等地设立"和源行"、"和益行"、"和兴建筑公司"等机构，以代理德国五金颜料进口、建筑业投资的名义，大量批发贩卖波斯鸦片、海洛英，骤得暴富，旋又投资上海房地产、金融各业，迄国民党定都南京时，资产估计约六七十万元。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各省军阀为了进行争权夺地的内战，均秘密派遣代表长期驻沪洽购军火。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七师师长兼川边防军总司令的范绍增当然也不甘落后，1929 年至 1930 年间，范绍增派两个秘密代表到上海，因其中一名代表被巡捕房抓去，于是另一代表求助于与上海黑社会人物甚有交游的叶清和。事成之后，叶清和自然勾搭上范绍增。谈妥条件，进入四川开设海洛英制毒工厂。叶清和的投资主要用于在上海购买制造海洛英的化学药品和机器。制毒厂出品的海洛英装在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及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长方形的煤油桶内。冒充中药川贝送达上海，怎奈叶清和请来的技师技术没过关，生产出的海洛英只能算是次等货，运到上海后经受不住“竞争”，销路打不开得不到巨额利润，反而因贿赂海关人员而花掉不少钱。

重庆的制毒厂大约只维持了两年左右就关闭了，主要原因是范绍增兵败失势。靠山既倒，叶清和又收拾“行头”来到成都，在苦竹林江另起炉灶。本想大干一番，没料到却遇上了“黑吃黑”，对手是一凶残的军阀，将叶清和的药品、鸦片、原料、海洛英，悉数吞没，并以武力相威胁。这下叶清和算是倒了大霉。

入川开厂制毒，劳命伤财。叶清和回到上海，又于 1931 年底在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办起海洛英加工厂，聘用一日本技师。还在法租界筹设加工厂之前，叶清和已感到需要有个自己的亲信当技师，免得处处仰人鼻息，因此诡计多端的他派亲信窃得日本技师的先进配方，然后在 1932 年夏将加工厂迁至公共租界的虹口，辞退了日本人。上海加工厂复制出来的海洛英，质量大大提高，销路问题得以解决。其倾销地区，主要是华北、东北各省，也有部分远销到西北省份。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叶清和春风得意之时，上海虹口的海洛英加工厂突然被租界当局封闭没收，厂里的亲信爪牙几乎全被抓去。

这个"狗咬狗"的丑剧究竟是如何一回事呢？原来叶清和的得意引起上海滩上其他制毒厂的眼红，利益发生冲突。于是他们不惜花巨资收买公共租界的华人侦探队长陆廉奎下此毒手。陆廉奎曾经向叶清和敲诈一万元未如愿，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现在他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事发之时，叶清和正在天津，返沪后他马上托人找陆廉奎谈条件。陆谦奎断然拒绝，且声言老板既回来，正好逮捕归案。叶本来进出都有私车，这下受了陆的威吓，不能不起戒心，出门时不敢坐自己的轿车而改乘云飞公司的出租车。起初，叶清和仍然迷信自己在法租界的所谓靠山和势力，以为只要不进入公共租界，陆廉奎便奈何他不得，然而后来，陆却在法租界的中央疗养院里把叶抓走了。

叶清和托人找陆的同时，也曾经找过英国殖民者的上层人物，但帝国主义分子一方面看到叶的海洛英加工厂被封已为既成事实，为了标榜租界当局也是"禁毒"的，只好牺牲叶；另一方面，破获叶的海洛英加工厂的是华人侦探队长，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在走狗面前争受贿赂，有失"体面"和"尊严"，也只得让叶"委屈"一下了。

叶清和在上海滩混迹多年，凭着平素建立起的关系网，被捕没多时便获得保释，名义上是保外就医。获释以后，叶清和心有不甘，马上聘请当时的名律师章士钊控告陆廉奎敲诈未遂，"枉诬"他是制毒厂的老板，滥捕无辜。官司一直打到高等法院，一时也闹得满城风雨。可是叶清和并没如愿，几场官司下来都吃了败诉。这一来二去，前前后后所花费用竟有二十多万，这种官司打下去只会更伤财。叶清和唯恐重陷囹圄，便偷偷离开上海逃回故乡厦门避祸。时为 1933 年初。

1933 年叶清和回到厦门，正值十九路军的福建省政府掌握大权。利欲熏心的叶清和使出浑身解数拉拢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开设"五丰公司"，专门从香港走私波斯烟土进口。1934 年 1 月十九路

军的人民政府失败，叶清和马上变换嘴脸搭上了国民党“进剿”十九路军的东路总司令蒋鼎文。有一次，叶清和得知蒋鼎文进驻闽南后军饷短绌，蒋的总指挥部特派员公署要向厦门市商会借十万元，商会只答应借给四万元，协商数天尚未获得解决，叶就自告奋勇愿意报效数万元。这样，叶清和深受蒋鼎文的青睐。不久，国民党政府为了搜括“剿匪”经费，在全国实行鸦片“寓禁于征”的政策，鸦片公卖称为“特货”，归商人承包。在蒋鼎文的推荐下叶清和获得闽南经销“特货”的专权，1934 年 9 月组织成立鹭通股份有限公司。

叶清和大量走私贩运公卖的“特货”以外的私烟，攫取了巨额的非法利润，这主要依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当时，日本侨民在福建的势力日益增强，在叶清和看来只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两股势力做靠山，做毒品买卖肯定是万无一失的，然而他却忽视了另一股日益显赫的势力——军统特务。

1936 年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垄断全国的烟土买卖，搞了一个所谓的“禁毒法案”，规定要在两年内“禁绝”全国鸦片。军统特务寻找机会向叶清和开刀。不久，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以开会讨论“禁烟”为名，通知叶清和赴榕。临行之前，叶清和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但不去又不行，便找到鹭通公司的老搭档陈长福一同前去。有陈长福的保驾再加上进出都是以车代步，特务们难于下手。1937 年 6 月 9 日会议结束，本来，叶与陈决定 10 日凌晨 3 时启程返厦。可就在当晚 11 时许，叶清和却被军统特务秘密绑架了，这只能怪他爱嫖的恶习了。

6 月 9 日晚，叶清和认为会议既已结束，看来安全是不成问题的了，便如释重负地到堂子里去寻乐。陈长福也不在意，让他自个单飞。俟其乐尽归来正要进楼时，突然窜出几个特务。叶还没来得及喊出声，嘴巴已被塞进布团。绑架途中，叶急中生智，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名片，假装擦鼻涕的样子，走不多远就擦一次然后将名片扔到路上，好让陈长福追寻时找到名片作为线索。陈长福半夜醒来

不见叶清和回来，待到天亮开始着急，赶紧追寻但已来不及，只在路上拾到几张飘落的名片，陈长福判断叶已被绑架无疑。叶清和下落何处，是生是死，陈长福及叶家的人一直打听不到消息。叶清和犹如石沉大海，直到数月后才奇迹般地与家中恢复了联系。

秘密绑架叶清和的是军统谍报股。叶先是被关在福建省保安处，没多久被移送南京，并以公膏渗浆、破坏"特货"信誉、非法牟取暴利为名判处五年徒刑。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撤退，囚犯判刑十年以上的就地枪毙，十年以下的转移芜湖。运载转移囚犯的轮船在接近芜湖的江中遭到日机轰炸扫射，船头中弹沉没。这一弹非但没把叶清和炸死反倒救了他一命。当时，叶被安置在后舱，因他自小生长于鼓浪屿，水性极佳，船沉后与几个没被炸死的囚犯一起游上岸逃跑了。到了芜湖，同伴中有一个身上的衣角中还暗藏着五元法币，落难到此，身无分文的叶清和向此人借了钱，打电报给汉口的朋友求援，汉口的朋友给他汇去一百五十元钱。拿到钱后，叶清和租了一顶轿子由芜湖乘到汉口，才给家中发电报平安。那时家乡厦门已进驻国民党的广东军一五七师，抓了几个当汉奸的日台浪人枪毙掉，叶清和心虚不敢回去，便由汉口转道去了香港。

早在被军统绑架之前，叶清和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为走私贩毒打开方便之门，因而加入了日籍，入日籍的名字叫叶振声。并且到过台湾，讨了个会讲日语、懂得日文的第五房姨太太。这么一来，叶清和大摇大摆地做起了日本人的走狗。

从汉口逃到香港，叶清和起初住在薄扶林道，后来迁移盆咸道。凭借日本人的势力，在干诺道太子行内开设福兴公司经营进出口兼船务。广州陷敌后，福兴公司在广州西关设分公司，有十多艘轮船走港穗航线。不久，又在澳门新填马路(海皮新街)设分公司。所谓进出口贸易，主要是从香港运汽油及粮食入广州，又从广州走

私日本军用票到香港，从中赚取汇水差价。此外，叶清和还曾替日本人开设在厦门的新兴公司自越南采购大批粮食以应日军军需。

1940 年 3 月底，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撑腰下汪伪政府在南京登场。叶清和企图在毒业中心——上海东山再起，重抄旧业。于是赴南京活动，获得汪伪中央政府批准设立赌场。据叶清和自己说，赌场如能开成，可以兼营鸦片。此时上海烟、赌特权垄断在盛老三（盛宣怀之子，排行第三，人称盛老三）和汪少丞（杜月笙的门生，亦为流氓头子）手中，怕叶的赌场开设后，抢走他们已有的利益，所以百般阻挠。就这样，在沪开设赌场兼营鸦片的计划成了泡影。

1941 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叶清和接受日本特务之命赴广东的海丰、陆丰代日军搜购钨矿等军用物质。起先叶用棉纱与两地奸商在海面进行小规模交换。因海面上交易的危险性大，后改用汽车由陆路进入海陆丰附近交换。1944 年间，叶发现派去交换物资的职员暗中贪污，赚他的钱，这种事岂容发生呢？于是亲自出马想查个究竟，但这第一次出门就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捕获。

叶清和被捕的消息传到香港，他在香港的儿子叶顺义等托人四处活动，企图用金钱营救叶清和出狱。但是他们搞错了，这次抓叶清和的不是日本机关，也不是国民党机关，而是人民抗日武装，凭几个臭钱贿赂的旧伎俩再也无法行得通了。

1945 年日本投降，叶顺义由香港返回厦门决定到海丰、陆丰一带调查叶清和的下落。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终于得到消息，叶在胜利前夕已经病死了，卒年四十七岁，尸首埋葬何处，已经无从寻获。也许叶清和自己也没有料到，曾经风云一时的他最后就以充当敌人走狗的可耻下场而告结束。

（杨霞荟）



冷开泰 死有余辜

冷开泰，四川仁寿人。早年在丝行学徒，并投清军巡防营，由拜把兄弟引荐加入袍哥，并以参加民初川军哗变遭通缉，从此逃离军队，恃仗袍哥势力在四川“跑滩”，专以包运烟土、贩卖军火和结伙抢劫为“业”，成为川东著名的袍哥“舵把”，并在贩毒贩枪生涯中与长江中下游的帮会势力建立起广泛联系。

1932年，一身商人打扮的冷开泰混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旅客群里，悄悄登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此前不久，他因利欲熏心闯了大祸，居然劫了"四川善后督办"刘湘部下傅真吾的一批军火，由此遭来大队"官军"的痛剿。凭冷开泰的这点恶势力，欺压绅民作践地方有余，要同"官军"真刀实枪地干，还差远了。大军抵达之日，匪伙作鸟兽散，冷开泰自忖"名头"太响，无法再立足四川，便去投奔沪上川籍青帮头子邱伯垣。惶急之际，他不会想到，此行竟会成为自己由匪为官的一个转机。

由于过去合伙做过军火的关系，冷开泰抵沪后，受到邱伯垣的款待，上海"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也久仰其"大名"，纷纷出面热情宴请。冷乘机吹嘘四川袍哥的力量、军阀的威风，并炫耀其在袍哥中之声望，与军阀间之关系，那些"大亨"们对他更加见重。当时汉口"洪门"（沿海及南洋一带的哥老会组织）首脑杨庆山也在上海，邱伯垣与之介绍，杨非常赏识，邀他入"洪门"，称为"嗨大哥"。"嗨"是洪门中一种很高的称呼，相当于袍哥之称"大爷"。这一层新的"组织关系"，马上便显出了灵验：有个土匪出身的川军游击司令易吉三托冷开泰在上海购买一批枪弹，冷先靠上海青帮的协助办成了这批货，接着又拜托"洪门"沿途"关照"，竟得一路平安护送回川。此事在川军中传开，影响不小：刘湘也在上海私买军火，曾在途经万县时被杨森打劫一空。此外，南京、武汉两关为中央控制，不易通过。因此，刘湘为购运枪弹一事伤透脑筋。正当他一愁莫展之时，有人向他推荐冷开泰，刘的军师刘从云，将领潘文华、唐式遵等也表赞同。转眼之间，在逃犯成了大能人。

"督办"代表笑容可掬登门造访，冷二话没说承办了此事。他在上海托青帮购进枪弹，用法国兵船掩护装运，竟然平安地抵达重庆。刘湘大悦，马上委任冷开泰为驻汉办事处副官，就此以烟贩土匪修成了"正果"。从此，他专在上海、汉口一带为刘购买枪弹和运

销鸦片。由于办事得力，又被刘湘提升为宜昌办事处副处长，旋改调为四川航务管理处检查处长。

冷在宜昌工作一段时间后，回重庆晋见刘湘，刘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首任情报处长。情报处是刘湘的特务机构，主要工作是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处内的情报员均可单独行动，每人都随身携带一方盖了关防和刘湘私章的绸子，可凭以调动军队，逮捕“犯人”，并可向行政、税收机关支用银钱。此时的冷开泰，已成为刘湘跟前的红人。

1936 年，国民党在汉口举办“珞伽山军训团”，川军二十四军邹善成等一批中下级军官奉命受训，他们都知道冷开泰与汉口洪门首领杨庆山关系密切，特别请他专函向杨介绍。结果这批人抵达汉口时，洪门兄弟已在码头迎接，帮他们搬行李，送到旅馆，殷勤招待。当时规定，军人不能着全副武装进出舞厅等娱乐场所，但他们是例外，能够不按规定，毫无阻滞地玩个痛快。这些军官受训回来后说，冷开泰把沿长江一带都“吃通了”。

正当冷开泰得意洋洋之际，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被撤消，另设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他原任情报处长一职随之被免，没有另予任用。个中原因，据闻是由于冷开泰集土匪、袍哥于一身，又是情报处长，掌握了全川不少重要情报，军统方面通过青洪两帮极力拉拢。冷暗中投了新主子，为军统搜集情报。但刘湘手下搞情报的并非只有他冷开泰一家，不久刘湘便有所察觉。于是刘湘和其智囊团缜密磋商，决定以胡尚武接替冷的情报工作，把冷一脚踢开。不过因问题涉及军统，不便公开，冷开泰还能保住性命。以后，军统头子戴笠多次由重庆飞往西安、兰州等地，路过成都时，都极秘密地约冷到机场谈话，可见冷开泰继续保持着与军统的关系。

冷开泰下台后觉得无事可干，就利用自己与军阀、袍哥的广泛关系，筹组公司，从事经济方面的投机诈骗活动。

1942年他利用袍哥关系，在东胜街“沙利文”，宴请成都附近各地连峰码头的舵把子，邀约他们入股。大家碍于情面，每个码头当场认领二十万元，共凑成八百万元。随即在华兴街黄石子公馆内成立蜀和公司，设有董事会，冷开泰自任董事长。

当时四川省境内遍地土匪，常伺机劫掠滋扰运输队。冷开泰自恃与袍哥、土匪关系甚深，有向政府交涉承运销售的政治资本，于是随身携带巨款，亲赴重庆向财政部、粮食部、储运局等机构接洽活动。但他一夜赌博，竟输掉几百万元，把蜀和公司股本几乎输光。经过一番筹划，他与孔祥熙拉上了关系，几度磋商后，孔答应让蜀和承运粮食，并以制造五百部板车和预发运费为由，先行一次拨款二千万元。

冷开泰巴结到孔祥熙后，深感荣幸。1943年8月27日，孔子诞辰之际，这位自称孔子裔孙的孔祥熙亲到广汉孔庙祭祀“先祖”。冷开泰见此机会，立即前往巴结奉承，追随左右，与孔并肩而行，昂首过市。祭祀毕，冷又陪孔返回成都。此后，冷越发猖狂，不可一世。

蜀和公司有这么好的经营条件，按理可以日趋发达，可事实并非如此。因冷开泰惯于挥霍，用钱无度，又大权独揽，无人牵制，加以他要在东胜街修建新颖华丽的大公馆，更要拉钱开支，因此在1945年初，公司便现窘象，周转不灵。虽然他又耍花招，设法增资，可没人再愿意把钱往水里扔了。

不过冷开泰是个惯于编筐打条的人，在这种情势下，就不择手段地谋开财源。如成都干槐树街11号，是个扬州妓院，鸨母叫三姨妈，她从嫖客和妓女身上刮了不少钱，冷就特地登门造访，要她在蜀和公司存款，说了许多威胁利诱的言词，迫使三姨妈把积存的黄金六十两存入蜀和，结果烟消云散，本利都被冷吞没了。

尽管冷用了许多方法搞钱，还是不够开销，无法使蜀和局面好转。1945年腊月间，存户过年需钱，纷纷来取存款，公司无钱支付，吵闹不休。延至腊月二十九日，存户仍取不到钱，就对这位“冷大

爷"指名斥骂。三十日除夕上午，情况更趋严重，冷乃吩咐一些狗腿子伪装存户，渗入存户行列同来取款，借故吵闹，互相斗殴，拔出手枪要彼此轰击。存户不知底细，怕枪弹伤人，纷纷散去。这样，才度过难关，但从此蜀和信誉扫地，不久便关门了事。

冷开泰还先后开办过恒泰字号、西宁公司、汉华公司，都是昙花一现。

冷开泰虽然官场失意，商场惨败，但他对烟、匪、袍、特务等方面的活动迄未停止。

晚年的冷开泰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不便亲自出马拉肥抢人，但这是他发迹起家的老路，总是不能忘情。而当时的土匪拉肥需要有后台保险，才不致出事。冷在江湖上有"名望"，军政界有人缘，到处吃得开，自然被土匪们倚为靠山，他也乐于坐地分赃。如资中县的"财神"、商会会长彭积光被人绑票后，求庇于冷开泰。冷答应将"肥猪"移到成都外东赖家店窝藏，由他保险。结果勒索彭家付出巨款，只换回死尸一具。像这样残忍狠毒的事还有很多，纵有人知道，也不敢惹火烧身。

成都市长陈炳光集股筹建成都商业银行时，冷开泰入股五万元，过后他要求银行为他作担保向四川省银行借款一千万元，可到期后他却置之不理，逼得该行东拉西扯，代为其偿还。1946 年，米庆云接办成都商业银行，后又转顶与周嘉琛，把原有股款退还。冷无理取闹，要求退硬银元，银行对冷甚为不满，未予置理。他自知理亏，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派了几个兄弟将米庆云请到东胜街公馆，先用恫吓手段，要银行退银元。米据理力争，坚决不答应，冷开泰就耍赖，说："外面都说我的公馆漂亮，有钱，其实我是空的带了一屁股帐。你老兄在商场上有办法，这点钱你也不在乎，数目多少还可以商量嘛。如果你不同意，我那些兄弟伙要吃饭啊！"米知道这个大流氓是不要脸、不要命的，难缠，只好答应再付他二千万元。果然钱

一到手，他不再和李注东等股东绞在一起乱闹，对米出让成都商业银行的事毫无意见了。

1949年，国民党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准备组织武装开展“反共”的游击战争。由于冷开泰在袍哥中人头熟，第四期游干班班副骆绍芳找他物色袍哥参加，并把他的公馆作为活动中心，冷本人也受训，不过仅报到一次。到了第五期，冷又邀了更多的人前来受训，他被任以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之职。

那时军校存有各种新旧枪炮两万余件，还有许多军用物资，决定分批发给受训人员，组织反动武装。由冷开泰传达，叫受训人员各自回去尽量组织队伍，有多少人发多少枪。发枪前，军校先征询冷的意见，要他考核报来的队伍人数是否确实以及这些头目的号召力如何，遂使大批想拖队伍当官领武器的人竞相奔走于冷开泰之门。

成都解放前夕，冷开泰还执迷不悟，坐着吉普车亲往成都附近各地与反共游击组织密商对策，以图抗拒解放和破坏解放后的建设事业。成都解放后，冷拒不自新，暗中策划各地暴乱。如崇庆巨匪李泽儒于1950年以新十二军独立团团长的身份率众暴乱。还有曾作刘兆黎部团长的蒋镇南，在川北纠集万余人，对抗解放军，被迫起义后，又复率众暴乱。这些都是冷开泰设计出策造成的。他还写信指示各县土匪、袍哥首领，说要齐心合力，消灭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要像瓦岗寨平隋乱那样，一齐动手；要大家出动，把川西南联络成一片，在1950年农历除夕那天，一齐暴乱等等。结果约有十六个县发生暴乱，其中有些是冷直接指挥，有些是受他的影响，附和蠢动，致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建设，遭受莫大损失。1950年政府逮捕并处决了这个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为民除了害。

当他被镇压时，围观群众都说：“太便宜他了！”

（唐若豪）



命丧安阳城

郭清，字井泉，河北临漳人，1906年生。地主出身，自小染上赌博、偷窃恶习，30年代初因破产逃债拉起杆子，渐成气候，成为活动于河北临漳、磁县、成安、魏县及河南安阳、内黄一带流窜打劫的著名匪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南逃。郭清趁机设立据点,很快收罗了地方民间枪枝六七百支,并联合其他几股土匪,成立土匪总部,郭清自称司令。

自郭清成立土匪武装后,临漳县各个村庄以及邻近各县便深受其害。他派人到处派粮要款,不给就抢。郭清土匪武装里的每个成员,抢劫、讹诈百姓都是好手。

1938年4月的一天,郭清的土匪武装闯入成安县的东范町村,抓人、抢物、要枪。这一次抓走三十多人,搜走枪枝四十多支,抢牲口三十多头,大车二十辆,劫得的财物不计其数,对绑架的"肉票"以人定价,拿钱赎人。有一家五口被绑为"肉票",因无钱赎人,被毒打后,全被活埋。有些人变卖家产,凑够赎金,才保全性命。抢来的民妇全被奸污糟蹋。

同年初夏的一天,郭清手下一位营长奉命带领十几名匪兵,到临漳田村讹诈枪枝弹药。一位农民抗拒不交,土匪便把他及其儿子枪杀,并把这位农民不满周岁的小孙子摔死,撕成两半。当地农民目睹惨状,个个惊恐万分,只好破财保命。有的买枪、买子弹,有的拿出大洋交给郭清,这才算了事。

从1936年到1946年,土匪郭清部活动频繁。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利用土匪武装,成立了"安(阳)临(漳)特别警备司令部",郭清任副司令,他还兼任临漳县日伪二、三区区长,这样,郭清由土匪变成了汉奸。1943年5月,日军又把郭清部编为"冀南剿共独立旅",任命其为旅长。郭清受编后,按旅的编制,大肆扩充军队,向各村摊派兵员、军饷,购置了汽车,大量的轻重机枪,设立了两个团、一个独立营,人数达到二千二百多人,势力迅速膨胀,控制范围以临漳县贾河口为中心,东到魏县城以西、广平县西南乡,西到临漳、磁县边界,南至漳河,北到成安城南,方圆八十里。

由土匪变成铁杆汉奸的郭清公开与八路军为敌。他怀疑大营村一位农民是共产党员，于是把他抓到贾河口一棵树上吊打了八个小时，直打得皮开肉绽，绳子陷进肉里，露出了白骨，到人快要死的时候才被放下。他怀疑贾河口一位农民私通八路军，就把他反捆双手吊在树上，用沾水的皮鞭抽打，打成半死然后把他活埋。郭清还杀害了女共产党员、魏县妇联主任王婉贞和八路军南下支队第四队队长郭度华同志。

据 1946 年不完全统计，郭清仅在临漳、成安、魏县三地就残害了七千多人。

郭清还是个大毒品贩。他同一些大毒品贩都有来往，并且凭着手中的土匪武装，包庇、贩运鸦片等毒品。1940 年夏的一天，郭清带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护兵到一大毒品贩那里，带回几包白粉，然后按一两一百块大洋的价格卖出去，得四万块现大洋。

1942 年 6 月，郭清带了几个护兵到北京，住了近五十天，同一些大毒品贩联系，贩卖毒品。郭清不仅自己时常亲自外出贩卖毒品，而且还派人常住北京、天津等地，购进白粉、红丸、鸦片等毒品，然后将这些毒品高价分销出去，牟取暴利。

从 1942 年春起，郭清还在他管辖的二十多个村庄强迫农民种大烟，每年种植一千亩，一年收“烟土”六七百斤。此外还从烟土产区大量低价收购，一部分直接销往外地，一部分由天津请来的技师加工，然后出售。

日本投降后，郭清又投靠了国民党，所部改编为“安阳人民自卫队第二总队”。他害怕在漳河以北被八路军消灭，于 1945 年 10 月率领所部约一千五百人离开他盘踞多年的贾河口，撤到漳河以南的柳园，并多次组织还乡团越过漳河，残杀我农会干部及进步群众。

1947 年春天，晋冀鲁豫解放军发动了豫北战役，先克柳园，直趋安阳。郭清率部溃退到安阳城内。5 月底，解放军主力部队撤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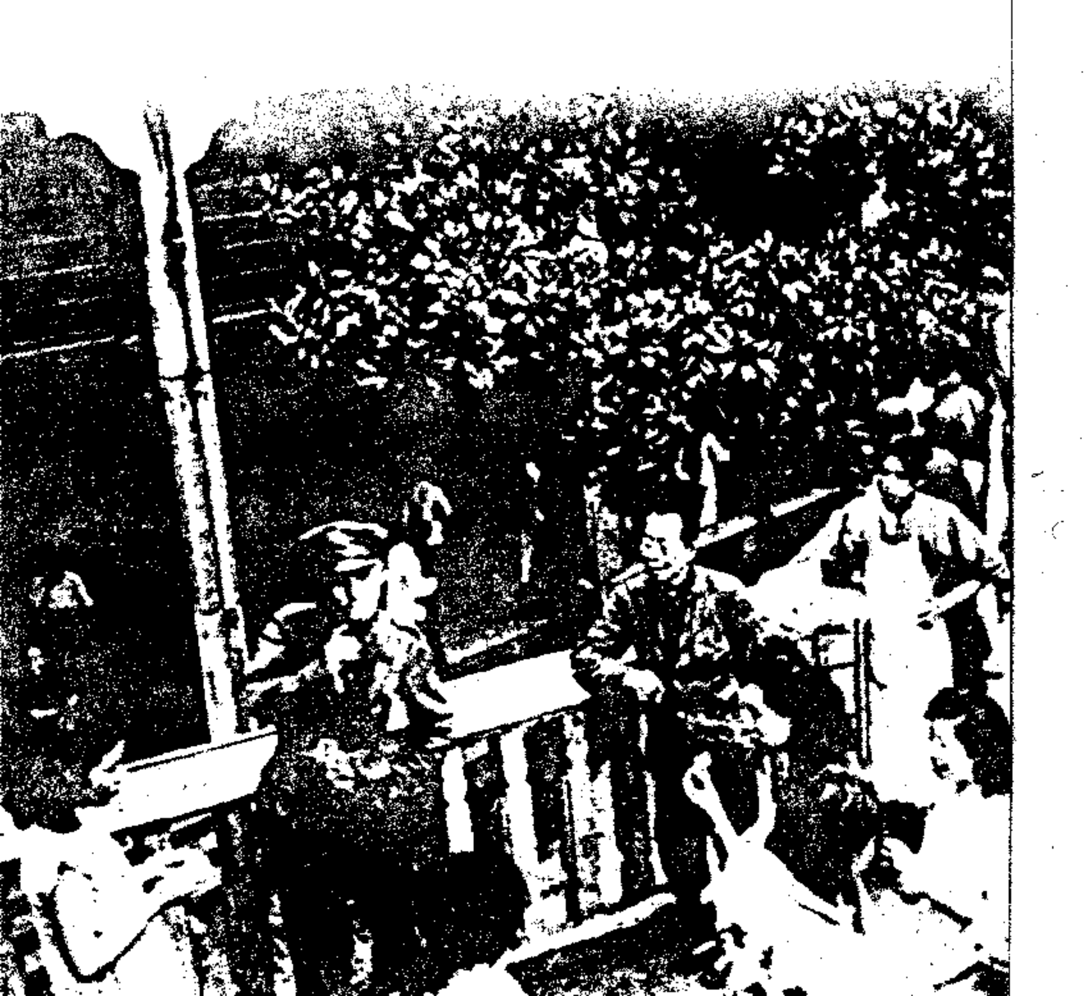
战斗，安阳城改由地方部队进行围攻。在围城期间，我方曾派人三次进安阳城争取郭清投诚，但郭清顽固不化，最后翻脸，使前去做争取工作的人几乎有去无回。由于"反共"坚决受到国民党赏识，郭清又被提拔为蒋军三三七师师长兼冀豫边区清乡剿共指挥部副总指挥、安阳城防司令，反动气焰甚是嚣张。

1949 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后，华北地区基本解放，只剩下太原、新乡、安阳三个据点仍被国民党军队盘踞。这时驻安阳的有多股地主武装及冀豫边界地区一百多个县的国民党流亡政权。安阳城里的土匪、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地主、富农等达到了三万多人。这些人在蒋家王朝这座"大厦"即将瘫塌的时候，还甘心充当炮灰。他们凭借安阳城坚固的城防工事，继续负隅顽抗。

1949 年 4 月，我第四野战军第十兵团，围攻安阳，在扫清外围据点之后，于 5 月 5 日开始攻城，6 日晨突进城内，8 时左右，全城解放，共歼敌二万九千多人。郭清在我军突进城内后仓皇逃至东门，受到阻击后，又向南逃窜，被我军包围。他自杀未遂，后被解放军击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黄寿东）

坛主道首的结局



五花八门的民间秘密结社，是民国时期遍布乡野市井的一大畸观，林林总总的会坛道门流品复杂，宗旨互异，社会影响也大相径庭。本章摭拾数例，权具管窥而已。

一贯道首送命真相

张天然，又名张光璧，山东济宁市人。为民国时期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总道首、“中华道德慈善会”会长。30年代，他将局促山东济宁一隅的一贯道逐渐推广，成为全国最大的反动会道门。

1947年4月,杭州西子湖畔的陵园里,随着吹吹打打的哀乐,几十人的孝眷、分成两列,跪在地上,呼天抢地。披麻戴孝的孝子已欲哭无泪,只是在干嚎。数百人的吊唁者中,有西装革履的政客、有身着美式军服的将军。灵台之上,摆放着一具楠木棺材,两旁站着守灵的国民党校级军官。在重叠的花圈挽联中,一副挽联最引人注目,上书:"张天然先生千古,蒋中正敬挽。"

这张天然是何许人物呢?

一贯道,原称"达摩",起源于山东省济宁市。传至十七代祖师路中一时,路以"三教合一"、"万道归一"而改称一贯道。1925年路中一死去,其妹路中节掌道,此时她手下有三大弟子:张天然、郝宝山、孙素贞,但办道数年,仍无进展。1930年路中节又一命呜呼。狡诈的张天然早已与孙素贞勾搭成奸,他俩合谋,将郝宝山赶走,由张天然独掌,自号"济公活佛";张纳孙为妾,称孙为"月慧菩萨"下凡。

张天然总结一贯道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是局促于济宁一地,二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为扩大一贯道,张天然制定了计划,首先是立足济南,然后依托华北,布道全中国,以一贯道统治天下。

于是,张天然与孙素贞先在济南创设金轴、敦仁、礼化、天一四个大坛,并大力发展道徒,再培植一批道长、前人、点传师向外扩展。1934年,张、孙来到天津。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对华北虎视眈眈,张天然利用民众害怕战争、动乱和迷信心理,胡说中国面临大乱,为"三期末劫",人们"在劫难逃"。只有"修仙入道",才能平安,而且一人入道,不但本人可以修仙,连祖宗三代均可"超拔","成佛成祖"。对现实厌倦、绝望的民众,正寻求精神上的"世外桃源",而一贯道的说教正迎合了这些走投无路人们的心理,于是,一贯道迅速在北平、天津打开了局面。

张天然自有一套特殊的点化骗术。其欺骗百姓的主要手段是“飞鸾宣化”，也就是扶乩。先是特选三名文化程度较高、眉清目秀的少男少女道徒，作为“三才”(天才、地才、人才)。“三才”必须经过道首和点传师的严格训练，既要熟记《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又要能背诵道书训语。其中的“天才”还要练熟“闭目横书”的障眼之法和装神仙入窍附体的骗人本领。开坛时，“天才”在沙盘上挑字，结合事先已私下打听清楚的地方情况和谋求入道之人的家事，写出合仄押韵的“训语”，再由“地才”记录，“人才”报字，使求仙者在惊奇之中对仙佛来人世“普渡三曹”之类深信不移，从而纷纷捐献功德费要求入道。当然，张天然着重吸收的是殷实富户、巨商财主，因为他们大有油水可捞。其主要诈骗手段是“普渡三曹”。“渡人曹”即劝人入道，入道者需交纳功德费，数量不限，越富越多交。“渡地曹”是超度亡灵，给鬼接“缘”。“渡天曹”就是“渡大仙”，是说天上神仙也要求道，神仙入道需引仙入道之人拿功德费；而且因为是“仙”，功德费要以黄金白银计算。一贯道通过“普渡三曹”诈得钱财无数。张天然一次“渡大仙”就带走功德费一万五千万两黄金。这些钱财大多落入道首点传师的腰包。张天然由此过着奢侈生活。各大城市均有他的行宫(总坛)和房产，所蓄古玩珍宝多到无法统计，还有成套皇帝龙袍。

正当张天然图谋大举发展时，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张天然不愿逃往毫无根基的西南，而对惊慌不已的孙素贞说：“我们一贯道主张‘万教归一’，宣扬儒释思想，日本人也非常重视神道儒佛。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我们从未反对过日本人，日本人也得利用我们，这不比我们南逃做难民要舒服百倍。”果然，日军侵占中国大片土地后，除用武力镇压占领区人民的反抗外，也需精神鸦片来麻醉民众，维持统治。于是他们看中了一贯道。

这下，张天然神气起来，带着孙素贞往返于日军各机构之间，商议在日军占领区发展一贯道，配合日军的统治。汪伪政权成立

后，汪精卫聘请张天然担任“外交部”顾问。张之干将、济南敦仁道首郝书暄出任伪山东省教育厅长。为充分利用一贯道来麻痹落后民众，接着，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上海市长周佛海等大汉奸亲自加入一贯道，褚担任点传师，周为坛主。这样，一贯道被定为汪伪国民政府的“国道”。他们按照日本主子的旨意，在原来的骗人说教之外，又加上了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王道乐土”、“东亚共存共荣”等内容。

张天然办了许多收徒纳众的训练班，如“三才训练班”、“忏悔班”、“仙佛研究班”等。1939 年 2 月，又在北平主持所谓的“顺天大会”，培养了一大批点传师、三才、坛主等*，然后派他们去西北、奔东北等地布道，发展道徒，配合日伪的统治，张天然把这叫做“开荒下种”、“广渡原人”。在八年抗战期间，一贯道徒竟达到一百万人以上，成为势力最大的会道门组织。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沦陷区人民纷纷控诉一贯道勾结日伪、残害百姓的罪行，要求政府取缔这个“一贯害人道”。国民政府将张天然拘留审查，并查封了一贯道的佛坛。这下一贯道上下慌了手脚，纷纷出动施展手段，予以搭救。张天然的妻子刘率贞和他儿子张孝骞以巨款向戴笠行贿，戴答应在蒋介石面前说情。张天然的小妾孙素贞更是由政界的道徒引路，到南京找到蒋经国，哭诉张天然并非真心降敌，而是在沦陷区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以便与蒋委员长里应外合收复失地，但没想到，汪精卫、周佛海等大汉奸混入一贯道后，败坏了该道的声誉。然后，孙素贞话题一转，表白说：“我们生怕共产党将来坐大，发展了百万道徒，等着委员长来整编，专门对付共产党。”

---

* 一贯道道员的职级分为：师尊（张天然）、师母（张妻刘率贞、张妾孙素贞）、道长、老前人、前人、点传师、坛主、道亲（即道徒）。点传师以上者，可带职业办道人员，即“三才”（天才、地才、人才）。

蒋介石与蒋经国认为像一贯道这样分布广泛、道徒众多的会道门，是反共的天然盟友，于是，蒋介石立即释放张天然，并与其达成密约，将一贯道改组为"中华道德慈善会"，一贯道指挥中心由济南迁到成都，要求道徒配合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区煽动暴乱。这样，一贯道改换门庭，又投靠了国民党。张天然仅在拘留所呆了七天便出来了，他得意洋洋地说："一贯道是不倒道，是全国第一大道。咱们过去供奉日本天皇，现在是供奉蒋委员长，不论是谁，都得利用咱们。"

一贯道改称"中华道德慈善会"，并在南京、上海设立总会，总会门前挂着国民党的旗帜，佛堂内既挂"仙佛牌位"，又挂蒋介石头像。正当张天然全力拓展势力，协助国民党反共之时，不料，后宫起火大乱。原来，张原配刘率贞生有长子张孝骞。张后来拉拢孙素贞，坐上第一把交椅，且孙为一贯道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为第二号人物，但却只能屈居二房。1946年，张天然将华北、东北的道务移交给儿子，并准备让他接班，这引起孙素贞的不满，孙曾当着张孝骞的面，大骂张天然说："一贯道不是张家的家产，也有老娘的一份。想当初，若没有老娘的支持，你能当上道首吗？我看你是活够了。"

为对抗张天然的"父业子承"，孙素贞在道内发展暗线势力。而张天然也开始对她防备与疏远，而与儿子张孝骞日益亲密，并且因为儿子的关系，与原配刘率贞的关系也热乎起来。孙素贞预料，迟早有一天张天然会逼她交出道务，她可不是等闲之辈，岂能就此认输，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毒死张天然。

于是，张天然这个罪恶滔天的一贯道道首，被其小妾毒死了。而孙素贞这个一贯道的"月慧菩萨"，在解放军南下的号角声中，仓皇逃亡，逃至东南亚，最后客死异乡。

（苏智良）

天门会主被害记实

韩欲明，原名韩根子，河南林县人，本业石匠。相传他和同伴在太行山采石时，获得旧时巫师所用石印一方，上刻“灵宝大法师印”六字，因此趁机发起具有迷信色彩的“天门会”。自任文团师（会长），倡言替天行道。1924年秋，韩欲明率领“天门会”武装抗拒林县民团“进剿”获胜，其后在向山西、河北的“传会”活动中，又相继战胜晋军和奉军，声威大震，会众发展为晋、冀、豫三省边区的二十余万人。旋以林县城关为据点，正式委派了林、涉、辉三县县长，恃险设防，形成太行山麓的农民会党武装割据局面。

1927年春夏，“天门会”进入鼎盛时期，并派代表出席了在武昌召开的“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但其政治纲领和组织模式依旧停留在会道门水平上，设在油村“文帝上神”庙内的总坛被会众称为“金銮殿”，成群结队前来“朝圣”者络绎不绝。“真龙天子”韩欲明头上盘着小辫，穿带襟小袄，束腿裤，部下三十六个核心成员的名字中都嵌一个“欲”字，暗含天罡下凡、同保会长之意，似也难以跟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时代潮流。

“天门会”的气候引起了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的注意。最初，冯想将这股力量纳入他的轨道，派了个参谋刘文彦去林县洽谈收编。刘的军阶是少将，下油村访“总坛”已算屈尊。孰知“真龙天子”派头更大，让一位前清秀才郭厚斋冒名出面，自己假充侍从。刘高参直言是奉了冯总司令的命令，来收编“天门会”。郭未及答话，韩欲明一旁就说：“收编我，我不知想收编谁呢？”刘文彦哪会想到这一身土装的老冒就是“天门会”会长，当时便斥道：“我与你长官讲话，哪有你这个勤务兵乱说乱道的？”

“我不但要说话，还枪毙你呢！”韩欲明昂然答道，说着，叫一声“来人”，马上把刘高参捆起，拖出去枪崩了。

这一下，可把冯玉祥激怒了，遂于1928年初春，派庞炳勋统率两师人马攻打“天门会”。

韩欲明侦知庞师进攻林县的消息后，除令驻在马店镇、科泉镇原有基本会队加强防守外，又火速调集安、林、辉等县武装会队数千人前来增防。这些武装会队平时既无训练，又无军事知识，更不懂什么战略战术，所凭的就是“天皇皇，地皇皇，四大金刚来避枪”等所谓刀枪不入的几句“咒语”，乱哄哄地驻扎在安、林交界处的几个村庄里。

当庞师进攻韩部第一道防线铺岭时，天门会故伎重演，基本会队走在最前面，直身持枪进行抵抗，前仆后继，死伤甚众，不过因作

战勇敢，庞师也伤亡了不少。激战三天之后，防线被破，其他人看看情形不妙，纷纷溃散。庞师乘胜追击，逼近韩欲明的指挥部马店镇。天门会不支，路欲殿、韩欲雷等率领基本会队败回林县城保护韩、郭等要人退往太行山(离林县城十五里)的桃园沟。天门会战败的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村坛即自行撤消，文帝上神牌位也被暗暗藏掉，所有天门会标志一概烧光，谁也不敢说自己是天门会的人。

桃园沟地形复杂，呈长三角形，外宽里窄，两边山崖陡立，壁高百丈，无路可通。黑龙潭间有一条仅容单人行走的羊肠小道，易守难攻。第二道险要是高百米、陡七八十度的水梯，上下两层，只能由梯往来，别无它路，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险。韩欲明退到那里后层层把守，严防庞师进攻。

庞师堵住桃园口后，几次三番攻击，都无功而返，反倒被天门会居高临下，冷枪伤了数人。当然韩部也无法轻易下山，白天他们活动仅限于里沟一带，到了晚上，借着人地熟悉，由一二层上的小路往南绕到位于桃园中南约二十里地的花园梯附近下山，那里没有庞师驻扎。他们事先拟定好向土豪官绅派粮要款的名单，然后派人下山，把写着所需物品清单、交货地点、期限的纸条塞人该家门缝，赶在天亮前回山。到了期限，被派款或物品的人就会乖乖地按数送到指定地点，谁也不敢违抗。因此，桃园沟里虽驻了千把人，可在半年时间里，倒也不愁吃穿用度。

庞炳勋眼见单方进攻无效，便会合晋军夹击。晋军在西面山上用大炮往下轰，庞师由东向上攻，使“天门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冯玉祥、阎锡山，两个堂堂集团军总司令合打一个出自乡土的采石匠，纵然胜之不武，但声势可够吓人了，是以“天门会”虽然还未受损失，内部先乱了套，人心惶惶，有主战的，有主逃的，争论不休。韩欲明为了安定人心，不使基干失散，经与郭金花等主要人员商议决定派人下山请求收编。不料所派二人被庞师扣押。韩军众人眼看收编无望，决定暂时各奔前程，分散离开太行山。郭金花一

面派亲信到沈阳，面见其友东北交通旅旅长，请其预备秘密住所，一面连夜从小路往外疏散会众，只留精壮者五六十人。

9月某日后半夜，月黑风高，韩郭等率精兵往北绕到桃园口北面约十里的黄华口。在四更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冲到庞师把守黄华口驻军地点的口头村(逃出黄华口的必经之路)，砍死守卫三四人后向东北逃去。待该营长知道，韩欲明等早已不知去向。庞炳勋获悉，即令桃园口守军往里进攻，一无所获，只得将把守黄华口不力的营长撤职了事。

韩欲明脱险后，将大部会众化整为零，分别潜入林、安、涉各县农村，插枪隐蔽，等待时机，他本人带同姓弟兄及侄子各一人，连夜赶赴沈阳，投奔张学良，同时不断派人与旧部保持联络，以图再起。

韩欲明在沈阳很受张学良的优待，许多高级将领都来他住所探望谈话，东北的各项庆典也都请他参加。这段期间，韩欲明的见识长了不少，过去他总认为识字的没好人，现在才明白没有识字的人合作，干不成大事。他应邀观看东北军演习受阅，感触很深，想起自己所以失败，就因为光恃人多，但无组织无训练，打仗像一窝蜂，胜则一拥而上，败则一哄而散，实在可笑。从此，他不许亲随再提什么“真命天子”了，并改名韩复生，意思是以前只当死了，今后有如复生。

1929年，石友三反蒋失败，退至河南，设后防司令部于新乡，司令李逢春。豫北一带又成混乱局面。躲在太行山附近的天门会基干跃跃欲试，想重整旗鼓，便派人前往沈阳请韩欲明出山。

韩欲明带着几个东北失业军人一起悄悄回到林县，住在太行山麓的云峰寺，招纳旧部，同时出榜安民，表示今后要为乡梓立功，再也不搞设坛拜神之类的迷信活动。时间不久，旧部云集，汇成一支上千人的队伍。他也不当“文坛师”了，自命游击团长。

韩欲明的复起，惊动了周围各县官府豪绅。安阳、汤阴等七县官府召开联合会议，决定组成剿匪司令部，趁韩羽翼未丰，加以扑

灭，公推杨寿彭、李锡三为正副司令。

杨、李招集民团近千人，直逼云峰寺。韩复生得到消息，马上派基干三四十人，乘民团在姚村东南某村休息时，猛冲下山。民团毫无防备，竟被打乱，一群乌合之众纷纷向东逃跑，杨、李二人带头跑回安阳，剿匪队伍不解自散。从此，官府士绅再也不提剿韩之事。不久，韩欲明被林县代县长李叙镜请回去，林县很快又成了“天门会”的世界。据说他是身穿西服、头戴礼帽、脚登皮鞋，一派绅士风度出席“欢迎大会”的，非复当年土老模样。后经人介绍，韩与李逢春接上了线，李代石友三委任韩为旅长，不过管编不管饷。团级编制升为旅级编制，兵员不足，便有“天门会”旧属冯贵德和范义各带人马前来投靠，都被委作团长，但士兵大都是徒手。为了补充武器，增加实力，他们设法收编林南土匪王德荣，委以独立营长，王匪进驻林县南关时，尚带“肉票”七十多张，都押在南关山西会馆石圈内，后来得赎款购枪。另有一巨匪王振国受封后住在北关。这两股土匪在当地强买硬占，扰乱市场。当时城关暗暗传说：“南关独立营，北关独立棚，一只吃人虎，一个伤人熊。”南关是林县的繁华市场，可人们走到独立营前，谁也不敢斜视一眼，生怕惹出是非。时间一长，韩欲明大失民心，但他这时的实际势力已经在王、范等人之下，也无可奈何。

眼看韩欲明势孤，林县官府马上又密商大计，决定趁机剿绝“天门会”。县北各区因尚在韩的势力控制之下，主张另谋善策，于是县南三区的官绅即在会后另行协调，联名写信吁请驻新乡之第十一路军刘茂恩“进剿”。不久，刘茂恩派出刘惠心旅开赴林县，驻在城关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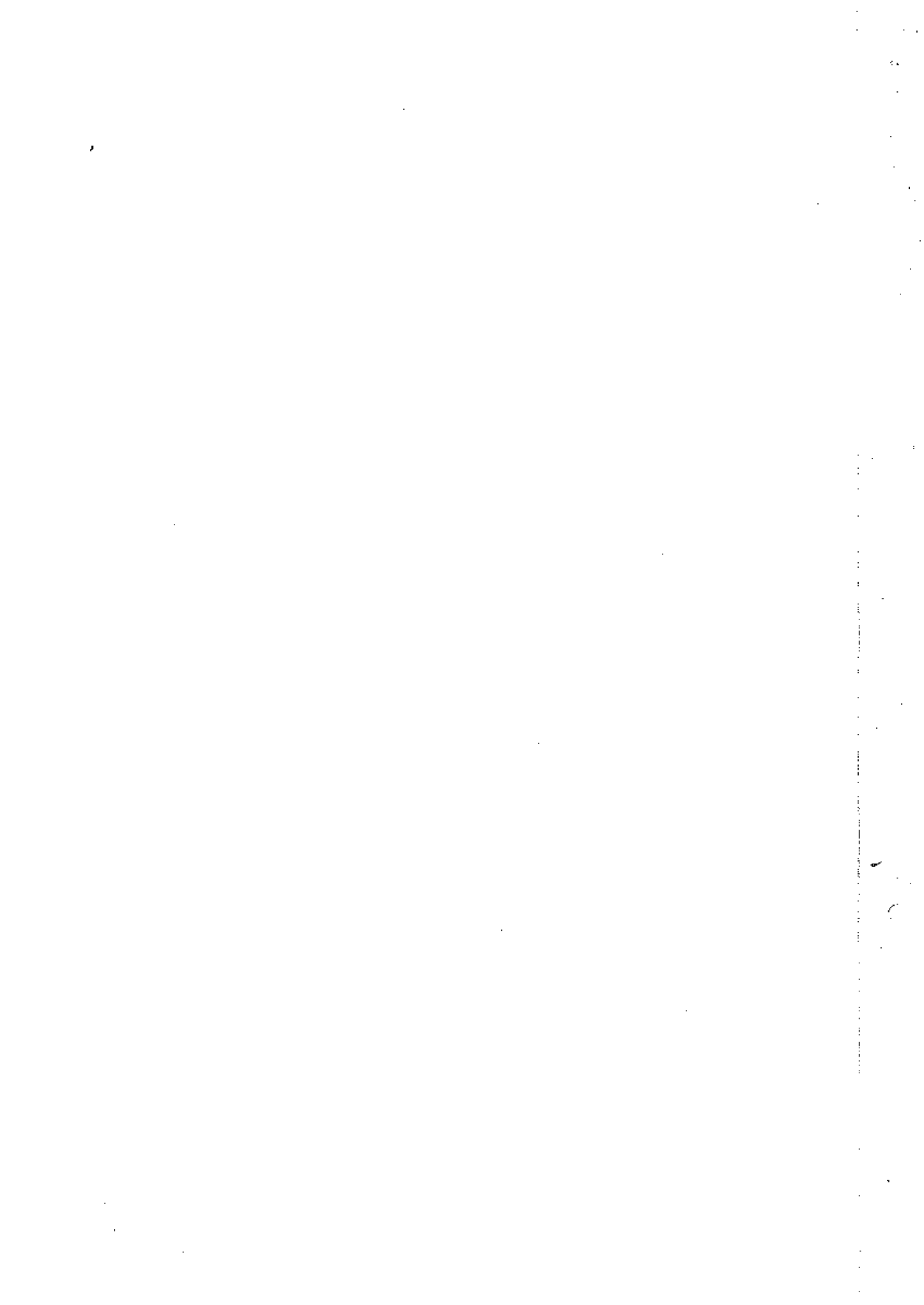
刘茂恩、刘惠心鉴于庞炳勋专用武力进攻的失败，决定变硬为软，设计招抚，以期一网打尽。当招抚的风声放出后，刘惠心即派人到合漳村面见韩、冯，晓以利害，允许由省方委他二人任林、涉二县民团大队长。县大队长官虽不大，有守土之责，不易外调，不但合乎

韩、冯二人在地方容易发展的理想,也合乎他们部下在地方容易发财的要求,经多次磋商,二人才欣然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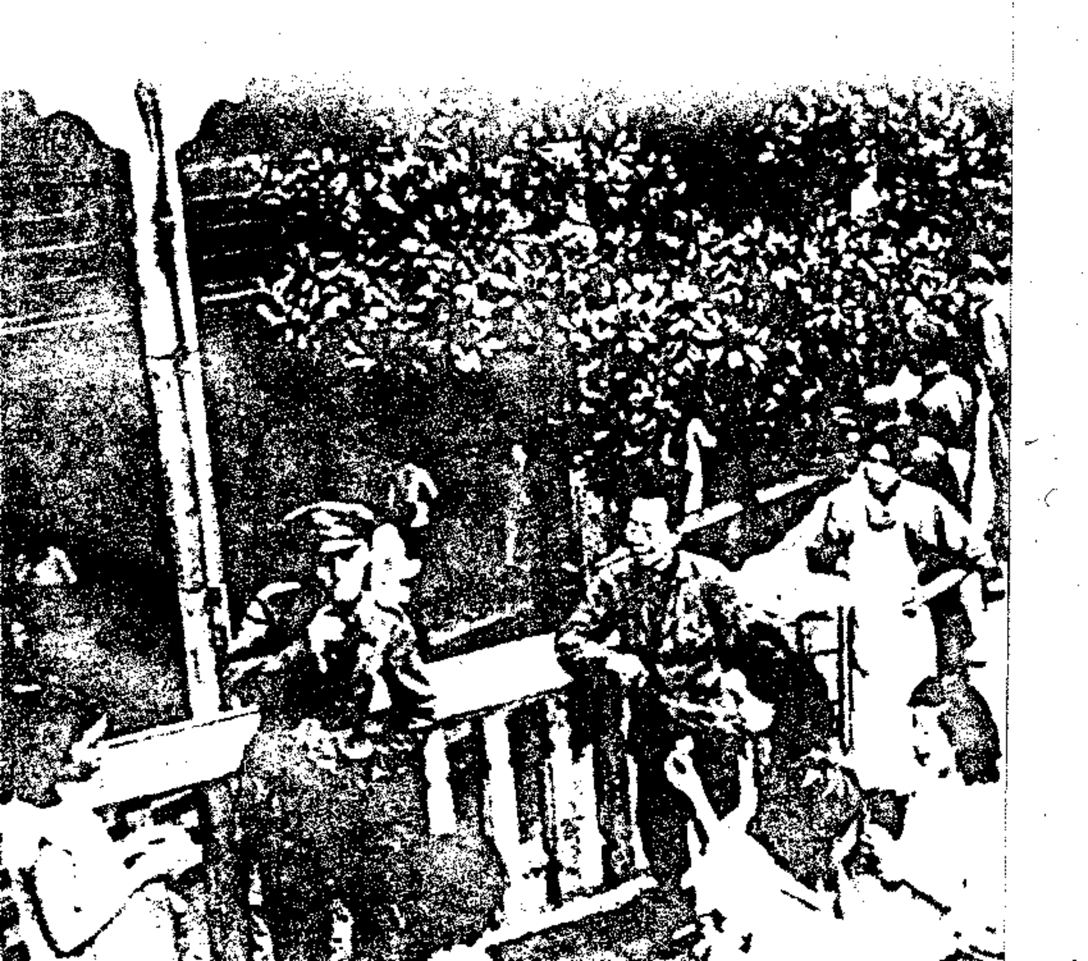
韩、冯二人第一次进林县时,刘惠心派专人迎送,盛情款待,使韩、冯根本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当他们第二次去林县接任民团大队长时,刘惠心早已在城关和旅部附近布置好便衣武装。防备军机不密或发生意外致使韩、冯逃脱。在旅部当天的午宴上,刘惠心掷杯为号,便衣一拥而上,将二人拿获,钉镣收押。在缴他们卫队的枪时,双方发生巷战,结果韩、冯部下全部被俘。韩部有名的团营长韩欲雷等六人在东门外被斩首,其余连排长十几人一律枪决。韩、冯二人则连夜派重兵押解往新乡,在旧车站西沟处死。

韩欲明遇害后,"天门会"余部啸聚安阳西北清凉山,推戴韩的侄子韩欲立为首领,王振国为军事指挥,图谋再起,但最终被林县保安大队长慕中岳率部于1933年旧历八月消灭。据慕中岳回忆,当时他们又恢复了过去那一套,如以韩欲立为"皇帝",王振国为"大将军"等,看来比"韩复生"又倒退了一大截。至此,威震林县十年的"天门会"归于沉寂。

(唐若豪)



呼风唤雨的名猾巨骗



大骗隐朝，小猾隐市。一个地摊郎中能掀起市场朝云暮雨；一个江湖术士能搅得虎帐柳营烟笼雾障；一个乡村土佬能逗引南京政坛团团打转——本章专给藏头露尾的民国高级骗子画像。

“大滑头”台前幕后



黄楚九，名承乾，以字行，浙江余姚人，1872 年 4 月 9 日出生。黄家世代行医，1887 年春，黄父殁后，十五岁的黄楚九随母亲来到上海，就读于清心书院，旋辍学随母行医售药，从此驰骋商界几十年，成为风云上海滩的“两个半大滑头”之一。

黄楚九的起家，从城隍庙得意楼前摆药摊开始，专售四神丸、圣灵解毒丸、明目菊花散等自制膏药，说是悉按祖传秘方精制而成。同时，黄楚九还以免费问病招揽顾客。一时之间生意竟十分兴隆。没多久，也算是小有资产了。

上海滩有钱就好办事，黄楚九与母亲合计，在三马路（即汉口路）租得石库门房子一间，正式开设中药铺，取名"异授堂"，意指其父知异公在天之灵所授，1890年，黄楚九亲自选择黄道吉日，将"异授堂"迁至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改名中法大药房。他运筹帷幄，苦心经营，仅一年工夫资本就增为一万元，其后药房几经搬迁，不断向闹市中心地段逼近。1893年初，中法大药房落户三马路湖北路蓝桥总会隔壁，生意越做越大。

经营药业多年，黄楚九早已不满足于经销人家生产的药品，巴望能推出赚大钱的本牌新药。

要在短时间内凭空造出一种新药谈何容易！黄楚九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拚命地"动脑筋，绞脑汁"。1905年，黄从药剂师吴坤荣手中觅得一张安神健脑滋补剂处方，于是便灵机一动，决定按此方制销补脑汁。这本是一份普通安神健脑滋补剂处方，为了使其具有"奇妙"之功效，黄楚九费了一番心思。19世纪后期的上海滩，舶来品充斥市场。黄利用人们的崇洋心理杜撰出一个子虚乌有的"艾罗博士"来，说此药系根据这位美国医学博士的处方配制而成，因而瓶贴上所署药名中文为"艾罗补脑汁"，英文为"YALE STIMULANT REMEDY"，商标则借用了一个大胡子犹太人的尊容，下有"Dr. T. C. Yale"字样，暗示此药系这位洋博士所制。同时，黄又在上海各报天天登载广告，宣称此药能使"精神健旺，筋骨强健，面色红润，思想日富"。此招果然灵验，"艾罗补脑汁"很快行销各地，供不应求，黄遂以小本而获大利，发了一笔大财。

"灵药"似水涌入市场，"艾罗博士"俨然成了黄楚九的财神。一

不做、二不休，干脆再借他的名义生产艾罗解毒药、艾罗疗肺药以及精神丸、日光丸等，结果销路也不错。

上海滩无奇不有，时隔不久，有一个自称"艾罗博士之子"的外国流氓，指控黄楚九盗用其父秘方牟利，扬言要对簿公堂。黄明知他目的是想敲竹杠，便将计就计，带那洋瘪三吃喝玩乐，最后叫他签署一张协议：声明艾罗补脑汁今后归中法大药房独家经销，自己不再过问。那美国小无赖为贪图上千元进帐，乐得悉听尊便，一切乖乖照办。黄即将这张协议拍照制版，广而告之，使人们愈信此药真是洋人所制，营业额因此每天高达千元。

1923 年，黄楚九盘进位于四马路（即福州路）的中西药房老店后，又有新药"百龄机"问世。在黄为"名牌"药品所做的广告中，恐怕要数"百龄机"的花样最多，所花的力气也最大，一则则新奇广告出现于报端，什么"百龄机人生五福寿为先"；什么"清补妙品人人宜服百龄机"；什么"同胞注意服百龄机十大保障：血液稠红、精神充足……"如此等等。更绝的是，黄挖空心思从城隍庙买来一只巨型风筝，挂上箱笼，下垂药线，然后在高入云端的游乐场顶楼把它送上天。风筝腾起之时，正是药线燃尽之际，箱笼自然开启，大量"百龄机"广告便从天而降。路人好奇纷纷捡来争相传阅，成为上海滩一大新闻。这真是令人拍案叫绝！确实体现了大滑头黄楚九在"生意经"上"脑筋灵敏，加人一等"的特点。

1917 年，黄楚九开设福昌烟公司经销"小囡牌"香烟，也是别出心裁。广告第一天整版只印一只大红蛋，第二天空白处加印一条小小的发辫，第三天形成一惹人喜爱的胖娃娃，第四天送出贺词："祝贺大家早生贵子"，第五天，方才谜底揭晓，原来是新产"小囡牌"香烟的广告，人们心中的问号终被解开。这一奇特的广告促使人们纷纷购买"小囡牌"，一是尝个新鲜，二是讨个吉利，黄楚九又是财源滚滚。

"小囡牌"香烟由于广告效应而风靡，明显影响了英美烟草公

司的香烟销路。为尽快扼杀竞争对手，英美烟公司遂以二十万元的高价收买“小囡”商标。黄为金钱所动，终被收买，答应今后不再生产这一牌子。“小囡”就此夭折。

1919年英美烟公司为搞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乘中国人民展开抵制日货运动之机，藉口南洋公司主人简照南曾入日本籍，竟拿出四十万元钱，唆使黄楚九向北洋政府农商部诬告南洋公司为日本资金所开设，所出产品纯为“日货”。黄以二十万元向农商部官员行贿，自己则中饱二十万元。农商部因此而吊销了“南洋”执照，勒令其停业。1925年国内各地又掀起抵制洋货运动，黄又一次接受英美烟公司的贿赂，将洋烟改装为福昌烟公司的产品。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黄楚九为了钱而听命于外国殖民者，着实扮演了一回小人。

黄楚九坐上了上海药品业第一把交椅后又开始不“安分”，敏锐地伸出他的触角，随时窥探着上海滩的新动向。辛亥革命后，他对新兴事业发生浓厚的兴趣，开始涉足游乐业，其中以开办“大世界”最为出名。

说起开设“大世界”的动机，讲到底也是为了出口恶气。

1912年，黄楚九集资在二马路(今九江路)浙江路转角筑一新式戏院，取名“新新舞台”。次年，与地皮大王经润三合资在新新舞台屋顶上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时称“屋顶花园”。1915年又与经在南京路与西藏路的东南角上办“新世界”游乐场。由于当时上海的娱乐事业还刚起步，所以经营这一时髦行业获利优厚。

正当“新世界”红遍上海滩之时，1916年，经润三溘然去世。内讧随之发生，“经大娘子”汪国贞处处与黄闹对立，未经商量就叫自己的外甥张石川主持新世界的一切，一把将黄的股权收了回去，黄等于被经大娘子踢出了门。黄楚九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大世界”孕育而生。

1916年底，黄楚九筹足资本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西新桥堍租了一块地皮。1917年3月，“大世界”破土动工。7月14日，正值黄来到上海滩三十周年纪念日，“大世界”正式亮相：占地一万四千多平方米，内设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等等。在“大世界”内，只要能赚钱，不管什么方式黄都乐意采用，这是“新世界”业主永远赶不上的。比如在寿石山房设立济公坛，引诱游客求神问仙医治百病，还可与鬼神一同拍照。这里每夜红烛高烧，香烟缭绕，来扶乩者络绎不绝。此外，黄色下流的“西洋镜”、赌博游戏“吃角子老虎”等等，更是一应俱全，以适应各类市民的趣味，很快将“新世界”生意“轧坍”。

“大世界”财源滚滚，黄楚九钱囊鼓鼓，善于投机的他又迅速地卷入了交易所这项“摩登事业”。1920年冬，他与人合伙在“大世界”内开设了“上海夜市物质交易所”。人家交易所只有日市，他却来个夜市，以使投机朋友们有所消遣。进行证券投机者从早到晚，买进卖出，乐此不疲。与此同时，为了调剂金融、便利收付，黄又在“大世界”对面开设“上海日夜银行”，这倒是与夜市交易所相呼相应，形成“一条龙服务”。银行日夜服务，对白天无法存款的人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也是积累资金的一种讨巧生意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黄楚九盘算着在交易所如林的上海滩，如何扬其“夜市”之长，狠捞一笔钞票时，突然之间，银根奇紧，股票暴跌，以至酿成“信(托公司)交(易所)风潮”。不到半年时间，上海一百多家交易所先后倒闭，一些银行、商号也受到冲击，黄楚九的交易所不可幸免地暴露出形形色色的危机与败象。

接着，他又欲拚命挤进地皮商的行列，把自家各企业所需要的厂房造好后，又选定市面日益兴旺的“日升楼”一带，即浙江路后马路(今宁波路)地段，租赁了几块地皮，大兴土木，耗费巨资建起了三十余间铺面楼房，准备或待价而沽或出租给别人作开设商店之用，指望靠它们坐收渔利。然而事与愿违，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席卷了整个上海，上海市面萧条，百业凋零，所造房屋根本无人问津。

为保全面子，黄只好再度挪用日夜银行的资本，自开店铺，强撑市面。可是经营不景气，不仅难以收回投资反倒增加了一笔开支。长此以往，黄楚九债台高筑、亏蚀殆尽，日夜银行周转失灵。

1930年前后，上门寻黄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少，显然人们已对黄的可靠程度、日夜银行的经营能力产生了怀疑。风声走漏，债户纷纷提款，日夜银行被挤得水泄不通，据说当时挤兑的行列能绕大世界数匝。

这次黄楚九真的是回天无术了，一急一累竟病倒在床上了。可黄楚九到底是黄楚九，就在他和日夜银行垂死之际，又玩了一个花招。

1931年初，黄楚九人虽垂死在床但神志十分清楚，他想如果银行倒闭在他死之前，势必整个破产，自己死后连个棺材也混不上。于是便请来一小报记者编造一篇报道，说黄楚九精神很好，只是小有不适而已，边上像模像样地登出一张黄早年所摄照片，注明此乃"近影"。这一手果真有效，缓和了提款风潮。

强撑数天，1931年1月9日，黄在宅邸内突发脑溢血，倒地而死，终年五十九岁。

黄楚九死后不久，"日夜银行"宣告破产清理，"大世界"亦招牌换记，成了黄金荣的私产。不管曾经多么辉煌，不管死后遭多少人咒骂，对于静静躺在楠木棺中的黄楚九什么都不重要了，所有的一切已成为过眼烟云……

（杨霞蓉）

“活神仙”起家败亡



刘从云，道名白鹤，人称“刘神仙”，四川威远人，1883年生。早年以测字算命为生，并加入当地的“黄经堂”，后自创“孔孟道”，广招门徒，威震一方。1925年以后，收得四川军阀刘湘、杨森、邓锡侯等为徒，从此混迹政坛。1929年，被刘湘奉为军师，协助刘湘挑动川内军阀混战，最后“统一”四川。1935年出任四川“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阻截红军北上抗日。

刘从云，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陌生，一般的民国人物词典上也难觅他的踪影，但刘从云在二三十年代的四川政坛军界可谓是一位“呼风唤雨”的灵魂人物。

刘从云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儿时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后来就在乡间挂起测字算命的招牌，藉此谋生。以后参加了当地的迷信组织“黄经堂”，拜所谓的“一贯先天大道”刘永宽为师，随师为人搞一些消灾祈福超度亡魂的迷信活动，骗取钱财。因为工于心计、能言善道，对本地的地主、袍哥和乡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刘从云的占卜之辞大多“灵验”，遂为四邻八乡的愚昧群众所信服，进而得到哥老会的支持，落第文人、失意的政客官僚及地主乡绅纷纷入道，影响逐渐扩大。见此情景，刘从云野心萌发，乃另创“孔孟道”，设立“明通坛馆”，自封“一贯先天大道”，在坛内利用“乩生”装神弄鬼，假借神仙“降体”发布谕文宣称什么奉玉皇旨意，代天宣化，普渡众生，要率领道徒，扭转乾坤，统一四川，问鼎中原，匡扶汉室云云，以蛊惑人心。

刘从云创道之时，正当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纷乱时期。他到处宣传鼓动“想逃避浩劫，只有信仰孔孟道，就会得到神灵保佑”，这正迎合了贫苦农民渴求平安过日子的心理。不消数年功夫，刘从云手下的男女道徒竟达万余之众，分布于威远、荣县、内江、富顺等县，声势浩大。他收徒的一般手续是先经人介绍，然后举行点烛焚香、顶礼磕头的仪式，入道者还要赌咒发誓：“死保恩师（刘从云），严守秘密，毁家纾难，互相提携。”为了加强控制，刘从云先后在威远县设立安通坛，荣县设立钧通坛、宝通坛，自贡设立微通坛，富顺设立祈通坛，内江设立极通坛，分别供奉至圣先师、太上老君等神明，号称“六通部”。统领六通部的是供奉玉皇大帝的明通老坛，刘从云为总令。另外在每个通部下还设立两个支坛，每个支坛

再分设数个分坛，分坛之下又辖若干大组和小组。通部中设置有总令、参议、财务、书记等职位高低不一、分工不同的负责人，大多由当地的土豪劣绅与较有权势的袍哥担任，他们都是刘从云道门中的骨干分子。此外，在刘从云手下还有“十八学士”、“十三太保”、“十大元帅”，作为他的心腹爪牙。这样，“孔孟道”就形成了一个以刘从云为核心、组织健全严密、等级分明的封道会道门。

仅仅在民间扩展势力，并不能使刘从云的贪欲得到满足。在苦心经营数年之后，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开始依附军阀，组建军队，妄图实现君川的迷梦。

1925 年，四川大军阀之一，四川善后督办兼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在重庆经道徒刘佛澄（刘湘的部下）的介绍加入了“孔孟道”，道名玉宪，随即刘湘又介绍他的将领潘文华、王缵绪、范绍增等人参加。之后的几年里，刘从云施展种种手段把川中其余大小军阀刘文辉（道名玉献）、邓锡侯（玉齐）、杨森（玉勇）都先后拉人自己的道门之中，其他如刘湘的二十一军中营长级以上的军官约有 90%的人成为虔诚的道徒，“孔孟道”简直成了军阀道。

1928 年，刘从云可能探听到了内幕消息，通知刘湘重庆不久会有战事，要刘湘将王缵绪部调回重庆以集中兵力。刘湘依计一一作了布置。果然，没过多久，杨森、罗泽洲等部联合进攻重庆。刘湘因早有准备，一战而胜，击溃了杨罗联军。经过这一次的胜利，刘湘对他的这位“神仙”恩师更是信仰崇拜，言听计从。1929 年，刘湘花费了银元四万余元，在重庆江家巷买了所大房子，将它布置得富丽堂皇，作为刘从云的住所，取名“神仙府”。这年夏秋之交，刘从云被接到重庆，刘湘正式尊他为军师。

此后，刘湘等人经常出人江家巷神仙府秘密同刘从云会商，图谋发展大计。刘从云主张与邓锡侯联合，对杨森、刘文辉这样的实力派要忍让维系，并且联络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将西南半壁打成一片，伺机问鼎中原，建立功业。看来刘从云的确有点诸葛

武侯的遗风，难怪刘湘那么信任推崇他。为了将川内大小军阀掌握在自己手中，刘从云还故意把对刘湘的这一番建议向川中各军驻渝代表泄露，于是各军阀凡有求于刘湘，必然都去走刘从云的门路。如此一来，刘从云不仅成了刘湘的智囊，也成了其他军阀拉拢求助的对象。

为了显示"神威"，1929 年中秋节，刘从云在重庆南岸真武庙举行了七天七夜的"移星转斗"的"收缘大会"。刘湘等军阀道徒以及威远、内江、富顺、荣县的四百多道徒均前往赴会。大会的内容无非是烧香磕头、拜神求仙、祷告上苍这一类的迷信活动。此间，刘从云还在庙里点了三千六百八十四盏灯，七昼夜不熄。会后，刘湘对与会道友各赠象牙筷一双，毛巾一块。

受封军师，又得到众军阀特别是刘湘的尊宠，按说刘从云应该心满意足了，但他不甘心于在幕后出谋划策，还想跳到台前来逞逞"神仙军师"的威风，巩固道首的地位。1929 年初秋，在刘湘的支持下，刘从云筹军款，买军火，操办建立他的"神兵"部队。刘从云从六通部中精心挑选了青年道徒一百人，集中到重庆南岸的大佛寺接受军训，定名"百子图"（亦称"百子训练班"），教材是步兵操典，随后又增加了"神术"训练，由他的三弟刘从湘、阮奎光、郝汉超三个体生（孔孟道中专门装神的人）轮翻传授武艺。其后，刘从云又筛选了三千名道徒，在巴县马王场成立学兵队，号称"三千子弟兵"，共编为二十个中队，六十个分队，分驻长生坪、黄金庵等地。其中的中下级军官都出自"百子图"。一年后，刘湘把这支部队改编为二十一军模范师，表面上由他兼任师长，实则一切都由刘从云主持，舆论称之为"以神治军，以军乱政，以政害民"，"刘神仙"遂成近代中国军界的第一号"神骗"。每个月他私吞的"军饷"钱即在万元以上。军阀割据与封建迷信紧密联系，以神权巩固统治，这是当时四川的一大怪事。

军阀混战使刘从云名声远播，但是好景不常，没多久刘从云的

这块神仙招牌就被红军入川给砸破了。

1933 年 10 月，工农红军在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靖主任，“围剿”红军。1935 年，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又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阻截红军。刘湘得令后，便召集将领在神仙府中开会，商讨对策。刘从云献计：调集十万大军，兵分六路，截击红军。对此红军采取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川北有利地形，进行运动防御。几仗打下来，刘湘损兵折将，连遭败绩，各路军总共被歼三万五千人以上。刘湘在被打得焦头烂额，计绌智穷之下，只得再次乞灵于“神力”，把“刘神仙”公开抬出来，封他个四川“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坐镇南充代替自己指挥各军。

刘从云执掌帅印以后，完全依照封建迷信的一套来治军经武。军队出发要择吉日良辰；每次发布作战命令、驻防甚至是埋锅造饭，都要举行“候祀”，听从神的安排。有时刘从云还指定什么“行军大吉”的方向，如正南方向，有的军队照办却走上了悬崖绝壁，成为笑柄。刘从云到南充就任之时正值红军主动从通江撤退，于是他借此大吹大擂，宣称“占卜有灵”，红军消灭在即。其实这位“神仙军师”在帷幕后面耍点鸡鸣狗盗的小聪明还行，真的动起真格打起仗来则全是胡闹。7 月中旬，川军各路开始以万源为主要目标向红军发起全线攻击。刘从云卜定 7 月 11 日为各路军总攻日期，说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可笑的是，刘从云下达命令的方式是将手令用黄缎包裹，由飞机分投给各军总指挥部驻地的。结果，11 日这天川军各支部队奉令进攻万源，红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毙伤敌军万余人，这是四川军阀阻截红军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刘从云见势不妙，仓皇乘飞机逃回成都。刘湘曾命人到南充阻止，等赶到那里，“神仙军师”早已“驾鹤”逃之夭夭了。自此，川中各军将领和大多数官僚地主们都猛醒过来，对刘从云大加指责，认为军事失利，皆系这个江湖术士搞迷信，指挥谬误所致，有的还主张

“神仙”自裁，以谢川人。刘从云的三千“神兵”与众道徒也以为他出任“委员长”一职，没有上表请示神灵，违反圣意，咎由自取。一时间，“神仙军师”众叛亲离，不得不潜离成都，溜回威远老家隐居。

潜回老家后不多日，刘从云得到密报：资中专员即将要逮捕他，便立即乘船离开四川，逃往武汉。一路上，刘从云食宿都在船舱里，不敢上岸露面。抵达武汉后，在日租界租了几间屋子，仍然开设神坛，重操旧业。

“西安事变”后，刘从云在刘湘和邓锡侯的关照下，回到成都。但这次除了搞迷信活动外，他不敢再对军政事务指手划脚，以免召来杀生之祸，因为川中将领早有警告：“如今后再参与四川的军政活动，定予沉重打击。”

抗战爆发后不久，刘湘病故，由邓锡侯继任川康绥靖主任。刘从云见大靠山已倒，深感处境危险，转而到峨眉山躲藏了半个月。后来还是邓锡侯念及师徒之情，将他安置在新繁县东湖公园内，并派一连部队担任警卫，约有半年。以后见局势稳定，反对他的将领都已赴前线，刘从云才敢返回成都。回到省城后，刘从云在提督街开设了一家宏通五金行，以此为掩护进行迷信活动，同时借以谋取经济来源，直至解放前夕。

1949 年底，成都解放。刘从云自感罪恶深重，恐慌异常，几经掂量，最后决定仍以经商为名，继续潜伏。他与亲信道徒刘官仪在外车水津街租一小店，做起米粮生意。1952 年，刘从云被人检举揭发，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一年之后，这个曾在四川风云一时的“神仙军师”在狱中结束了丑恶离奇的一生。

（张姚俊）

“假财神”梁作友来龙去脉





梁作友，1899年左右出生，山东黄县龙口北皂梁家村人。农民出身，除自耕少量薄田外，还到龙口一所小制袜厂帮工记帐兼销货，取得微薄工薪赖以维持生计。家中尚有老母和一已出嫁之胞妹，另有一弟在东北。梁早年曾订过婚，后因女方嫌其家境贫寒，相貌丑陋，而解除婚约另字他人。

寒意料峭的1932年早春，北国的“九一八”狼烟未熄，江南又起“一·二八”战火，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已走到最危险的关头。

刚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被正式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决意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策划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围剿”，正愁浩大的经费一时无从措集，有个大财神自己找上门来——财神爷叫梁作友，山东黄县龙口镇人氏，这会儿上书最高当局，自称有巨额存款，愿提出三千万元报效国家，其中若干作抗日“剿匪”用，若干作兴办实业用，若干作赈济灾民用。惟事关国计，一应具体事项，非得面谒委座云云。

蒋委员长吃过“龙口粉丝”，回味无尽，可从没想到过这小地方居然会冒出这么个慷慨捐资以纾“国难”的大义士来。当即喜上眉梢，马上发电给其老幕僚、刻下正在北平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的蒋伯诚，命他代表中央前去山东，把这位千年转世的“及时雨”接到南京来。紧接着，这半辈子还从未与中央直接打过交道的黄县县长郎咸德竟有幸收到这样一份来自南京的急电：十万火急！黄县县长郎咸德：着即派妥员将你县八区梁作友先生护送来济南胶济铁路饭店，以使会同赴京。启程时间电复蒋伯诚。

不知是哪位耳报神先把这天大喜讯捅了出去，俟“梁义士”在黄县总务科长周浩陪同下由潍县转乘胶济路火车抵达济南时，“大财神巨资报国”的新闻已被传媒炒作得如汤如沸。根据火车时刻表，梁作友当于早晨7时40分到达济南铁路总站，届时随同蒋伯诚前往月台欢迎财神兼抢新闻的各报记者，竟成黑压压一片。

一声汽笛长鸣，火车拱进了车站。致令蒋委员和众记者大吃一惊的是，没想到这样一位腰缠千万而引起中央如此重视的人物，竟是一个突胸驼背、面颊干瘦、额头皱纹叠累、身高不满四尺的土佬。不过当记者们纷纷围上前去摄影采访时，这位穿着土布夹袄、拎一个白布小包袱的普通农民倒是谈吐自如，洒脱大方，道是“关于捐

款和救国大计，暂不发表。当到南京谒见委座之后，你们自然会知道。”旋随蒋伯诚走进胶济铁路饭店休息，不复与外界接触，当夜又跟蒋乘坐津浦铁路客车特备的专席，奔赴南京。车抵下关，一班中央党政警宪大员如陈立夫、谷正伦、张静江、张嘉璈等都跟着孔祥熙前往接风，还特派一个宪兵连护送到中央饭店下榻，“孔财神恭迎梁财神”，盛况空前。

中央饭店立即成为全国“无冕之王”的云集之地，梁作友捐献巨款不仅成为轰动国内的特大新闻，连《泰晤士报》等外国报纸也竞相报道。但是梁对中外记者一概拒见。与部长级官员会晤时，也只说些“匹夫有责”之类的豪言壮语，毫不涉及三千万元何来何去。据梁表示，事关国家大计，一切问题必须向“委座”面呈，就连蒋介石的老盟兄张静江受蒋重托前去探询，也照样被这“土佬”玩了一转，不得要领而出。

越是神秘，越引起外界的猜测与好奇，有关梁氏巨款的来路，又成了小道传诸大道的最热门话题。有说梁当过北洋直督褚玉璞的马弁，褚死后外国银行存折落在他手里，自己无法提用，想借政府取款后提半捐献；有说这外国存折是张宗昌的，1929 年张被刘珍年打败由龙口经海路窜逃时，存折被梁作友拾去；还有说梁去东北，途中沉船，临难前有人把一个大提包托给他，因其是驼子将来容易辨认。结果全船人都淹死了，只有梁作友被大提包托浮出水面遇救——原来大提包里全是钞票、珠宝。

蒋介石急于了解实情，但又怕闹出笑话不好收场。经过各方要人一再研究，想出一条妙计，即派人陪梁各处游览，引诱他在兴奋中吐露真情，自己则暂离南京去汉口，静待消息。果然，梁作友在出席“励志社”欢迎会时，于“即席发言”中露出了两条破绽：一是一旦与“委座”当面谈定捐款开支比例后，七天内即可从中国某银行提取；二是将要当面向“委座”奉献可保证在一百零八天内全部收复东北失地的锦囊。此言一出，语惊四座。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说，

别的我不懂，要说中国的银行，在七天内决支不出三千万元现金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则说，从古至今还没有能算出多少时日可以收复失地的军事家，太玄虚了！

不过，急于得到三千万元的衮衮诸公们，依然根据外间传说，把希望寄托在梁作友掌握有张宗昌丢失的存款凭据上，于是又派"中统"干员钟竟成立即潜赴黄县，由国民党黄县整理委员会委员徐叔明协同调查取证。这会儿梁上南京捐款的消息，已在黄县城乡传遍。"乡下人"倒比中央大员实在，都说梁是穷极生疯的痴子。可是钟竟成钻进梁家那三间破房与梁的妹妹攀谈后，却兴奋不已，原来她说："哥哥临走前还特地切了一尺白粗布，把一个本子包起来，叫我给用针线牢牢地缝起来。"钟便据此断定，这就是张宗昌败逃胶东时丢失的外国银行支票。为证明此行不虚，钟还让陪同探访的徐叔明为他和梁母梁妹拍了张合影，供《良友画报》独家发表。

揣测"证"实，皆大欢喜的南京政府为梁作友代购头等船票送他去汉口谒见老蒋。临行前，陈果夫接见，"中宣部"摄影，极尽风光。没想到一到汉口，负责招待他的是汉口市警察局长陈希曾，开门见山，要"财神"在捐款中先提一部分救济汉口灾民。梁作友随口作答："很好，我可以从日本提出一笔款子先汇到汉口来，以应急需。"这一来，马脚对不上他此前所说存款"中国某银行"的牛头了。机警的陈希曾马上质疑，梁显得慌乱了，忙解释说他存款日本是为了安全，但已从日本移存了一部分到天津，如果急需，可从天津提取。岂知这一"补"，漏洞更大了，陈即刻追问天津提款何时可以汇到汉口？梁忸怩地说："大约七天可以到。"陈说："好，我七天后再来看你。"

被"招待"住在汉口歆生路福昌旅馆的梁作友受到了监视，再甭提啥谒见"委座"了。七天后，陈希曾冲进门来痛斥梁是骗子，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梁作友情知骗局到此完全戳穿，反而泰然道："既然委座不肯接见我，我索性就把好办法告诉你吧。"

恨不得一拳将对方揍死的陈“太岁”又被假“财神”吊起了胃口，忙洗耳恭听。

“这个办法嘛”，梁作友侃侃而谈：“就是由政府下一道命令，叫全国四万万人每人备一个扑满，每年存五角钱，作为爱国捐款，一年之内，国家就有二万万元到手……”

第二天，报上出现一条简短的消息：“梁作友捐款纯属子虚，已由当局驱逐出境”云。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梁作友是被押解上船勒令离开汉口的。俗谓“要劫劫皇纲，要睡睡娘娘”，一个把堂堂南京国府麻倒的“乡下佬”，可算是亘古无双的超级巨骗了，似乎也该效法太史公为朱家郭解立传的传统，替他书一笔“梁作友后话”吧？

时过近半个世纪后，当年曾陪同钟竟成去梁作友家“摸底”的徐叔明先生专就此轰动全国的大骗局写了篇回忆文章。据他说，梁在上海下船后，找到一位在明星电影公司当演员的同乡王献斋，在王的资助下搭轮回到龙口，并在龙口振龙银号当面对他讲述了去南京汉口“行骗”的经过，只不过这位对官场头脸不甚了解的假“财神”只知道汉口警察局长乃“委座”的“外甥”，因而错认陈希曾是俞济时了。徐叔明先生又说，后来他以“黄县教育局长”身份到上海参观访问时，陶行知先生特邀其介绍“梁作友捐献”真相，介绍完后，陶行知幽默地说：“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梁作友比当年的圣人还高明。当年孔老夫子是趋炎附势，而今梁作友敢于揭露、耍弄最高当局，有胆有识，真了不起！”事后，陶行知还特为写了篇《梁作友其人》，却因国民党当局查扣而未能刊行，这缘故或许略同《皇帝的新衣》所喻义吧？

然而文网恢恢，疏而有漏，专以“幽默”相称的上海《论语》半月刊上，漏出一段梁作友后话，题为《明天再去》，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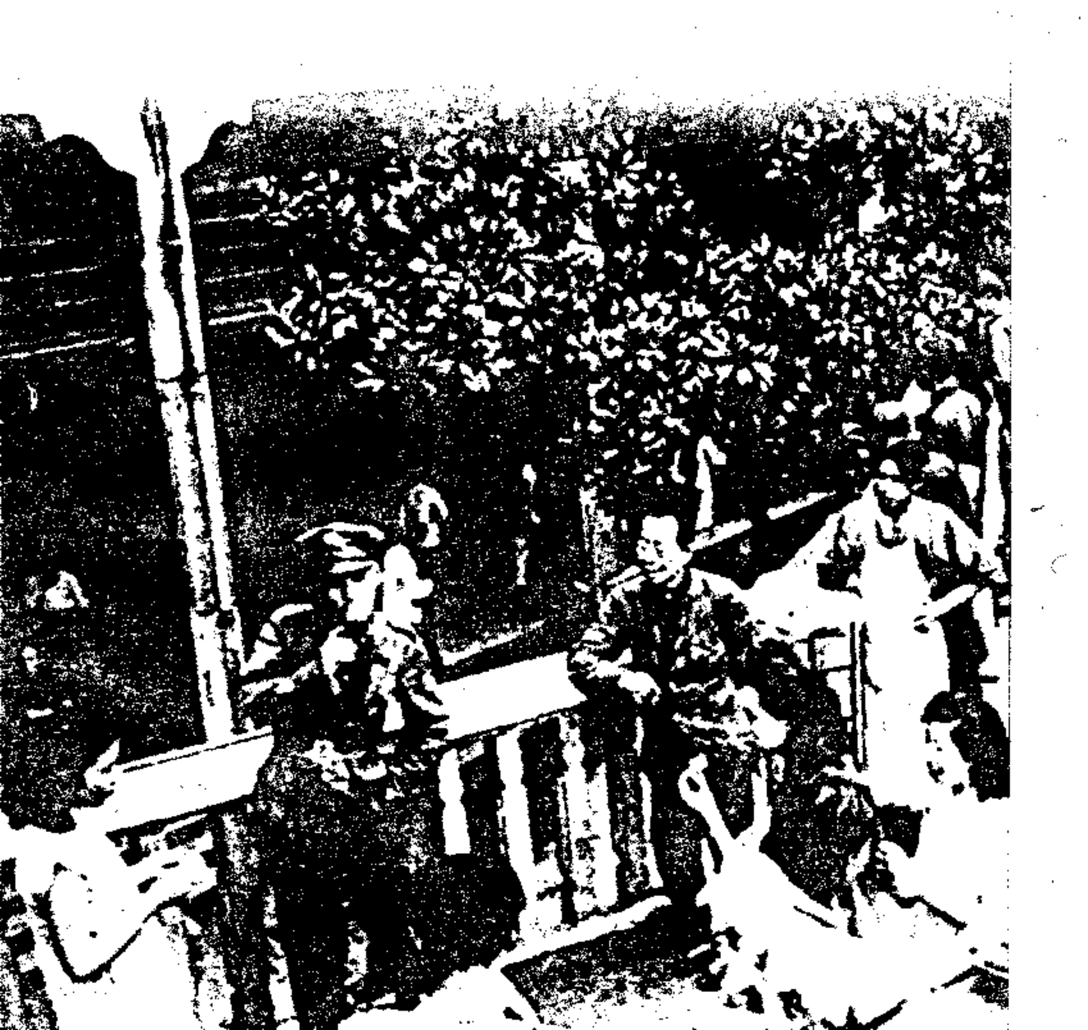
> 假财神梁作友被逐回黄县后，每日背粪筐外出捡拾，人见而问：“梁先生近来怎么样？”他便说：“不错，唉！我说的救国计

划都不听，没法子，唉！——明天我再去南京。”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未久，胶东即成敌后，梁“财神”的下落似已迷失在战火中，倘若今犹健在，倒有百龄寿庆了。

（郭永生）

银幕下的反派原型



为虎作伥的“胡传魁”，占山称王的“座山雕”，血手染红岩的“徐鹏飞”……这些早已在银幕舞台上为人们所熟悉的反派艺术形象，都有其生活中的原型，他们的本来面目和结局，就是本章的内容。

山神庙谢文东就擒

谢文东，辽宁宽甸人，1899年出生。电影《林海雪原》中匪首“谢文东”的原型。早年上过私塾，辍学后在家务农。1925年移民黑龙江依兰土龙山区（现属桦南县），不久被国民党任命为保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率众发动了土龙山农民暴动。1939年3月，谢文东投降日寇，曾到新京（现长春市）和日本东京为敌张目，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伪满洲国上下一场混乱，在鸡西城子河煤矿充当劳工大队长的谢文东急忙赶回勃利家中闭门不出，静观时局发展。

进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对谢文东又打又拉，既没收了日本人存放在谢家的军用物资和谢文东的一些家产，又想任命他出任勃利县副县长。谢文东面对抄家之不测大病一场，更不屑于一副县长之职，于是便搬到大尾巴屯"养病"去了。

抗战胜利后东北各地的各色人等拾起日本侵略者的遗弃武器装备，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自卫团"等武装组织，谢文东因昔日的"威望"而成为这些人心目中的一面旗帜。这时长春的国民党也派来了特派员武康前来助阵，谢文东乘机打出了"中央军"的旗号。到10月底，谢文东的所谓"东北民众军"总人数已达一千余人，成为哈尔滨以东地区一支最大的匪队，并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命，成为"东北第一挺进纵队"的上将司令，号称是胡宗南的队伍，正如其手下副官长王大中叫嚣的："咱们不再是自治军而是中央军了！"

谢文东的所谓"东北第一挺进纵队"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内讧和挨打的"悲惨命运"。

首先他们与苏军发生了直接的武装冲突，虽然给苏军造成了不少损失，但自己也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其次，我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率队对谢文东部进行围剿，谢文东被打得狼狈不堪，四处逃窜。第三，由于内部不和，他手下的武康凭借国民党的背景，独揽大权，使谢文东及其部下心怀不满，双方发生了不少冲突，最后迫使武康出走，大部分队伍投降了三江人民自治军。至此"东北第一挺进纵队"已所剩无几。

1946年3月上旬，谢文东盼望已久的国民党联络员杨义儒来到了他的住地，带来了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翰涛的委任状，委任谢文东为合江省保安军(自称保安支队)军长，这支匪队人数达六百

多人。正因为这支土匪人马较多，于是便成为当时剿匪部队的重要进攻目标，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我军的围剿。4月中旬，谢文东计划攻打鸡西，但他们的袭击遭到了我剿匪主力部队三五九旅的猛烈反击，整个匪队立即败退下来，一气跑了七十多里，队伍乱成一团。就连掩护部队也顾不上掩护，只是顺手牵羊地抢劫老百姓的马匹和衣物。难怪其参谋处长汪洋也不免深有感触地哀叹不已："这些兵打胜仗还可以，一旦打败仗就完蛋了！"

其实谢文东对国民党也决非百依百顺。国民党合江省党部书记张玉书到处发展国民党组织，封官许愿，拉拢控制了不少匪队，致使后者不再听命于谢文东的指挥，对此谢文东十分恼火。1946年8月初，谢文东兵败逃至太平镇，向当地最大的商号同成兴要款时，商号说已交给了张玉书，这就使谢文东更加心怀不满。不久张玉书和谢文东相遇，同桌共饮之际发生了激烈的正面冲突。谢文东说："你真行啊！你向同成兴要了那么多的钱；我这么多人，还一个钱要不出来。"张玉书回答道："党部需要很多钱。"并挖苦谢说："你们不是能抢吗？你的队伍到处抢劫，还用什么商号捐款……"谢文东一听便气不打一处来，瞪圆眼睛浑身抖动着说："他妈巴子，你是个什么玩艺儿，是干什么吃的？"张玉书毫不示弱地回敬道："我是国民党合江省党部书记，你能把我怎么的！"谢文东破口大骂："你国民党当个屁？老子枪毙你！"张玉书更是嘴硬："你敢？我是中央委任的，国民党马上就要过来了！"谢文东发怒了："有啥不敢？国民党来了我打国民党！"张玉书见势不妙，正要掏枪，谢文东的保镖上前抓住他捆绑了起来。这时杨义儒上前劝解，门外也有四五十人下跪为张玉书求饶，但谢文东一概加以拒绝，把张玉书押走枪毙了。杨义儒问他说："这样做能行吗？"谢文东火了，拿起皮鞭朝杨义儒狠狠打去："谁他妈巴子说不行？"杨义儒的眼睛也被打肿了。

进入10月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谢文东的匪队吃穿问题越来越困难。为了过冬，他们在牡丹江附近对有三百多人的八道沟

屯进行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抢劫。他们当时把住屯子向外的所有通道，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搅得全屯哭叫声震天。这次他们共抢到四十多匹马、三千多斤粮食和大量衣物。他们认为抢到的粮食还太少，立即又到附近的林家房身屯抢了十几匹马、三百多斤粮食和一些衣物。第二天被抢去马匹的群众找到谢文东要求归还马匹，谢文东却要群众用胶鞋来兑换，气得群众无不咬牙切齿。

谢文东匪队的作恶多端，使其成为我剿匪部队的"首选"对象。首先撞入由我三五九旅和合江军区骑兵部队布下的网中的，是谢文东的警卫团长谢生荣。他在转移的路上被埋伏在路边的军区骑兵部队当场击毙。谢文东悲恸不已，只好带领匪队西窜，但没走多远又遭到了同样的狙击，死伤惨重。杨义儒、汪洋等他的亲信心腹看到如此情形，也纷纷抛弃了谢文东，径自去长春找中央军谋取"前途"了。

被打得东奔西逃的谢文东此时想起西莲花泡有个很有名声的"大神"(即巫医)，于是便连夜带队，悄悄来到了西莲花泡请教神仙指点迷津，算算何处才能避开我军的追击，何时中央军才能前来"接收"。"大神"见谢军长亲临驾到，便使出最为灵验的"请神法"，即用一把尖刀插在头上，满脸带血地为他"请神"。谢文东十分虔诚，不断向"大神"提问。但是"大神"的回答没有一句是他想听到的。

11 月 6 日，谢文东窜到了大夹皮沟，老老实实地钻进了我剿匪部队设下的口袋里，而这口袋是合江省军区司令员贺晋年等率领的三五九旅及合兵骑兵团长期努力的结果。

当时贺晋年率部追剿到莲花泡，得知土匪进了西山夹皮沟后，他向团以上干部发出指令：擒贼先擒王，剿匪要捉匪首，捉到或打死匪首，就等于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若不消灭匪首，即使全部将匪徒消灭，也不算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谢文东就在牡丹江西岸，我们要活捉谢文东，消灭这股顽匪。部队虽然很疲劳，但必须坚持追

击,坚持就是胜利!

在贺晋年等领导的严密布置下,剿匪部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谢文东成了瓮中之鳖,无法动弹。首先,剿匪部队进入了大夹皮沟,堵死了谢文东南逃的大门。接着,剿匪部队将南起夹皮沟、北至黑瞎子沟,东至牡丹江,西至老爷岭东麓这么一东西窄、南北长的地带切成几块,同时加紧搜索,各路搜山部队格外注意配合衔接;其次,牡丹江流域南起莲花泡,北至大、小一期的所有渡口,都安排有多则一个排,少则一个班的部队,还有骑兵队来往机动,互相接应。沿江所有船只均被我军严格控制,沿江零散的住户暂时被动员到附近较大的村庄居住。牡丹江这一段的西岸被封锁得如同铁桶一般;第三,剿匪部队想尽一切方法烧毁敌人的密营,断绝敌人的粮食,使敌人在山林中无法生存;第四,为了土匪早日被瓦解,我军还加强了政治攻势,凡是土匪经过的地方,都贴上了标语,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如“缴枪不杀,投降留命”等。

谢文东很有一套欺骗匪徒的手段,他随身揣着一个小铜佛,一本“卦书”和“诸葛金钱神术”。每当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他就把小铜佛供在地上,占上一卦。那些追随他的土匪对他这套骗术很是相信,谢文东就凭着它作为匪队的精神支柱,到处流窜,同我军捉迷藏,妄图逃脱人民的惩罚。

然而,这次谢文东感到苗头不大对劲儿了。由于我军多路连续搜剿袭击,土匪赖以生存的密营和粮食不断被我军焚烧和炸毁。土匪没有粮食吃,只好靠杀马度日,于是便开始腹泻便血。加上没有食盐供应,便出现了四肢软懒浑身乏力的现象。11 月 11 日,谢文东带队从五道河子下山,打算从五虎嘴子偷袭过牡丹江,即被我封锁部队一阵猛烈射击给堵了回去。不甘失败的谢文东又率残部向北窜去,企图从能能沟方向偷渡,但又被我军一阵激烈的枪声打败,所看到的只是几具土匪的尸体罢了。谢文东虽有些惊慌,但还不停地给部下打气壮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天无绝人之路,江

西不好咱们到江东去。”

但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冷，又没有任何东西可吃，饥寒交迫之下有些土匪最终开始动摇了。他们陆续向我军投降，经我军教育后被释放回去，去劝其他土匪来投降。11 月 13 日，贺晋年部派出两名当地猎户老乡进山劝降，他们很快就遇上了谢文东一伙。土匪们一边向他们要吃的，一边打听山外的情况。老乡们向他们介绍了我军对牡丹江严加封锁的情况，并讲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当即就有两个土匪营长站起来说：“不干了，投降去，留条活命！”谢文东有气无力地吼道：“这是共军的宣传，别上当！”接着他便把这两个老乡捆绑了起来要加以枪毙。正在这时，我搜山部队赶到，机枪响了起来，一颗手榴弹在土匪的火堆里炸开了，土匪们四散逃命。这支二三百人的匪队，谢文东是再也没有本领聚集起来了。

此时谢文东身边只剩下了五个人。那天他们气喘吁吁地逃到了一个山坡上，实在挪不动步了，于是大家索性躺在雪地上，谁也懒得说话。过了一会儿谢文东一边无力地摇着脑袋，一边用力支撑着肥胖的身躯，又给手下的喽罗打起了气：“弟兄们别泄气，胜败兵家常事……”但谢文东的马弁汤二虎却听不进他的这套鬼话，他气呼呼地走到谢文东面前，用枪口对准他说：“军长，你不投降，我要投降了。”谢文东看到这副样子，便装出可怜的样子说：“二虎，你今天先去投降，替我办好手续，明天拉匹马，带两个饼子来接我。”第二天，汤二虎带着剿匪部队去找他时，谢文东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11 月 20 日中午，三五九旅八团五连副连长李玉清等打扮成土匪模样，进入五虎嘴子山林反复搜索，终于发现了一堆大便和一些脚印，不久便发现远处一块向阳的平地上有座小山神庙，庙前围着五六个人。李玉清立即让手下战士分成两组包围过去。当他们走到庙后时，看到一个胖子正跪在地上喃喃地说：“神灵保佑多保

佑，保佑我父子性命安全，脱离苦海，将来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李玉清断定这个胖子准是谢文东，于是端起手枪跑前几步大喊一声：“谢文东我捉你来了，看你还往哪里跑！”谢文东被吓得失魂落魄，瘫软在地，嘴里还嘟哝着：“我，我不是谢文东……”他的儿子和其他几个土匪走投无路，也都乖乖地成了俘虏。

12 月 3 日上午，谢文东这个所谓“三朝匪首”，在勃利县城召开的公判大会上得到了最后的审判，等待他的是一声清脆的枪声。

（徐有威）

“胡传魁”苏州伏法

胡肇汉，湖南人，生年不详。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的原型。原系国民党某部班长，“八一三”抗战后溃退于江苏吴县，在当地乡绅资助下拉起一支武装，成为为非作歹于阳澄湖一带的政治土匪。抗战胜利后曾担任国民党吴县阳澄区区长等职，横行霸道，“胡肇汉”三字足令人谈虎色变。

1949年4月下旬，随着我解放大军横扫千里渡江南下，国民党已呈土崩瓦解之态势。胡肇汉自知法网难逃，即潜逃外乡。同年秋季水灾泛滥，一时人心浮动。蛰伏多日的残匪乘机蠢蠢欲动，“老蒋八月半回来吃月饼”之类的谣言不胫而走。匪情从阳澄湖开始向苏州城区蔓延，从陆巷我干部被胡肇汉勤务兵枪杀案，到苏州娄门大街鼎丰粮行的“人头案”，一时间竟满城风雨。这些案件的匪徒有一共同的特点，即都打着“胡肇汉”的旗号，一进民宅或商行总是自称是“老板（指胡肇汉）派我们来的”，利用胡肇汉盘踞阳澄湖前后长达十二年所留下的所谓“威望”吓唬百姓，助长其反革命之声势。于是，一场追捕胡肇汉归案的任务，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剿匪肃特”活动中的首要工作了。

主办胡案的任务由吴县湘城公安分局局长包振家等同志负责，他们信心百倍，常常废寝忘食地连续作战，但对胡肇汉的踪迹却始终毫无头绪。直到1950年春节前后，随着史云泉的开口才有了重大突破。

说起史云泉可算是个人物，他是胡肇汉手下的第一大队大队长、干儿子。解放后他并未潜逃，只是匿居乡间，那天他托人向政府传话说愿意同政府谈判，包振家立即决定单身赴会，打探胡肇汉的行踪。谈判中史云泉一口答应协助政府收缴枪支，但对胡肇汉的下落问题却是一问三不知。在包振家严峻目光的威逼下，史云泉这才装出恍有所悟地“回忆”道：“我想起一个线索，胡肇汉有一个秘密的小老婆，胡临逃前夕，将她寄养在阳澄村的保长家，表面上算是保长新娶的小老婆，找到她，或许可以打听到胡的消息。”接着他又告诉了包振家联络的暗号。

包振家和侦察员孙如海等研究后，决定连夜行动，他们六七人当晚就在苍茫的夜色掩护下摸进了阳澄村。在那保长的家门口，孙如海学着胡肇汉的湖南口音腔调，含含糊糊地开口道：“是老胡……快开门！”那小老婆可能正迷糊中，果真开了门。包振家见她探

出头来，迅速用枪对准她不许出声，随后将她拖至村外的船上便审了起来。那小老婆原是村姑出身，见识不广，又加上今晚行动太突然，一时竟被吓得成了“哑巴”，最终才结结巴巴地开了口：胡肇汉在十个月前将她送到这里藏身后，从未来过，然而她想起了包振家他们从未听到过的一个胡肇汉的落脚点。包振家的眼前又升起了一片希望的曙光。

那新发现的落脚点在上海浦东，是一家布店，老板也说湖南话。这个小老婆前年曾随胡肇汉去那里住过几天，此人与胡肇汉熟得“称兄道弟”。第二天包振家便带上两名助手，并将改装打扮过的小老婆也带上以便供认之需。他们到达浦东后马上找到了这家店铺。据派出所称，那老板姓王，确为湖南人，平时奉公守法，其老婆很贤慧，且为人爽直，王老板颇为惧内。

为防止打草惊蛇，包振家决定来个短兵相接，给王老板来个措手不及。他们带上胡肇汉的小老婆，站在王老板必经之地的人行道上人丛中守候着。不一会只见一身穿棉袍的中年汉子匆匆走来，小老婆示意包振家注意，包振家立即示意小老婆上前打招呼。当那汉子听到迎面传来的“王先生”的叫喊声，为之一怔，包振家等一拥而上，将他扣住并押往附近派出所进行盘问。

包振家开门见山地向王老板说明三点来意：一是胡肇汉的事与你不搭界，说清楚就算了；二是我们找胡肇汉只是要向他借批枪，不会碰他的；三是替你保密。王老板这个老江湖面对这批化装成不三不四人物的保证如何肯轻信，他只是承认和胡肇汉是同乡，前两年曾接待过他及其小老婆小住过几天，其余一概不知。包振家深知不能用硬而弄僵，况且上海公安很讲规章制度，单凭小老婆口供是不能将王老板拘留的。于是包振家假装自己是投靠共产党混日子的，过去还是国民党主办的“茅山训练班”二期毕业的铁杆“国军”呢。对此王老板将信将疑，问起了包振家过去的“朋友”的情况。这样一来一去二三个小时后，王老板开始不断偷望窗外，几丝焦急

和惶惑之色暴露无遗。包振家深知王老板"惧内"的秉性"发作"了，于是慢悠悠地说道："你不肯谈，晚上再谈。"王老板被戳痛处，只得叹口气吞吞吐吐地说："谈也无用，你们早来两天就好了，他到朱家角去了！"这个老江湖原想用这话搪塞一下便好早点回家，不料包振家乘势不断追问，王老板顿时阵脚大乱，最终交待了真情：三天前胡肇汉来到上海，死命纠缠王老板与他祸福共享。王老板被逼无奈，勉强答应担任"联络"工作，随后胡肇汉称要去香港便走了。包振家断定王老板的口供可信，便提出要他写下书面保证。第二天在王老板老婆的支持帮助下，王老板答应一有消息随时报告，并保证不会泄密。包振家等旋返回苏州向领导作了汇报，等候上海方面的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包振家接到上海王老板的长途电话："客人来了！"兴奋无比的包振家立即带人跳上半夜火车，拂晓时分便到了王家。王老板急忙拿出胡肇汉的香港来信，只见信笺上歪歪斜斜的铅笔字写着：

××兄我已平安到港勿念，在沪承热情招待，兄弟十分感激，永记在心。现正在接生意，接到之后，一定返沪面谢，弟字。

包振家读后决定逗留浦东，来它一个"守株待兔"，同时包振家写快信回吴县湘城分局索取忘带的介绍信。但是三天后当他拿着介绍信去浦东公安分局联系时，却被后者拒绝了，因为根据上海的有关规定，接待这类案件一定要有专区公安局的介绍信才行。包振家无奈之余只得赶返苏州再说。

他们刚到苏州，便遇到了苏南公安处处长黄赤波和侦察科科长江华，原来他们是专为追捕胡肇汉一案找上门来的。黄赤波告诉大家："胡匪影响太大，公安处决定将胡案升级，由苏南直接来抓，你们原班人马配合。"接着黄赤波简要讲了胡肇汉的三个特点：一是他熟悉阳澄湖的每一港叉，甚至睡在船中，只要听到橹声、水声便能知道到了哪里；二是他贪女色，到处搞娘们；三是专喜在晚上

单独活动，只带几个人，乘一棚船神秘外出。随即黄赤波召集了专区、苏州市的有关领导，专门对侦捕胡肇汉作了部署。几天后，按照黄赤波的安排，包振家和苏州专区及苏州市公安局的同志便在浦东与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会师了，三路大军摩拳擦掌地等候着"大鱼"的上钩。

过了几天，王老板果然派人送来了条子："老板马上就到。"又过了一天，王老板火烧火燎地亲自来报告了："来人了，通知我老板(指胡肇汉)后天到上海，要我做好安顿准备。"王老板走后江华立即召开实战部署会，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同志负责指挥，苏州专区和吴县公安局为第一梯队负责直接捕人，苏州市公安局为第二梯队负责接应，上海市公安局等为第三梯队负责包围现场等，同时他们还借给第一梯队的同志一批新枪。

"后天"终于盼到了，但直到傍晚时分还没有见到王老板前来送消息，大家不免焦急万分。正在这时，那老板娘神色慌张，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了，只见她结结巴巴地说："来了……二十八个……我家老头子……已封锁……在屋里，他们都在……楼上开会……我推说……布店断……货，要向小姐妹……借……布，才准我一个……出门！"说完她便拚命蹬着脚催包振家快去："迟去了，散会跑掉了，就难找了！"

闻听此言，大家都是又惊又喜。喜的自然是胡肇汉终于来了，惊的是这次胡肇汉的人数大大超出了对他的预料和准备，第一梯队力量明显不足。但是人多了，上楼梯必定惊动敌人，室内格斗力量也难以展开。大家进行反复比较利弊后，决定仍以原方案为宜，尖刀组由包振家、江华等三人组成。包振家这位著名的孤胆英雄坚决要求打头阵，还提出了具体的战术打法："突入匪群后，趁敌人惊呆当儿，我火速抢占壁角，双枪对外，逼住群匪，喝令举手投降。或者，我趁乱钻入桌底下，使群匪无从发挥火力，我在桌底下发枪，扫射敌人足部，打乱敌阵，造成内外夹击之势。"大家听后齐声称妙。

接着，尖刀组的三位同志立即打扮成人力车夫模样，并在人力车上装上几捆布匹，一副提货返家的排场。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各路人马均已进入指定地点埋伏。老板娘跳上了由包振家拉着的第一辆人力车，江华等人拉的另两辆人力车也紧随其后，直奔王老板的家去。

这时马路上行人已少，车行毫无阻碍，不多时便抵达弄口。三人握枪在手随老板娘走近家门，当钥匙插入锁孔中尚未转动时，已听到门内敌岗的低声盘问，老板娘镇静回答道："是我，提货回来了！"大门刚开一线缝儿，三人即闪身进去，用枪相逼缴下了敌岗的武器。此时楼梯转角处煤球炉子上烧着的开水沸腾了，江华立即机灵地右手提枪，左手提起那壶开水，轻声跨上了楼梯。楼上又传来了低低的一声"楼下是谁？"老板娘又镇静地应了一声："是我！"楼上便没有了声音。

此时包振家、江华等三人已上了楼，在王老板指点下接近了群匪正开会的那房间，包振家一脚便踢开了房门，只见房内电灯光通明，匪徒们围坐在三张大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黑压压地挤满了一室。包振家、江华等只好改变原战术，趁敌人被突然袭击震怔的一刹那，左右开弓的六支短枪迅速对准了群匪："不许动！""举起双手！"

群匪无不大惊失色，只能乖乖地举起双手俯首就擒，原来他们的武器都坐在屁股下一时不易拔取。只有边座一个身材魁梧的匪徒有所动作，但很快为江华、包振华制服了。后来才知道，此人是另一匪首——国民党吴县淞南区区长王群，真可谓意外的收获。

匪徒们一个个高举双手鱼贯着走出了房门，接着挨次戴上手铐押下楼去了。短小的胡肇汉和高大的王群则得到"优待"，首先被押上囚车直接押往上海提篮桥监狱。

为了一网打尽其余党，江华和包振家当晚即在监狱的地下室内开审胡肇汉。素称强悍的胡肇汉杀人从不眨眼，有"不怕胡肇汉

跳，只怕胡肇汉笑"的民谚，但此时此刻胡肇汉却面呈死灰，浑身战栗，语不成声，连称"先生"不止。他当即招供，刚才参加会议的二十多名匪徒，都是嵊泗列岛的海盗，他们正讨论合并事宜。当晚上海市公安局果然在附近河浜中的两条木驳船上搜得二百支冲锋枪和数挺机关枪。胡肇汉还承认：从香港到台湾后因人事不熟，并未与匪特机关取得联系，后转至舟山找到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这才接上了头，被委任为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官。他们起初企图携带电台从宁波沿海登陆，因我戒备森严而未果，最后只能从香港入境。胡肇汉自知罪孽深重性命难保，一再恳求政府保全其妻儿的性命。

1951 年春，胡肇汉在苏州伏法。"杀人魔王"终于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徐有威　陆益军）

那厚村韦秀英毙命

韦秀英，女，广西邕宁人，生年不详。电影《英雄虎胆》中女匪首的原型。民国初年随父母迁往南宁谋生，与张瑞贵为邻，张从军当上连长后，即与韦秀英成婚。1948 年，曾任军长而闲居广东从化的张瑞贵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命他指挥地方杂牌军进驻钦城，妄图对抗我南下之解放军，挽回失败的命运。

位于广西西南部的十万大山方圆百里，山峦起伏气势雄伟，这里曾经是哺育革命的摇篮，但也是土匪出没无常的老巢。

1949年，张瑞贵纠集了数千国民党地方杂牌军大举进攻我十万大山区的游击队，在但钦县贵台一役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被迫退驻北海。这年岁末，我南下解放军席卷两广边陲地带，国民党主力部队白崇禧的残部争相逃命，张瑞贵自知末日将至，便事先派其结发妻子韦秀英去家乡作好潜伏之准备，以图东山再起。至广西北海解放时，张瑞贵只能只身亡命海外。

1950年十万大山区刚被解放，人民觉悟普遍不高，人民政府的基层政权尚未巩固，隐伏下来的国民党骨干成员与当地官僚地主互相勾结，纠集起二十余股二万多人的散兵游勇和土匪特务，肆意攻打我区乡各级人民政府，杀害革命群众，一时间血雨腥风刮遍了十万大山的角角落落。

同年2月中旬，先期外逃在海南岛的张瑞贵派遣特务李成威持台湾国民党的指令潜回广西，和潜伏下来的韦秀英策划暴动。韦秀英纠集匪首黄正球、韦雨庄和朱广畴等数十人，在大寺南间组织起"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韦秀英自任"总指挥"，并定于3月1日为总暴动日。就在这一天，长滩的匪首杨茂培、宫著勋等结合匪徒一千多人，围攻那枭村，杀害我解放军和征粮工作队四十一人。接着，大寺、那蒙、那彭、那思、那香和沿海一带土匪活动陆续公开化，日趋猖獗。时至1950年6月，韦秀英手下的匪徒已扩充至二千多人，他们到处设卡收税，断绝交通，杀害拥护我党的基本群众，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说来韦秀英只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平庸妇人，就是在家庭中也不过是个失宠的官太太，长期被张瑞贵抛在一边过着寂寞的生活。然而此时由于她得到了台湾的支持，加上是"将军"的夫人，使得昔日盘踞在十万大山区的各路股匪不由得刮目相看，纷纷率股

人伙甘拜在她的脚下，韦秀英遂摇身一变，成为“威震”十万大山的女匪首。到10月间，韦秀英的匪帮又扩展到了五千余众，拥有二千多条枪，竟被编成两个师、四个纵队、两个支队这样颇为“庞大”的规模。我部分区乡政府一度陷于瘫痪之中，边远山区人民只好各自为战，以应付极度的困境。

正当韦秀英因自己的得手而得意忘形时，毛主席两次对广西剿匪下达指示，限于1951年“五一”节前彻底肃清广西的土匪。1950年11月，广西省委和军区立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总结前段剿匪经验，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击破”的方针以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大力进剿十万大山的这伙匪帮。在广东钦廉军分区的配合下，他们首先堵绝了匪帮逃往越南的去路，对敌布下了天罗地网。

然而韦秀英对此却是一概不知，依旧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11月下旬，广西横县、灵山、合浦诸股匪被我剿匪部队逐个击败消灭后，韦秀英这才感到大事不妙，但何去何从却依旧举棋不定。直到她所属的朱广畴部被我军消灭后，韦秀英这才感到末日将至，立即决定逃跑了事。

12月初，韦秀英率手下一千多骨干份子，向西流窜企图逃入越南境内。他们在宁明即被我军赶上，遭到迎头截击，遂被围于九特、俊仁、大平和公安等地。韦秀英多次突围，均被打退，最后被歼过半。绝望之余韦秀英又改向那勤方向回窜，但当到那勤又被我军另一部断其去路。黄昏时分韦秀英抵挡不住我军的凌厉攻势，向大菉方向逃窜。当夜我军得此情报，连夜追踪而去。12月13日早晨在那厚村将韦秀英残部团团围住。次日11点我军展开最后的围歼，一些顽匪转移到一楼房中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使我军伤亡不少。战士郭善林见状怒不可遏，在密集的枪声掩护下，他用梯子爬上楼顶，掰开瓦面投下一集束手榴弹。只听“轰隆”一声，最后的匪巢中烟火弥漫。血肉模糊的十多具匪徒尸体七横八竖着，其中一五

十岁出头的农妇模样打扮的女尸躺在门坎上。经辨识，这就是罪恶累累的女匪——韦秀英。

（徐有威）



落网始末

张东山，黑龙江人，生年不详。电影《林海雪原》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匪首“座山雕”的原型。素有东北“三代惯匪”之称，早年啸聚山林，历经张作霖、张学良和日本占领时代。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委任为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

经过我民主联军牡丹江军区二团官兵一年多的频繁激烈的剿匪战斗，到 1946 年底合江省(现属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的大股土匪基本上都被消灭了。入冬以后，二团对东北“三代惯匪”张东山(绰号“座山雕”)进行了多次搜剿，歼灭了其大部，但潜伏在海林县北部夹皮沟山里(现属海林县林业局夹皮沟林场)“座山雕”的老巢，却一直无法找到。

说来这个张东山确为狡猾异常的惯匪，其行踪诡秘的程度，连军阀张作霖父子和日本侵略军也奈何他不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委任他为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之衔，使得他的气焰更为嚣张了。二团曾用一个营的兵力背着行李，带着炊具进山搜索了一个多月，却丝毫未能发现其一丝踪迹。因为在那茫茫无踪的林海雪原里，大部队行动很不方便，土匪很容易发现我军行踪而隐蔽起来。

1947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在海林镇农会办公室的地上，发现了一封写给农会主席贾润福的信，原来是张东山匪队向他勒索二十件棉衣、十袋白面，限三天之内送到胡家窝棚，否则就要他的脑袋。二团首长读到这封信后，确定张东山的老巢仍在海林北部山区，而且人数也不太多。于是找来三营七连一排一班班长、素有侦察英雄之称的杨子荣，要求他一定要摸清张东山匪穴的情况，能打就打，不能打也要搞清地形地貌，如能抓个“舌头”回来搞清地点，再派队伍去围剿则更好。总之，只要消灭了张东山这个匪首，匪队自然也就不战自溃了。

杨子荣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但也感到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因为张东山靠着其几十年的土匪生涯和山林活动经验，从不股集活动，总是少数人分散出入山林。他的老巢更是极其秘密隐蔽，除少数亲信知道外，一般土匪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从俘虏的土匪和群众那里是得不到一点线索的。

经过周密的考虑，杨子荣决定这次化装成被我军歼灭了的王枝林匪队的残部，先设法与土匪直接见面，拉上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后，再打入匪巢智擒张东山。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精悍的侦察小组，孙大德、魏成友、赵宪功、孙立珍和耿宝林等五名侦察员被杨子荣从两个侦察班中挑选了出来，他们都是侦察经验丰富且又熟悉当地情况的骨干力量。杨子荣穿上了贾润福那二尺半的黑棉袄，外罩一件日军黄呢大衣，他装成土匪头目的模样。其他侦察员也都穿上了便衣，腰里暗插上匣子枪和手榴弹。

1 月 26 日(农历正月初五)午后，杨子荣一行六人从海林镇出发，杨子荣向大家合盘托出了自己一整套的计划和设想：“从现在起，咱们正式化装成土匪，就说是东宁王枝林部被打散的人，要到吉林去投国民党。大家都要说过去学会的土匪黑话，而且一定要记住，再不能互叫同志，见到群众也不能叫老大爷、老大娘，装得一定得像。”接着杨子荣确定了各位侦察员的具体身份，杨子荣装成土匪副官，孙大德装成土匪排长，其他人都扮成匪兵。见到土匪后，主要由杨子荣和孙大德答话，其余人少插话，以免说漏了嘴。大家都认为杨子荣的想法可行，于是大家便向北大林子奔去。一路上他们不断练习土匪的黑话和动作，彼此用黑话“说山”(即闲扯)，还故意哼着庸俗的小调，表面上看与真的土匪还真有点难分彼此呢。

天黑时他们来到了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发现山角下有灯光，原来是个伐木头的大工棚，里边有十几个人身份不明。杨子荣问出一个姓孟的是把头，然后用黑话问他民主联军来过这里没有，孙大德也问了一句。但是那姓孟的一句话也不回答，好像听不懂似的。那些旁边的“伐木工”们也不吱声。杨子荣为试探这个孟把头，便故意和孙大德在工棚外边用黑话闲聊了起来，说什么他们如何被共军打散，没办法才准备去吉林那边投奔国民党等。一直这样胡扯了一个来小时，孟把头才对他们有些相信了，叫他们进屋去坐。接着

孟把头又对杨子荣脚上穿的我部队发的大头鞋顿生疑惑,对此杨子荣又立刻编造了一整套有声有色的"故事",这才使孟把头信以为真。他拿出几斤苞米面和一些盐,还拿上一些工具叫孙大德他们背着,领着杨子荣等走了二三十里地,到了大森林里的一个空木棚子里,这才对杨子荣解释道:"这里最僻静,共军来不了,你们就在这里住吧!"说完便匆匆走了。

杨子荣断定孟把头肯定与土匪有联系,他一定会给土匪去报信,所以决定等在这里。可等了两天两夜,孟把头还没有来,侦察员们不免又是议论纷纷,都要求回团部去。而杨子荣则竭力说服大家说,这是土匪在试探我们。果不出其所料,又等了两天一夜后,孟把头终于出现了,他别的没有说,却提出要带杨子荣他们去夹皮沟抢东西吃。孙大德思量夹皮沟是我民主联军常去的地方,群众都认识我们,故而很有些担心,而孟把头则一味地坚持要去抢劫一番。杨子荣明白孙大德的心事,更看透了这是孟把头的又一次考验。为了使孟把头彻底放心,杨子荣对孙大德说:"有粮咱们就去!"

回到木棚子后,杨子荣又心生一计。他说很多天没有洗脸了,便让孙大德弄点雪来烧化洗脸。他趁孟把头没注意,在水里放了些黑灰,以便把脸弄黑些,群众好认不出来。轮到魏成友时,他说水太黑不洗了,这下引起了孟把头的疑心。杨子荣又机智地大骂孙大德不会办事,连弄来的水都是黑的,乘机抬脚踢翻了脸盆。这才又一次消除了孟把头的疑心。

等到杨子荣他们真的到夹皮沟进行了一番"洗劫",回来后又像土匪一样抢吃抢喝后,孟把头这才相信这些是"自己人",于是他承认自己是张东山的联络副官,愿意引荐他们入伙,又说山里会来人和他们面谈的。由于杨子荣的耐心,果然把张东山匪队引了出来,大家都非常高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天山里果然下来了两个土匪,他们用土匪黑话盘问了杨子荣后便走了,并答应明天再来。可是第二天他们并没有来,侦察

员们又都埋怨杨子荣说好不容易见到了土匪，只要把这两个“舌头”带回去就算完成了任务。但杨子荣坚信土匪肯定会再来，他的目标不是要抓几个“舌头”，而是要直接活抓张东山。

又过了两天，那两人真的又来了。他们说张东山要和杨子荣拜把兄弟，请他们上山过元宵节，他俩现在就去牡丹江买酒肉，到时候再来接杨子荣他们。

两个土匪走后，杨子荣他们进行研究后，马上派出魏成友回团部汇报情况。在一个屯子里魏成友见到了团部派出来寻找他们的七连一个排，他和率队的副连长说明情况，要他们快撤兵以免引起土匪的怀疑，影响杨子荣打入匪巢的计划。接着魏成友又赶回团部，向作战参谋介绍了他们的计划种种。随后魏成友便立即返回杨子荣等住的大木棚子，大家磨拳擦掌地准备大战一场。

元宵节下午，那两个土匪果然回来了，说过节的酒肉已筹办好了，明天接他们上山，说完便走了。杨子荣和战友们又进行了研究，最后大家决定，张东山太狡猾，再拖下去怕夜长梦多。只有当土匪来时先将他们绑起来，叫他们领进山去，这样才便于动手；要尽可能地继续装成土匪，骗取敌人信任。如果被敌人识破，就进行强攻。

第二天下午那两个土匪来了，杨子荣等立即动手下了他们的枪，将他们绑了起来。杨子荣假装发火地用黑话骂道：“你们这两个小子，也他妈的太不讲交情了，我们等了这么些天，都要饿死了，也不领我们上山。你们安的是什么心？是不是五爷（指张东山）给我们的给养都叫你们独吞了，快说，是不是？”那两家伙急忙进行解释，但杨子荣装作不信的样子，要面见张东山当面对质，叫他俩赶快领着进山。

就这样杨子荣他们押着两个土匪在没脚深的雪地里走了三十多里地，在大砬子山里见到了土匪的第一道卡子房。由于同行的土匪的答话，杨子荣很快将岗哨缴械并绑了起来一道前行。又走了二里多地遇到了第二道岗哨，因为这些土匪人多，杨子荣只同样绑走

了哨兵，并没有惊动正酣睡着的土匪们。又往前走了二里多地，看到了第三道岗哨，这里可是双岗。杨子荣佯装大怒："是不是不想叫我们见五爷，怎么走这么远还不到。"那两土匪说："这条路是最秘密的，很不好走，前边就到了。"此时，果然前面出现了微弱的灯光。

杨子荣让孙立珍等三人看押住那六个土匪，他自己带着孙大德、魏成友向灯光处摸去。走了百十米后，他们从林子缝中看到有一座埋在雪里的大马架子房，门前没有岗哨。杨子荣等摸到房前，一脚踢开门，枪口对准了炕上的土匪："别动！"孙大德立即冲进屋站到了东南角，魏成友则抢占了西南角。这时他们才看清楚屋内的情形，屋里点着一盏马灯，还有松树明子；炕上睡着七个土匪，其中一个瘦小的老头，有七十多岁，白头发，下巴上一撮白山羊胡子，鹰勾鼻子，两只深陷的小眼睛发着阴森森的目光。一望便可推测此人正是"三代惯匪"张东山，这个号称"座山雕"的老匪首现在穷途末路，只剩下身边这几个人了。

张东山一看有生人进来，赶紧伸手摸枪。只见杨子荣一个箭步窜上去，踩住了他的手，缴了他的枪。其余六个土匪也都被缴了枪。由于土匪人多不好对付，杨子荣他们仍装成土匪，并故意愤怒地用黑话斥责张东山：我们不过是借条路去吉林投国民党，你们却这样不讲义气，让我们等了八九天，好险没饿死。张东山一听冲进来的这些人原来是那两土匪提及过的要联络入伙的土匪，顿时放了心，他连忙道歉道：误会，自己人好说，那些都是为了考验你们是不是共军。当张东山听杨子荣说，只需张东山亲自送他们出"地面"，过了铁道便放自己回来后，他更是连声说："误会，误会，一定送你们。"另外六个土匪也同声表示一定护送，请杨子荣他们放心。接着杨子荣他们将张东山等捆绑结实，押着他们向南走去。可笑的是张东山等为了表示信任，竟连随身的武器也没带上。

就这样他们爬过了一座山，天大亮时已看到了二团团部供给处派到这里拉木头的大车。张东山说那是共军的大车，得快避开。

杨子荣笑着说:"正好,卸他们几匹马,骑上走更快些。"这时一个土匪一看不对头,转身就跑,杨子荣一枪就打中了他的腿部。众侦察员大喊:"不许动!"供给处保护大车的一个班的战士也打枪威吓敌人。这时杨子荣才公开了身份。张东山等土匪一听都耷拉下脑袋,腿肚子一软瘫坐在了地上。张东山嘴里嘟囔着:"真晦气,大帅、少帅(指张作霖、张学良)、日本鬼子都没整了我,竟被你们几个土八路整了。真是打了一辈子鹰,最后还叫鹰啄了眼……"张东山这股匪帮终于被击败了。

民主联军在海林镇小学召开了公审大会,张东山即被送往牡丹江军分区司令部审讯处理。不久张东山因病死亡,走完了他几十年的土匪"道路"。

(徐有威)

功德林再生



徐远举，字希哲，号嘉庆，湖北大冶人，1914 年出生。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国民党特务头目“徐鹏飞”的原型。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1932 年进入军统局前身力行社系统，成为一职业特务。此后先后任国民党西南行辕调查组组长、重庆行辕二处少将处长、保密局北方局副局长等职。解放前夕在西南地区多次主持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残害革命志士，血债累累。1949 年 12 月间潜入昆明活动时被捕。

徐远举在 1949 年 12 月被云南起义将领卢汉逮捕后，旋被送往昆明军委会，随即被押往西南公安部，关押在昆明陆军监狱。一年后，又被押送到重庆市公安局。而在重庆囚禁他的地方，正是一年前他囚禁和屠杀革命先烈的白公馆！历史是如此的无情，又是如此的公正。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来到白公馆附近的烈士陵墓扫祭，他们爆发出的雷鸣般的口号声，使正在白公馆内学习改造的徐远举面色惨白，缩成一团，不时地用袖子擦汗。过了一会儿，徐远举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只见监狱大门和侧门都紧闭着，增加了很多解放军岗哨，旨在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报仇。看到这里，过去看惯别人痛哭流涕而无动于衷的徐远举，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一串感激的泪水。

不久，西南公安部要徐远举交代过去的罪行，徐远举马上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背地里劝一同被捕的另一军统局高级干部沈醉："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徐远举怀着这种思想交代问题，常常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而在他的这番启发下，沈醉的表现也有所提高。

两年又过去了，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徐远举等移居那里。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后便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所以他曾在白公馆走廊上指着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片山沟对沈醉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但自从搬到这一新监狱后，管理较白公馆更宽松了，伙食也改成了中灶，徐远举又感到可能不会处决他，也许就在这里老死了。但是西南公安部随即撤销了，徐远举等被送到了重庆市石板坡监狱。这里的伙食标准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只能闷坐在牢房内消磨时间。此时的

徐远举越来越急躁，认为这辈子就在这里完了。

1955 年的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所有犯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被吓坏了，根据他的"经验"，过去只要将某一共产党员的材料整理好，便预示着他的生命的结束，今天监狱长也让自己把材料整理好，岂不也要让自己去死吗?徐远举面对管理员抱来的近四百张档案，心情自然格外沉重。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将这些档案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徐远举因心怀鬼胎，便冷冷地回答道："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然而，正当徐远举时刻准备去死时，管理员向徐远举等宣布，再过两天要搬回原来的松林坡监狱了。果不其然，两天后徐远举等便搬了回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这些罪犯宣布说，集中他们是为了对他们加速改造。他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的。徐远举听到了，又悄悄地对沈醉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

这次集中的人中有不少在四川制造过血债，如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徐远举，有关方面恐怕这些人外出参观学习时被群众认出来，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

1956 年 1 月 20 日，徐远举连同王陵基、沈醉等到达北京，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

徐远举进监狱后不久便患了肺结核病，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人民政府派专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质量上乘的特效药链霉素，为他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同时，战犯管理所的炊事员变着花样地给他做些好吃的食物，保证营养。治疗和护理双管齐下，徐远举的身体不久便恢复了健康。

此时，徐远举的思维也开始活跃了起来。他回忆起这五年来共产党的精心安置，和他在白公馆内对待共产党人成鲜明对照，这使他的昔日信仰有了些许茫然。现在共产党又花大价钱为他治病，看来他的这条命是不会有问题了。想到这些，徐远举的思想有了不小

的触动。

每到3月17日前夕，沈醉总会提醒同狱的人这一戴笠的“忌日”，过去徐远举听到这一“提醒”总会长长地叹一口气。但1956年3月的这次“提醒”却失效了，徐远举甚至还劝说沈醉，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不必再去提醒别人。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说得沈醉连连点头称是。从此每逢3月这一时间，沈醉再也不做此事了。

徐远举参加劳动的态度也积极了许多。他在劳动中重活脏活抢着干，有一次在砖瓦厂抱装砖瓦时，由于窑温太高，有三人最后竟休克，其中一人便是徐远举。在农业劳动时他也是从不偷懒，常和人竞赛谁挑得更多。劳动回来后人们多半先去洗澡，而这位徐远举回来后总是先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抢着看完标题后，再一队一队地去分送。最后得到了大家送给他的一个雅号：“义务报童。”

徐远举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主持过《新生园地》达十五年之久，由于他帮助别人不讲情面，曾惹出过不少事端。例如徐远举质问王陵基为什么对1927年屠杀革命志士的“三三一”血案没有勇气进行交代，王陵基大骂徐远举“特务万恶小鬼头，看你自己去遭殃”。然而徐远举却不急不躁地予以回击，劝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些言论得到了同狱许多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写稿批评王陵基的顽固态度。在真理面前，这位昔日的国民党“省主席”、“上将”嚎啕大哭之余，彻底承认了这一滔天罪行。由此徐远举被誉为“打虎英雄”。

徐远举的举动固然得到了不少赞扬之辞，但也有不少人善言地劝说他注意批评的方式方法，还有些人当面称他为“猎狗”。但徐远举却仍一如既往，鼓着那双圆圆的鹞眼回敬说：“笑骂由人笑骂，批评我自为之。”

1956年初秋之际，徐远举等人来到了繁华似锦的江南一游，

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员安排他们到雨花台烈士公园参观。当徐远举听说有此安排时，极为紧张地找到同行的沈醉开口便问："今日要到雨花台谒墓，您可知道领导的用心安在？我们将如何表示？"沈醉立即进行了一番解释，使他疑云顿消。等到达雨花台烈士公园参观结束后，徐远举等人代表众人致敬致奠时，忽闻他低头痛哭起来，而且呈昏厥状态，旋被随行的医护人员搀扶了下去。

1959 年 9 月 16 日下午，徐远举这个"义务报童"高举报纸，大喊大叫着："好消息！好消息！"原来国庆十周年之际，政府准备特赦一批战犯。徐远举兴奋之余，又清晰地意识到这毕竟是"一批"而不是全部，像自己干特务的，肯定轮不上。

果不其然，当 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宣布特赦战犯名单时，并没有徐远举的名字。不少人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性急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地嚷了起来："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一普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用徐远举本人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来说，即"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 年 11 月，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又公布了，徐远举依旧"榜上无名"，但却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这次获特赦的沈醉在与他握手分别时安慰他说，第三批一定会有他，因为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了。以此类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远举把头一摇："不合辩证法！"果然，第三、四、五批都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的。

1964 年，沈醉等一批特赦战犯应邀到功德林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徐远举和沈醉见面时，最希望知道的是外面知不知道沈醉就是小说《红岩》中的"严醉"。当他得到满意的答复时，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红岩》中的"徐鹏飞"了。两人分手时，徐远举高兴地握着沈醉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

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

在狱中徐远举曾向同狱的文强学习古典诗词，在文强的日记本中留下了他的三首习作，其中一首题为《盼赦》的无疑表露出了他的这一强烈思绪：

人间无永寿，天地有常情。

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

正当徐远举为争取重新做人而努力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吹进了监狱。徐远举凭着他政治上的敏感立即感到了其中的含义，他曾心事重重地对文强说：“我看这是一场难以估计的党内斗争。姚文元这个不见经传的小卒，竟敢大放厥词，其中必有后台……预料大赦特赦都会告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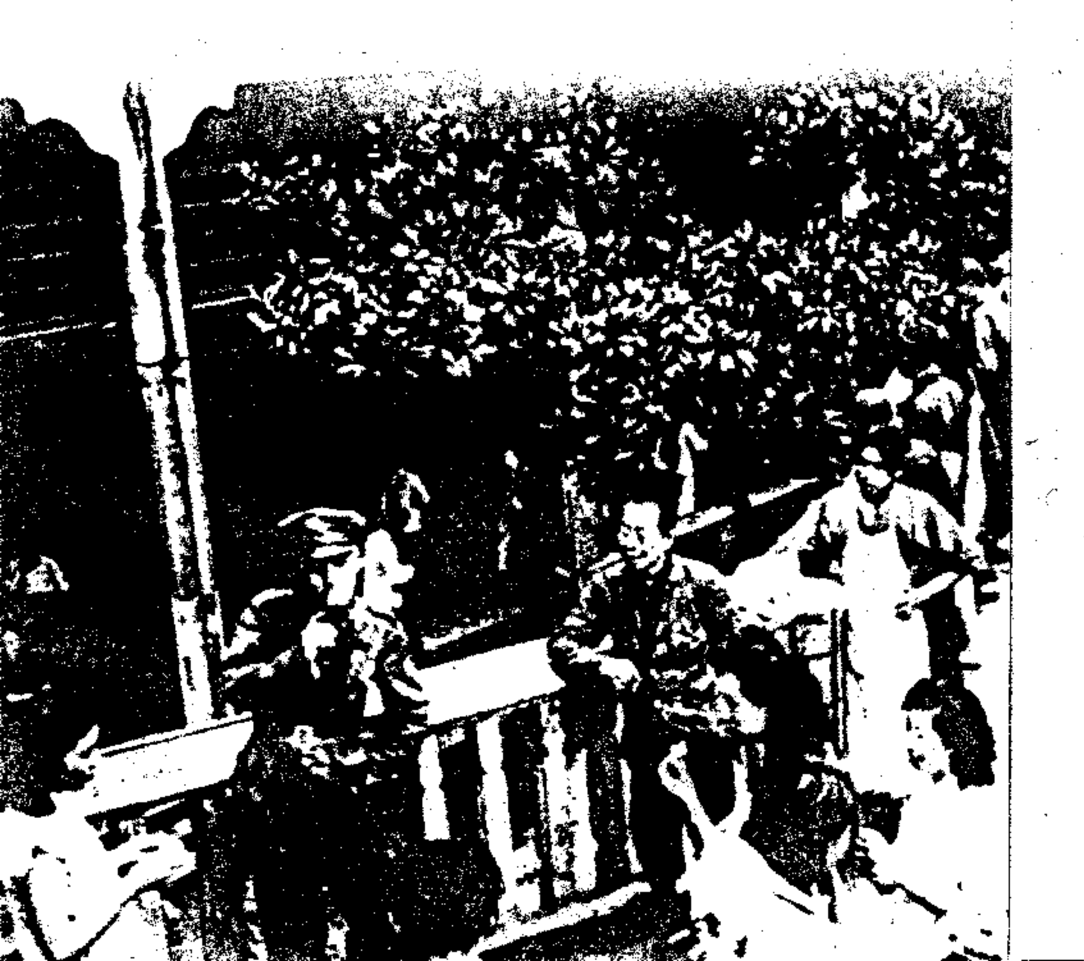
运动期间，不少造反派组织和很有来头的人都来向徐远举“索要”他们想要的材料。对此徐远举遵照管理人员的教导，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他当面告诉那些外调人员：“解放前我犯了罪，经过共产党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而私下他更是明确地告诉前军统局要员文强说：“这样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条命来顶住，不能听别人指鹿为马地顺竿子爬。我的宗旨是：第一，要重历史，不能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第二，不能无中生有的冤枉好人；第三，不能胡编乱造夸大自己的罪行。”同狱的战犯们对他这种连命都不顾的有原则、守信义的态度都感动异常，甚至连平时对他抱有成见的人也露出了钦佩的面容。

1971 年 9 月林彪叛党集团自我暴露后，监狱中政治空气焕然一新，在此新形势下徐远举又显得乐观活跃了。他再三要求多干体力劳动：“我是同犯中较年轻的一个，应该多争取一些体力劳动。我学习过《从猿到人》这本书，懂得劳动能创造一切，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他还拜了好几位战犯为师，学理发、学农艺、学缝纫，还学古典诗词，似乎换了个人，有使不完的精力。

1973年1月21日，徐远举白天缝衣后，晚上洗了个冷水澡。第二天凌晨面色苍白满身出汗，管理人员立即派车将他送往北京复兴医院抢救，因脑血管破裂于23日零时20分病故。入院时徐远举神志尚清醒，连说“感谢慈母般的照顾”，临终前紧握着监狱领导的双手不放，那眼神流露出的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徐有威）

作恶自毙的市虎山魈



“西霸天”、“黄花碎”、“镇河妖”……无处不在的土豪恶霸编织起覆盖市镇乡村的蛛网，构成为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暗无天日”。虽说收编进本章的仅是几个“网结”，但也能加深对民国社会黑暗现实之原貌的认识。

川北活阎王尸焚梓潼

黄清沅，又名黄正培，四川梓潼人，1898年生。早年是土匪，后来利用手中控制的土匪武装，与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相互勾结，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党政要员。他曾任梓潼县公安局长、保安局长、梓潼县商会主席、国民党梓潼重华区分部书记长、国民党四十一军咨议员、梓潼最大哥老大同公总社社长、川陕反共救国军顾问、江油、梓潼、剑阁三县边界土匪头头……集党、政、军、经、社团于一身。

1951年，在梓潼县重华区召开了审判昔日川北土皇帝黄清沅的公审大会。当黄清沅被押上来时，万余群众一阵沸腾。受黄清沅压迫、残害的广大群众及家属再也控制不住压抑多年的仇恨，此刻一股脑儿全迸发了出来。他们捶胸顿足，咬牙切齿，用一件件触目惊心的、由血与泪组成的事例控告这祸及四方、凶残如虎的土匪恶霸。

经过审判，黄清沅被判处死刑，当场枪决。随着"呯"的一声枪响，恶贯满盈的黄清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受他迫害多年的群众仍未解恨。他们收集了草把，一把怒火焚烧了黄清沅罪恶的躯体。看到黄清沅的可耻下场，父老乡亲们满心欢喜。他们称，除了黄虎，家富人宁。

黄清沅从一个土匪发家，成为集党政军等职务于一身、独霸一方的川北土皇帝之后，以江油、梓潼、剑阁交界的重华为虎穴，上至马角，下至梓潼，西至武都附近，东界剑阁武连，纵横二百余里，控制反动武装，操纵金融买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官僚、党棍、土豪、土匪、哥老合一的封建势力。他依仗有专员公署和四川军阀撑腰，指使手下的土匪、袍哥及公安局的兵丁为非作歹，奸淫掳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

他穷凶极恶，杀人成性，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1939年冬，在重华乡小学教书的老师张华沛按规定应补领薪谷一石四斗。由黄清沅包管的公粮粮谷用小斗量了一石四斗，明显秤斤不足，又多是秕壳。张华沛对此愤愤不平，但又敢怒不敢言，于是到城里暗暗告了黄清沅。谁知，县政府的官员与黄清沅是一丘之貉。状纸转手就到了他的手中。黄清沅见到状纸，怒气冲天：一个小小教书匠竟然敢状告我黄清沅，这分明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于是他派出打手在重华街上明目张胆地把张华沛绑架，口塞棉絮，全身用旧棉絮紧捆了两层，然后浇上煤油，用火点着，当众活活烧死。

死后的尸体还被送进砖瓦窑内化成灰烬。

且不说一介平民百姓，纵然是政府官员，若在川北地面上冒犯了黄清沅，同样难逃毒手。黄清沅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他会不择手段将对方置于死地。国民党重华区区长彭越生原本是和黄清沅有些交情、见面称兄道弟的人物。结果就因为一点小"误会"，被他活活整死。事情是这样的：

1935 年初，由于红军在川北一带活动频繁，国民党地方政府要求各区区长每晚亲自率队"清号"，以防"匪患"。所谓"清号"就是查旅馆，让旅馆老板把旅客带到门口排成队，点名清查。在重华街上有一家旅馆是黄清沅的心腹亲信开的。不知实情的彭越生神气活现地率队到了旅馆之后，不由分说便勒令"清号"。老板蒋铁匠见此架式，仗着主子的权势当然不肯卖帐。于是双方大打出手，经过一番争斗，蒋铁匠狼狈逃窜，到黄清沅家中向他求救。黄听了事情的原委之后，拍案大怒："打狗也不看看主人，这明摆着是在跟我过不去。"他先叫蒋藏了起来，之后却诬陷彭越生"借查号之名，私自抓走蒋铁匠"，并命手下人把彭越生拖出来用砖块打得半死，丢进粪坑。彭越生挣扎着爬回了家，不久含恨而死。

黄清沅杀人如麻，手段毒辣，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不但如此，他还奸淫成性。见到颇有姿色的女子便使用各种手段，或抢或骗，或威逼或利诱，搞到家中供其蹂躏。待到玩腻之后还把她们当作商品，送给或卖给外地的哥老首领、土豪官僚。

旧中国"权钱一家"，有权就有钱。凭借手中的权势，黄清沅玩弄权柄，巧取豪夺，聚敛了巨额的财富。其父遗留的财产仅薄瘦田地二十八亩，破房七间。但到了 1948 年，黄清沅本人的田产（不包括三个弟弟的），已有田地四千一百多亩，山林近一千亩。他的公馆有一千六百多平方米，大小共九十八间，房屋高敞，一上一下。如果把黄清沅一家所占有的房屋面积加在一起共有七千八百多平方米，相当于解放时梓潼城区半个县城的建筑面积。此外，他还拥有

铁矿山四处，铁锅厂两处，纸厂、山货铺、旅馆及茶馆各一处。其财力之强盛在当地无人可望其项背。

种植鸦片烟是黄清沅牟取暴利的主要途径。重华地区大山多雨，土质肥沃，所产鸦片烟驰名省内外。利用优越的地理环境，黄清沅发动他的佃户和附近的农民大面积种植鸦片。尽管政府明令“禁烟”，但他却嚣张地声称：“说是我黄清沅叫种的，没人敢摸边！”在他的促动下，重华、青灵口、马角坝、文胜种鸦片的田地由原来的二百亩激增到二千多亩，使毒品日趋泛滥，黄清沅则靠贩卖鸦片烟大发横财，每年都有数十万的利润。

为了更彻底更直接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黄清沅采取了贱买贵卖和包收捐税的手段。他从老百姓手中低价收购鸦片烟、皮毛、杠炭、蓝靛、珍贵药材等货物，然后运往成都、重庆以高价售出。通过低收高卖，他每年都有十多万的盈利。黄清沅向梓潼政府包收厘金、税捐、粮秣以及各种苛捐杂税，每年只上交二万多元，而实收五倍甚至十倍于上交数。连续几年，他就搜刮了数十万元。

1949 年的冬春之交，已临近解放，黄清沅知道末日将近，对百姓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敲骨吸髓式的搜刮。他以估卖田地的名义，强迫重华附近百姓购买他家的田地，还规定了购买数额。用这种方式他又搜刮了近四万元，几乎把重华附近百姓的现金、银元、黄金搜刮完了。

除此之外，黄清沅还以县政府公管的名义霸占了附近四座寺庙的全部产业，还有一些乡绅大户的山林树木。

水满则溢，月盈则仄。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人世的规律。无论黄清沅如何嚣张，如何专横跋扈，但也终究难逃其灭亡的结局。

早在 1935 年，正当黄清沅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封联名信就使他身陷囹圄，险些命丧黄泉。当时红四军和红三十军以及红九军一部从剑阁、梓潼南面向梓潼进发。黄清沅面对革命武装惊恐万分，闻风鼠窜，率领着一千多地方武装从梓潼退到重华，又从重华一路

逃到安县。黄清沅不战自退，这对于那些恨之入骨的乡绅们来说可谓是天赐良机。梓潼黄祉生、王蕴朴、薛少叔、任清华等五十九名士绅、教师联名告发了黄清沅。绵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平民愤，同时也为了找替罪羊，于是上报成都保安处，逮捕了黄清沅。1937 年 1 月 27 日以军字 3 号文判处黄清沅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锒铛入狱的黄清沅贼心不死，为了重新获得自由，他令其三弟黄复初、四弟黄燎如将家中的鸦片烟三千多两，银元二万多元以及银锭、金子共值十多万元，运到成都，四处打点，贿赂军政要员贺国光、邓锡侯、孙震等人。旧中国"有钱能使鬼推磨"，黄清沅就这样被无罪释放，又回到重华当土皇帝。

黄清沅虽然用钱买回了一条性命，得以苟延残喘，但是天网恢恢，他作恶多端，天理难容。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垮台后，黄清沅真正感到了大难临头。但他仍不甘心灭亡，率领土匪武装抵抗解放大军，进行垂死挣扎。国民党百万正规军尚且不堪一击，小小黄清沅无异于螳臂挡车。土匪武装被击溃后，他仓皇逃窜，企图逃往香港。由于沿途群众对可疑行人盘查甚严，他不得不潜伏在南充，伺机而动。不久便被公安人员捕获归案，这就有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描写的一幕。

（陈建勇）

津门大恶霸  明正典刑



袁文会，天津人，1901年生。七八岁时即在日租界芦庄子中局脚工帮助其任把头的父亲剥削工人，后转到其八叔袁国友开的鸿义栈赌场站道望风，学会了见风使舵、溜须奉承的一套伎俩，深受警察署探长刘寿岩的赏识，后被刘收为义子。1926年以后袁又拜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的青帮徒弟白云生为师入帮。不久袁与白玉生的另一青帮徒弟李子珍联手揽了王三在新旅社开的赌局，取而代之。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因时局动荡不安，赌局处于萧条状态。袁文会与几个亲信合计，决定将新旅社赌局改为花会，同时又在新津里一带再办一个花会。花会分为三十六门，押中者可得二十八倍的赌彩。花会中的“跑封”者走街串户大肆宣传某人中彩发了大财，诱使一些人争相投赌，袁文会坐地拿钱发了横财。

从 1931 年开始，袁文会负责包运天津日租界进出的毒品。三年中仅押运上船南运的鸦片计有二万余件，银元滚滚流入了他的腰包。同年 11 月 8 日他在邻居日本友田洋行经理友田的策动下组织千余名吸毒者参加天津便衣队暴乱，为日寇劫持清废帝溥仪去东北组织傀儡政权创造条件，不料满载吸毒者的大卡车刚从日租界冲出，即遭天津保安队和警察的猛烈阻击，死伤惨重。相持到次日凌晨便衣队不支，纷纷逃回日租界。

1933 年袁文会为了摆脱开赌局“混混儿”的恶名，在芦庄子开设会德号做生意。会德号经营烟酒罐头，由于商号离日本宪兵队不远，因此袁常为日本宪兵提供廉价便宜的烟酒罐头进一步联络感情，结识拉拢了不少日本宪兵军曹。会德号同时兼营放窑帐高利贷，袁文会以此控制窑主和妓女，为自己淫乱创造方便条件。

1934 年袁文会见日本招募华工人数急剧上升，于是在万国公寓设立柜头，代办招募华工事宜。与此同时天津城西有名的青帮流氓刘广海等人也在各处代招华工，并且有意染指在日租界的生意，为此袁刘双方矛盾日趋激烈。袁文会于是设法打通关节，与日本人开办的贩运华工的大东公司达成协议，优先办理由会德号招募的华工，手续办妥后即可拿到费用。

1935 年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三天，袁文会见刘广海等人去日租界万国公寓办事，误以为刘是来搅乱的，于是带领李子扬、郭筱波、周文瑞等打手徒弟多人前往万国公寓斗殴，刺毙刘广海的干将宋国柱，殴伤刘筱田，肇事后逃之夭夭。刘广海在案发后

向天津地方法院状告袁文会行凶杀人，但袁文会置法院传讯于不顾，只是下令李子扬作伤自戕，归官场顶事(1935年李被地方法院判刑后因病保外就医)。厉大森、黄金荣等津沪帮会头子纷纷出面进行调停。袁文会自知理亏，同意为宋国柱出大殡并赡养死者家属。但刘广海不依不饶，厉大森等人只得知难而退，袁文会为逃避法院的追究，经其干爹刘寿岩介绍逃往大连避难。在那里袁文会结识了日本特务小日向。

1936年小日向赴天津组织以青帮为主体的普安协会。袁文会经小日向介绍担任该会的行动部长兼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普安协会最初的工作重点是为日寇伪造"民意"，制造"华北自治"的舆论，"自治运动"低落后，该协会经常性的工作就转为造谣捣乱、刺探情报和走私贩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于7月30日占领了天津。袁文会依仗着日本宪兵队的势力，从习艺所里将凶犯郭筱波、周文瑞等要了出来，让他们逍遥法外。天津沦陷初期，发生了日军用车在东车站被抢事件，袁文会闻讯主动向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要求由他负责追查，于是袁文会带了自己的一伙流氓加上三个日本宪兵去河东地道外小市场商店里挨户搜查，凡有售卖军鞋、军用水壶等可疑物品的商店全都遭了难，结果共有七八十人被袁文会抓进了宪兵队。1938年4月袁文会得悉刘广海的秘密住所，立即向日本宾兵队诬告刘组织抗日活动，派人将其逮捕，报了私仇。

1938年11月，袁文会在日寇的指使下，收编土匪武装，开赴霸县一带，到霸县后袁自任警备队长，搜捕八路军零星人员。"袁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不久这支土匪部队被八路军打散，袁见大事不好狼狈逃回天津。

同年日本大东公司改组为满洲劳工协会，袁文会为了扩大招募华工的规模从中赢利，先后在荣业公司、涌泉庙地揽地找房作为

新的华工集中住宿地，将会德号改名会记栈，准备大干。接着他又和日本人接洽，在桥立街(今北安道)设立馒头房，供应在津住店的全部华工的干粮。开初，住其他店的华工不愿买袁文会馒头房的干粮，袁就派打手去各店刁难捣乱，迫使各店只好劝住店华工去买。馒头房供应华工食用的干粮，论个不论斤，同日本人结算则是按斤计价，其实每斤干粮华工至多不过拿到八两。袁文会还派人多次与满洲劳工协会交涉，包办借地给华工照相、代购华工出境的火车票、轮船票，从中捞回扣分成。面对日寇汉奸的虐待，一些华工不堪忍受不断逃亡，袁文会则随时抽调打手追踪抓捕，凡被抓回者惨遭木棍殴打，被打死者则被袁文会一伙扔进海河。据统计，在日本侵华期间从天津口岸贩运走的华工不下十万人，而袁文会的会记栈从 1938 年至 1945 年招募的华工竟达六七万人！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对袁文会大加青睐，专门为此颁发了感谢状。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在舆论压力下着手惩治汉奸，袁文会见势不妙，住进天津交通旅馆避风头。10 月 17 日晚上当他过足烟瘾，步出旅馆想去闲逛散心时，被刘广海手下的刘筱田等三人撞见，扭送警察局。11 月 5 日根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发出的代电，袁文会由天津警察局解送天津警备司令部依法讯办。1946 年 1 月 9 日又从警备司令部移转天津肃奸委员会继续侦讯，转押于军统局看守所。军统局为了套出袁文会的真实口供，特派汉奸高铁侯作"狱情"与袁共同关押，骗取袁的信任，探知实情。

1947 年 12 月 12 日天津地方法院下达判决，认定"袁文会率周文瑞、郭筱波、王恩贵、李子扬等在万国公寓群殴，刺毙宋国柱殴伤刘筱田，事后逃逸，以共同杀人罪处袁文会有期徒刑十年。"至于抗战后招募华工、杀死华工"属汉奸案内之罪行，本院无权审判，不予受理。"判决后袁文会不服，上诉河北高等法院一分院。次年 3 月底经最高法院书记厅多方商洽，袁文会汉奸案转移在北平的河北省高等法院审理。

1950年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法院决定将袁文会押解回天津审判，以便就地教育和启发群众。同年12月20日天津市人民法院经过认真调查，判处袁文会死刑，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12月25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袁文会在天津小王庄刑场被执行死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邵　雍）

内乡土皇帝气数殆尽

别廷芳，河南内乡丹水区人，1883年出生。1929年任四县联防司令，后又晋升为宛属三县联保主任，并骗得河南第六区自卫军司令一职。他宣称“治乱世，用重典”，建立了严密的保甲制度。1930年，在内乡发行“流通券”，强迫人民使用，以搜刮民财。他又收笼文人写了《地方自治》、《沿河改地》、《农业浅说》、《植树经验谈》四部书稿，奔走呈送。

1938 年，蒋介石召见别廷芳，在听了别廷芳“宛西自治”的面禀词之后，大加赞许：“好，好，实在的好！”并立即颁布手谕，封称内乡为“全国三大模范县”之一。

于是内乡出名了，别廷芳更是达到了他统治的巅峰。

人称别廷芳相貌丑陋，嘴巴宽，门牙长，短短的脖子整天缩在衣领里。豹头环眼，剑眉倒竖，活像个凶神；走路外八字，背脊又圆圆地突起，一扭一摆的样子，俨然又是个猪八戒再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其貌让人不敢恭维的“草莽”，却由小小老虎寨的寨主，步步发展，成为一统内乡的土皇帝。当地小孩子在开玩笑时，常常是咬着牙，恶狠狠地说：“老子别廷芳，张口日你娘，高兴我剥你的皮，生气我抽你的肠。”别廷芳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别廷芳的发迹史是内乡人民的血泪史，也是国民党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权钱交易的罪恶史。

别廷芳暴戾、凶残，随着权势的扩大，他的气焰更是嚣张，想打就打，想砍就砍，无人敢挡。他下令在内乡范围内修筑四通八达的公路，由保长负责监工。他们对筑路工人动不动就毒打，死于棍棒之下的冤魂累累，三百公里长的路面上，铺满了广大人民的血与泪。公路修成以后，别廷芳派联保主任养护，雨后铺沙，雪后扫路，发现不平的地方轻则责打，重则枪毙。一天，别廷芳外出检查路面，发现两个小坑，立即招来联保主任，让其跪在坑里，痛打五十木棍。在这样的棍棒统治之下，全县的公路，砂石铺面，一平如镜。这便是“模范县”的“业绩”。

别廷芳也搞“植树造林”。他要求所栽的柳树不能被他拔起。有一次，菜园联保主任为此挨了别廷芳的耳光，便将过失降到植树人庞甫申的身上，用香火将庞活活烙死。毫无人道的责罚换来了柳树成活率的提高，多年后便郁郁葱葱起来。别廷芳还将七百余顷沙地改造成良田。

为了防止资金外流，别廷芳还规定本县人只准穿土布，不准穿洋布；只准吸水烟、旱烟，不准吸纸烟；并禁止吸食鸦片和赌博。

1934 年至 1936 年，别廷芳收笼文人，搜索枯肠，为其写成《地方自治》等四部书稿，四处奔走呈送。

同时，别廷芳勾结刘峙及其夫人，与宋美龄拉上关系，1938 年又亲赴武汉面见蒋介石。别廷芳刁诈得很，他的贿赂手段也很高明。明的是说："蒋委员长和夫人昼夜为国劳苦，送些猴头、燕窝等山珍海味滋补身体"，实际上他向宋美龄呈信一封，没有片言只语，装的却是一张二十七万元现洋巨款的支票。

宋美龄一见大喜，当夜便向蒋介石吹了"枕头风"，极力夸奖别廷芳的诸般好处。蒋介石是爱听宋美龄的话的。第二天就召见了别廷芳，于是有了封内乡"全国三大模范县"之一的手谕，于是别廷芳有了这样那样的"风光"。

在别廷芳歆享着"皇恩浩荡"的同时，他还加紧谱写他美妙的晋升"国家要员"的狂想曲。他深刻地感受到靠金钱魅力得到的庇护，于是加紧了他那令人发指的罪恶活动。

他开始变本加利地搜刮民财，滥杀无辜。

当时，他利用"归顺"过来的张仲起，带领三百多人将从张堂村拉来的二十九万元银元埋于别家院子的一口井中。事成之后，怕走露风声，与亲信密谋暗商，将三百多名陕西官兵和十几名石匠以"庆功"为名灌得酩酊大醉，而后捆绑至后山，用斧头、刺刀一一弄死，埋入事先挖好的大坑之中，后人将此处称为"万人坑"。

别廷芳的招摇、嚣张，在河南宛西区域内越来越显得不可一世，并有不断扩展之势。当时，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驻扎在河南。他为了打击别廷芳，曾派便衣别动队在宛西各县乡间胡作非为，尤其是缉私队，明抢硬要。在别廷芳的暗示下，地方上趁夜间活埋了一些别动队人员。汤恩伯找到别廷芳责问，别装着一副糊涂的样子："别动队咋个别动法，我不知道。你也不给我说一下咋个别

动，别动队不见了，你找我，我找谁？"气得汤恩伯咬牙切齿："别廷芳，我早晚要和你算帐的！"

驻洛阳司令长官卫立煌看着别廷芳日益猖狂，也深切地感到别势力的发展威胁着国民党在洛阳地区的统治，决心刹刹其威风，否则必将是一种祸患。

第一步，卫立煌委任其部下为南阳专员，替换了原专员、赃官朱久莹。并明白地指示亲信鲍庚说："你这次去南阳，手脖子要硬，务必把别廷芳的恶势力连同其非法制度取消。"卫立煌还说："到了南阳，动作要快，并且设法让他来洛阳。"

得了主子的令箭，鲍庚一到南阳，便拿当地实权人物、别廷芳的头号心腹别光汉开刀。要别光汉取消设在南阳的司令部，回到内乡去，将内乡民团的预备队取消，兵工厂停产，人员遣散。如有不从，军法论处。

别光汉连连称"是"。赶紧回到内乡，将情况汇报给别廷芳。别廷芳不由暗中叫急，隐隐地觉出一种冲他而来的力量，而且来势凶猛，急召心腹商议对策。

别廷芳还想以金钱贿赂来打点，他还没来得及行动，又传来卫立煌的命令：速赴洛阳，不得有误。别廷芳当即魂不守舍，语无伦次地说："气数尽了，气数尽了，天灭我也，天灭我也……"

别廷芳带着紧张与不安，诚惶诚恐地赶到洛阳。立即战战兢兢地去拜见卫立煌。这时，卫立煌光顾着自己看报纸，头也不抬，傲慢地对别廷芳说："你先下去，有空再谈。"

就这样，别廷芳被软禁了起来。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土魔王怒不可遏，却又是无可奈何。但他还期望着别光汉会为他四处打点，还想着如何去"烧香拜佛"以平祸端……

正巧，别廷芳被卫立煌软禁的消息传到了汤恩伯那里。汤恩伯对别廷芳盘踞一方、恶霸内乡也早已深感威胁，加上以前有过节，这次便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汤恩伯派参谋长到洛阳专程“看望”别廷芳。参谋长凭借汤司令的名号，要见被禁中的别廷芳自然是易如反掌。而久不与外人接触的别廷芳，对参谋长的到来，自然是惊喜万分，他以为是家人的打点起效果了。更加上参谋长一再声称：“汤司令对你还是相当器重与关心的，派我与卫司令长官交涉，不久就可以自由了。”

接着，他又是给别廷芳敬上“浓茶”，又是给别廷芳递上香烟。

这时的别廷芳，早已是感激涕零。说道：“多谢汤司令与参谋长关爱，此恩别某铭记在心。只要我能回到内乡，日后有需要别某的地方，别某在所不辞。”

说着便向参谋长下跪，参谋长赶忙将他扶起，拍着他的手说：“你放宽心，好好休息，归去之日，旦夕将至！”

别廷芳目送参谋长远走，心中还有着道不尽的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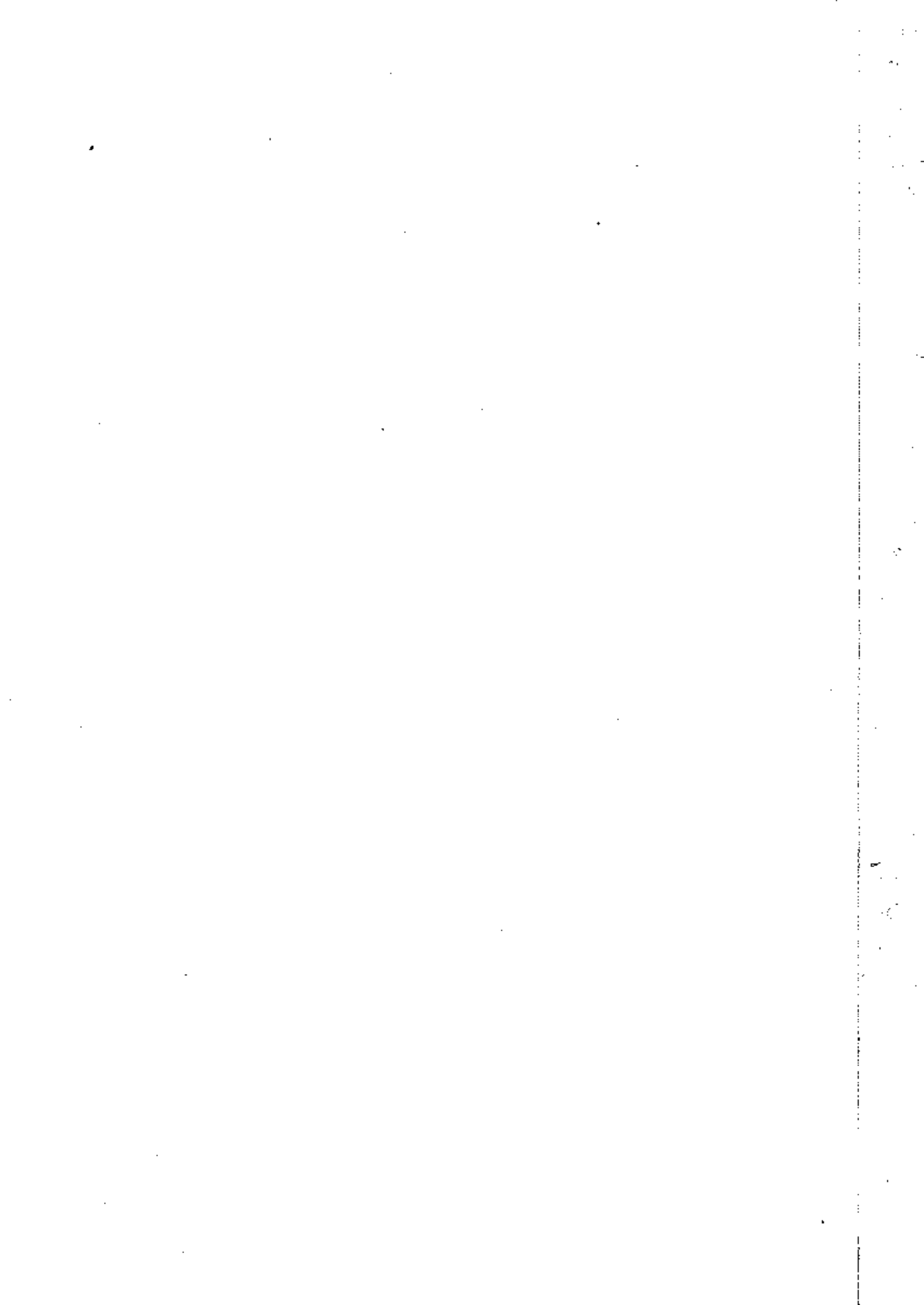
当晚，别廷芳突然感到腹痛难忍，竟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是年五十七岁。

原来，参谋长接受了汤恩伯的指示：务必铲除这个恶人。便在茶中下了毒。别廷芳自以为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又谁知千恩万谢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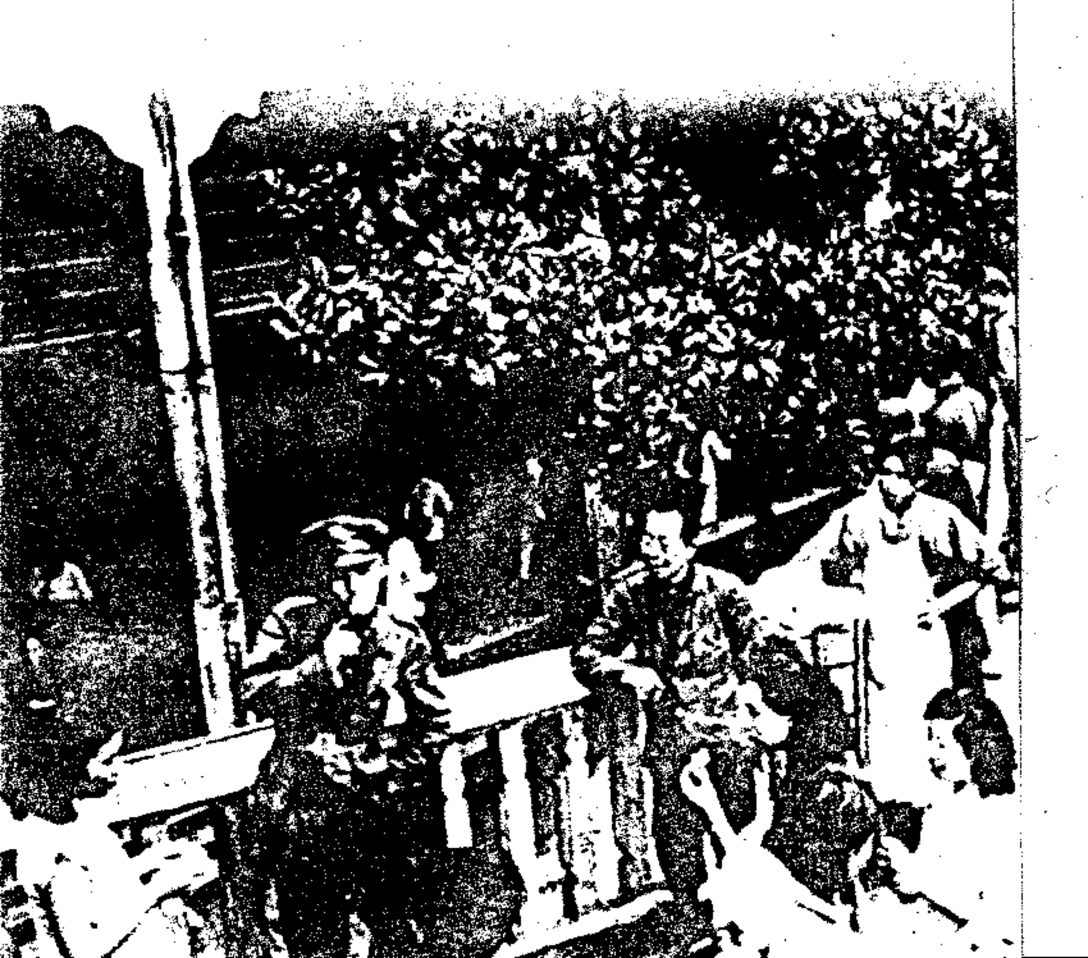
对于别廷芳的死，还有一说。由于别廷芳与汤恩伯积怨日深，1939 年底，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汤恩伯利用其上层关系，使别廷芳在众人面前遭到训斥责骂。别廷芳咽不下这口恶气，却又无可奈何，所以在春节前回到西峡口后，就病倒了，开始吐血，后来越吐越多，次数也日益增加。虽然李宗仁从老河口给他派来了一位挪威医生，但已无法挽回他的生命，1940 年 4 月 3 日深夜死去。

不管是被毒死的也好，被气死的也好，总之，别廷芳这个土霸王是死了，也许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气数尽了。”

（石　瑛）



“名妓”萍踪



民国娼业的畸形繁荣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几个略具代表性人物身世的速写，有助于加深对这个奇特而复杂的社会群类的具象认识，同时也是了解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埋骨陶然亭



赛金花，本姓赵，名彩云，又名梦鸾、灵飞。赛金花是她从事烟花生涯的艺名，此外还有傅彩云、曹梦兰、傅钰莲等艺名。原籍徽州休宁，1872年11月1日生于苏州。因家道中落，于十三岁时受人引诱，开始"清倌人"的青楼生涯。两次特殊的际遇，使她成为有清一代名满京津沪的名妓。

1886年，傅彩云在“出局”画舫时，结识了曾中状元的洪钧。

洪钧，字文卿。1868年一甲第一名进士，曾任陕西、山东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北、江西学政，结识彩云时正丁忧在家为母亲守孝。风流状元洪钧见了彩云后，立即被她的音容笑貌和风度迷住，翌年便正式纳彩云为妾。同年5月，洪钧受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彩云作为公使夫人随行。洪钧出使四年，其中在德国柏林时间最长。出国时带了一老一少两名女仆，但因星使夫人喜洋仆而厌华妪，随侍两名女仆先后回国。当时她身边有四名洋丫环，还专门请了一名欧洲女仆陪伴，整天陪她吃饭，聊天，玩耍，教她说德语。这样，性本聪颖的彩云，在出使四年中对欧洲的礼节习俗乃至语言不说熟谙，也称得上粗通。她见过几次德王与王后，也见过有名的俾斯麦。她在德国于1889年5月22日，生了一个女儿，名德官。此外她还到过圣彼得堡、巴黎、伦敦等处，见了世面，开了眼界。这与她在庚子国变时的所为不无关系。洪钧任满回国后，升任兵部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彩云带了女儿和母亲同住在北京。1893年8月洪钧病殁，彩云随灵柩回到苏州。不久，便离开洪家，才四岁的女儿德官被强留在洪家。

此时的彩云，才二十出头，娘家父亲已死，弟弟尚未成家。因一家人生活无所依靠，便带了母亲和弟弟到上海，在今九江路彦丰里租了一幢五楼五底的房子，包了两个姑娘挂牌应客，自己做老鸨。平时轻易不露面，后来，知道她底细的人多了，都想一瞻状元夫人风采。在这种情况下，彩云便以曹梦兰之名挂牌，每周两天见客，车马盈门，声名鹊起。

洪家知道后，认为这是耻辱，便诉诸上海道台，上海道即下令公堂谳员，勒令彩云撤牌从良。彩云只得改名傅钰莲，搬到大兴里营业。号称沪上花界“四大金刚”的林黛玉、金小宝等人都在这里营业，彩云与她们结拜成义姐妹。1898年春，彩云又北上天津，改名

赛金花，组织全为南方女子的金花班，在江岔胡同重张艳帜。

这时的天津、北京，大小官吏生活糜烂，狎妓成风，因此金花班在天津开张后生意兴隆。赛金花结识了不少显贵，其中有官至户部尚书的杨立山，曾任浙江、江西巡抚的德晓峰等人。赛金花还借给杨立山的老太太拜寿的机会两次到北京看行情，广为交际，结识了许多官僚、名士。当时，北京还没有南班，因此，她认准了到北京组班是条财路，况且有好几位显贵的关照，便于 1899 年合家搬到北京，创南班入京之先例。

金花班设在西安门外砖塔胡同，赛金花经几位老相好的吹嘘，不久便声名鹊起，每天门前车轿拥挤不堪。就在这段时间里，经杨立山的介绍，认识了他的好友卢玉舫，经卢玉舫的再三要求，赛、卢结拜成“兄弟”，卢为大，赛为二，赛因此而获“赛二爷”称号。不久，因官厅禁止内城设立“乐户”，金花班又搬回天津。

1900 年，八国联军入寇中国，赛金花又带着班子在兵荒马乱中来到北京，想寻求权贵的庇护。但是，北京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已仓皇逃离京城，满朝群臣也逃跑一空。八国联军开进北京，烧杀淫掠无所不为。赛金花最初躲在定王府附近旧仆杜升家，后移居南城李铁拐斜街。她因懂一点德语，以及职业缘故，不时和德国军官往还周旋，以一个中国女子的善良之心，从敌人的淫威中救下了一批老百姓的生命。当敌人不分老幼，乱抓苦力时，她也前往联军统帅瓦德西处说情，请令约束兵士纪律并保护了一些文物。于是，“赛二爷”之名一时成了市井商民的护符。据说在辛丑议和活动中，赛金花也曾起过一点作用。德国因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作梗较多，尤其是克林德夫人指名说“就是不要太后抵偿，也要皇上给赔罪”。于是，赛金花被授命充当劝说克林德夫人的说客，结果以在克林德遇害处造一牌坊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中国政府把牌坊挪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牌坊。当时曾举行过一个盛大的纪念会，赛金花也应邀参加，会后合

影，站立在前排的一名女子，就是赛，或许有关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辛丑条约》签订后，出逃的一批权贵又回到北京，赛金花的营业逐步扩大。就在生意兴旺的1903年，发生了金花班一个名凤铃的妓女服毒自杀的案件，引起官场的大哄动，赛金花负有刑事责任，便送了刑部。洪钧的几位老亲友如陆润庠、孙家鼐等见赛金花在京城影响越来越大，早想解散她的班子，赶她回原籍，免得给洪钧丢丑。加上赛的案子是人命之事，便把她下了大狱。经其母亲多方活动，才得到罚款释放，出境回籍的判决。经过这场官司，赛金花几乎倾家荡产，便和母亲一起回到苏州。不久又到上海。在小花园租了一所两楼两底的房子，挂起"京都赛寓"的牌子，第二次在上海为妓。在上海营业期间，赛因虐待婢女，受到济良所控告，被遣送回原籍徽州黟县，后经黟县回聚京货店老板程梦余向县衙疏通，才放她回上海。经过这番波折，赛金花对卖笑生涯感到厌倦了。

1908年，赛金花撤榜，与沪宁铁路上做事的曹瑞忠结婚，曹比她年少三岁，对她体贴入微，热忱真挚。赛金花此时便以曹赵氏称，她为曹捐了个同知，分派在徐州一带铁路上任提调。当时她是向曹所交好的同事借了价值两千元的珠花为夫捐官，因不及时归还而受到控告，被会审公廨提审，审判结果为"人洋并保，限半月清理"。可见，赛金花与曹感情甚好，但好梦难圆，曹又于1911年死去。

曹死后，赛金花迫于生活，又重新在小花园立寓见客，还包了一个妓女赛嫒嫒。这时出入妓院嫖客的成分有所改变，革命新贵政客替代了原来的官僚士绅，赛在上海第三次立寓营业后交接的就是这批人。其中有一个金溪人魏斯灵，曾当过江西民政厅厅长，参议议员，和赛自1913年结识后交往密切，但总是行踪不定，只是每次到上海必定去看赛，对她的过去饱尝风露颇为理解同情。1918年魏决定与赛正式结婚，两人在上海新旅社举行新式婚礼，魏穿西装，赛穿洁白的婚纱礼服，手捧鲜花，是当时最时髦的文明婚礼。和魏斯灵结婚后，赛金花恢复真姓赵，名灵飞。婚后，和母亲随魏居住

在北京李铁拐斜街，与魏的其他家人分开住，魏对待她们母女都很好。

1921年是赛金花一生的又一转折时期。这年正月，她的母亲病逝，终年七十八岁。自赛金花离开洪家后，母亲一直和她一起生活。她的母亲和蔼端庄，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平时总是面带微笑，对赛金花影响较大。赛金花走南闯北，波波折折，母亲始终没有离开过她。因此，母亲的死对她是个重大打击。她于1889年在柏林生的女儿德官，当年被迫强留在洪家，也于十九岁时死去了。此时母亲又舍她而去，世上亲人只剩丈夫一人了。祸不单行的是，母亲死后半年，平时身体健壮的丈夫魏斯灵亦相继去世。遭此两大打击，赛金花惊呆了几日，竟无一滴眼泪，这年赛金花四十九岁。

魏斯灵一死，赛金花亲人全无，不愿再睹冷酷的人生，便带了女仆顾妈搬到北京天桥附近下层民众集中的居仁里居住，过起烧香拜佛的隐居生活。与她相依为命的只有女仆顾妈与其弟。

赛金花晚年不仅自己烧香拜佛，还以仙迹神话吸引了南城一带的迷信妇女，到她所设的佛堂里来烧香，许愿治病。有时还扮演一些仙佛上身的把戏，以取得佛婆们对她的信仰，同时得到一些生活来源。到1932年时，因年老多病，过着食不饱、衣不暖的凄苦生活，连八角钱的房捐也缴不起。她所住地区有人代她写了一纸呈文给公安局，请求豁免她住屋的房捐，特别强调她曾在八国联军陷京时，不忍坐视，挺身调瓦，劝令约束联军尊重人道而保护同胞的实情。现在，“衰老孤苦、食不饱，衣不暖，所有应缴房捐，历次催促缴纳均无资缴付，请求豁免。察其情形，委实凄惨，可否准予豁免”。这篇呈文一发表，立刻震动了社会，访问者接踵而至，已被社会遗忘的赛金花，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其后，赛金花凄凉的晚景频频披露报端，在《蛰居天桥之赛二爷》、《赛金花遗事》等访问记中写道：她住的屋子是“齐眉罩”式的四间，破旧而污秽，两间堆杂物，一间作厨房，一间为卧室，光线昏

暗，屋内萧然，虽尚有数件古老的纪念品陈列案上，其余均破旧不堪。此时的赛经中亚医院陈院长及刘采宸大夫的治疗，病情稍有好转，陈、刘为其治疗不取分文。赛面色尚好，但不能饮食，仍卧在床上。床上被褥污旧，衣衫褴褛，床头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那里，蚊帐已成酱黄色，人都不料风云一时的一代名花，竟贫至如此地步。

1936年12月4日，赛金花在北平病逝，终年六十二岁。

赛金花病故后，上海《大晚报》、北平《世界晚报》等都以显要地位报道了赛金花病死的实况。北平市民纪念她曾为民众做过好事，便组成灵飞治丧处，向各界募捐，由《实报》刊登启示，并指定由该报代收捐款三天。除《实报》外，各界也自动组织助葬募款机构。名教授萧一山等也发起助葬筹备处。李苦禅等著名画家于5日起在中山公园举行画展，售出款项完全助葬。1936年12月16日，北平人为赛金花举行了颇为隆重的葬礼，埋骨陶然亭。

（孙国群）



忧患余生录



小凤仙，本姓朱，1900年前后生。其父是清末驻浙江杭州的一名旗人武官，因父母早亡，由姓张的奶妈带大，故改姓张。奶妈带着孤女在浙江巡抚增韫家帮佣，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妈带着孤女逃到上海，迫于生活把她押给姓胡的妓院老板，花名小凤仙。在她日后的卖笑生涯中，碰到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蔡锷，产生了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小凤仙押给妓院老板时，还是幼女，当时上海租界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女孩做妓，老板便带着她到南京卖唱，成为一名红歌妓。1913 年，张勋奉袁世凯命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攻打南京，小凤仙跟胡老板逃回上海。后来又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卖唱做生意。

小凤仙相貌一般，性情孤傲，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极善辨别狎客才华。一天云吉班来了几位客人，其中一位商人打扮的客人独尝小凤仙。小凤仙见此人面目中有英雄气，不像那些醉生梦死的寻常人。他外似欢娱，内怀郁结。小凤仙表示，倘蒙不弃，愿为君解忧，休视奴为青楼贱物。客人见小凤仙虽未妩媚动人，却另具一种慧秀态度，又见案头文人相赠卷轴，堆积如山。小凤仙见其注目卷轴，便要求这位客人也赠她一联。客人便挥笔写下“不信美人终薄命，古来侠女出风尘”的对联，上款署凤仙女史粲正，要署下款时，小凤仙因客人伪称商贾之人，不及真名，便说，“上款蒙署及贱名，下款须署尊号。彼此混迹都门，虽贵贱悬殊，究非朝廷钦犯，何必隐姓埋名，效那鬼蜮的行径。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若疑我有歹心，天日在上，深加诛殛。”客人听了这番话，便在下款署名“松坡”。粗通翰墨的小凤仙略一思忖，才知眼前这位颇觉与众不同的客人，原来是云南名将蔡都督。但小凤仙对其如何轻身到都门龌龊之地，甚感不解。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1898 年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康梁亡命日本，蔡锷随师东渡留学，前后入日陆军成城、士官两学校学习军事。1903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回国后相继在湖南、广西士官学堂和新军中任教和任职。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率军起义，被推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此时才三十岁。袁世凯篡得临时大总统之后，对享有声誉又握有军权的蔡锷极不放心，视蔡为“危险的天才”。便以明升暗降的伎俩，把蔡调到北京，委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昭威将军，全国

经界局督办、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头衔，用“结之以恩”的办法，困蔡于京城。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以及紧锣密鼓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认清了袁的反动面目，反袁之心日强，然而在袁的爪牙的严密监视下，难于脱身离京。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和同僚涉足云吉班，结识了妓女小凤仙。

在日后二人频频交往之中，小凤仙渐渐察觉蔡锷并非儿女情长之人。她发现袁世凯的爪牙对蔡监视严密，蔡一来，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到班里别的姑娘屋里打茶围；蔡一走，就有人到小凤仙屋里来打听蔡的情况，说些什么，与哪些人来往等等。别的客人也告诉小凤仙，蔡松坡是革命党，袁世凯表面上给他挂名差事，很器重他，骨子里派人监视他，听说他还反对老袁做皇帝，叫小凤仙别跟他太热乎。

小凤仙对帝制和总统制有什么区别并不了解。蔡锷经常讲些三国、水浒之类故事和做人的道理给小凤仙听，又教她识字看书，小凤仙觉得蔡是胸有大志的好人。同时，就在她和蔡锷交往期间，奶妈从江西到北京，找着胡老板，但无钱赎身。小凤仙告诉蔡锷，奶妈是母亲，胡老板是领家，即押账的债主，必须本利还清才能自由。蔡锷便出资替她赎身，使小凤仙成为自由身回到奶妈身边，母女对他甚是感激。但迫于生活，小凤仙仍在云吉班做生意。因此，无论人家怎么说蔡锷，小凤仙确信蔡锷是正派人。

有一天小凤仙对蔡锷说：“人家说你是革命党。至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你给我讲讲。”蔡锷便说：“假如我是革命党，你怎么办？”小凤仙表示：“我不怕。”并说：“你敞开来说，我对着灯发誓，决不告诉别人。”蔡锷告诫小凤仙：“我对你说了实话，你要替我兜着，别误了我的大事。”然后，他深入浅出地告诉小凤仙：“革命党就是反对皇帝，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应该是孙中山做总统，可是袁世凯手里有兵权，他使了种种花招，做了总统，现在他觉得总统不过瘾，想要他的子子孙孙都掌权，所以又要做皇帝，我就反对他

做皇帝。”小凤仙搞不清帝制和总统制的区别，便说：“总统不是和皇帝都一样，一个人说了算，皇帝有什么不好呢？”蔡锷便告诉她：“皇帝和总统大有区别。现在袁世凯是总统，我和他平起平坐，随便聊天。他要做了皇帝，坐在金銮宝殿的紫檀椅子上，我们就要跪在地下和他说话了，矮了一截，直不起腰来，那滋味可不好受。”并郑重其事地对小凤仙说：“我们好容易把皇帝打倒，扔在茅厕里，现在又想从粪堆里爬上来，那怎么行，你帮我逃出北京城，我一定能打倒袁世凯。”小凤仙听了蔡锷这一席话，甚是感动。便表示：“你叫我干什么，是我办得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蔡锷既觅得知音，便到云吉班来得更勤，以醇酒妇人的消极态度，麻痹袁世凯的爪牙。还借此与夫人演出了一幕夫人因吃醋、与丈夫吵闹不休、蔡锷休妻的双簧：蔡锷频繁涉足八大胡同，吃花酒、打茶围，日夜逍遥市场、戏院。潘夫人因此与蔡锷打闹不休，摔坏杯盘什物不少，直至惊动袁世凯，袁命王揖唐、朱启钤两人前往劝架，然而王、朱越劝，闹得越凶，直闹到休妻才罢休。夫人借此哭哭啼啼带着儿女婆母离京。老母眷属离京后，蔡锷更无后顾之忧，并索性假意要王、朱代为“物色佳丽”。

此时，袁世凯复辟帝制已处于紧锣密鼓之际，蔡锷、唐继尧的密使往还不绝，唐催促蔡回滇，宣布独立。袁世凯对蔡锷十分不放心，但又无证据，便秘密派军警伪装盗匪闯入蔡宅，明为抢夺财物，实为检查信函电报，翻箱倒柜但仍一无所获。事发后，袁世凯为释蔡疑心，便假惺惺地从狱中提出几个罪犯枪决。蔡锷经此搜查，便加紧策划脱离樊笼，一面装出若无其事、泰然自若的态度，与小凤仙益形密切，甚至日夜不归私宅。尽管如此，袁手下的侦缉队员对蔡锷的监视愈加严密。小凤仙的奶妈害怕受连累，要她冷淡蔡锷。小凤仙自知蔡锷之志后，决心帮助他。

袁世凯要当皇帝啦，龙袍都做好了，就要登基了……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蔡锷心急火燎，决心设计尽快离京，但是乱七八糟的人

整天在云吉班里晃来晃去。正巧云吉班班主生日就在即日，那天凡与该班妓女相好的嫖客都要来摆台面捧场。到那天蔡锷也到小凤仙香阁摆酒，不请外客。蔡锷进屋便把衣帽挂在衣帽架上，怀表放在桌子上，自己面对穿衣镜背窗而坐，这样外面的动静，可以从衣镜中看得一清二楚。窗上已撤去纱帘，换上纸卷帘，并故意卷上一半，这样外边的人也能透过玻璃看清室内人的活动。蔡锷一面饮酒，一面和小凤仙说笑。不一会儿，站起身，悠闲地随便走出屋去，趁院中乱哄哄时，悄悄地出了云吉班，跳上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候着。蔡一上车，曹福便把一张票塞到他手里，离开北京到天津。

当袁世凯的爪牙发现蔡锷不在屋中时，便盘问小凤仙，小凤仙故作惊讶，矢口否认知道蔡锷去向。军警、侦缉队四处寻觅，不见蔡锷踪迹。第二天报纸上便把蔡锷和小凤仙的事作为新闻，纷纷刊登。有的说，蔡锷留宿在小凤仙处，深夜出走，从而瞒过监视人的耳目，连夜搭火车离京，翌晨被发觉时，袁的侦骑四出，而蔡已横渡渤海了。有的说，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蔡松坡……众说不一，然而蔡锷以与小凤仙相恋相昵作掩护，得以先把家眷送出京，继则自己得到小凤仙的配合，避过袁世凯的耳目，脱离虎口，则成事实。因此无论哪一种说法，青楼女子小凤仙之名都因和蔡锷的英名相联系而载人史册。

蔡锷在云南举义后，获得全国响应，袁世凯帝制自为终归失败。但蔡锷由于劳累过度，喉病日重，发音甚微且痛楚加剧，赴日本就医，旋于 1916 年 11 月 8 日不幸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享年三十四岁。遗体运回国内，全国人民为蔡锷的逝世而悲痛。北京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拨款二万元，为蔡治丧，追赠他为上将军。时黄兴先蔡八天逝世于上海。1916 年 12 月 20 日，北京政府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下令，为黄、蔡国葬，均归葬于长沙岳麓山。北京政府发布蔡锷的讣告并举行国葬典礼的消息见报后，北京设灵堂吊唁，并

在中山公园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小凤仙白马素车到灵堂祭奠，并有哀悼蔡锷的挽联："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几年北地燕支，自悲零落，赢得英雄夫婿，桃花颜色亦千秋。"这副挽联用词典雅贴切，显然不是粗通翰墨的小凤仙所作，而是由文人捉刀。那天，小凤仙穿蓝布大褂，向遗像鞠躬，为北大学生发现，她快步走出公园。

小凤仙后来隐姓改名嫁给东北军的一位师长，迁居沈阳。师长死后，她改嫁给当地一位厨师。他们没有子女，生活比较清苦。她有两个嗜好，一是每餐都要喝两盅白酒，二是爱听戏，并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1951 年，梅兰芳赴朝鲜慰问志愿军，途经沈阳演出时，小凤仙曾拜访过梅兰芳，当时她在东北统计局出版部的张建中家当保姆，丈夫在东北人民政府总务处当工人。她还对梅兰芳说："我觉得靠劳动吃饭最光荣。四十八岁那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我进被服厂工作，以后做保姆工作。"后来经梅兰芳的帮助，当地政府安排她到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此时她已改名张洗非。

至于小凤仙与蔡锷相识时的年龄，据她自述中"十三岁那年，正遇张勋攻打南京"以及"四十八岁那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来看，张勋攻打南京是 1913 年，东北解放是 1948 年，由此可推断小凤仙与蔡锷相识时的年龄是十五岁。这正是豆蔻年华，富于理想，追求美好的时光。她虽不幸陷入平康，但碰到蔡锷这样具有远大志向的英雄人物，在相识相恋的时日，受到蔡锷的诱导，出于侠义帮助蔡锷脱离虎口，举旗倒袁，这确是一段值得彪炳的佳话。1981 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电影《知音》的上映，不仅使护国军司令、倒袁名将蔡锷的英名重放光辉，也使小凤仙的名字几近家喻户晓。

1976 年，小凤仙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

（孙国群）



潦毙上海滩

陆金宝，小字颦卿，松江章练塘人。“林黛玉”是她在上海平康的花名。因家境困难，八岁时便到李姓皮匠家当童养媳。十岁时随婆母到上海，在一杨姓巨商家做女佣，后被杨家一个女仆引诱，逃离婆母堕入火坑，先在福州路“一支香”挂牌接客，后由该仆带她北上天津挂牌，不久染病，回沪治疗，从此与该仆决裂，不再受其操纵。病好后，便以林黛玉之名张榜接客，后成为沪上所谓“花界四金刚”之魁。

一天一张局票飞来，点名林黛玉出局。大病初愈的她，应招来到一家酒楼，原来是章练塘一名宋二的同乡。宋在上海做生意，也是各大妓院的老嫖客，他为林出谋划策。建议她顺应洋场日趋奢侈的风气，以豪奢阔气动人视听。林既经天津之行，又经大病不死之磨难，便决计冒险一试。

林本身颇善修饰，便首先从服装修饰入手，不拘于苏帮传统的淡装雅服，而大胆转变青楼风气，提倡穿新装。对嫖客中善于挥霍者，非但不作丁娘之索，反代为缝制衣服，代购所需物件，以方便嫖客。这样一来，林黛玉之名便不胫而走，传遍洋场，上海稍有地位的冶游者，无不登门造访。

当时，郑叔向、沈砚传、张子芯、易实甫等人，曾经集合在林的香闺竟一月欢。

林曾学艺一年，歌唱较有功底，昆曲、梆子、髦儿戏样样都行。因她喜欢和当时上海有名的伶人交往，所以在这方面颇有长进。1904 年，林曾赴汉口怡园唱梆子花衫，还发生林黛玉投刺访张彪的趣闻。

武汉在张之洞署两江总督任内编练了自强军，张彪为自强军的一个统制。一日张到怡园看林黛玉演出，对林频施青睐。几天后，林渡江到武昌军营访问张。林将名片投进门房，门房起初以为新翰林拜谒的抽丰，一旦看清是林黛玉芳容，便马上进去通报张彪。张不明林来意，不禁大惊失色，便派人告诉林："这里是军营重地，不是你来的地方，请马上返回寓所。"事后，张彪派人赠送林数百金，以酬林渡江拜访之厚意。

林由汉返沪后，先后在群仙茶园、丹桂园唱戏，亦娼亦优，风头出尽，她在伶界活动的时间也最长。

林黛玉的奢华放诞，交际手腕，及其唱戏特长，既弥补了她的色相不足，更是顺应了当时十里洋场的社会风气。1897 年李伯元

《游戏报》称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等为花界四大金刚，林居首位。自此，林黛玉之名，更是妇孺皆知，“名人墨客、洋场买办、达官富商，莫不以一仰颜色为荣。”1899 年间，上海花界发起募捐，建造“群芳义冢”，也推林黛玉为首的“四金刚”为号召。胡宝玉、林黛玉、赛金花还被称为上海“花丛之杰”。

但是，豪华的排场，无度的挥霍，往往使她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每当走投无路之际，林便使出她独创的招数，选择富豪“从良”借此偿还债务。她把嫁人称之为“淴浴”，即如同一身污垢，得水便洗涤干净。因此，她一生反复嫁人，反复张榜达数十次。

1905 年，清政府搞假维新，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过上海。其中端方久闻林黛玉大名，便特召林至行辕唱曲，一见极为赏识。林也主动表示愿作端方侍妾，端方准备答应，被左右劝阻。对失去这一良机，林极为惋惜。有人问到这件事时，林说：“彼御命之人，乃可狎妓。侬诱之来，将狎之以遂余欲也。”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林继续登台唱戏，期间与比她小十几岁的龙小云相好，便从群仙茶园转到丹桂园。林对龙的感情似同母爱，既为龙请英文教师，又负担龙的衣、食、学费，还走前清江苏督帅张勋门路，为龙谋职。然而，龙小云到南京后，嫌弃林年老而另结新欢，并时时向林索款献媚于新欢。林知道此事后，打击极大，便离沪北上。那时，正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名人政客麇集北京。林到北京后，汤化龙见到她，甚为倾倒，但是，林对汤却不屑一顾。结果汤出资三千，仅得握手一次。

1914 年冬，林返回上海继续入群仙茶园唱戏。这时的她已年近五十，年老色衰，卖座率极低。只得又调脂抹粉，逐鹿情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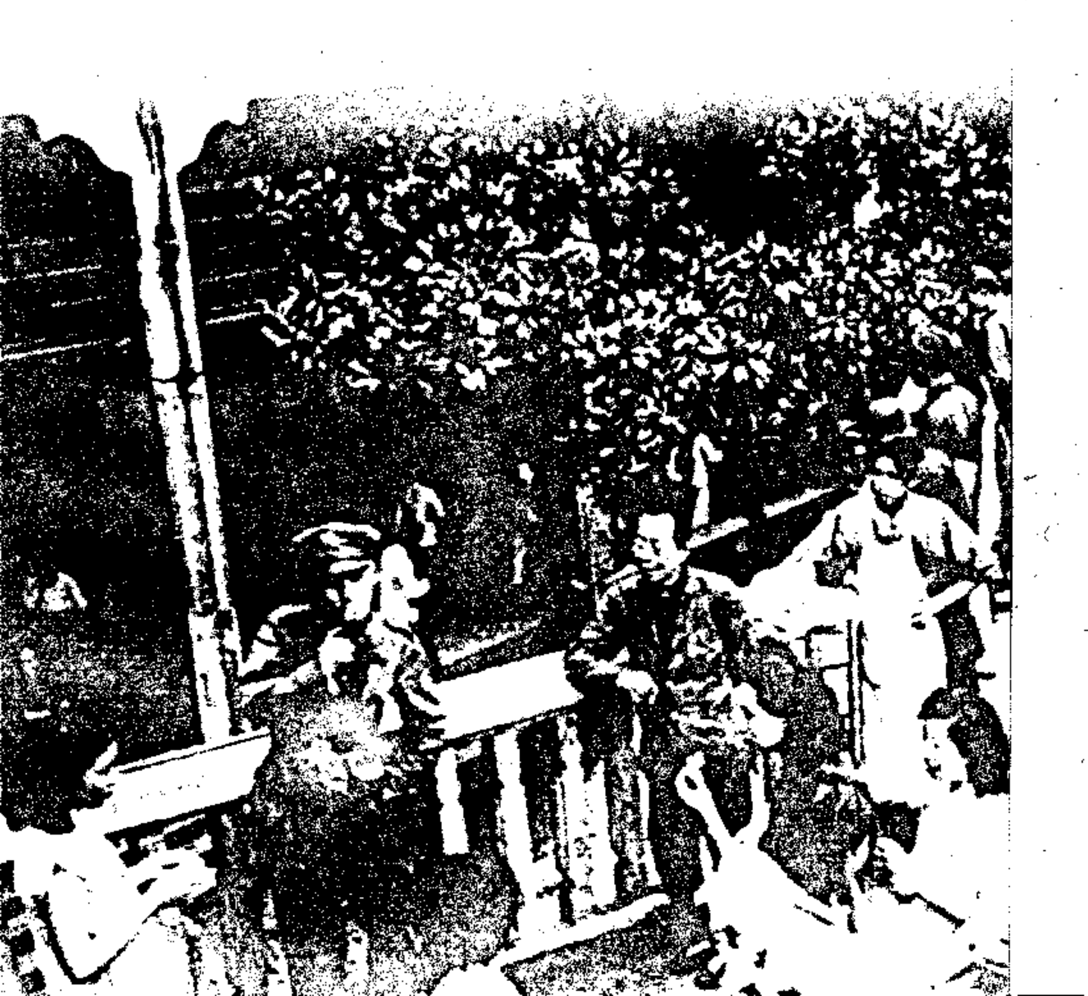
1920 年 2 月，林又嫁颜料大王薛宝润为妾。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暴发户，很早就倾慕“金刚”大名，既成富翁便想娶林为妾。薛当时已六十有余，娶林纯粹为猎奇炫耀。但林不愿嫁一白发老翁为妾，婉言谢绝。薛穷追不舍，并声言拨三十万金作为林将来

的赡养费，林为巨款所动，才答应撤榜嫁薛。薛租屋法租界，迎林进门。但是，薛家的财权掌握在夫人之手，对林夸下的三十万海口难以兑现。每月仅供给林二三百金，林知上当，便决计提出诉讼。薛闻言后，便和夫人商量，夫人答应给林五千五百金，听林自便。1920年冬天，林离开薛家，重堕风尘，和碧霞楼合资经营妓院。

1921年除夕，林因日夜连续出局、碰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瘫痪病床达半年之久。经中西医、内外科综合治疗，才勉强能起床，但仍不能出房门一步，病中医药费、鸦片烟费均由一王姓姘夫支付。此人是做地产生意的中流人物，当林的病稍有起色，便与其脱离关系。王一走，林只能靠典卖钻石、珠宝等首饰度日。一旦典尽当光，其可悲下场可想而知。

（孙国群）

帮门鹰犬的可耻下场



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洪流，加速了帮会势力的分化，其中一部分在不同程度上投身抗日，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另一部分则继续堕落，沦为认贼作父的汉奸。通过对几个恶鹰名犬斑斑罪迹和可耻下场的观察，可以从反面教材中得到启示。



“就地正法”

常玉清，湖北荆州人，1888年生。湖北武备学堂毕业。辛亥革命后赴上海谋生，拜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师入帮。先后在日商坂川洋行、内外棉等纱厂任职。1922年改业，先后开办丹桂第一台、大新舞台、大观园浴室，曾任上海五马路商界联合会评议长。1927年“四一二”反共事变后任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委员兼调查部副部长、部长。同年及1929年两次因刑事犯罪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逮捕关押。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常玉清应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聘请，就任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会指导员，具体负责自“一·二八”抗战爆发以来迅速增加起来的码头失业工人的救济事务。没干了几天功夫，他就伙同汉奸胡立夫等人在日军控制的“中立区”闸北组织“上海北市人民地方维持会”，自任该会巡警组主任，指挥警察、侦探二百余人，擅自变卖北市公私财产，中饱私囊，并包办烟赌娼一切违法事业，为此遭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通缉。《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军将在四周内撤出闸北、吴淞等地，常玉清等人因树倒猢狲散，惶惶不可终日，常玉清在劝说内哄的汉奸时称，“吾等现处此累卵之局，死神迫在眉睫，不图自救办法，尚操同室之戈，引起阋墙之祸，实非吾福。”不过直到日军完全退出闸北、胡立夫被捕法办后，常玉清才想出“自救办法”，只身逃至大连，继续投靠日本侵略势力。常玉清的汉奸行径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赏识，1933 年日本占领军在拼凑东北青帮代表团出访日本时，特意将他安插进去。东瀛之行，使常玉清感激涕零，受宠若惊。

1937 年 11 月上海沦陷后，常玉清重返上海，在日本人西田大坂的策动下与傅筱庵等人组建“上海维持会”并任宝山县伪县长。次年 2 月他又在日本浪人高桥井上的策划下出任黄道会会长，招募无业流氓，酌予津贴，指使他们在租界内实施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用以扰乱人心，打击租界中的抗日力量。黄道会曾将一些抗日志士骗至苏州河以北的新亚饭店的会所内残害，然后在饭店浴缸中肢解，装入麻袋扔掉。有时则将被害的爱国志士的首级割下，悬于租界的电线杆上，恐吓在租界中避难的中国居民。当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拒不出任伪教育部长，日寇便将杀刘的任务交给了常玉清为首的黄道会。常玉清曾多次组织会内调查组人员去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安乐坊 81 号刘湛恩住宅周围察看地形，刺探刘的动向，还向 81 号院内扔过手榴弹，送过注入剧毒药品的水果，结

果均未得手。1938 年,4 月 5 日常玉清被日本主子找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回来后他把憋在一肚子的火都发到手下喽罗们的头上,骂他们是“光吃饭拿钱,却不干事,个个都是饭桶”。并宣称“再不把刘湛恩干掉,我常玉清也要完蛋了,你们个个去喝西北风”! 次月早晨,常玉清从调查组、爆破组中调集了岳培芝等七人,伺机刺刘,当天未遂。4 月 7 日这帮杀手再次出动,终于在静安寺路大华路口找到行刺机会将刘杀害。此外常玉清还派出了大批黄道会员化装乡民,分赴江北各地,侦探中国军队和游击队的情报,转报给日本侵略者。

常玉清积极参与了伪维新政府的筹建工作,分工全面负责后勤。伪维新政府粉墨登场的当天他迫不及待地纠集十一个伪工会组织在闸北大夏大学主持召开“庆祝大会”。会后又组织与会者数千人分乘二十辆载货汽车打着伪维新政府的旗帜耀武扬威地开进英租界,进行汽车游行。黄道会行刺刘湛恩得手后,凶手岳培芝即被提升为伪维新政府绥靖部谍报组长。8 月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出了通缉常玉清的命令,同时赏二十万元要取常玉清的首级,吓得常玉清等人藏匿在新亚饭店,在日军的庇护下度日。黄道会刺杀公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陆连奎案发后,常玉清不敢在沪久留,旋在日军保护之下逃往南京。

在南京,常玉清开设国际舞厅作为汉奸帮会活动的据点,并以复兴安清为名筹建中国安清同盟会。该会后经日军特务部、伪维新政府内务部批准正式成立。常玉清在南京复兴路曾公祠召开的成立大会上狂妄地宣称,“我们中国共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我们教友要占四分之一,我们团结起来,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打倒祸国殃民的蒋介石是很容易的”。常玉清的汉奸言论赢得了日本主子的喝采和叫好,从而登上了该会委员长的交椅。1940 年 5 月 15 日,时任汪伪国民政府边疆委员会委员的常玉清根据伪社会部的建议,将安清同盟会和曹幼珊等人组织的中国道义协会合组为中

国安清总会，自己充任常务理事。在短短的一年中，中国安清总会共设立了江苏等二十二个分会、绥远等一百零六个县市的分会筹备会，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分会最多、成员最众的汉奸帮会组织。常玉清还担任安清总会机关报《民报》理事会的理事长，他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俨然以青帮最高领导者自居，重新整理订立了青帮章程、帮规等，为维持日寇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奔走效劳。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玉清在南京被捕归案。1946 年春连同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及宪兵副司令苏成德等八十人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他在上海受审期间，使出全身解数，百般狡辩，拼命为自己开脱。他矢口否认杀过一人，否认黄道会与一系列暗杀事件的干系，诡称黄道会只是担任招募工人的名义，安清会是慈善机关，内部只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不过在做些救济事业，举办安清子弟学校、平日施棺设米救济贫人云云，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悲天悯人的大善人。有时他装聋作哑，满口阿弥陀佛，软磨硬泡，企图蒙混过关。当时《申报》曾报道说老汉奸常玉清"信口雌黄，态度恶劣，为非作恶，坚不吐实"。尽管如此，上海市高等法院经过调查，还是在 8 月 20 日开庭宣判。当法官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宣判常玉清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所有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者外全部没收时，原先身穿蓝绸团花长袍白袜黑鞋故作镇静的常玉清声称患有重听症，要求厅长重读。当即由一法警高声向他转述，"判处死刑"，常玉清听清后立即全身颤栗，脸色惨白，两眼直瞪，口部微动想讲些什么，不过终于没能说出一句话来。由法警押回监狱后，常玉清不服，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次年 2 月 25 日以劣迹昭彰、罪大恶极，复判仍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3 月 12 日，白发稀疏、肥头胖耳、身体臃肿的常玉清穿着那身缎子长袍在监狱二楼走廊内打着太极拳，打着打着突然被法警告知就在当天执行死刑。霎时间他瘫坐地上，死也不肯下楼，一面还挣扎着说，"我还在上诉！我还在上诉！"法警不由分说将他拖了下

去，常玉清吓得魂飞魄散，还没到刑场已经昏死过去。由于他体重达二百磅以上，法警不愿再花大力气将他拖至刑场，于是就地开枪，只见一弹击入其后脑，常玉清就此一命呜呼。

（邵　雍）

作伥自噬

吴世宝，又名吴云甫，江苏南通人。早年在上海拜青帮流氓荣炳根为老头子，在公共租界跑马厅当马夫。后改行为二等流氓、丽都舞厅老板高鑫宝开汽车，并拜高为先生。后来，性喜刺激的吴世宝又入赌场当保镖，纠集起一群狐朋狗友，有了一点地盘与家私，遂搭了个摇缸女郎、青帮流氓季云卿的干女儿佘爱珍，姘居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同福里。

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因"权高震主"、专横跋扈，而被送入日本宪兵队监房。1942年2月2日，因得到李士群的说情，吴世宝被释放。感激涕零的吴世宝当即赶到李士群公寓，向李士群行跪磕大礼，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次日，吴来到苏州饮马桥新宅，准备在此舒舒服服地蛰居一段时间。不料，2月4日，吴宅内传出哭嚎之声：吴世宝死了。

混世魔王吴世宝怎么也想不到，送他去见阎王的，就是"恩人"李士群。

1937年底，日军侵占上海后，季云卿便将干女婿吴世宝介绍给了日本人。有奶便是娘的吴世宝便落水做了汉奸。最初，他弄了一辆旧汽车和一把破手枪去见李士群，算是见面礼。接着带了张国震、顾宝林、赵嘉猷、夏殿元、郭忠和等徒子徒孙，每晚到沪西越界筑路地带抢印度巡捕的枪，遂实力大增。

吴世宝生得皮肤墨黑，满脸横肉，蒲扇一样的面孔上，却嵌了一对鼠目，活脱浮尸一具加上大字不识撇捺，一张口就是"触那"（上海话，骂人的脏活）。吴世宝最大的特点是心狠手辣，狗胆包天，他拚命为日伪打天下，遂由一个小流氓而跃为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警卫大队长。他自己清楚，凭他的才能，只能当蟹脚，做大官是没有他的份的；然而吴对金钱可谓是情有独钟，为了钱，他什么都敢干。

在乱世，烟赌是最易发财的。吴看准后，便独揽上海的白粉（即海洛因）包销，仅此一项每月就可进帐上万元。同时，吴世宝又以上海赌场的总保镖、总后台自居，赌场有事他出来撑腰，当然每个赌场分红，他都要算上一股，否则现开销叫几个特务喽罗凶神恶煞般地到赌场一坐，手枪再往赌台上一拍，赌场老板没有一个不屈服的。后来，沪西的赌场老板们只能躲到远离七十六号的南市去。吴

世宝岂肯善罢甘休，赌场前脚刚移动，吴后脚即派青帮兄弟凌世昌出任南市俱乐部主任，照老规矩收钱。

吴世宝敛钱的手段还有绑票和投机等。如中国化学工业社老板方液仙因经营三星牌蚊香等而发财，吴遂串通李士群，将方绑票弄到七十六号，吴世宝突击审讯，要逼方出巨款赎票。无奈方个性倔强，宁死不屈，吴世宝等竟将方折磨致死。肉票虽亡，吴世宝后来仍从急于领回尸体的方氏家属手里敲到十多万元。股票交易实非"粗坯"吴世宝之所长，但吴看到股票时涨时跌，暴涨暴跌，倾刻巨富，亦眼红心焦，便大量买进，做起多头来。要是当天市价上涨，对做多头有利，他当然稳稳赚钱；要是股市下降，眼看要蚀本，吴又要施展他的法宝来，叫几个特务喽罗，把枪顶住经纪人的腰眼，要他们立时三刻把行情由低冲高，直到吴赚足钞票为止。总之，不论金银、证券、花、纱、布，吴要做什么就稳赚什么。只不过这种做生意实际上与抢劫没有区别。

1940年，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警卫大队扩建为警卫总队，吴升任总队长兼第一特务大队大队长。这样，这个混世魔王更为霸道、更加毒辣。为弄钱甚至践踏帮规，欺师灭祖，连其"先生"高鑫宝也不放过。

高鑫宝早年是杜月笙赖以起家的"小八股党"之一，与吴有主仆之情、师徒之谊。日伪统治时期，社会风气黑化，烟赌娼盛行，高鑫宝见有利可图，又见原来的仆役吴世宝做了特务头目，也想捞上几票。便投资沪西几只赌台，做起股东来。高开设的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丽都舞厅营业兴盛。于是，高在楼上摆开赌台，供暴发户豪赌，获利极巨。因为此处在租界中心地带，非七十六号特务势力所能及，不必缴纳日伪的"娱乐捐"。另外，高鑫宝自己思量，万一有事，你吴世宝总要买买先生的面子。

然而，吴世宝对这位"先生"也不肯放过，一定要雁过拔毛：向日伪纳交营业税。还沉浸在青帮论资排辈帮规家法之中的高，自然

极为恼火，大骂吴不讲义气，欺师灭祖，想当年吴是何等人，若不是我高某提拔，你吴世宝一辈子只能做“垃圾”。吴得知高的态度后，顿起杀机。1940 年 3 月 15 日晚上 10 时，高鑫宝从虞洽卿路(今西藏南路)一品香旅馆玩乐出来，准备返回丽都舞厅。当走到人行道，准备坐入自备汽车时，吴的两名杀手突然狙击，高因毫无防备，当即被击中三枪，倒于路侧，在送往医院途中便气绝毙命了。

吴世宝凶狠手辣，手下的特务也个个无法无天。其徒张国震看中百乐门舞厅的一个北平籍的舞后，并侦知这个寓居金门大饭店的舞后拥有巨资，张国震便策划以反日分子名义绑票勒赎。谁知事机不密，被这个舞女察觉，正好该舞女与一日本军官有染，便将张国震的阴谋密告之，于是，日本军官大怒，设下埋伏将张的两个党徒捕获。骄横的张国震吃了亏后，竟明火执仗，将这个舞女从金门饭店抢出，并“撕票”泄愤，是为当时上海滩轰动一时的舞后暗杀事件。事后，日军要李士群迅速交出张国震，但经吴世宝、佘爱珍上下打点，大事化小，日军也无奈张国震如何。

此后，吴世宝、张国震一伙继续胡作非为，把发财的主意打到日本主子身上，一场黄金抢劫案，加速了吴自己的灭亡。

1941 年 12 月，日本侵略者准备将劫来的上海海关的一批金砖，用汽车运到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然后再寻机运回日本。整整一车金灿灿的金砖，使吴世宝垂涎欲滴，便忘了自己是日本侵略者奴才的身份。吴指使张国震等预伏在正金银行附近，当运黄金的卡车开到，他们从路旁一涌而上，拔枪命令司机停车。机灵的司机停车后，随手拔掉钥匙下车，突然拚命向附近的正金银行奔去。张国震等计划将汽车劫跑，因此也不去管他，不料上车一看，钥匙已失，而且车后面的铁门又是铜锁坚固，无法打开，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四马路(即福州路)上的警察局已开始增援，张国震等只能长叹一声，呼啸而去。

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抢到日本人的头上来了，日军上下大

怒，经侦查始知系吴世宝手下人之所为，于是新帐老帐一齐算，日本宪兵队点名向李士群要人。吴怕牵连自己，只好抛出张国震，并安慰张说："你放心去好了，我会托李部长替你说情的，但千万不要牵连我。"于是，张国震被送进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本部关押，果然，张国震受不了日本人的刑罚而供出了吴世宝。

吴世宝的胡为蛮干，使汪伪政权的野蛮、残暴与腐朽暴露无遗，汪精卫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为了"平息"上海市民的愤恨，下令免除吴世宝的警卫总队长之职，并在 1941 年 12 月 13 日的伪《中华日报》上公开通缉。对此，吴惊恐万状，先逃为要，使日本宪兵队扑了个空。日军一计不成，便逼着李士群要人。李士群看到日军急红了眼，自己如果不交出吴，难免要被日本人视为嫌疑。因此，他与其老婆叶吉卿一搭一档，逼佘爱珍交出吴世宝，并保证：吴进去后绝无生命危险，也不会受虐待。迫于压力，佘只好将丈夫交出。李亲自带着翻译夏仲明将吴带到日本宪兵队本部，交给了特高科长林少佐。

吴世宝被日军关押后，林少佐即命南京政治警卫总署长马啸天到上海，把吴的财产查封，摆出了严惩吴世宝的架势。李士群为了使吴免受刑罚，更是为了免把自己牵涉进去，便给林少佐等上下送厚礼。果然，吴世宝没有受到刑罚，还被获准由佘爱珍不时送些物品进去，这在杀人魔窟的日本宪兵队关押的人中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吴世宝与佘爱珍两人盘算，再请李士群用点力，便可保释出来了，今后就算做个平头百姓，但凭自己这几年捞的钱，仍可过上等人的生活。

岂料，他的恩人李士群早有打算了。

李士群对胡作非为的吴世宝已感到尾大不掉了，他曾对密友言："吴大块头这个人，不仅日本人恨他，连我也恨透了他。他在'七十六号'，我这份'家当'早晚要被他拆个精光。现在日本人要了他去也好，对'七十六号'来讲也是件好事。"但权衡下来，自己部下还

是由自己处理，可以加强自己的权威与顾全面子。因此，他向日本人提出，把吴世宝与张国震交给七十六号自己惩办。经过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的斡旋，宪兵队答应了李士群的要求，条件是必须依照日本人的决定处置。

张国震因招供了“劫金案”，因此宪兵队提出必须处死。于是，李士群将张国震接回七十六号，然后下令绑赴中山北路杀人场执行枪决。对吴世宝因查无实据，不能“明正典刑”，但是，林少佐也不愿纵虎归山。时林少佐已升任中佐，在他返国任职前，李举行送别宴会，林中佐、影佐与李士群三人密议了处死吴世宝的办法。

吴被告知对他的处理意见：首先，日本宪兵队将吴放出，由李士群将吴关押三年，关押地点是苏州饮马桥吴弄来的一幢洋房内，吴不能自由出门；被封存的吴的财产也由李士群、马啸天负责全部发还。吴世宝对这一决定基本满意，认为由于李的帮忙，性命已挽回来了。

1942 年 2 月 2 日早晨，吴世宝已收拾干净准备出狱了。两个日本宪兵来到监房，准备将吴押出监房。这时狱卒端来一只醋饭团（寿司）和一碗米汤。吴一看就倒胃口，想等一息出去山珍海味有的是，便不愿吃。但宪兵和看守都瞪着眼珠子，非要他吃。吴只得陪笑咬了两口醋饭团，米汤却全部喝光了。

吴感到这只冰冷的醋饭团有点不舒服，回到家里立即告诉了佘爱珍，但也没有当回事。实际上，这醋饭团没有任何问题，而米汤却是林中佐已叫人下了毒的，这种慢性毒药，属败血性毒菌，喝下后，毒菌在人体内会以每分钟繁殖一倍的速度增长，三十六小时后即会发作毙命。而且，这种毒菌繁殖期间，没有丝毫中毒现象，但一经发作，便无药可救。

这一切吴世宝尚蒙在鼓里，2 月 3 日，他沐浴、理发、更衣，拜祭祖宗，然后到“恩人”李士群寓所，向李深谢救命之恩。李看这个大块头丝毫没有反应，以为日本人的毒药失灵了，又密遣人从宪兵

队取了一些来，暗中放在一碗面条里，让吴吃下后才让他离去。

下午，吴世宝回到苏州寓宅，当晚即上吐下泻，一命呜呼。据目击者称：吴世宝这个大块头，死后却缩成了一小团，像只猴子干。

（苏智良）



狗烹内讧



李士群，浙江遂昌（一说江西瑞昌）人，1905年生。早年投机革命，后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并拜季云卿为“老头子”，加入青帮。抗战爆发后，奉命“潜伏”的李士群卖身投靠日寇，任汪伪“中央特务委员会”秘书长兼所属“特工总部”副主任。从此，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在其和“主任”丁默邨的主持下，成为抗战时期在上海危害人民最甚的一个血腥恐怖组织，被人们称为“魔窟”。

乌云密布，阴霾满天，1940 年的上海处在血腥与恐怖中。

一块蓝底白字的“七十六号”门牌钉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一幢最大的花园洋房院门上，牌坊式的门楼像一只噬人的猛兽，日夜张开它的血盆大口——这就是上海人为之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善良的人们从这里走过，心理上都如临深渊，乃至不敢对它稍作正视。孰知窝在门洞里的汉奸们自知所作所为不容于人民，也是朝夕提心吊胆，如临大敌。更非外人所晓的是，“魔窟”内对门而踞的两个魔头——“主任”丁默邨和“副主任”李士群，正在警戒森严的高墙背后进行着一场狗咬狗的撕搏。

李士群和丁默邨的矛盾由来已久，随着特工总部的势力步步膨胀，冲突也愈演愈烈。总部内李派、丁派壁垒分明，争斗不息，甚至到了短兵相接，行将火拚的地步。丁的亲信茅子明与李的部将吴四宝争吵时，吴破口大骂，直指丁默邨为“屁主任”，并拔出手枪威胁茅：“你当心点，不要惹穷爷生气，随便啥人，都没有便宜占！”这个“随便啥人”是显而易见的。吴四宝以“警卫总队长”的身份，敢于如此放肆，自然全仗李士群在后面撑腰。其实论地位、资历、威望，李士群远逊于丁默邨，但占优势的却始终是李士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李士群得到了日特“梅机关”晴气庆胤和日本驻沪宪兵队特高课长林少佐的全力支持。日本参谋本部还出面与李士群订了一张“秘密协定”，保证在政治上全力支持李。这一纸协定是日后李飞扬跋扈、步步高升的主要原因。

李士群还巧妙地利用汪政权内部实力派周佛海与丁默邨间的矛盾，向周效忠，一度成为周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李士群的激烈攻击下，丁默邨终于被逐出了“七十六号”，由李士群独掌了特工总部的大权。接着，李又在争夺伪警政部长职位的斗争中彻底击败了丁。汪精卫原定由丁默邨任该部部长，但李士群公开反对，要求由他担任，为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汪精卫不得不改变原定安排，决

定由周佛海兼任部长,李士群任政务次长。1940 年 12 月,周佛海为了拉拢李士群,将部长一职相让,使李如愿以偿。这样,李士群集特工、警察两要职于一身,成为汪伪集团中权势显赫的人物。

1941 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在华中占领区实行"清乡"。李士群因掌握特工力量而再次受到青睐,被任命为秘书长,实际主持"清乡"活动。他将大批亲信爪牙安插进"清乡委员会",控制各部门,使势力范围由上海、南京推向整个汪伪政权管辖区。李士群还利用"清乡",对伪江苏省政府的权力采取"蚕食"政策,"清乡"清到哪里,督办人员就接收该地区的行政权力。1941 年 8 月,汪伪警政部与内政部合并为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由李任部长。12 月,李士群在日本特务机关支持下,赶走了原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由他兼任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至此李士群完全控制了沦陷区最富庶的江苏省,个人权势发展到一生中的最高峰。

李士群势力的过分膨胀,不仅加剧了他同汪伪集团内部其他各派系的矛盾,而且也引起了日本主子的不满和不安,一张无形的大网正悄悄向他张来。

1942 年底,日本侵略者败象四露,内外交困,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为了摆脱困境,决定实行"对华新政策",进一步粉饰其侵略嘴脸,以诱使重庆当局与之"媾和"。在此政策主导下,以杀人劫财为主要特点的李士群特工势力便显得碍手碍脚,而且随着他权势的恶性膨胀,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俯首贴耳,甚至在战略物资——粮棉问题上,敢与日军争夺。

1943 年夏天,日军以秋后必须保证缴售军粮五万吨为条件,撤消了对苏州地区的粮食军管。但苏南产米区的粮食收购权控制在李士群手中。他不但不积极筹集,反伙同伪江苏省粮食局局长后大椿和伪粮食部苏州办事处主任胡政,勾结日本浪人倒卖粮食,牟取暴利。同年秋天,日军所规定的期限到了,伪粮食部只交出了一

万三千吨军粮，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在苏州秘密逮捕了后大椿和胡政，从他们那里找到了贩卖粮食的证据，并执意要汪伪政府将两人枪毙。这实际是给李的警告。早在 1942 年冬，李士群的"东洋靠山"晴气调任华北，李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加上继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的柴山中将对李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李士群在日本主子面前开始失宠时，他与汪伪集团内部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周佛海矛盾的激化。

李士群曾是周系的重要干将，伪警政部长之职也是周有意出让的。按说李应感激才是。但李实力的增强使他越来越不把周放在眼里，矛盾屡屡加深，终于围绕在"清乡"地区推行中储券迸发了第一次正面冲突。

周佛海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为了在经济上实际控制统治区，决定推行"中储券"，最早与法币的兑换率是一比一，后改为一比二，并于 1942 年 6 月 23 日由伪财政部公布《禁止使用旧币办法》，宣布禁止使用法币。当时正值李士群在"清乡"地区大肆搜刮，币制改革无异是与虎谋皮。于是他公开在报纸上对伪财政部提出异议，并派人当面向周佛海提出这样做会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实则想狠敲周佛海一笔竹杠。起初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还是周佛海让步，为了维持"中储券"的发行和流通，只好忍痛送去中储券四百万元，换回四百万元法币。而在江苏沦陷区，李士群还是按一比二兑换，白白赚了二百万"中储券"。周佛海闻听此事，直恨得咬牙切齿。

李士群与"军统"、"中统"也是关系暧昧。一面背着日本人与两者建立了秘密联系，一面却又多次背叛"军统"、"中统"，破坏他们的组织，捕杀和诱降大批国民党特工人员。戴笠和陈立夫曾多次下令不惜代价杀掉李士群，但由于李防范森严，未能实施。而他这种

首鼠两端，脚踏几只船的态度使蒋介石也担心他会利用手中实力，成为国民党独吞抗战果实的绊脚石。就在1942年初，周佛海与丁默邨等汉奸头目眼见“和运”道路不通，先后与重庆方面联系，希望自己能搭上自首的末班车。1943年夏天，军统局通过秘密电台给周佛海等人下达了“除奸令”，以此考验他们的诚意。于是一幕“汉奸除汉奸”的闹剧开演了。

周佛海等人拟定了三套方案：“上策”是利用日本人与李的矛盾“借刀杀人”；“中策”是利用李与其他汪伪派系的内讧除掉他；“下策”是由军统方面派人刺杀。经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决定采用“上策”。

1943年秋，在周佛海的指使下，伪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利用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是老同学的关系，在其面前大谈李士群对日本宪兵队如何不满，野心勃勃想夺宪兵队的权，并瞧不起冈村。熊的话激怒了刚愎暴躁的冈村，加上日方本来就已对李不满，冈村终于下了除李的决心。

9月6日晚，冈村借口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的矛盾，约两人同到上海外白渡桥百老汇(今上海大厦)谈话。李士群事先已听到不少对他不利的消息，因此十分警觉，本不想赴约，但不敢轻易得罪日本宪兵队，只好硬着头皮赴“鸿门宴”。行前他与随行翻译夏仲明约定，不吃冈村的任何东西，连香烟都抽自己的；还预先派了几个保镖在大楼附近，约定如自己两个小时内不下来，就冲上楼去。似乎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可是一见面后，冈村、熊剑东就摆出一副肝胆相照、尽释前嫌的姿态。熊表示：“误会的起因，还是由于我。今天，我们当着冈村课长的面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今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并声称，他对周佛海不过是利用而已，他的目标是“开府浙东”，现在万事俱备，只差五百万。李士群一听，也装出高姿态，一边对往事表示歉意，一边立即答应奉送一千万元。熊假装无比激动，紧握李的手说：“老兄真是爽直慷慨，脾气都和我一样，我真恨

咱们相知太晚，今后我们在一起，一定可以有所作为。"这时，冈村也趁机插话："你们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年轻有为，前程远大。今后你们两位有什么事，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效劳。"

冈村和熊剑东"珠联璧合"的双簧使李士群完全解除了戒心。为了表示对熊已无丝毫芥蒂，他推说天热，把身上携带的手枪也卸了下来；暗中又让夏仲明下楼，告诉保镖安心等候，不必冲上楼。同时双方开始相互敬烟，一起喝酒和汽水。这时，冈村的妻子(实为雇来的日本艺妓)端出一碟牛肉饼，送到李士群面前，说了声："粗东西，请李阁下尝尝!"冈村也郑重地说："这是我太太的拿手菜，专为李阁下做的。"李士群见只有一碟，心存疑虑，便故意把它推给冈村。正在你推我让之际，冈村的妻子又端出三碟，在其他三人面前放下。冈村说："为了表示敬意，这第一碟应请李阁下吃，熊先生是我们家常客，我也不客气了。"说完和熊剑东狼吞虎咽起来。李士群见此情景，也不再推辞，吃了半只牛肉饼。半小时后，才起身告辞回家。

实际上在李士群吃的那只牛肉饼中已下了毒，这是日军新发明的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撒出来的尿培养出来的细菌，吃后三十六小时才会发作。李士群回到家后，总觉得方才吃的牛肉饼有异味，便到卫生间用手指朝喉咙里抠，想把它呕出来，可是抠了半天也没用，只好作罢。第二天，他从上海回到苏州家中，未觉有异，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但是到了第三天，毒性发作了，周身大量出汗，连续发高烧。起初他还以为只是一般时疫，后来觉得病情不对，才又回想起那半只牛肉饼。他开始预感到情况不妙，可又不敢让一般的医生看，急忙派人去上海找江苏省立医院院长储麟荪。此时，日军驻苏州的一个师团长小林中将，因平时与李交往不错，闻讯也带了两名高级军医前来探视。他们并不知情，将检查结果据实相告："李省长是中毒，瞳孔放大，关节失灵，已无法挽救了。"一席话说得在场众人毛骨悚然，面面相觑。当时小林他们主张打针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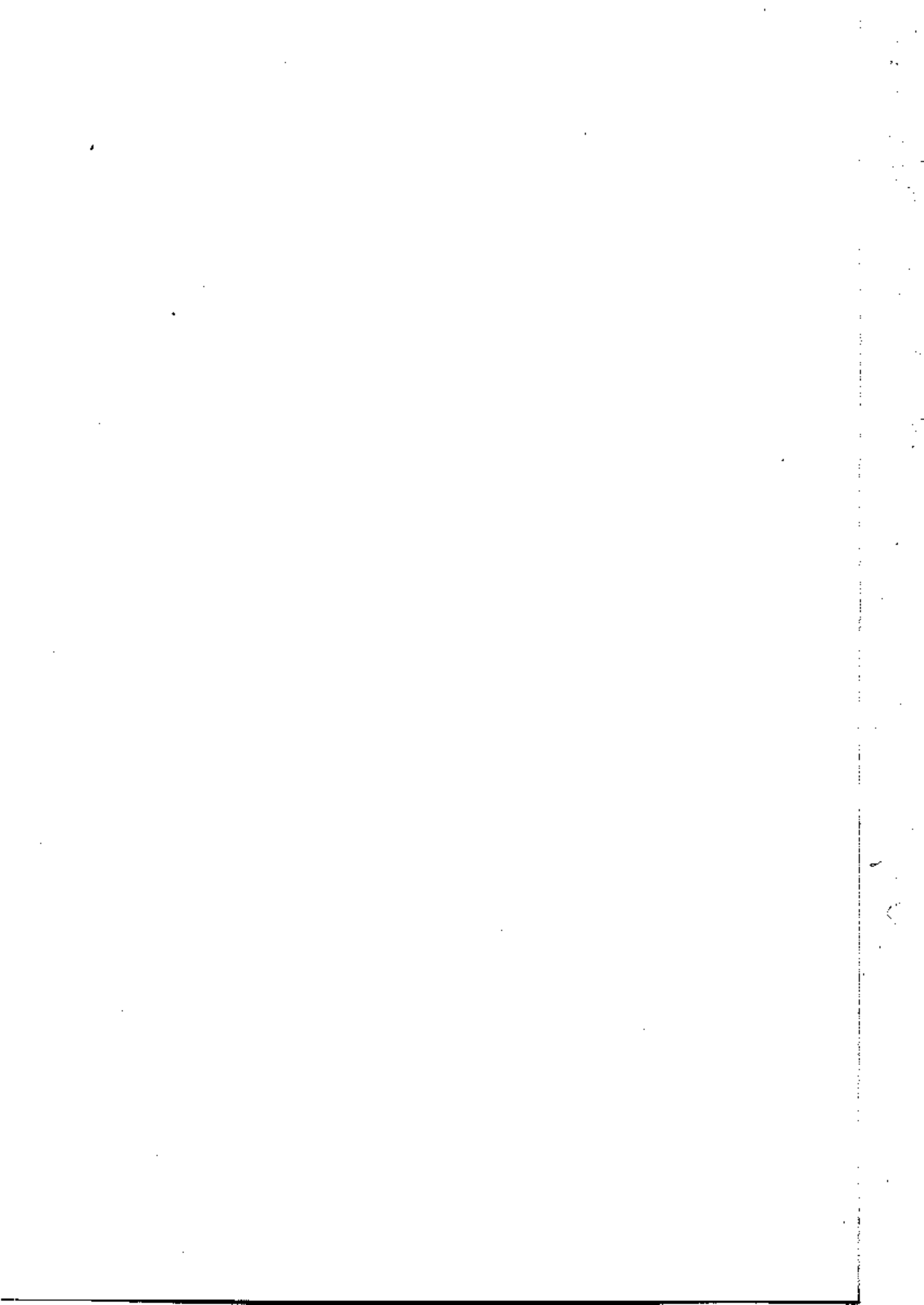
救，但此时李士群深怕是催命针，坚决不肯打。病情在不断恶化，他感到万分痛苦，要拔枪自杀，守在一旁的马啸天、叶吉卿急忙把枪夺下。李绝望地说："我做了一世特工，现在却落在人家设下的陷阱里，还是让我自杀的好！"等到储麟荪从上海赶来时，李士群的血管已经硬化，连盐水针的针头也无法插入了。第三天下午5时，李士群终于毙命，时年三十八岁。

李士群死后，日伪为了掩人耳目，同意进行公葬。大殓那天，汪精卫派行政院秘书陈春圃致祭，并亲题墓碑"李士群先生之墓"和墓志铭，称李是"才足以济世，而天不永其年"。李的尸体因中毒而缩得象猴子那么大，可还是用了一口顶大的楠木棺材成殓。当地的日酋如师团长小林、苏州宪兵队长等也都猫哭老鼠般地前来吊唁。入殓后即"移灵"上海，当行至南京路国际饭店时，李士群的老部下、七十六号的行动总队长林之江带了十几个喽罗拉住棺材，说是他替李士群搞了许多钱，非要李的老婆出来摆句话不可，后经人好说歹说才肯放行，使这场神气活现的大出丧出足了洋相。

李士群虽已入葬，但关于日本宪兵队毒死李的传说仍流传很盛。于是一天晚上，苏州的日本宪兵队把七十六号在苏州的几个特务头子及江苏省政府的头头召到李家，声称：日本宪兵队与李士群的死决无干系，并逼迫李的老婆叶吉卿在一张由他们草拟的书面证明上签字：李确因病死，别无缘故。活脱脱一幕"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闹剧。

对于李士群的死，汪精卫也曾感慨地对汪曼云说："日本人竟会这样不讲信义的！"联想到日后汪贼的可悲下场，果有兔死狐悲之感！

（唐若素）



难逃天网的残渣余孽



雄鸡一唱天下白。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民国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远未得到彻底清除，它们还在时时散发着臭气，侵蚀着共和国健康的肌体。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撷拾在本章内的几例，恰能印证这一条道理。

刽子手杨进兴原形毕露



杨进兴，浙江省人，出生年月不详。曾任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等职。1946年参与杀害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等；1949年9月主持杀害杨虎城将军等；同年11月参与“白公馆大屠杀”，杀害了包括进步人士黄显声等在内的三十余人。1949年底率一批特务被我军击散后失踪。

1950年初，地处偏僻的四川省南充县青居乡三村，忽然来了一对陌生的男女。只见那男的浓眉横眼，头戴草帽，身穿呢衣；女的穿着红绒线衣，脚蹬皮鞋，一头的烫发。

这对男女到村上的第二天，便大摆筵席请众乡亲吃饭。吃喝之间，男的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杨大发，四川省广安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随叔父离乡背井在成都、重庆做点香烟和水果生意。解放后他认定经商无甚前途，便想来此务农。于是这位杨大发夫妻真的佃了田，在这里定居了。

杨大发可真是个"能人"。他到青居乡后没几天便脱下了呢衣，换上了土布衣服，一副庄稼把式的模样。他常天不亮便下田做活，大雨大雪的日子里，别人在家休息，他也决不闲着，同样的下田。他佃的田里草常被铲得干干净净，肥料也积得最多，因此庄稼年年增产。如此的勤勉，自然得到了乡亲们的好评。1952年三村组织互助组，他便"积极"参与，选举互助组长时他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了。在互助组里，他专找笨重活干，还常帮助组员干活，互助组的好处更是常挂嘴边。

在土地改革和减租退押中，杨大发也是积极参加斗争，看管地主等很是卖力，因此被评为"贫农"，分得了田地和一石谷子。而他竟从这一石谷子中拿出五斗捐给农民协会做基金，自然又赢得了一片的喝采声。在粮食统购中，他不但踊跃售粮，还把粮食晒干风净，专选烈日当头时送到政府粮仓中。政府号召推广包谷单株密植等先进耕作技术时，他也是带头响应。凡此种种，"积极分子"的雅号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

这个杨大发的群众关系也出奇的好。他定居下来后便带着妻子到处找农民认干亲，认娘家。农民滕明清的妻子被认做他们的娘家后，绒线衣和花布等礼物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娘家。他平时三天不讲两句话，就是偶然讲话也是结结巴巴的不成句。对人极为和

气，从不与人争执。大家说他老实、肯干，他听了很是得意。

尽管这位外来户的出色表现举不胜举，但是政治觉悟颇高的当地村民对他的怀疑仍是不少：

杨大发说他是四川省广安人，那么他为什么不回老家，却要来到这里落户？

这对夫妇来的时候为什么穿得那样的阔气？

更有甚者的是，和他同在一个互助组、又是邻居的老农民胡德清曾发现这对“贫农”夫妇和村上的几个国民党分子在屋里密谈，在墙壁缝里胡德清偷听到这个“贫农”正杀气腾腾地说：“依我过去脾气，早杀掉他妈几个……等着吧，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还有一次，胡德清听见这对“贫农”夫妇在隔壁吵架，那女的说了声：“政府要捉特务，哪里去捉呀！你自己干些啥，敢到乡上去坦白！”那男的一听就再也不敢吭气了。

另一本村农民滕明忠对这个“贫农”、“积极分子”也很注意。有一次他和杨大发一起去挑东西，当他们路过一座地势险峻的山时，只听到杨大发小声地自言自语了一句：“以后出啥意外，这里倒是个避难的好地方。”还有一次，这位杨大发突然要到华蓥山去进香，滕明忠很想了解他的举动，便自愿给他带路。可走到华蓥山后，杨大发却一反常态地硬要滕明忠先回家去，而他自己却独自上了山，并在那里住了好几天。

家住青居乡的小学老师滕志远过去曾是国民党员，他曾被杨大发拉去密谈过。杨大发对这位老师倒是很信得过的，向他暴露说自己曾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背过枪，在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干过重要工作。他还向滕志远扬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国民党不久要重回大陆。”

村民的怀疑越来越多，“难道这家伙是特务？”他们纷纷将自己的怀疑不断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曾在这个杨大发岳母家帮佣多年的雷开云，得知这个昔日的东家正隐姓埋名潜伏于青居乡后，立

刻向公安机关报告了他的真实姓名——杨进兴。雷开云还报称了这个杨进兴解放前内穿西装，外罩便衣，身藏手枪、铁铐，到处捕人等情况。

时光匆匆，1955 年 6 月 17 日，这个杨大发的真面目得以暴露的日子终于到了。当可疑的线索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四川省南充公安局便展开了外调。1955 年 2 月，公安人员带着杨大发夫妇的照片和检举材料来到重庆，被俘战犯徐远举和周养浩看了照片后都说不认识，直到原戴笠警卫邓培新等人看后，才认出他就是血债累累的杨进兴！这个特务除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宋绮云等革命先烈外，甚至还在杀害黄显声后扯下了他带血的手表。

所以，当那天我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这个"贫农"面前时，杨进兴还狡辩不止："你们是捉特务吧，我是个'贫农'，别弄错了。""黄将军的游泳表呢？""杨大发！你不是贫农杨大发，你本名杨进兴，是不是？"听到这一连串的斥问，这位"贫农"脸色大变，不得不低下了头。

1958 年 5 月 16 日，重庆市司法机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召开公判大会。杨进兴一被押进场，便在麦克风前膝头一弯，笔直地跪在了那里。"……我杨进兴，罪大恶极，罪该万死！"麦克风里传出了杨进兴颤抖的声音："我该死，……"

（徐有威）

“小老板”戴藏宜机关算尽

戴藏宜，谱名善武，字紫理。浙江省江山县人，1915年出生。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之独子。上海私立大同大学肄业后，回乡任仙霞乡乡长、京沪杭铁路警务处少将专员等职。

1946年3月17日戴笠机毁人亡后，国民党为这个大特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同年6月12日，蒋介石指示拨款创办以戴笠表字命名的“雨农中学”、“雨农医院”、“雨农图书馆”等，以示纪念之意。戴氏亲属随即组成了以戴藏宜为主任的“戴雨农将军纪念事业筹备处”，负责筹建这些“事业”。

在国民党军统内部，戴藏宜素有“小老板”之称，其人文武不就，吃喝嫖赌的本事不亚于乃父。恃仗戴笠的权势作恶乡里，是条乡党切齿的地头蛇，并在抗战期间亲自策划杀害了在江山领导抗日斗争的中共党组织领导人华春荣。因其名声太臭，戴笠恐有玷“家风”，旋将其调往军统局安插，从此专搞武装走私，发了不少横财。“同袍”看了眼红，但碍于“老板”的马脸，对之无可奈何。

抗战胜利后，军统特务以“肃奸”为名，大发“接收”之财，被戴笠安排为京沪杭铁路警务处专员的戴藏宜亦得捷足先登，弄到一批卡车和枪支，将武装走私的买卖愈做愈大。焉知好景不长，正欲鸿图大展之际，戴笠从天上掉到了地下。靠山既倒，早就红眼的特务们马上推墙。继任军统局局长的郑介民以妥善保管戴故局长遗物为名，不仅将戴笠藏在保险箱里的金条、钻戒全部搜光，还派出武装人员，强行夺走了戴藏宜用来走私的交通工具和武器。“小老板”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得认输，好在还有这个蒋介石亲批拨款的“戴雨农将军纪念事业筹备处”，于是便攫住这个摊子，像煞有介事地办起了“文教卫生事业”。

1946年10月23日，戴藏宜致函江山县县长林希岳，称其筹备处已于10月6日正式开始办公，从此上起浙江省府，下逮江山县署，了无宁日。光是“雨农中学”的校舍落实，就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戴藏宜本想风光抖在家门前，可是江山父老倒怕他屙屎乡里，把子弟教坏了，推三诿四不给地皮，最后由国民党军委会核定原“第八航空总站”遗址为其校舍，地点在衢州西南五公里处的汪

村。因该处早年遭日寇轰炸，已所剩无几。到此地步，“小老板”也无暇挑肥拣瘦，即命筹备处总会计毛文池到衢州勘地施工，一应财务往来都在戴藏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一年以后，“雨农中学”开始招生，并于 9 月 10 日正式开学，学校里的教职员工不少是戴家的亲戚朋友，懂“教育”的不多，会搞钱的不少，加上有戴藏宜这么一个“校董会董事长”，办学效果可想而知。一团乱糟糟中，浙江省教育厅碍着他手舞“总裁手谕”，硬起头皮准予立案。随后，他又把军统局从大汉奸陈群那里没收来的几万册藏书弄到手，以此为本搞了个“雨农图书馆”。

1949 年春天，戴藏宜孜孜在念的“雨农医院”八字未见一撇，人民解放战争的春雷已由华北向着东南滚滚而来。“小老板”急忙扔掉他的“事业”，着手“应变”，叫嚷要“战斗”到底，以承父“志”。当年 5 月，江山县解放前夕，戴笠之母蓝氏病逝，戴藏宜匆匆忙忙为祖母办过后事，立即携带金条、美金和武器逃出仙霞关，进入福建浦城县水北乡。他夫妻两人分乘两顶轿子，率随员和家属同行，为国民党水北乡乡公所的武装人员所拦截，搜查发现其大批行李中藏有大量金条和美金，竟予扣留。分赃时这伙武装人员闹得不可开交。恰巧此时浦城县已经解放，我军浦城县军管会接到有关人员的报告后，立即派员前去水北乡，将戴藏宜一行及其财物带至县城审理。

浦城县军管会不但发现了戴藏宜随身携带的钱财和武器，而且发现了陈诚、何应钦、胡宗南和陈立夫等二十六名国民党政要 1948 年给戴藏宜祖母蓝氏的祝寿贺信和礼单。然而，戴藏宜一行在夜间竟跳窗逃离了浦城县，潜回老家浙江江山县，旋与戴笠的兄弟戴云林合股，麇集伙党，盘踞二十七都山坑等地“打游击”，继续与人民为敌。

江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剿匪斗争，戴藏宜叔侄的反革命武装“游击”迅速归于破灭。1949 年 7 月 14 日，中等身

材、微胖、活像父亲戴笠的戴藏宜突然出现在江山县县长苏明的面前，试图“悔过自新”。苏明向他宣传了我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贯政策，戴藏宜装出一副极为感动的样子称：“此次本人出面与人民政府当面晤谈，非常感谢长官的诚恳接待及解放军政策之宽大，由此深悉本人过去的错误，与对过去一切认识之不准确。我这次来城登记，是因为外界谣言太多，说我戴某人仍然在暗中活动。听了这样的话，我实在是受不了。目前承苏县长、赵副县长、李局长、王副司令等长官恳切指示，内心更为感动……”

戴藏宜如此这般地讲完后，我江山县公安局长李春林便指定他住在江山县城中山路亲戚家中，随传随到听候发落。不料这个玩弄花招骗取“宽大”的“小老板”出尔反尔，一转身便溜之大吉，旋潜至大溪滩乡刘家山，计划在平滩站乘火车外逃上海，再从上海转去台湾。

按照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的指示，江山县公安局于9月9日将这一少将特务缉拿归案。被捕后戴藏宜避重就轻，妄图重罪轻判蒙混过关，即被押送至浙江省公安厅监狱。

1951年1月30日，江山县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判处戴藏宜死刑，在其老家保安执行枪决。

（徐有威　毛作元）

“赛狸猫”飞蛾扑火

段云鹏，又名段万里，河北冀县人，1904 年生。早年为北平地区惯偷，绰号“赛狸猫”。抗战胜利后，任军统北平站行动组中尉组员，曾企图暗杀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1947 年 9 月破获中共北平地下电台一处，导致数百名地下工作人员被捕入狱。1949 年 1 月曾奉命暗杀原北平市长何思源，不久逃往台湾。

1949年10月，秋阳下的北平热闹而繁忙，人们仍沉浸在开国大典盛况带来的喜悦中，感到古都的秋天从没有像今天这般美丽。但是却有人并不快活，尤其是朝内南大街一家小客栈新来的一位名叫李馨斋的商人。其实他真名叫段云鹏，正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军统特务"赛狸猫"。

国民党自大陆败退逃往台湾后，实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为了在近期内制造"轰动事件"，进行破坏，接连向大陆派出了数批特务，专门收集中共军政要人活动行踪的情报，企图伺机进行暗杀活动，段云鹏就是其中的一人。

1949年8月，段云鹏潜入解放不久的上海，搭识了与军统特务孙某姘居的妓女王小姐，将她带往北方。到了天津，他先让王小姐回北平听风声，自己潜入天津通县地区，发展了解放前曾代为窝赃、销赃的于振江、曹玉静和在通县开设和平小店的刘珍、刘妻和伙计张文起等人为特务，同时于、曹两人又发展了天津车站的王国庆。段云鹏在完成这些任务后，便将主要精力转向新中国的心脏——北京。

北平因为是和平解放，鱼龙混杂，但又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公安部门加强了防范，国民党特务的活动进行得并不顺利。就在"七一"前夕，段云鹏派恶徒崔锋到北平打前站企图刺杀毛泽东和破坏"七一"庆祝集会，不料短短几天即被公安部门缉获。这件事对段云鹏的打击很大，他觉得自己这次的行动必须格外谨慎，才能不蹈崔锋之覆辙。

段云鹏当年在京津地区交游广泛，狐朋狗友甚多。他经过仔细推敲，决定先跟四个人联络，他们是他的徒弟、军统运用员杨某；亲戚、当过伪警的秘静轩；开设中西旅馆、当过宪兵十九团特高组织运用员的赵友三及开设茶庄、贩卖过毒品的魏金山。后两人是他的至友，特别是魏金山，段在解放前夕，曾将衣物存在他处。可段云鹏

在北京奔走数日，前两人因已搬家没有找到，结果只找到了赵友三和魏金山。

一天深夜，段云鹏施展飞贼绝技，翻墙跃入魏家茶庄后院，悄然来到魏的床前。他告诉魏金山，在台湾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带他面见了蒋介石，提升他为上校，负责京津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要求魏提供政府要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情报。魏当即接受了段布置的任务。段云鹏又教他活动方法：发现中央要人的汽车后，记清车型、车号、顺着行车路线逐段跟踪，跟至住处即可。还要求魏发展他人加入特务组织。

几天后，魏在家中介绍在民航局当炉工的李万成与段见面。段说回台后给魏上报为组长，李是组员，规定魏化名魏玉峰，李化名赵芝圃，另规定今后由天津的曹玉静来京与魏联系，他又留下了香港的通讯地址及化名。至此，段云鹏对于自己第一次潜京的活动颇为满意，不久即返回台湾。

几个月过去了，大陆方面尚无动静，段云鹏沉不住气了，他决定再次潜入大陆，为他所联络的特务们打气，督促他们采取行动。1950 年 4 月，一封信寄到了北京魏金山手中，段约他于指定之日赴天津会面。

5 月，魏金山按时抵津，由段云鹏的总交通曹玉静引路，在二道沟于振江家中见到了段云鹏等人。段云鹏指派王国庆去买做炸药的雄黄，并催魏同李万成赶快活动，魏当日回京布置，二十多天后，段云鹏再次来到北京。

6 月的北京浓荫匝地，风光迷人，但段云鹏根本无心欣赏任何风景，他已经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方案。让他高兴的是他偶然发现在朝阳门外推车卖劈柴的妻兄张兰亭，就暗中悄悄跟踪张回家，记下了住址门牌，几天后他找到了张兰亭及其弟张振仲等人，又通过他们找到了秘静轩，将这些人发展到了他的组织网中。他又通过赵友三找到了程立云(程沛然)，约他们和张兰亭等即期赴天津密谈。

随后，段云鹏又马不停蹄跑到朝外大街一元堂药店，买了配制炸药的雄黄。入夜又潜入魏金山家，命他将李万成找来，自己口述，让李万成给北京靳某写一封恐吓信，并说靳家在北洋政府时代当过大官，很有钱，最近还新买了一座楼房，敲诈他，可解决活动经费不足。几天后见靳家无动静，段迫不得已，又派人找来魏金山，向他借了钱，遂返回天津。

不久，程沛然和赵友三来津与段相见，段当即任命他二人为北平行动组正副组长，任务是发展组织，搜集中央领导人和著名人士的住址、车号等情报，伺机暗杀，对工厂、企业和公共设施进行爆破，并决定通县刘氏夫妇及张文起三人归程、赵领导，要求他们回京后继续发展组织，并布置程也给靳某写一封敲诈信以解决活动经费。

不数日，段云鹏又与张兰亭、张振仲及原伪专署特务队长王惠民三人在天津黄家花园会了面，他们商议了购买枪支搞武装和破坏活动等事。因缺乏经费，段云鹏让他们先搜集情报和下乡搞武装组织。

段云鹏这次潜入大陆收获不小，但苦于没有行动成果。偏巧他在北京时，朝外大街辅华火药厂发生了大爆炸事件，段云鹏返台后即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谎报是他指挥潜伏人员搞的，为此，保密局奖给了他港币三万元。

段云鹏坐镇台湾遥控大陆潜伏特务的活动，在金钱的刺激下，这些特务分子猖狂活动起来。天津的特务小组已发展至十余人，其中一人还是天津市公安局消防队队员。这伙人用自制的小炸弹试炸过有轨电车道，因药力小，未造成破坏，他们还多次策划炸工厂、电影院和公安局的宿舍，曾几次到现场勘查，因遇上巡逻的或来往人多而未敢下手。北京已有三伙特务组织。魏金山、李万金一组于1950年7月已密探到五位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与程沛然打听到的基本一致，这年9月，段云鹏第三次潜入天津，通过总交通曹玉静

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密写后带回台湾。张兰亭一组则以卖劈柴为掩护到京津南苑天津八里台机场刺探了飞机和机场工作人员情况，张还化名张香圃赴河北省香河县城子河，密谋在乡下搞武装活动。程沛然一组最为猖狂，1950 年 8、9 月间，为了解决活动经费，程、赵伙同刘珍、张文起四人，先后六次夜入民宅进行抢劫，抢走了大量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在此期间他们还收集了人民机器厂干部枪支配备情况、天坛粮库的储粮和警卫情况。这年 10 月段云鹏又一次潜入天津再次会见了程沛然，告知他保密局已升他为少校组长。程将绘制的中南海内首长位置图交给了段，段大为赞赏，令他赶快行动，并说台湾有规定，刺杀一名中央领导人给金条十根。段回香港后不久又给程汇来港币八百元作活动费，曹玉静按照段云鹏的布置从天津带来配制炸药用的原料硝酸钾交给了程，程、赵二人按照段云鹏所教的方法制成了炸弹，由刘珍带到通县的一个河套内试爆，因配制方法不对未能成功。他们还几次去长安戏院进行观察，策划当中央领导人出入时爆炸暗杀。段云鹏获悉他在大陆门徒的活动情况，喜不自禁，他知道，只要有一次成功，对他来说就是莫大的"战功"，他得意地等待着捷报频传。

但他没有料到，在他第三次潜津前，我公安部门已收到了情报，正张网以待，准备将这伙匪特一网打尽。经过一系列艰苦的调查取证，于 1951 年 2 月 4 日，将段云鹏布置在京、津、通县三个地区的匪特数十人全部抓获。1951 年 5 月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审阅了此案，指示北京、天津市公安局：段云鹏对首都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威胁极大，要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他。为此，公安局提出了捕段方案：一、利用段云鹏在香港的至友张某(贩卖毒品起家，在京曾开设旅馆)捕段。张在北京有家属，曾与中央察北地区禁烟局有往来联系，政治上反对新中国的倾向，他本人在港估计会与段来往，可以通过张的小老婆对张做工作，进而创造条件捕捉段。二、对魏金山加强教育，在适当时机令魏给段写信，保持联系，发现段去找魏时

立即逮捕……北京、天津市公安局为此分别作出了布署，不出所料，1950年段在香港确实与张某有了往来，段还把张上报为保密局上尉情报员。至此他的一切行动都落入了我公安部门严密的监控中。

当大陆潜特大部落网(除魏金山外)的消息传至台湾，段云鹏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料到这次自己如此苦心孤诣并采取了单线联系的方法仍没能逃过我公安部门的法眼，功亏一篑，好在还有魏金山一人未被逮捕，当然他对魏也有怀疑，只是无法证实，他决定暂时沉寂一阵，以观动静。

这一沉寂就沉寂了两年。这期间祖国大陆日益兴盛，而蒋介石局促于台湾一隅越发气恼消沉，为了给自己打一剂强心针和扰乱大陆的安宁，他不时催促台湾保密局采取行动。毛人凤明知是飞蛾扑火，但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将段云鹏找来，要他再次潜入大陆，一是直接赴中南海行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二是恢复原有组织，并继续发展，从中网罗精干人员去香港受训后再予返回；三是建立大陆秘密交通和接收、存放爆破器材及电台的安全据点。段云鹏骤听此言，宛如听到天方夜谈，但看到毛人凤苦恼的神色，明知不可为也得为。他突然想起中南海内有一名花匠，是其旧友，或许可以通过此人设法潜入中南海内，执行暗杀任务。他当即向毛人凤发誓，此次行动，必抱"杀身成仁"之心，以报答毛对他多年的"知遇之恩"。但当他走出草山别墅保密局总部，看到那熟悉的青山碧野，他的心中一阵发毛——这次我难道还能平安回来吗？

1954年6月，段云鹏再次孤身一人偷渡进入香港，直奔张某的住处，这一消息迅速传到北京。罗瑞卿当即下令："立即严密布置，防止走露消息，对段务在必获"，并下令部署了公安部队调用两个团的兵力在边界堵截，发现段潜入后立即抓捕。北京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对魏金山的联系，只要段一出现，当即逮捕。

8月19日，段在港由一名“黄牛”领路，夜暮时分潜至九龙粉岭边界，企图伺机偷渡，但当该“黄牛”一人先行探路时，被港警发现抓走，段的这次偷渡没有成功。

段云鹏又化名张仁，以九龙大轮行副经理身份于9月14日经深圳转赴广州，刚一入境，即被十几人团团包围。段云鹏知大势已去，束手就擒，而此时在港军统正设宴款待助段潜入有功的张某呢。

数日后，段云鹏被押解进京审讯，在事实面前，他供认了自己的罪行。1969年10月11日，段云鹏被押解至天津处决。

（黎　霞）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民国三教九流归宿
作者=苏智良主编
页数=367
SS号=0
出版日期=